

淮上文丛

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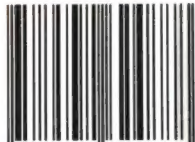
赵维平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

ISBN 978-7-5426-2488-8



9 787542 624888 >

定价：21.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 /赵维平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4

ISBN 978 - 7 - 5426 - 2488 - 8

I. 明... II. 赵... III. 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明清时代 IV. I 207.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6392 号

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

著 者 / 赵维平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陈志皓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田 波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8.875

ISBN 978 - 7 - 5426 - 2488 - 8/I • 309

定价:21.00 元



总 序

悠悠长淮,孕育古代淮阴灿烂的文明;浩浩运河,兼收南北文化的精华。

当四五万年前的下草湾文化、六七千年前的青莲岗文化印制出人类在淮阴活动的足迹时,在这片热土上诞生了第一个古国——徐国。徐国的建立者是淮夷,淮夷是东夷部族的一支。中华民族以华夏(炎黄)部族、东夷部族、苗蛮部族和北狄部族为主体。

在传说时代,东夷诞生了伟大的英雄后羿。后羿是弓箭的发明者。按照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说法,发明弓箭是人类进入高级蒙昧社会的标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必然阶段(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第 9 页)。后羿敢于挑战太阳,作为后羿的传人,淮夷自然有不屈不挠的英雄品质。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建立了熠熠发光的徐国。尚武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也是人类自我发展的第一个品质。这一血脉流淌千年,汨汨不息,浸润了淮阴人的灵魂。于是,在古代淮阴大地上出现了项羽、韩信等彪炳史册的大军事家。

尚文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需要。我是谁?当人类带着生存上的困惑追问这一问题时,精神上的诉求已悄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在发现下草湾、青莲岗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何尝感受不到先民们传达出来的审美要求呢?这是一方充满了创造力的文化大邦。走出

淮阴，为民族文化添上绚丽的一笔，是一代又一代淮阴人的梦想。从这里出发，我们的先民们开创了淮阴灿烂与辉煌的文明。正是有了这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传承，才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了汉代辞赋大家枚乘、枚皋父子，南朝文学家鲍照、宋代诗词家张耒、南宋画家龚开、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清代画家边寿民（扬州八家之一）、清代女弹词家邱心如……当枚乘《七发》开一代新风时，有多少赋家为此竞折腰。由模仿《七发》创“七林”体，散体大赋成为一代文学之胜，是枚乘高举起辞赋革新的大旗。

淮河是淮阴的母亲河，像黄河、长江哺育中华民族一样，淮河也哺育了淮阴。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托起了淮阴人永远挺立的脊梁。淮阴是“浮在水上”的土地，淮阴有四分之一的面积是水（古代的水面更大）。从空中俯视淮阴，那烟波浩淼的洪泽湖如同振翼高飞的天鹅……淮阴水网密布，五龙口汇聚了柴米河、六塘河、盐河、古黄河、运河等波光粼粼的大河，赋予淮阴比江南水乡更秀美的风光。

还是谈谈大运河吧。大运河是淮阴走向繁荣的大动脉。自隋炀帝开挖大运河以后，淮阴成了隋炀帝游兴江都的必经之地。淮阴运河古已有之，早在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挖了古运河邗沟。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南开挖大运河，连接邗沟通往江都。元代以后，北方隋开运河淤积，遂废弃不用。从此，杭州到北京的运河成为中国最繁忙，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人工河流。

运河的作用太大了。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大都（今北京），可是，天下取之不竭的财富又在江浙。“苏湖熟，天下足。”要想用最经济的手段把江南钱财运往北京，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漕运”。漕者，槽也。平地开挖的大运河如同马槽状。通过水路征调沿途



各地的粮食、布帛、食盐、茶叶、铸钱等入京，给大运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生命线，元明清三代的国家财政收入有一半以上靠漕运实现。为了保障国家财政，明清两代在淮阴设置了漕运总督府（旧址在今淮安市楚州区）和河运总督府（旧址在今淮安市清浦区）。漕运总督府与河运总督府相隔仅二十多里，同属一地，一个地方有两个总督府，在明清两代极为罕见，故淮阴又有“运河之都”的称谓。

在这条黄金水道上，淮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淮阴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部，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淮阴最为重要的水陆码头是清江浦。当时，小小的清江浦约三十万户人家，以一户五口计算，人口超过百万。清江浦一时名声大震，“南船北马舍舟登陆处”遂成为清江浦的美誉。此外，古镇河下也是十分繁忙的水陆码头。漫步在河下镇青石铺成的小街上，不时地可以听到明代状元沈坤抗击倭寇的故事，吴承恩撰写《西游记》的故事……这是一方乐土，开启乾嘉学派的大师阎若璩客居在这里，为发现甲骨文作出杰出贡献的刘鹗、罗振玉寓居在这里……当我们走进刘鹗、罗振玉的故居时，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守着青灯黄卷奋笔疾书的形象。

翻过历史，走入近代。面对民族深重的危机，淮阴人又书写了新的一页。为抗击英国入侵者，关天培勇守虎门炮台；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南社英俊少年周实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还有一代伟人周恩来，为救国救民高唱着“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雄浑诗篇，走出了淮阴。历史的烟云从我们的眼前滚滚而过，我们感受着淮阴，读解着淮阴，淮阴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书写了重重的一笔。

出于对乡贤的敬仰，我们——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

科的同仁有志于发扬光大淮阴优秀的文化传统,决定将我们的学术成果奉献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月当楼。”(白居易《赠楚州郭使君》)这一富有诗情画意的诗句既道出了我们对淮阴的深厚感情,也是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淮上文丛”的原因。

需要交待的是,淮阴师范学院坐落在文化名城淮阴的中心,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于2004年被批准为江苏省普通高校重点建设学科。近半个世纪以来,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先后出现了于北山、周本淳等知名学者,他们的《陆游年谱》、《范成大年谱》、《杨万里年谱》、《诗话总龟》(校点)、《唐音癸签》(校点)、《震川先生集》(校点)等至今为学术界津津乐道。

薪火相传。近年来,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继承老一辈学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的基础上,在秦汉文史、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等领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使学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书轨新邦,英雄旧里。”(宋苏轼《淮阴侯庙记》),踵先贤之旧履,续淮阴之新章,是我们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人的心愿。

张 强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日

总序 / 1

导论 运河文化哺育了明清小说 /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运河的发展演变 / 11

第一节 先秦两汉时代的运河 / 11

第二节 隋唐时代的运河 / 16

第三节 元明清京杭大运河漕运与管理 / 19

第二章 运河与中国政治中心东移 / 22

第一节 隋唐以来都城的逐渐东移 / 22

第二节 运河促进中国东部繁荣发达 / 27

第三节 中国历史上三次北人南迁 / 31

第四节 东南人才日益担当社会重要角色 / 37

第三章 运河与中国经济重心东移 / 43

第一节 古代农业与漕运 / 43

第二节 运河商埠的崛起 / 47

第三节 运河货运与天下物流 / 52

第四节 盐业生产和运销 / 55

第四章 中国文化中心东移 / 59

- 第一节 运河流域传统文化 / 59
- 第二节 运河流域市民新观念 / 65
- 第三节 运河流域出版业的兴盛 / 69

第五章 明清运河流域主导性文学创作 / 74

- 第一节 明清运河流域的诗文创作 / 74
- 第二节 明清运河流域的戏剧创作 / 79

第六章 明清运河流域小说 / 86

- 第一节 明清小说与吴越文化 / 86
- 第二节 明清小说与燕赵文化 / 93
- 第三节 明清小说与齐鲁文化 / 110

第七章 《三国演义》和运河文化 / 135

- 第一节 孙吴坐断江淮运河之利 / 135
- 第二节 刘蜀未尽西部运河之利 / 143
- 第三节 曹魏尽有北方运河之利 / 152

第八章 《水浒传》与运河文化 / 158

- 第一节 《水浒传》所写的梁山泊 / 158
- 第二节 方腊割据江南和宋江平方腊 / 164
- 第三节 作品中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 169
- 第四节 作者生活阅历与小说情节 / 175

第九章 《西游记》与运河文化 / 181

- 第一节 作者生活阅历与小说成书 / 181



第二节 取材运河流域的几个章回 / 186

第三节 《西游记》反映的运河文化 / 190

第十章 《金瓶梅》与运河文化 / 199

第一节 《金瓶梅》是运河文化产物 / 199

第二节 《金瓶梅》中的运河流域商务 / 205

第三节 《金瓶梅》中的明代黑暗世道 / 211

第四节 《金瓶梅》中的文化娱乐生活 / 218

第五节 《金瓶梅》与明代艺人生存状态 / 221

第十一章 《红楼梦》与运河文化 / 228

第一节 作者生活经历和作品自传成分 / 228

第二节 《红楼梦》以运河流域为背景 / 232

第三节 《红楼梦》与北运河文化 / 243

第十二章 《儒林外史》与运河文化 / 250

第一节 作者在南运河流域的生活 / 250

第二节 《儒林外史》中的运河客运和货流 / 255

第三节 《儒林外史》中的运河都市风情 / 257

第四节 《儒林外史》中的运河流域士林 / 261

参考书目 / 272

后记 / 274

运河文化哺育了明清小说

明清小说的主体是运河流域小说,运河流域的社会生活是明清小说的主流题材。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得到说明。

一是运河流域小说在明清小说中占的比重和分量。朱一玄等人编著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是一部收录最全、提要精到的小说总目,书中著录明清文言小说 1308 部,其中 113 部同书异名,实际著录 1185 部。在这 1185 部明清文言小说中,有 219 部不明作者籍贯或无法断定小说背景,能够断定作者籍贯或判断小说背景的 966 部。在这 966 部能够断定作者籍贯或判断小说背景的明清文言小说中,有 667 部出自运河流域(包括今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等六省市)文人之手,占 69%;263 部出自非运河流域文人之手,占 27%;另有 31 部为非运河流域作家写运河流域生活或在运河流域创作小说,5 部为作者不详但作品一定程度反映运河流域生活,共占 4%。该书收明清白话小说 1826 部,其中约 704 部为异名同体小说,实著录约 1122 部。在这 1122 部明清白话小说中,有 411 部小说作者不详且题材看不出地域特征,占总数的 37%;313 部出自运河流域文人之手,占总数的 28%;282 部作者不详但题材涉及了运河人事,占总数的 25%;116 部出自非运河流域文人之手,只占总数的 10%。

二是运河流域小说在当代研究领域的涉及率。能步入当今古代文学研究殿堂的明清小说,多数出自运河流域文人之手。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所属“明代文学”、“清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三编,章级标题提及明清小说九部(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按照该书观点,全部出自运河流域文人之手。《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祖籍东原(今山东东平),流寓杭州”。寄居杭州期间完成了小说创作;《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明人除了较为一致地肯定他是杭州人外,其他未曾提供一点可信的材料”;《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的说法就几乎成了定论,此后出版的小说和史论,一般都将《西游记》归之于吴承恩的名下”,而吴承恩是“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古称‘兰陵’之地有二:一为今山东峄县,另一为今江苏武进县,现在尚难考定何者为是”。但为运河流域人应该是确定的,小说描写运河流域富商生活谁也无法否定;“三言”的“编著者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等,长洲(今苏州)人”;“凌濛初编著了《初刻拍案惊奇》(刊于1628年)和《二刻拍案惊奇》(刊于1632年)各40卷”,“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大半生陆续写作出来的”,蒲松龄“生于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吴敬梓“安徽全椒人。移家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在穷愁困苦中完成”,“在移家南京之后写作的,大约在乾隆十四年(1749)49岁时已基本完稿”;《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长在南京,少年时代曾经历过一段富贵繁华的贵族生活。在他十三四岁时,随着全家迁回北京”,“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他以坚韧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楼梦》的写作与修订”。九部小说全部被认为出自运河流域文人之手。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最后三编的节级标题提及明清小说八部:《封神演义》、《醒世姻缘传》、《水浒后传》、《镜花缘》、《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也都不同程度与运河文化相关。《封神演义》“是明代天启年间,由许仲琳、李云翔据民间创作改编而成”,许仲琳号钟山逸叟,应该是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人;《醒世姻缘传》“是用山东中部方言作成,故事背景主要是山东济南府绣江县(章丘的别称)明水镇,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小说作者是明末清初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一位文人,小说作成于清初顺治年间”;《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1615~1671?),字遐心,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镜花缘》“作者李汝珍(约1763~1830),字松石,原籍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早年随兄移家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市),长期生活在淮南、淮北一带”;《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江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市)人,咸丰年间迁居山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趼人虽为广东佛山山人,但18岁即到上海谋生,32岁以后在上海和汉口从事新闻事业;《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字铁云,清江苏丹徒(属今镇江)人;《孽海花》作者曾朴是江苏常熟人。八部小说中七部出自运河流域文人之后。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最后三编的正文另外还提及明清白话小说共9个系列80部,其中67部产生于运河流域文人之手或描写运河流域人事,七部作者不详;提及明清文言小说53部,其中出自运河流域文人之手或写运河流域人事的36部,7部作者不详。

二

运河是封建王朝集权统治和帝王意志的产物,体现的是封建王朝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春秋时期吴国是当时开掘运河作为最大的诸侯国,其主要目的是为军事服务。东汉赵晔著《吴越春

秋》、宋代文言小说《吴越会粹》、宋元白话小说《吴越春秋连像平话》和明代章回小说《东周列国志》都写及这段历史,可见夫差利用运河穷兵黷武之一斑。夫差穷兵黷武虽然给当时吴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但为江淮经济的后来居上奠定了水运之利。

隋代是封建社会中期开掘运河作为最大的王朝,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沟通淮河与黄河)、永济渠(连接黄河与海河),疏浚了山阳渎(以邗沟为基础)和江南运河。于是,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二千七百公里呈“之”字形的人工水道出现在中国东部地区,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褚人获《隋唐演义》第三十七回写道:“如今好大喜功,既建东京宫阙,又开河道,土木之工,自长安直至余杭,那一处不骚扰遍了。只看这些穷民,数千百里来做工,动经年月,回去故园已荒,就要耕种,资费已竭,那得不聚集山谷,化为盗贼?”就是隋炀帝开运河劳民伤财的写照。开运河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却为唐朝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

元代建都北京,解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南北联系是元朝生死攸关的大事,其运河开掘之功主要是以“会通河”直接连接邗沟和大都,南来漕艘无须再远涉渤海或递转路运,可经由此河直达京都。元代运河与隋代运河相比,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隋代政治中心(东都洛阳)在运河的中点,而元代政治中心在运河的北端大都(今北京);二是隋代运河以洛阳为中心,通济渠是东南走向、永济渠是东北走向,整个运河是迂曲的,而元代运河功在打通山东,形成南北走向的京杭水道。元朝打通山东运河,从南方运粮直达北京,为明清两朝所承继。

运河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对中国古代的巨大效益不仅仅体现在漕粮运输上,而且体现在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上。运河对中国古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城市大多出现在运河沿岸。隋唐建都长



安,同时以洛阳为东都,长安在当时运河的最西端,洛阳在当时运河漕运的中点,长安、洛阳也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褚人获《隋唐演义》第十七回写隋末长安的娱乐体能活动,第二十七回写洛阳杨帝行宫,都极尽繁华和富贵之态。唐朝运江淮的米接济关中。沿河的楚州(今淮安)、扬州等城市得到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扬州,当时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赞誉。汴梁因城内有汴水、蔡河等运河流过,从江南运粮方便而被北宋定为都城,经过百年升平发展繁盛一时,被《水浒传》描写为“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的文化昌明之地。元代以后,沿京杭大运河自北而南,屹立着运河沿岸都市依次是北京、德州、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南京、苏州、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当时运河沿岸城市,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城市;尤其是晚清迅速崛起的天津和上海,占尽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先机。

二是运河流域逐渐成为重要的商品生产基地。运河北端的天津是盐业基地,并成为皮货流通中心,山东境内的临清、济宁成为货物流通集散地,运河中游的淮安成为船舶生产基地,扬州成为竹器、漆器和食盐生产流通中心,江南的松江(今属上海)一带成为棉布生产基地,苏州成为丝织品生产和流通中心,运河南端的杭嘉湖三州成为商品粮生产基地、生丝生产中心。明代商品经济萌芽最早最典型地出现于运河流域,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八写道:“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子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仁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第十卷所写的河西务,“这镇在运河之旁,离北京有二百里田地,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舟楫聚泊,如蚂蚁一般;车音马迹,日夜络绎不绝。上有居民数百余家,边河为市,好不富庶”。一定程

度反映了运河给两岸商品生产和商业经营带来的繁荣。

三是运河流域城市诞生了当时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宏大的印书行业,成为文化中心。南宋迁都和靖康之乱,使宋代的藏书损失惨重,绍兴九年开始筹划重新刻书。杭州以其纸张好、雕版印刷水平高而成为当时刻印、出版、发行、校讎的中心,并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等三大刊书系统。元代杂剧前期中心在大都,后期中心在杭州,说明京杭两地文化设施的健全、市民娱乐需求量大和印刷业的发达。明清印书业更为集中在江南运河流域,仅江苏书坊刻书业来说,就有九如堂、三多斋、大业堂、世德堂、周曰校、荣寿堂、天许斋、叶敬池、衍庆堂、五雅堂、尚友堂、贯华堂、萃文书屋、翼圣堂、仁寿堂、书业堂、甘朝士局、宝翰楼、崇德书院、绿荫堂、绿慎堂、聚文堂、宝文堂、掌珍楼、艺古堂、爱日堂等,都有多少不等的作品刊刻问世。

明清时代小说作者的文学创作艰苦卓绝,小说读者的欣赏活动趋之若鹜。

明清经典小说的作者创作态度严肃,精雕细刻,一丝不苟。世代积累型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吴承恩、施耐庵,面对前代纷繁芜杂的正史稗史、小说话本和戏剧资料,以公正严谨的态度进行融会贯通、想象发挥和穿针引线,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奉献给世人以卷帙浩繁、情节离奇生动、人物栩栩如生小说作品。文人独创型小说的作者呕心沥血,苦心孤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晚年索居北京西郊,在“满径蓬蒿”、“举家食粥”的生活中,以坚韧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楼梦》的写作与修订,“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终于写成“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传世杰作;《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在毕家坐馆的日子里仍然执著地写作,直到年逾花甲,方才逐渐搁笔。

新兴的通俗小说在明清有广大的读者,这从它在当时的传播



与出版后的热销可以看出。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中描写了《三国志演义》问世后历史演义创作的盛况,说:“小说多琐事,故其节短。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①通俗小说热销,印刷小说又有利可图,各书坊便争着物色作者,收买小说作品。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中说:“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②《古今小说》的编纂,是应书贾之邀进行的,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中说:“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③《拍案惊奇》的编创,也是因冯梦龙“三言”的畅销,书商看好,而邀约凌濛初写作的。至于《二刻拍案惊奇》,同样是“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抄撮成篇,得四十种”(《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并以较短的时间成书出版的。

运河文化哺育了明清小说,明清小说光大了运河文化。

运河文化哺育了明清小说表现在:一是政治中心落户运河流域,为运河流域明清小说家提供火热的时事政治素材。明代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陪都保存下来,南北二京各保留了一套政府机构;清朝定都北京后,南京作为不愿与满清统治者合作的汉族文人心目中的都城,南北二京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趋向。但无论南京还是北京,都是运河流域重镇,这里政治信息最敏感,斗争最激烈。明清时事政治题材小说和借历史写时事的小时,如明代

① 《冯梦龙诗文(初编)》33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②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9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同上111页。

陆应旸的《樵史通俗演义》写苏州人民反对魏忠贤的斗争，孙高亮的《于少保萃忠传》写于谦以领导军民保卫北京、捍卫社稷为中心的波澜壮阔一生，清代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写清兵入主中原过程中杀戮人民的累累罪行，连梦青《邻女语》写八国联军进北京给运河流域人民带来的灾难，都得益于作家身在运河流域的地域优势。二是经济重心落户东南，漕运和盐政，白道和黑道，做工和经商，商品经济和资本萌芽，水匪恶棍和沙场健儿，读书为官与经商致富，明清时代运河流域社会生活领天下风气之先，为小说提供了惊世骇俗或缠绵悱恻的生活素材。《金瓶梅》写运河流域官商一体、黑白并行的西门庆的暴富经历，“三言二拍”反映明代运河流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大批商贾的传奇人生，都是对运河流域经济生活的形象描述。三是文化中心在东南形成，既为明清小说提供了素材，如《儒林外史》的作者长期生活在南京、扬州，得以写活了运河流域读书人的不同人生；又为明清小说提供了市场和印刷条件。

明清小说光大了运河文化表现在：一是展现了运河流域韵味独特的风俗人情。如《西湖二集》对杭州风俗民情的描写。该书卷十四《邢君瑞五载幽期》介绍了杭州清明节戴柳的风俗，颇有趣味：“西湖之盛，莫盛于清明。清明前两日名为‘寒食’。杭州风俗，清明日人家屋檐都插柳枝，青萋可爱，男女尽将柳枝戴在头上。又有两句俗语道得好：‘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小孩子差读了道：‘清明不戴柳，死去变黄狗。’”使读者领略到了吴越风光旖旎、韵味独特的地域风情。二是展现了运河流域人的精神气质。燕赵人的慷慨悲歌，《隋唐演义》第九十四回所写的南霁云“魏州人氏。其为人慷慨有志节，精于骑射，勇略过人”，雷万春“涿州人氏”，二人在安史之乱中随张巡死守睢阳。绝境之中突围求救于人，“霁云大哭道：‘仆来时睢阳城中，已不食月余矣，今即欲独食，安能下咽！大夫坐拥强兵，并无分灾救患之意，岂忠臣义士之所为乎？’因发狠，自咬下一指，以示进明道：‘仆已不能达主将之意，请留此指以示

信，归报主将与同死耳！’一时指血泪血，有如泉涌，座客俱为之挥涕。”然后杀回睢阳，城破被俘，“万春、霁云俱骂不绝口而死”。齐鲁人的自强不息，陆人龙《醒世言》第九回《避豪恶懦夫远窜 感梦兆孝子逢亲》刻画的山东青州府安丘县王喜一家三口人便是他们杰出的代表。王喜为避祸远走他乡，妻子独撑门户养子成人，其子长大历尽艰辛寻得父归，后遇明君招贤以孝道卓越被荐为官，终于子荣父贵，全家团圆。吴越人机智灵活、勇于开拓。《初刻拍案惊奇》卷一写苏州商人文若虚，在国内做生意是“百做百不着”，他并未灰心放弃，而是将眼光投向海外，出海经商，用一两银子买了一筐橘子，到海外卖了八百两，后又在一个荒岛上捡来龟壳，内藏一颗大珍珠，出售给波斯商人，成为富商。

三

本书内容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明清小说的成就集中在运河流域的成因，包括：(1)政治中心效应。历朝都城沿黄河渐次东移，至明清两朝定都于京杭运河起点北京，表明中国社会政治中心落于运河流域。(2)经济重心效应。东汉末年以后，战乱总是在黄河流域(或者说中国北方)爆发并持续时间较长，江淮流域总是相对安定的史实，促使江淮流域经济后来居上，隋唐财赋来源开始依赖江淮漕运，明清两朝京城费用和“九边”钱粮主要靠江淮漕运支撑。说明明清社会经济重心在东南。(3)人才集群效应。中国历史上三次北人南迁，第一次是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期间，第二次是唐代安史之乱至唐末，第三次是金元灭宋过程中，都使西北汉人大量避难东南，从而导致东南文人密度增大和人口质量提高。(4)题材支持效应。东部运河漕运和盐业产销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两大命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最先在运河流域出现、发展，最易产生传奇故事，清官循吏治水理漕，劳动者做工经商发迹变泰，

贪官污吏无法无天,人民群众反抗强暴,都为小说提供了生活素材。

第二部分以明清小说典范作品为例,说明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密不可分:(1)《三国演义》所写东汉末年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的兴亡成败,本质上取决于各自着眼于运河之利建立前进基地和利用运河之利进取天下的自觉程度和实际效果。(2)《水浒传》所写梁山好汉聚义到败亡的故事情节,一定程度反映了北宋运河文化:宋江伐辽利用了北方运河,平方腊则完全在江南运河流域进行。(3)《西游记》所写玄奘出身、孙悟空和花果山原形等都有唐代运河文化背景。(4)《金瓶梅》人物活动背景在京杭运河流域,西门庆依托运河水道经商致富,运河流域是他施展拳脚的主要舞台。(5)“三言二拍”无论是前代话本,还是作者自创作品,反映运河流域人事者居多。(6)《红楼梦》所反映的文化尽管是多侧面的,但以运河流域特别是南北二京文化为主。(7)《聊斋志异》题材来源虽有设茶道边的传说,但多数作品取材于运河流域,其中真人真事作品来自于作者故土。(8)《儒林外史》写于作者 33 岁时迁居南京之后,人物原型多为南京、扬州士林。

运河文化反映了中国古代征服自然、创造生活、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对社会生活表现力最强、反映面最宽、开掘度最深的通俗文学。本书的撰写目的:一是阐发运河文化对明清小说的滋养,回答明清小说为何那么多地产生于运河流域;二是论述明清小说所反映的明清社会生活,阐明运河流域社会生活和明清小说的相得益彰关系。本书的知识创新表现在,既整体地研究运河流域明清小说的成就,宏观把握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的关系,又注重通过对明清典范小说与运河文化关系的阐述,使主要观点获得重要的典型支撑。其现实意义在于,通过揭示运河文明的内涵,通过明清小说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的挖掘,为当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借鉴,间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第一章

中国古代运河的发展演变

元代京杭运河南起杭州拱霞桥，北至北京积水潭，纵贯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六省市，全长 1800 公里，形成当时中国大地上惟一的南北交通大动脉。

第一节 先秦两汉时代的运河

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对先秦运河曾经有过概括的叙述。他说：自禹治洪水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飧其利”。^① 中国最早的两段运河是邗沟和鸿沟，都挖掘于先秦时期。

春秋时期的吴国有开凿运河的传统。泰伯做了吴国首领以后，首先在无锡市东约 15 里的梅村建立了吴城（又名泰伯城），史称梅里，并领导当地人民治水开渚。泰伯所开之渚，后来名之为“泰伯渚”。这是我国开凿运河的最早记载。由于泰伯渚的开凿，

^① 《史记》1196 页，中华书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本书所引二十四史，全部为简体字本。

当地的水运和水利条件大为改善,使吴地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吴国开凿运河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夫差在位期间作为最大。公元前506年,为适应对楚战争的需要,吴王阖闾沿荆溪上游向西开凿了一条名叫“胥溪”的运河。完成的当年,吴王阖闾便亲自率领军队从胥溪向楚国进军,攻破楚国都城郢。公元前495年,越国联楚攻吴。阖闾败死,他的儿子夫差做了吴王,派伍子胥开凿了一条从太湖向东经定山湖,然后流入大海的胥浦,三年后夫差率军攻打越国,初在夫椒打败越军,乘胜攻破越都。迫使越国屈服。后来,吴王夫差又开凿了一条从吴都姑苏向北至长江的运河,为后来江南运河雏形。

公元前五世纪末,当时江淮之间没有贯通的水道可走。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伐齐,与晋国争霸,根据国内开凿运河的经验,决定利用江淮之间的湖泊,开挖运河。把其中几个湖泊连接起来,形成沟通江淮的水路,缩短进军路线。公元前486年,在今扬州市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引长江水经过邗城城下向北,经武广、陆阳两湖之间注樊良湖。转向东北入博支、射阳两湖。又折向西,经夹耶(今宝应黄浦渠旧址)到末口(今淮安城北)入淮。这条运河因临邗城,被后世称为邗沟。公元前484年,吴国水军利用邗沟从水路进军,联合鲁国在艾陵(今山东莱芜县境)打败了齐国,随即乘胜转师西进黄池,同晋定公姬午会盟。连续两次胜利,吴王夫差更加相信利用水路进军可以出奇制胜。在西进会晋的行军途中,又在商鲁之间开辟了泗、汶航线。由泗水入洙水,由洙水入洸水(汶水的分流),凿成了黄沟运河。这样一来,吴国的大军从姑苏坐船出发,从邗沟进入淮河,再从淮河进入泗水,然后通过黄沟运河进入济水,就可以直达中原腹地。

吴王夫差开凿的这几条运河,虽出自军事目的,但对后来发展地方经济很有好处,受到了人们的好评。过去扬州市东北郊古运河畔的黄金坝附近,有过一座邗沟财神庙,庙里供奉的两位财神,

一位是西汉前期的吴王刘濞，另一位就是春秋末期的吴王夫差。扬州人认为这两个人对扬州经济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就把他们奉为财神，并立庙纪念。

鸿沟是战国时期的魏国对有关水道进行整治而开凿的几条运河的总称。秦汉之际，汉高祖和楚霸王曾经约定以鸿沟为界，暂时各罢干戈。楚汉分界中的鸿沟，只是鸿沟系统中的狼汤渠，并非是鸿沟的全体。《史记·高祖本纪·索隐》引应劭说，鸿沟在荥阳东南二十里；引张华说，谓此水本二渠，一渠东流，经浚仪（今河南开封市南）南，始皇灌大梁时所凿，就是鸿沟；别有一渠东至阳武县为官渡水。鸿沟的开凿，由荥阳引黄河水流向东南。由于分支很多，流经的范围也广，当时通到宋、郑、陈、蔡、曹、卫各国，下游分别和济、汝、淮、泗等几条河流相会合。那时宋国都于商丘，也就是现在河南商丘县。郑国都于新郑，也就是现在河南新郑县。陈国都城在今河南淮阳县。蔡国都城在今安徽凤台县。曹国都城在今山东定陶县。卫国都城在今河南濮阳县。也就是说，鸿沟的范围乃在荥阳之东，泗水之西，淮水之北，济水之南，包括今河南省的东部，山东省的西南部，安徽省的北部和江苏省的西北部。在鸿沟的总名下，分流出汴水、获水、狼汤渠、睢水、鲁沟水和涡水等河流。

秦国统一天下过程中，不断根据形势需要开凿新的运河。比较著名的有灵渠，初名秦凿渠、零渠，唐代以后改称灵渠，近现代又名兴安运河或湘桂运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湘江和漓江源头的崇山峻岭间。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分别对北方和南方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用兵。当时，活跃在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繁多而分散，秦时统称为越人或百越。秦始皇发兵五十万，在东起今江西省东部，西至今湖南省西南部的战线上，分五路全面攻伐百越。由于南越位于岭南，有着五岭天险屏障，秦军进攻很不顺利，虽然南越首府番禺已经攻克，但其他地方到处有越人的顽强抵抗，秦始

皇审时度势,鉴于征途遥远,山路崎岖,粮运十分困难,当即任命监禄率领士卒民夫开凿灵渠,连通湘、漓两江。从水路运送粮饷至前线。这一决策很及时。在灵渠开通前,秦军粮饷运输是从水路溯湘江而至上游,改从陆路越过分水岭,再改从水路自漓江上游而下,运至岭南秦军作战前线,水陆交替常常贻误战事。监禄受命凿渠历时五载而建成,有了这条从内陆直通岭南的水道,大批援军和粮饷得以及时运达前线,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彻底胜利。随即在那里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从此岭南地区纳入中国的版图。

西汉建都关中,是因为关中南北西三面天险,东面有河渭漕运关东粮食接济的便利。开国之初,高帝、惠帝、文帝、景帝奉行无为而治国策,每年通过河漕运抵关中的粮食不过数十万石,至武帝时连年对匈奴用兵,每年从关东运往关中的粮食,陆续递增到六百万石。由于朝廷对粮食需求量的快速增加,多运、快运粮食到关中已成为当务之急,其关键又在于水路运道的通航条件的改善。

当时从中原地区运送粮食到长安的水路运道是黄河和渭水。渭水发源于今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蜿蜒曲折地流经甘肃东部和陕西中部的丘陵地区,入陕后则基本上沿着秦岭北侧自西向东横贯整个关中平原,至潼关附近汇入黄河,全长八百多公里。其中宝鸡至咸阳一段,河道比较平直,咸阳以东特别是临潼以东,河床虽较开阔,但河道弯曲多拐折,而且水浅多沙,由关东地区开往长安的漕运船队,在弯弯曲曲的渭水中航行,加上又是逆水行舟,既费时又费力。大司农郑当时于元光六年上书汉武帝,建议在渭水南岸开凿一条走向与渭水平行的人工漕渠,以取代渭水的漕运地位。他说:“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武帝当即采纳,“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

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①。这条历时三年完成的漕渠，起自长安城西南的昆明池，并与附近的泂水连通，向东延伸，经长安、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和潼关，通至黄河，全长三百余里。由于全线位于地势平坦、秦岭北麓水流不断的地带，沿途又陆续接纳了漓水、浚水、灞水，因此渠内水量丰富，使原来从渭水运粮的九百里水路缩短了三分之二路程，而且可以通行装载五百至七百斛粮食的大船，大大地提高了漕运效率，从而使每年运到京师的漕粮，由一百多万石增加到四百万石，武帝元封年间更增加到六百万石之多。

东汉建都洛阳，当然是迁就于东南的产粮区，而洛阳连通东南粮区只有汴渠。西汉末年黄河溃决，“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加顷年以来，雨水不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滂濆广溢，莫测圯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②。至明帝方欲收拾横流，任用王景主持其事，“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积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遗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明年夏，渠成。帝亲自巡行，沿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③工程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治河，将河水泛滥形成的新河道裁湾取直，使之成为一条路线较直、有利于行洪的入海通道；然后自河南荥阳东至山东千乘入海口，在河道两岸修建堤防，防止河水泛滥和改道。二是理汴，清除汴渠中的淤泥，整修汴渠两岸堤防；修复和新建汴渠口和堤岸上的水门，使汴渠上每隔十里就有一座水门，以便调节渠水流量和水位，最后达到河汴分流、各行其道的目的。后来汉顺帝阳嘉年间，东汉又一

① 《史记》1198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② 《后汉书》79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③ 《后汉书》1666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次大举动工,由汴口一直至淮口,沿岸积石为堤,从事彻底整治。这些工程,保证了漕运的通畅,为后来魏晋继都洛阳打下基础。

东汉漕舟由汴入河,出河还须溯洛水抵都下。明帝时张纯为大司空,他另在洛阳城西南开了一道阳渠,引洛水入渠,东至偃师县,再归入洛水。阳渠走向基本上与洛水平行。它西起宜阳附近的洛水,向东延伸,在经过洛阳城时,有意识地沿着城池的西、南、东三面绕了半个圈,然后再东流至偃师附近注入洛水。由于阳渠的起讫点都连通着洛水,途中还先后接纳了洛水的几条支流如涧水、谷水、瀍水,阳渠开通后水量丰富;阳渠环洛阳城绕行并连通城内河道,形成水运网络,因此阳渠的开通既使漕船顺利抵达京城,又解决了京城的生活用水需要,使“百姓得其利”。后来洛阳屡为建都之地,跟阳渠之利不无关系。

第二节 隋唐时代的运河

北达涿郡、南至杭州的大运河的开凿是隋朝完成的。隋朝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沟通淮河与黄河)、永济渠(沟通黄河与海河),修浚了山阳渎和江南运河。于是,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二千七百公里呈“之”字形的人工水道出现在中国东中部地区,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隋代大运河在邗沟北端折向西北,然后在洛阳附近过黄河东北行至德州,虽然迂曲,但为后来元代在山东开河取直渠道提供了借鉴。

隋代运河工程,发轫于文帝开广通渠。文帝初即帝位,就命宇文恺在关中开凿渭渠。《隋书·食货志》描述开凿前的漕运情况说:“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操舟之役,人亦劳止。”^①后来宇文恺主持

① 《隋书》463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工程,“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这条渠道就是有名的广通渠。以广通渠为名,是由于经过华州广通仓下而得名。广通仓建于开皇三年,为关中水运仓库,与卫州的黎阳仓、洛州的河阳仓、陕州的常平仓同等重要。后来为避炀帝讳,改名为永通渠。

炀帝所开的运河有四条,即通济渠、永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四条运河中,通济渠下接邗沟,邗沟下接江南运河,通到长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连接江南财富。永济渠纵贯太行以东平原,单独通到涿郡,支持北方边防。开凿这些运河,有经济的目的,也有政治和军事考虑。东晋南朝虽偏安一方,长江流域的经济却逐渐得到发展,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及太湖流域更显得富庶,鱼盐杞梓之利,泽被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太行以东的北齐旧地处于黄河下游,相当富饶,所辖各州沿河有旧置粮仓,当地好年景一斛谷贱至九钱。而包括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在内的沿海各郡,煮盐业更有长足的发展,所得收入可以资助军国之用。其经济虽不逮长江三角洲及太湖流域,然隋初漕粮的取给,太行以东也是重要地区。永济渠的兴修适应了上述的经济形势。

唐代没有大规模地开凿运河,只对隋代运河疏浚整理,开凿较短的新运河。开凿或修浚了连接汉水、渭水的丹灞水道,联通关中和蜀汉地区的褒斜道、嘉陵江故水道,以及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灵渠和通达陇右的黄河汾水道等。唐代务实的漕运政策,为唐王朝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应有贡献。

从唐都长安到余杭水路,主要包括汴渠、山阳渎、江南运河及洛阳至长安黄河水运线。汴渠又称汴水,隋称通济渠,是连接黄河和淮河水道。由于汴渠直接与黄河相连,河水泥沙含量较大,容易淤塞。特别是与黄河相接的堰口若疏通不及时,黄河水就不能进入漕渠。因此,唐朝多次进行疏浚。唐初,每年初春就征发附近州县丁男,疏通堰口。开元二年,河南尹李杰“发汴、郑丁夫以浚

之”，以通江、淮漕运；开元十五年（727），玄宗命将作大匠范安及“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①。安史之乱，汴渠的疏浚中断，漕粮中断，京师匮乏，“时新承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官厨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畿县百姓乃授穗以供之”。^② 代宗宝应元年（762），刘晏充度支、转运等使，再次“疏浚汴水”，恢复了漕运，“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③。

山阳渚，隋朝时自山阳起至扬子入于长江。唐朝初年，长江三角洲向外推移，江面逐渐变窄，扬州以南与长江之间易为泥沙阻隔，漕船不得不绕道瓜步，损耗亦大。开元二十六年（738），润州刺史兼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齐浣改换漕道，从今扬子桥到瓜洲镇之间开凿新河。新河为邗沟增添了一个新的运口，既保证了行船的安全，又节省了时间和运费。修浚邗沟，扬州长史杜亚作为较大，他“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夹堤高昂，田因得灌溉。疏启道衢，彻壅通堙，人皆悦赖”^④。保证了江北漕路的畅通。元和年间，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在高邮湖筑堤为塘，又修筑富人、固本二塘，保证了邗沟充足的水力。

江南运河水资源最为丰富，它自京口至余杭，全长八百里。为了保证运河充足的水力，唐朝在江南运河南端的钱塘江口创设“长安闸”以防河水流失。代宗初年整治练湖，禁止引湖水灌溉田地，导湖入漕河；宪宗元和八年，常州刺史孟简于武进（今常州市）西四十里开孟渚，引长江水南注通漕，又于无锡南五里疏泰伯渚，东连蠡湖，以济漕运；穆宗长庆元年，引西湖水北出杭州余杭门外，流入

① 《旧唐书》1425 页，中华书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② 《旧唐书》2387 页，中华书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③ 《旧唐书》2388 页，中华书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④ 《新唐书》4034 页，中华书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运河。这些措施都提高了漕运能力。

唐代漕运通过三段人工运河到达洛阳,还得经过八百多里的黄渭水道才能到达长安。天宝元年(752),陕州刺史兼水陆使韦坚据隋代广通旧渠,于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这条漕渠西起禁苑之西,横断灞水和浐水,东至永丰仓附近与渭水汇合。文宗太和初年,咸阳令韩辽又自咸阳至潼关凿“兴成渠”三百里,不断改善了关中运道。

第三节 元明清京杭大运河漕运与管理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建都北京的大一统朝代,解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南北联系是元朝生死攸关的大事,曾先后探索和开辟过海运、陆路转运南北运输线,但都有明显缺陷。打通山东、直接淮扬运河,完成南北走向的京杭大运河,正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但自南宋末年,黄河泛滥溃决,先夺泗入淮,又夺淮入海,导致原有运河河道淤浅不能通航。元朝初年,南北诸运河只有江南运河、淮南运河以及御河部分河段能较顺利行船。元初的漕路即由江南运河入淮后,溯淮入黄至今河南封丘西南约三十里之中滦镇,转为旱运,到达淇门再入御河,运至直沽(今天津)沿白沙河至通州,最后陆运至大都。水陆交替,反复装卸,既费时且费力。因此,在原有运河的基础上,开凿新的便捷的运河河路,去湾取直,使之南北直航,便成为元代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随着元朝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南北大运河的贯通具备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元代京杭大运河,不同地处不同称呼。北京到通州叫通惠河,通州至天津叫白河,天津到山东临清叫御河,临清到东昌须城县叫会通河,自东昌须城县至长江口叫扬州运河,自镇江到杭州叫江南

运河。而贯通的关键是打通了山东境内的会通河。

(一) 明清运河与漕运

元末明初黄泛多次侵袭运道,元代开挖的济州河、会通河大都淤废,漕船只能沿泗水至鱼台。《明史·河渠志三》写道:永乐“九年二月乃用济宁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书宋礼、侍郎金纯、都督周长浚会通河”。动用军民工计三十余万,开浚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五里河道,恢复了它的通航功能。工程自二月至六月共用了百天。

会通河重修后,漕舟始达通州,南粮北运得到改善,运输效率显著提高。明各朝实录载,永乐间漕粮为二百五十万石左右,宣德年间为五百万石左右,正统年间为四百五十万石左右,景泰、天顺间为四百三十万石左右,成化八年确定为四百万石定额,“自后以为常”。

清代漕运承明制。明永乐以后,运河漕运繁荣长达四百余年,至清王朝道光三年,年供北京漕粮定额,正兑米(即直入北京仓库)三百二十万石,改兑米(即输通州仓)七十万石。除山东、河南负担约七十万石外,其余三百二十万石均由江、浙一带通过运河漕运到北京。

清道光四年(1824),黄水骤涨,河运艰难,张玉廷用三百万巨款整治,但一无所成。户部尚书英和提议:“河道既阻,重运中停,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虽一时之权宜,实目前之急务。……暂雇海船分运,则民力逸而生气益舒……以商运决海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①清宣宗采纳了这一提议,试行以商运代官运的新法。咸丰五年,河决兰考北趋,运河中断。海上输运兴起,漕运改折现金或以商运代官运,直至清王朝灭亡。

^① 《清史稿》962页,中华书局1998年1月第1版。

(二) 明清时代的运河管理

明清时期是京杭大运河的最繁盛时期,朝廷设漕运总督(驻淮安)和河道总督(驻济宁)。这时期设置的河漕机构规格高,分工细,作用大,经常受到皇帝的“眷顾”,许多官员也将任职河漕视为“肥缺”。明代初年曾仿元制,“尝置京畿都漕运司,设漕运使”(《明史·职官二》,本段引文同此),负责粮米贡品河运事宜。漕运使,正四品。下设知事(正八品)、提控案牍(从九品)等官员。永乐年间,“设漕运总兵官,以平江伯陈瑄治漕”,总兵官为军职,此即以军兵代理漕运防护事宜。至景泰二年,“因漕运不继,始命副都御史王竑总督,因兼巡抚淮、扬、庐、凤四府,徐、和、滁三州,治淮安”。这是正式设立的漕运总督,正二品,并兼任当地巡抚。二十年后的成化年间,任命的漕运总督不再兼任巡抚。嘉靖四十年,“改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①漕运总督兼任漕运军职,成为明代后期及其清代常见命官模式,军政合一在漕运管理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明代漕运总督属下还设有漕运行管机构漕储道(驻浙江),漕运军士防务机构——卫、所。为保障运河沿岸的漕运防务,运河沿岸重镇均设立了卫所。如:德州卫、临清卫、济宁卫、徐州卫、邳州卫、淮安卫、高邮卫、扬州卫、镇江卫、杭州卫等,其隶属关系并非全部属于河、漕衙门,但强化沿运防务是明代军事布防的基本宗旨。清代漕运防务较多地沿袭了明代晚期的设防格局,但又有调整。京杭运河“漕运总督部院署”仍驻节淮安,其下属防务机构有所加强。

^① 《明史》1183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

第二章

运河与中国政治中心东移

隋炀帝鉴于黄河三门峡天险漕运长安的不易,营造东都洛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南至杭州、北到涿郡的大运河。北宋鉴于漕运洛阳的险远,干脆以汴梁为都城,直接通过汴水、淮扬运河从江南运粮。元代定都北京,开挖山东运河直通江南,为明清两朝所继承,标明中国政治中心彻底移至中国东部。

第一节 隋唐以来都城的逐渐东移

我国古城之中,建都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有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被称为六大古都。它们为都时间不一,亦非依次更替。但披阅中国历史长卷,可以找出它们递嬗规律。首先,我国的都城是沿着黄河的流向由西向东迁移的,至黄河中下游汴梁,又沿着黄河的冲积扇向南北方向转移。这一递嬗规律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一致。其次,我国古都的递嬗轨迹,基本顺序是按长安、洛阳、开封、北京一线发展的。而南京(明初除外)、杭州则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汉族政权迁移江南而出现的都城。如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晋室南渡,司马氏在建康建都,划江自守。同样,金灭北宋,赵构借长江天堑,定都杭州,出现了南宋和金的对峙。因此,南京和杭州实际上都是地区性政权的都城。

历代统治者选择都城的原则是借此有效、长久地统治天下。他们主要是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和军事因素、民族关系以

及统治者的历史心理因素等方面来考虑,建立起他们的统治中心。而这些条件又往往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和谐地结合为一体的,同时各种条件和因素也都是在动态的变化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今天看是有利的因素,明天则又成为不利的条件了。择都是一个不停地寻找有利条件的过程。

周、秦、汉、唐先后建都长安,重要原因就是关中险要的山川形势。刘邦的谋臣张良曾说:“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①地形上退可以守,进可以攻,可以东制诸侯,即所谓“金城千里”;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并且“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经济上自成体系,是为“天府之国”。同时,交通便利也是重要原因,由长安东可通关东产粮区,西达西域,与“丝绸之路”相联,山川形势这样优越。同时,关中农业水平当时也超过中原和江淮。长安成为周、秦、西汉、隋、唐建都的最佳地选,反映了先唐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在西的实际。

当然,长安作为都城也有不利的一面,其地理位置比较偏西,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其弱点也愈益暴露无遗。主要是关中农业地位为江淮超过后,维持京中庞大的开支不得不靠漕运东南,而经黄河运粮过三门峡河道险峻,损失惨重。《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中宗景龙三年有如下记载:

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覡影君卿等说上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乃止。^②

① 《史记》1632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② 《资治通鉴(中)》1452页,团结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

关中农业优势为何渐不如人？首先，古代人们对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茫然无知，故率先开发的地区往往就是植被最早受到破坏的地区，也是人类最早接受大自然重罚的地区。秦汉时关中处在开发阶段，植被尚未破坏，《汉书》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①。汉武帝元鼎二年关中水灾，诏曰：“今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②可知当时关中地区的森林覆盖是蔚为可观的。北周以后，曾大量移民关中，关中成为人户殷繁的狭乡。按唐律，准狭乡之民迁徙宽乡，但贞观初崔善为上表称：“畿内之地，是谓户殷，丁壮之人，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此则虚近实远，非经通之议。”^③从此关中人口不得外徙，密度日增，仅建筑和柴薪就会使森林很快毁掉。唐高祖初入长安，樵薪贵而布帛贱，刘世龙建议“采街衢及苑中树为樵以易布帛”（《旧唐书·刘世龙传》），似唐初关中林木已显匮乏。唐玄宗以后，关中地区已经木材紧张，建筑用材要到岚州（山西岚县一带）和胜州（内蒙河套东部）采市。唐敬宗欲造二十只竞渡船，船材则是从淮南运到京师的。自唐中叶以后，关中地区视木材为奇货，甚至在长安坊内隙地种植榆材，亦可获厚利而致富。可见关中地区森林植被的毁坏，隋唐时期是一转折。

众所周知，森林是维护陆地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是调节自然界物质和能量正常循环的主要机制，失去了森林保护，关中地区自然灾害日趋频繁。据董咸明《唐代的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统计，自武德七年至开元二十九年的一百多年里，京畿地区旱灾十次，水灾七次，蝗灾三次，计二十次；都畿地区旱灾一次，水灾十二次，共十三次。受灾程度和次数，京畿地区高于都畿地区，而都畿

① 《汉书》1312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② 《汉书》130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③ 《旧唐书》3462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地区又高于淮南和江淮地区。洪水和干旱的结果，一方面是水土流失，土地日益贫瘠化，另一方面则是水源枯竭，水利灌溉事业衰退。秦汉时，郑国渠灌溉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汉武帝时修白公渠，溉田四千五百余顷。此两渠为关中最重要的水利设施，当时大得其利，故当时有歌曰：“郑国在前，白渠在后，举耜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汉书·沟洫志》）汉代关中的农业生产有多么发达。可到唐代永徽六年，郑白二渠总灌溉面积只剩下一万顷，至北宋至道元年，总灌溉面积不足二千顷。所以，宋以后的关中失去建都的条件。

而洛阳，雄居于伊洛盆地，四周也有山河之固，东据成皋，西阻轂、澠，背倚大河，面向伊阙，“形胜甲于天下”（《读史方輿纪要·河南府》），但若与长安相比，其所处伊洛盆地不如八百里秦川为优。但它从东部运粮比长安要方便得多，洛阳处于黄河流域的中枢，北控幽燕，南通江淮，西接关陇，东抵大海。地理位置居中，从经济上说，漕运方便，且交通也方便。正因为如此，西周、隋唐定都关中的同时，都以洛阳为东都，而东汉、魏晋干脆以洛阳为都城。隋炀帝则以洛阳为中心，开通了南达苏杭、北抵幽燕的大运河，从而加强了与天下的联系。

开封，地处平原，地势开阔，黄河、汴河、蔡河、广济河水运方便，以汴梁为都城，通过汴河可以解决京城的物资供应问题。北宋定都开封还有其历史原因，首先自从隋炀帝开运河之后，开封居于运河的中心，其地位不断上升。到唐末五代时，开封已经具有了洛阳不可比拟的优势。其次，自唐代以后，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日渐衰落，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则日益强大起来。于是汉族王朝军事防御的重点开始从西北转移到东北，这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也迅速南移东移。所以北宋定都汴梁，适应了中国经济重心东移的客观形势。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南岸，江山险要。北靠慕府山、乌龙山，东北以钟山、黄龙山、青龙山为屏障；南有岩山、牛首山，东南有巍峨的紫金山，气势磅礴，恰似蟠伏的蛟龙；北临长江天堑，西有石头山临江而起，岩壁陡峭，地形险恶，好比猛虎雄踞于江畔。不仅如此，南京地区还有秦淮河、玄武湖等众多的河流湖泊萦绕南北，构成古城的护城河或自然保护带。又地在江南经济发达区，江北是广阔的江淮平原，东南与富饶的太湖平原和钱塘江流域毗邻。自秦汉以来，长江下游逐渐得到开发，南京及其周围地区不仅农业发达，而且手工业、商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南京由此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总汇。所以六朝和明初定都南京，对黄河流域形成有效的进取态势；明初建都南京，完成一统大业；清朝定都北京后，南京成为怀念明朝的在野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心。

杭州是一座最美的都城，处于河网交织的杭嘉湖平原上，大运河的南端，东有钱塘江入海口，地势平坦，土沃水肥，河流纵横，农业发达，物产丰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但它既远离北方，也不临近长江。对统治北方广大地区而言，鞭长莫及。这里只能作为坐断东南半壁江山、南北分裂时期地区性政权的都城。

中国政治中心的最后选择是北京。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共选都城，一是元清两朝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北京离他们的发祥地较近，且处于新王朝版图的适中位置。元明清三代是中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时期，而北京恰在中原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交界处。二是北京有一定经济基础，东周时，北京地区得到一定的开发，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朝统一全国后，修建了万里长城，蓟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隋朝时曾改名涿郡，隋炀帝修通大运河，涿郡又在运河的北端，从此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发展。三是京杭运河开通后，通过漕运能有效地从江南获得财赋。明清两代东南漕运粮食一般年份为四百万石。明政府所设二十多个织染局，半数在运河区域。清代所设北京、江宁、苏州、杭州等织



造局全部在运河线上。明代在运河上所设钞关的商税收入年达八九十万两,清代康熙年间增加到一百四五十万两,占全国关税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这说明北京与全国经济中心联系紧密。

第二节 运河促进中国东部繁荣发达

隋唐时期开始运江淮的漕米接济关中。沿河的楚州(今淮安)、扬州等城市得到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扬州,当时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赞誉。据《隋书·地理志》记载,隋代江南七郡在炀帝时代尚不过12万余户,而据《新唐书·地理志》,唐代江南九州(地理范围同隋代江南七郡基本相同)在天宝年间却激增到69万余户,人口达473万多人。到五代时候,吴越王钱镠大兴水利,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有飞跃的发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开始出现。两宋时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号称“苏湖熟,天下足”。元灭宋不久,关汉卿自大都来到杭州。杭州城市的繁华令他震惊不已,作曲曰:“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南昌·一枝花])而明代唐伯虎眼中的苏州则是一个“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阊门即事》)的富贵之区。江南地区由偏居东南的落后地带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一跃而为令人称羨的先进地区,原因固非一端,而漕运驱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明清时期,运河对沿岸的冀东、鲁西和苏北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也非常显著。运河既为朝廷运粮河,民间商船利用率本不高,但为优恤运卒和民户,明朝政府逐渐准许漕舟免税搭载私货并在沿途码头贩卖。漕舟数目巨大,如明代天顺间“船数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于是大量土杂货物随舟涌向沿途城镇,推动一批沿河城镇发达起来,如通州、直沽(今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等。以济宁为例,明末人称“济当南北咽喉、子午要冲,

我国四百万漕艘皆经其地。仕绅之與舟如织，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者，又鳞萃而猬集。即负贩之夫、牙侩之侶，亦莫不希余润以充口实。冠盖之往来，担荷之拥挤，无隙晷也”^①。道光年间《济宁州志》云：“其居民鳞集而托处者，不下数万家；其商贾踵接而辐凑者，亦不下数万家。”^②在运河沿线，也有一些小镇，如京城东南的河西务、微山湖西北端的南阳、淮河与运河交汇处的清江浦，都由于交通地位的重要而成为较大的商业城镇。

运河对沿岸城市商业繁华街区的形成有促进作用。沿河近桥及城市入口等交通便利处勃兴的各种“行”和“市”，便是新的商业街区。从理论上不难倒推运河对商业繁华街区转移的重要影响，而历史事实也有很多有力的证据。元大都积水潭既是整条南北运河的终点，也是南北物资的集散之地，其近旁的斜街则凭地利之优发展成为全城的商业中心。明清时期，苏州的阊门为运河码头之所在，四方之货汇集，成为商业繁华的地方。有谚云：“天下之货莫不聚于苏州，苏州之货莫不聚于阊门。”阊门外南濠之黄家港，到清代时已是“人物殷富，阊阖且千，鳞次栉比”。扬州原在蜀冈建城，唐代以后在蜀冈下运河边逐渐形成一个工商业者的聚居区，于是在此地筑罗城，与蜀冈上的罗城相连。至宋代则建大城，扬州城经济重心进一步向运河岸边移动。明代嘉靖年间修筑新城，扬州繁华之区完全与蜀冈脱离。淮安原在山阳建城。有元一代，古城荒凉破败，释大欣在《庚午秋过淮安》一诗中有“百感嗟何及，行人过楚州”的感慨。而运河所绕过的古城北的北辰坊一带却出现工商业聚集的繁盛景象，新城也随之在此建立。济宁的城池元代以前在今天运河以南的南池一带，地势低洼，雨水极易浸潦，不便转漕

① 转引自魏梦太：“试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沿岸城市经济”，《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第10页。

② 同上。



和仓储。宋金以来,由于汶泗相通,在后来的运河北岸形成建城的条件,金代曾移州治于此,但当时并没有形成城市。待元代京杭运河贯通后,运河北岸迅速成为济宁的交通和商业中心,新城随之建立。

交通运输是商业发展的首要前提,交通促进商业的发展,商业、交通二者又势必促进沿河商埠的发展。由漕运所引出的仓站、闸站和支运、兑运的接交处,无疑是人口集中之地。江河交叉口、水陆交会处,车船会聚。既有人口车船之聚,当有车船人口日用之需。于是酒楼饭馆、旅舍客栈、商铺货店、码头驿站、配套的经济行业随之而兴。过去的荒丘野地,此时成了繁荣小镇;过去小村僻庄,此时成为重镇都会。天津、临清、济宁就是这样迅速崛起的。

天津金朝时叫直沽寨,当时不过一普通村落。元朝统一中国后,首都设在大都,天津成为京都的门户,军事价值显示出来。明朝建立后,永乐二年在天津设卫,随后又设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天津成为“三卫”所在。永乐三年始筑城墙,初为土墙,弘治四年(1491)将土墙用砖包砌为砖墙,城墙周围长“九里十三步”,高“三丈五尺”,设城门四个。当时北城为全城中心,北门外是繁华的商业区。清顺治九年将天津三卫并为天津卫;雍正三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雍正九年升天津州为天津府,下辖天津、静海、青县、沧州、盐山、庆云等六县一州,从此天津成为拱卫京城的要地。到晚清,天津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重镇。

天津能从一个普通的村寨发展成为著名的城市,军事地位重要是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天津地处大运河的北端,又是华北地区的海上门户,具有大规模制盐的天然资源。天津地区最早的运河是东汉建安十一年曹操主持开凿的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平虏渠相当于青县至静海的南运河段;泉州渠北汇今蓟运河,南接今海河;新河西起泉州渠北端,东至今滦河。隋大业四年隋炀帝调河北

诸郡 160 多万人,开凿了南起杭州北达涿郡的大运河。唐朝时,从南方海运到北方的大米、丝绸都要从天津海口上岸。元朝时,由于河运、海运的需要,先后在天津设置“广通仓”、“直沽海运仓”和“接运厅”。清朝时,每年由运河运往北京的粮食高达四百万石。河运、海运的发展,不仅使天津官员、民众增加,而且引来四方商贾,商业贸易逐渐发达。渤海湾丰盛的盐产,对天津都市兴起和发展也十分有利。后唐时在芦台开辟了盐场,在今宝坻县设置了盐仓。辽代在今武清县设置“榷盐院”,管理盐务。蒙古太宗八年,设立了三岔沽和大直沽盐使司,管理盐的产销。明代天津盐产量大增,洪武二年在长芦镇设立“北平河间盐运使司”,后又改为“河间长芦都转运使司”,长芦盐的名称从此开始。当时,长芦盐的税收每年可达白银一万二千两,占全国盐税的十分之一。清康熙十年,把长芦盐管理机构迁往天津,天津遂成为海盐运销的中心。正是军事上的重要,海运、河运及盐业的发展,使天津由一个渔村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军事重镇、商业中心及贸易港口。

济宁在京杭运河全河的中段。从元朝至元十九年至至元二十六年凿通济州河和会通河,与两年后凿通的通惠河(又称北运河)相连接,标志着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大运河全线的制高点在济宁境内号称“水脊”的南旺。明代的济宁不仅是“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又是漕河管理中心和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出现了“官舸商舶鳞集,麻拥于济城之下”的兴旺景象。到明代中叶,济宁就已“车马临四达之街,商贾集五都之市”,城区商贾不下数万家。清代济宁商业臻于鼎盛。州城内外通衢要道,运河、越河两岸行栈店铺林立,各地商贾云集,百业兴盛,市场繁荣,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元以上,市场辐射达周围近百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三十三座工商业大城市之一。在商贸业的刺激和带动下,济宁的手工业生产和农业商品化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当时,蓬勃兴起的手工业近二十个行业。其中,玉堂酱菜园是酿造业中佼佼者,其产品“京省



驰名”、“味压江南”；“兰芳斋”为誉满冀鲁豫的糕点与果品大王。“济宁路青猾皮”元代就已成为济宁名牌特产；还有竹木器、铜铁器、纺织、造船、红炉等业兴起。在农业方面，棉花、烟草、林果等成为济宁商品农业的大宗。经济作物的商品化又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商品化。清代中后期，济宁一带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增加了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收入，同时也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商品流通业和内河运输业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临清位于卫河和运河交接处，在元代不过是个普通县城，随着明代对运河的修整利用，迅速发展成为运河岸边一座重镇。据《明史》的《食货志》、《河渠志》所载，明初京卫设军储仓。在临濠（今安徽凤阳境内）、临清两地建仓以供转运之用。洪武二十四年，临清储粮达十六万石，以供给训练骑兵。不久，会通河通航，朝廷又在徐州、淮安、德州建仓，三仓与临清、天津二仓合谓之水次仓，以资转运。后来又把德州仓移到临清的永清坝。至宣德年间，临清增造可容三百万石的大仓，成了运河畔最大的粮食转运枢纽。城内城外因漕船商舶停泊转运之需，出现了许多服务业。弘治二年，临清由县升为临清州，辖馆陶县、邱县。明代万历年间临清有三万余户、六万六千余人，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商贸城市。

第三节 中国历史上三次北人南迁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北人南迁，使东南人口素质逐渐高扬起来。

一 第一次北人南迁。东西晋之交，五胡崛起中原，晋室倾覆。司马氏余脉渡江复国于建康，偏安江南。荆、扬、江、湘、广之地，赖以得全。北方人民之不堪异族统治，相率避难斯土。朝廷对南渡百姓，有因其旧贯，侨置州、郡、县之制。所谓侨州郡县，即某

州某郡某县的实有领地沦陷，东晋政府仍保留其政区名称，借土寄寓，并且设官施政，统辖侨流及其后裔。《隋书·食货志》云：“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①又《宋书·志序》：“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兖、豫、青、徐之境，幽沦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于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②侨州郡县的广泛设立乃至成为制度，是东晋南朝地方行政建置的特殊现象，而究其原因，其一，北方人口多举族南迁，与当地土著不易相处，并且难免故土之思，政府侨立州郡县以安抚之，如姑幕大族徐澄之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居于京口。高平金乡大族郗鉴率领千余家，移居广陵。祖逖南渡时，亦率乡党、部曲数百家同行；其二，通过侨置，满足出身名邦望郡的南渡世家大族保持原来郡望的要求；其三，表明统治者一种收复失地的决心，以及对于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否定。侨州郡县多因原州郡县侨流而设，所以侨州郡县可以表达人口迁移的始点与终点，提供有关迁移时间、路线以及迁移人口数量的线索。今人胡阿祥先生由侨州郡县推论这时期北人南迁情况^③，研究结果很有说服力。

首先，这时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过程历时一百多年，可大体区分为三期。西晋永嘉乱后至东晋元、明、成帝时为第一期。西晋惠帝元康年间，侨流人口已大量出现，东晋元、明、成帝时期，以侨流所立侨州郡县，主要分布在淮南及长江下游南北，长江中游也渐有所及，为此次人口迁移高潮。东晋康帝、穆帝以后至东晋末年为第

① 《隋书》456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② 《宋书》136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③ 胡阿祥：“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见《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二期。东晋中后期，石赵政权崩溃，中原兵燹连年，而以关右最甚，于是陕甘之人多南出汉水流域，也有南下四川者；符坚败亡后，中原人民大量南迁。为此次南迁的第二次高潮。刘宋少帝至明帝时为第三期，人口迁移规模较前为小。

以上三期人口迁移，换言之成现在的地理概念，则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以接受黄河流域下游即今山东、河北及河南东部的移民为主；长江流域上游及汉水流域，以接受今甘肃、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移民为主。人口南迁，以东晋时最盛，及刘宋时，人口南迁的次数与人数已远少于东晋，其地域也偏于自西北而向西南。齐、梁、陈则大批之移民绝迹。

其次，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多因迁移人口而设，故由侨州郡县的分布略可勾画出当时人口迁移的路线。

水路三线。江左线：晋元帝立国江左，定都建康。以正朔所在，晋朝王公大臣及青、兖、并、幽、冀诸州人口，多由汴水、菏水、濉水、沂水、沐水、泗水等线，会于彭城、相县、下邳、东海、淮阳等地，过准则栖息于山阳、淮阴一带。若更南迁，则沿沟通江淮的邗沟抵广陵，渡江至京口，寄寓晋陵郡境及建康等地。淮南线：大凡司、豫二州人口，多取道淮域诸支流如涡水、颍水、汝水等，过淮寄寓在钟离、马头、寿春一线。若更南迁，则经由皖中丘陵平原南北狭长地带，而散处于合肥、居巢、历阳、新蔡等地，又有过江寄居姑苏、芜湖、春谷、寻阳等地者。汉水线：汉水与关中、河洛邻近。司、雍、并、秦、梁诸州人口南迁，或顺武关路出关中，或沿南阳路下南阳，再多由汉水东南下，寄居于沔北、襄阳以至南郡、上明等地。司、豫人口又有出弋阳路、义阳路，越过大别山脉，南下至邾城、安陆等地者。

陆路二线。秦岭道：雍、秦、凉三州人口多由秦岭通道即褒斜道、傥洛道、子午道入汉中。剑阁道：梁州人口及诸州人口寄寓汉中者，经剑阁道入巴蜀。

第三,关于人口迁移数量。今人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①根据《宋书·州郡志》“侨州、郡、县之户口数当南渡人口之约数”,推断出截至刘宋,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占当时江南人口五百四十万的六分之一。

二 第二次北人南迁。第二次人口大迁徙,发生在唐朝的安史之乱期间及唐末。今人陈勇^②对此有深入研究。安史之乱起,中原沦为战场,北方人民为避战乱,纷纷南迁,所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李白《永王东巡歌》),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黄河流域衣冠南迁,目的地主要是长江下游,包括江南和淮南扬州一带。

长江下游是后期唐政府财赋倚重的东南八道中的淮南、浙西、浙东、宣歙四道二十四州之地。天宝战乱,战场主要在河南河北。长江下游区由于远离战事中心,社会相对稳定,因而也成为这次北人南迁,特别是士大夫避乱的重要地区。“中国新去乱,仕多避处江淮间”(韩愈《考功员外卢君墓铭》),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北人南迁多住苏州,其次是越州、扬州。

今人刘礼堂根据《唐代墓志汇编》推断唐人因安史之乱北人南迁情况^③,指出安史之乱后北方官僚士大夫迫于战乱形势下的自发迁移,主要集中于安史之乱间和唐末两个阶段,其流向主要从两京一带移往江南、剑南、荆南和岭南地区,虽然其间一部分官僚士人在政局安定后重新回到北方,但未归者占一定比重。

① 《长水集(上)》21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② 陈勇:“唐后期的人口南迁与长江下游的经济发展”,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③ 刘礼堂:“从《唐代墓志汇编》窥探安史之乱后北人的南迁”,见《江汉考古》2001年第4期。

综观安史之乱导致的北人南迁,较之于晋末南迁,有几点不同:(1)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从安史之乱开始的这次北人南迁在规模和数量上逊于永嘉南渡。六朝时期士族地主的力量十分强大,他们拥有大量的部曲、奴婢、佃户等依附人口,因此在永嘉南渡时,北方士族大多率部曲、奴婢、乡党、宗族同行。隋唐时,由于科举制取代了九品官人法,士族地主把持仕途的特权丧失;中央政府又通过“输籍定样”、“大索貌阅”等办法简括隐漏户口,士族地主的经济力量大大削弱。当时举家、举族迁往江淮的也不少,但是在数量和规模上远不及永嘉南渡。在唐前期,士族地主已处在“世代衰微”、“累叶陵迟”的中衰状态,“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因此他们不可能像晋时南渡那样拥有成百、成千乃至上万户的依附人口一同南迁。(2)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安史之乱的北人南迁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又特别集中在湖北荆襄、江南苏州和淮南扬州三处。襄州距两京为近,沿汉水可达鄂州,水陆交通便利。在安史之乱中,关中地区的人民避乱南下,多从襄、鄂经过。显然,襄鄂二州户口的增长与北人南迁有关。北人通过襄鄂迁往江西各州的人口也不少。(3)在迁往长江下游区的北人中,士大夫等非生产阶层占有相当比例。士大夫迁往江淮,对本区文化的发展、繁荣做过贡献。(4)北方先进技术的南传对促进南方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特别是手工业技术对南方的影响较为明显。比如歙州地多美松,是制墨的最佳原料,然而在李超、李廷珪父子南来前,这里的制墨业一直都默默无闻。唐末李氏父子从北方制墨中心河北易水南来此地,带来了先进的制墨技术,遂使这里的制墨业有了重大突破。延及五代宋时,这里世出墨工、多佳墨,遂成为全国的制墨中心而名播天下。再如越州的丝织业,大历时越州刺史薛兼训令士兵于“北地聚织妇以归”,引进了北方先进的纺织技术,从而使越州的丝织业更上了一个台阶。

三 第三次北人南迁。这一次人口大迁徙,发生在金灭北宋、

元灭南宋期间。靖康之变，金人攻破汴京，掳徽、钦二帝而灭北宋。建炎元年五月，赵构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即位，同年十月迁至扬州，此后一年零四个月扬州成为临时政治中心。建炎三年二月，金兵南下攻陷扬州，高宗仓皇逃往镇江，经平江、崇德逃至杭州。待金兵撤退后，迁都江宁，建炎三年十月因金兵再渡南侵，赵宋政权又从建康逃到杭州，几日后又动身逃往越州，十二月逃往明州，又至定海、南海。建炎四年正月金兵撤退，高宗经一年零八个月回到临安。绍兴八年正式定都临安。随着赵构集团政权的南移，北宋汴京城的皇族、贵族、官僚、富商、平民也纷纷追随南渡，《宋史·钦宗本纪》载：“丁未，斡离不复攻广信军、保州，不克，遂犯真定。戊申，都统制张思正等夜袭金人于文水县，败之。己酉，复战，师溃，死者数万人，思正奔汾州。都统制折可求师溃于子夏山。威胜、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①就是当时北人南迁的写照。

根据《宋史·地理志》所载崇宁元年南方各路的户口数字，以及《宋会要·食货》所载绍兴三十二年南方各路户口数字，通过计算二者之差，大致可知这次南迁人口数字超过了二百万。

南宋初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北方民俗及文化对南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都市娱乐场所瓦舍，“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州绍兴闲驻蹕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破坏尤甚于汴都也。其杭之瓦舍，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②南迁使杭州瓦舍中演的节目，如杂剧、诸宫调、参军戏、傀儡戏、说史等，得以继承了汴梁衣钵。

① 《宋史》287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② 吴自牧：《梦粱录》166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第四节 东南人才日益担当社会重要角色

魏晋南北朝,随着汉族正统南迁,大批士林迁往江南。“六朝”对南方进一步开发,江南的经济文化得到较大发展。

隋炀帝适应人才南朝化的趋势,组成了以江淮人才为主体的中枢机构,启用了大批江淮人士在隋朝任职。如苏州的陆德明,扬州的曹宪、李善、公孙罗、王绍宗、张若虚、邢巨、李邕等等,在京都朝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唐太宗“日与为之商榷者,皆东南儒生”。长江流域的人才在唐代显出了更大发展的趋势,像名学家姚思廉、刘知几,学者徐坚、陆羽,书法家虞世南、张旭、怀素,文学家杜审言、皮日休、陆龟蒙,诗人贺知章、孟浩然、罗隐,名相张柬之、张九龄等等。宋代以来,长江流域更成为全国人才中心。据徐吉军《长江文化史》,北宋科举进士北方仅 789 人,南方却有 7869 人,北方不及南方的十分之一。宋室南迁,杭州成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才中心。仅两浙路的科举进士就有 6899 人。

两宋江南人才跨入政界、文坛等比比皆是,政界著名的有包拯、吴充、冯京、陈东、王安石、王安礼、范仲淹、李纲、王淮、胡铨、陆秀夫、文天祥,哲学家有周敦颐、朱熹、杨时、杨简、陈亮、叶适、陆九渊、魏了翁,学者有胡安国、张九成、王十朋、王应麟,诗人有王令、陆游、徐玑、杨万里、范成大,词人有柳永、张耒、周邦彦、张孝祥,文学家有苏洵、苏轼、苏辙、范仲淹、叶梦得、周必大,史学家有杨亿、荣祁、郑樵、袁枢、洪皓,法医宋慈,科学家沈括等等。元朝虽短,也行汉法、用汉人,江南也产生了胡三、欧阳玄、金履祥、汪元量、柳贯、王冕、邓牧等著名人物。

明清统一时间较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程度的加深,进一步发展了人才重心南移的局面。安徽凤阳人朱元璋开创的明朝,依靠的是江淮人士。从明成祖至明末,163 名内阁大学士中,

仅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就有 49 名,占 30%。南方名臣有张居正、潘季驯、海瑞、杨嗣昌,理学家王守仁,思想家李贽,画家沈周、唐寅、仇英,学者陶宗仪、叶子奇、钱一本,文学家宋濂、刘基、杨慎,小说家凌梦初、冯梦龙、吴承恩、施耐庵,科学家徐光启、宋应星,医学家李时珍,仅江浙地区就有史学家 110 人,著作 184 部,爱国名将有余谦、熊廷弼、袁崇焕、张煌言等等。

今人陈国生^①分别从五个角度论述了明代人才多出自运河流域。

一 《明史》人传人物地理分布。《明史》人传人物共有 3472 人,但是由于史文阙略,有些传主的籍贯有待于继续考求,实际上能具体确定籍贯的只有 3263 人。这些人传人物按出生地的人数以浙江(436 人)、江苏(416 人)、江西(385 人)三省最多,安徽(255 人)、河南(231 人)、山东(186 人)、河北(181 人)、陕西(159 人)、福建(158 人)、湖北(157 人)次之。苏浙赣三省合计占 37.91%。从区域看,东南沿海地区(苏、浙、沪、闽)人物最密集,长江中上游流域(赣、鄂、皖、川、湘)次之,东北、西南和西北边陲地区最少,明显呈现出沿海、沿江、内地和边远几个不同的地理层次,其格局与安史之乱以来经济文化中心东渐南移的区域进程相吻合,也与中国商品化城市化的区域进程相一致。

二 明代进士地理分布。据《明史·刘三吾传》记载,洪武三十年翰林院学士刘三吾为会试主考官,所取宋琮等 52 名进士都是南方人,北方举人全部落第,引起北方举人不满,上疏说刘三吾偏袒南方举人,欺君罔上。朱元璋大怒,下令将刘三吾充军,并重新出题另考,钦定 61 名进士全是北方人。此事时人称之为“南北榜”事件,从此开始了科举制下无休止的南北之争。为避免“南北榜”事件的重演,洪熙元年仁宗命大学士杨士奇等定会试录取进士的

① 陈国生:《明代人物的地理分布研究》,见《学术研究》1998 年第 1 期。

名额,南方人十取六,北方人十取四。宣德、正统年间又“分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南、北、中地区的具体划分为:“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①,从此按籍贯“分地而取”的原则最终确立。这个按地域的进士名额分布,多少反映了北中南三区文化素质的高下。

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各科进士共 2792 人,其中南方籍 2228 人,占总数的 79%。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分布在南方的浙江、江西、南直隶和福建;其次是北方的山东、北直隶和河南。东南沿海、沿江四个富庶省份的进士占总数的 43.43% 之高。宋代以来,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江南省份成为全国财富的聚集地,也逐渐成为全国人才的渊藪。与南方省份相比,进士出自北方省份的比例要低得多。这与当时中国南北经济的发展状况有很大关系。当然,明代进士人数与当地文人水平并不完全吻合,但总体上仍足以反映明代江南和运河流域人文化水平较高。

三 明代儒士地理分布。黄宗羲《明儒学案》一书,根据明代学者的文集语录,分析宗派,立学案 19 个,叙述学者 200 余人,为明代最系统的学术史专著。据《明儒学案》一书所记明儒的地理分布大势看,硕儒籍贯分布与进士具有惊人的相似,主要集中于江西(53 人)、浙江(43 人)、江苏(35 人)一带,其中又以江西为最,占硕儒总数 25.6%,浙江(占 20%)、江苏(占 17%)次之。北方硕儒人数不多,又多集中于陕西、河南二省。儒家大多有较高的学历,受过良好的教育,而这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力量作基础。江浙两省人才辈出的传统所造就的优越文化氛围,一直延续到近代,影响和规

① 《明史》1134 页,中华书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定着这些地区文化人才的数量保持出超的地位。据肖一山的《清代学者著作表》统计,在该书所列的 970 人中,江苏省占 32.58%。又据韩石秋的《清代文学史》统计,在该书所列的 208 人中,江苏省占 62 人,反映出江浙士林政治智慧的高超。

四 明代阁臣地理分布。据《明史》、《国榷》和《明实录》记载,明代共有阁臣 164 人,他们籍贯分布以浙江(27 人)最多,其次为江西(22 人)、江苏(19 人)、河北(15 人)、山东(13 人)、福建(11 人)。在阁臣的总人数上,南方共 117 人,占阁臣总人数的 71.34%,具有绝对优势。仅浙江、江西、江苏三省即有 68 人,占阁臣总人数的 41.5%。这些阁臣除 7 人(乡举 1 人,生员 1 人,荐举 3 人,贡生 2 人)以外,全部由进士入选,其中有状元 17 人,榜眼 15 人,探花 9 人,共 41 人,占进士入阁总人数的 25%以上,显然内阁要员以浙江、江西二省最多,浙赣人对明代官僚政府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当时全国著名儒生、文士共 108 人,其中南直隶 30 人,江西 22 人,浙江 19 人,福建 9 人,这四处占总数的 74%。可见,其集中现象是十分突出的。

五 明代武将地理分布。对武将的统计,主要以《明史》、《皇明将略》和《皇明功臣封爵考》为主要材料,再辅之以地方志、明清人文集、史传、笔记类典籍及碑文、年谱、事状、别传等古籍,统计出明朝著名将领 884 人,其中南直隶(263 人)、河南(96 人)、北直隶(90 人)最多,陕西(75 人)、浙江(63 人)、山东(62 人)、湖广(59 人)次之,由于武将不受经济条件限制,打破了富家子弟垄断进士的格局,这样一来,江浙等富庶省份自然也失去了垄断的优势,但江南和运河流域仍然所占比例为大。南直隶将军最多,尤其集中分布在安徽凤阳一带,明显与朱元璋起事濠州有关。明中晚期因用兵西南,川湘赣粤省的士子一向政治热情甚高,因此人才屡出。

明清人才数量与当地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太湖地区社会

经济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发达,相对造成了其知识密集的文化环境和较为强劲的文化凝聚力。在这种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民生其间,多秀而敏”,上至士大夫,下及“田野小民,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文章因此振动,以至“布衣韦带之士,皆能摘章染墨”^①,得熏陶渐染之功。嘉靖、万历年间,湖州府一个南浔镇就出过7个进士,又有“九里三阁老(朱国祯、温体仁、沈淮),十里两尚书(董份、沈演)”之佳誉。入清以后,该镇入乡试中举者计50人,进士及第者达16人。号称“东南巨都”的菱湖镇,在明进士8人,在清进士34人。苏州府傍唯亭镇“习儒者亦不少。近时吟咏成风,科名相继,可与诸镇相埒”^②,明代进士6人,举人有24人,清代进士及第23人,举人有39名,还出过如高启这样的“一代开国诗宗”。

角直镇亦是个“诵诗读书者正复不少,比岁科名相继,吟咏成风”^③的文化名镇。明朝进士者有高庸、沈钟等24人,中举者有59名。清乾隆年以前,有蒋德峻等6进士,有许虬等24个举人。南翔镇是苏松一带文化中心之一,镇上书院、小学、义塾等文化设施甚多。明朝时出过贡生14名、举人16名、进士10名;清朝时出过贡生20名、举人19名、进士7名。常熟东南之唐市,其镇“虽小,有水市,有物产,有名胜,有科第,有仙释节烈。经术之湛深,于明则有杨(彝)、顾(梦麟);文章之雄伟,于本朝(清朝)则有苏苞九、陶子师;书画擅长,则有邱屿雪、黄尊古,诸家诸体咸备”。^④其自明迄清,进士及第者有:许士柔(仲嘉)、苏祖荫(苞貽)、许瑶(文玉)、苏凤翔(苞九)、唐孙华(君实)、陶元淳(子师)、许谷(貽孙)。他如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第62页,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第1版。

② 《道光元和维亭志·风俗》卷3,转自《史林》1999年第1期16页。

③ 同上。

④ 方燧深:《乾隆唐市志序》,转摘引《史林》1999年第1期16页。

同里镇,明清两代出过 29 个进士、77 个举人;双林镇在明清出过 22 个进士、93 个举人;朱泾镇于明及清嘉庆以前出过 26 个进士, 52 个举人。



第三章

第三章

运河与中国经济重心东移

运河与中国经济重心东移

第一节 古代农业与漕运

中国农业在先秦,形成关中(包括巴蜀)、三河(河内、河东、河南)和齐鲁三个发达农业区。两汉四百年,这三个发达农业区继续保持领先水平。当时的江南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田开垦和粮食种植水平还比较落后。

但是东汉末年以后,总是北方的黄河流域首先发生战乱,并且持续时间较长,而长江流域局面相对安宁。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多次:一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黄河流域成了军阀混战的战场,曹操写的“生民百遗一,千里无鸡鸣”,说明北方三个发达农业区遭受破坏的严重程度。而当时的江南受战争破坏较小,农业生产保持着上升的势头。二是西晋末年晋室内乱招致的“五胡乱华”,黄河流域血雨腥风数十年,而江南局面比较平稳,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江淮农业区的发达程度已经与黄河农业区旗鼓相当。三是唐代安史之乱发生在北方。隋唐以长安为都,关中农业区作为王业基础,说明其粮食生产的充裕;初盛唐在关东地区大兴水利工程,使“三河”和山东的农业得到发展。但安史之乱暴发后,叛军掠河北、占河南、入关中,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受到破坏,安史之乱平定后的藩镇割据和混战多发生在黄河流域。惟独江淮农业区相对稳定,使得江淮农业区在后来居上,一跃成为唐代中后期主要的财

赋来源。四是金灭北宋、蒙古灭金继而灭南宋，黄河流域拉锯战时间较长，长江流域战乱较少、持续时间较短，所以元代建都北京，不得不打通山东运河，全力贯通京杭大运河漕运，靠江淮财赋支持军国庞大的开支。明清时期中国农业高产区都集中在运河流域。明代的运河地区，各种农田水利的兴修治理，使得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的稻田农业耕作日益精细，经济作物如棉花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以苏州为例，明代苏州的农业生产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突出表现在耕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已达到“五年耕而余二年之食”的水平。

在上述情况支配下，两汉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治国理财的主要内容，就是漕运。王朝宫廷和都城消费，主要来源于江淮地区的赋税，主要依赖于运河的运输，漕运成为王朝生死存亡的生命线。隋文帝都关中，为保证京师用粮，在关中筑库储备漕粮。隋炀帝迁都于洛阳，在洛阳附近运河岸边大置粮仓，仓窖及储粮之数都远远超过了隋文帝时代，为后代漕运所继承。唐宋时期，长安、洛阳、开封等都城的皇粮都是从运河运输的。唐代每年转运漕粮最高时达 700 万石；北宋时漕粮高潮期近 800 万担；明清时也有 400 万石。南北长距离运输，劳动力需求量大增。仅清代在通州，光是运粮的漕船就有两万余艘，而押运漕船的官兵有 12 万人次之多。隋以后各王朝，无不“漕通则兴，漕塞则亡”，炀帝困于江都而隋亡；唐末朱梁控制汴水流域而唐亡；元末朱元璋等人起事江淮而元亡；明末李自成取北京，清兵沿运河南下而明亡；清末革命军割据江南而清亡。

明自永乐迁都北京，出现北部政治中心区与江南经济重心区分离的格局，“国家财赋，仰给东南”。江南地区每年漕运四百万石左右的粮食供给京师，漕运制度几经变革，“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①

① 《明史》1277 页，中华书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支运就是粮农亲自把赋粮运到北京,明代漕运之初的运输力役和运输耗费全部由粮农承担。两项负担加上正粮给江南百姓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兑运、支运相参就是粮农把粮食运过长江,兑给运军由运军运到北京。这是明王朝为减轻粮农负担而安排的,缩短粮农漕运距离,由运军承担力役,而粮农支付运输耗费,另外还必须给予运军一定的报酬,“民运至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① 加兑的数量,以距离远近为差,湖广每石加耗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苏松常镇等府六斗。所谓长运就是漕运力役全部转为赋税,加大了粮农的交粮数而免去了他们的运输任务。这个方法又叫改征折色,也就是按照粮食市场价格将部分漕粮改征银钱,改折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优恤政策,是因为改征银钱可以避免长途运输过程中的耗费以及在交纳、兑运和上仓等各种环节的费用。但这一办法是一遇灾荒才执行的,正常年景粮农还享受不到。

明代漕运有五个特点,一是路途遥远,费时逾年。江南地区距离京师,近的三千里,远的四五千里,往返近万里。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江南地区税粮运输的距离最远。二是正粮有限,但力役、加耗和官员勒索是无底洞。仅耗米一项,数额几乎接近正额。明王朝额定的加耗条例,加耗的数量已超过原额漕粮的近70%,但实际操作中往往超过这个比率。三是漕运数额越来越大,人民负担日益严重。明代永乐迁都之前,主要沿元之旧,实行海运,每年供应北平粮食约数十万石。永乐四年建都北京,每岁“转漕东南”运抵京师粮米增至百万石。永乐十三年修会通河,海陆并罢,独行河漕,每年运输粮米200万石。在北京人口极盛的宣德、正统间漕运达400~500万石。成化八年始以400万石为定额。四是漕粮来源主要在江南六省,包括南直隶的江苏、安徽,加上浙江、江西、

^① 《明史》1278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湖广、湖南、湖北，北方仅山东、河南两地。而江浙承担了漕粮的大部分。五是正漕之外，政府还许令漕船“附载土宜，免征税钞。孝宗时限十石，神宗时至六十石”^①。这是运军卫所军士私带的地方土产及各种生活用品，在限额内不交税。依漕船定额 11770 只计，每年附载京师的“土宜”由孝宗时的 11.77 万石增至万历中的 70.62 万石，使京师农副产品供给多样化，是农产品商品化的表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商贩运粮输入京师者少，主要是运往边防。六是有漕粮、白粮之分。漕粮供应军需，白粮供应官禄。白粮共 21.4 万石，“六宫百官皆取之”。

清代，漕运沿袭明制，仍以 400 万石为定额。当代学者韩光辉、贾宏辉撰文^②阐明清代漕额在历朝情况是：顺治三年（1646 年），实征 160 万石，不足定额。嘉庆以前京通各仓储粮多，康熙六十年（1720）583 万石，雍正八年（1730）达 1496 万石，乾隆后期仍在 1000 余万石。咸丰后赣、鄂、湘、豫改征折色，咸丰二年漕 200 万石，三年后每年只有几十万石。漕运省份仍为山东、河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湖南、湖北。清初诸省所属地方交纳漕粮如下：江南正兑、改兑米的正米、耗米总计 285 万石，浙江总计 109 万石，江西总计 95 万石，湖广总计约 188 万石，山东总计 51 万石，河南总计 51 万石，总共 600 多万石。漕粮仍以江浙地区为大宗。如顺治三年（1646）起运漕粮至北京的江浙两省船 1429 只，以每只载粮 500 石计，共计 71400 余石，山东、河南、湖北不超过 20 万石。顺治四年（1647）起运 245 万石，江浙约占 80%，浙江漕额自顺治九年 82 万石起，历年都在 80~90 万石左右，康熙五至八年甚至超过 100 万石。

① 《明史》1281 页，中华书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② “从封建帝都粮食供给看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 年第 3 辑。

清代漕运特点有四：一是漕运之外，允许商人运粮到北方。其来源有：(1)运丁所带行日粮米，水手所带食水，到北方销售。其收入可补贴运丁。(2)漕船携带土宜。明时最多60石，道光时增至180石，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京师的农副产品供给。(3)商人贩运粮。商贩运粮比漕运灵活，来源地不限于漕运省份。二是漕运方向不只有运河一个方向。在北方，新产粮区的崛起，运输方式的变化，促成粮食来源多样化。三是先漕运后海运。清代道光以前主要是漕运，之后恢复海运。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苏、浙江、山东停止征漕，粮商贸易更是迅猛发展，它较少漕政之弊，运输工具、运输路线、运输方式更为灵活。粮食的转运不再取决于政府指令，而是依市场需求而定。四是漕粮用途主要用于皇宫、官吏和八旗子弟，其次用于赈灾。清代京师赈济大体可分为如下类型：其一，降价糶卖。其二，赈给粟米。其三，煮粥赈济饥民。

第二节 运河商埠的崛起

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使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全国各地工商业城市的出现，就是较为明显的表现。在这些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中，大多数集中分布在大运河沿岸。除上一章提及的天津、临清、济宁外，还有：

(一) 通州

明代运河只到通州张家湾：“自都门东南行六十里，有地曰张家湾。凡四方之贡赋与士大夫之造朝者，舟至于此则市马僦车，陆行以达都下，故其地水陆之会，而百物之所聚也。”(高建勋《通州志》卷十)从张家湾到通州，再到东便门一线就成为南来货物的主要集散地。这样，明代北京的商业贸易区便集中在城东南方。据万历年间统计，大兴、宛平两县应当充役的铺户共132个行业，

39802 户,其中处于东半部的大兴县有 26223 户,在西半部的宛平只有 13579 户;应缴税额中,大兴为 3352 两多,宛平为 1783 两多。从当时税收看北京的商业,城内有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集课税,征收那些进城销售的货税;城外有抽分,而对于远来的“行商”,则由通州钞关抽分。这样,各城门的关榷形成所谓的内圈关榷,而在距京附近设立的收税机构,比如后来的河西务、张家湾、居庸关、卢沟桥、白河等地,形成所谓的外圈关榷。这些大体上都是针对进京的商品货物的。

(二) 淮安

淮安地扼南北大运河之中央,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于城北清口,府内河湖交错,水路发达,每岁漕艘过淮,衔尾北上,四方贾客,贸贩而来。城外的清江浦,被称为船都。

为了适应淮安水运管理形势,明代在当地设榷关。淮安榷关不仅指淮安钞关,其实包括关、仓、厂三处,因明代在淮安还设有淮安仓(又名常盈仓)和清江厂(又名工部抽分)。前者直隶户部,后者直隶工部。淮安钞关创设于明宣德四年。明初推行钱、钞并行的双轨货币制,不久因发行钞贯肆虐,引起钞贯贬值。仁、宣时期,钞法壅滞不行,宣宗拟大增天下商税,设置钞关收钞。于是有济宁、徐州、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之设,淮安亦居其一。其关署置于淮安城西北十二里之板闸镇,大关之外设有军饷、上一铺、下一铺、草湾、外河蟹等十二处分口。专征船料,不税货物。淮安仓乃明初所设。永乐年间漕粮俱民运,置淮、徐、临、通四仓储漕粮,以便分段转输。淮安仓即称常盈仓者,由户部委派司官一员管理。成化年间改行长运,运军押粮直抵通州,淮仓遂改储关支卫所月粮及出运之行粮。万历八年(1530)经抚按题准,将淮安府所属四税改归淮仓征收。这四税为杂粮、脚抽、斛抽、济漕四项,俱是嘉靖、隆庆年间增设之税,万历中虽裁去脚抽一项,而四税之名不变。是以淮仓遂成关榷。清江厂设于明

景泰年间，专司修造运船，兼征船料，三十分抽一。位于清江浦，由工部都水司司官一员督理。主要抽征竹木、钉铁、油麻等物。初无定额，每岁约计银 12000 余两，后因额课不敷，渐征及船料与货物。有关修造漕船的税项有抽分、羨余、船钞等三项；有关兼河工的税项有由闸、石价、梁头、扣利、折夫等五项。亦为关榷之一。关、仓、厂皆在运河一线之上，相踞十数里，抽征可谓繁重。

清代淮安物流更繁，每年北方的大豆、小麦、棉花，尤以河南的大豆和豆饼为大宗，山东次之，连檣南去者不下数百万石，例如乾隆九年过关豆货约达五百余万石。还有山西钉铁、药材、碱、矾，山东枣梨，过境南去。南来货物以绸缎、花布、架货为多，例如乾隆四十一年，绸布船计 376 只，杂货船 3896 只。东海渔盐亦经淮安贩鬻四方。

（三）扬州

明王朝开国至隆庆、万历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运河都市孕育了新的生产关系。明代扬州的商业，主要是两淮盐业专卖和南北货交易。清代扬州城，占盐、漕、河三大有利条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鳞集麋至”，“四方舟车、商贾之所萃”，他们“陈肆其间，易操什一起富”。扬州成为闻名全国的商业城市，“富庶甲天下”，民居鳞次栉比，楼高于天，舟车辐辏，商贸萃居，生齿聚繁，人口众多。城中所住外地人占了十分之九，本地人只占十分之一。外地人口大部分为商人，商人中尤以徽商、晋商、陕商居多。城内百业兴旺，店铺林立，商业行业门类齐备；各色南北货物，从一般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柴、米、布、肉、鱼、茶、蔬菜等消费品，到上层人士所需的高档服装、首饰、漆玉器、化妆品，无不应有尽有，满足了社会各个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既有日常生活消费所需的物资市场，也有文化娱乐所需的旅游、书画等文化市场；有商品货物，也有支持商业经营的金融业。众多的商品货物，在门类齐备的行铺内发售，商业经济极为繁荣。

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

(四) 上海

明清时代,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地区,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明中叶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导致商业性市镇星罗棋布,区域市场网络形成。明代,棉花纺织遍及城乡。随着社会分工和城市的发展,原有的手工业技术在不断传播,新技术、新行业在不断出现,逐渐形成手工业专业市镇或比较集中生产某一种或某几种产品的乡镇。如松江的枫泾、朱家角等市镇,都以盛产棉布而著称。商品生产一定程度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出现。众星拱月的松江府城,已成为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据崇祯《松江府志》记载,嘉靖万历以后,松江城内建造了许多华丽的住宅和众多的店铺。城西郊有数百家暑袜店,城东则开了许多鞋店。

清代上海棉纺织是产值最大的手工业。棉布具有仅次于粮食的广大国内市场,并可出口国外。而在棉布商品的上市数量中,松江府无愧当时全国产布的中心。在松江府内,上海港一跃成为清后期最大的布市场,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清代前期,北方诸省都在上海设局收购棉布,名曰“坐庄”。十八世纪后,上海棉布又大量转销欧美,外国人称之为“南京布”。鸦片战争前夕,每年平均从广州出口海外的“南京布”达一百二十万匹,遍及世界各地市场。棉织业的发展,也促进该地区航运业的发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开放海禁,以棉、布贸易为基础上海航运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上海港逐渐形成了内河航运、长江航运,及沿海的北洋、南洋航运和国际航运等航线上的要点,到嘉庆、道光时,上海已成为我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沙船总数已达三千五六百艘,总共雇佣“在船水手十余万人”,成为鸦片战争前上海资本主义萌芽中实力较强的一个行业。

(五) 苏州

吴地重镇苏州逐渐发展成为江南工商业中心,同时也成为全



国的丝织业中心之一。丝织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分工更加细密,出现了綾、绢、罗等各种专门的织机,还发明了提花机,能制造各种复杂的花纹。从事丝织劳动的,有车工、纱工、缎工和织工等各种专门的工匠。当时官营丝织业作坊已拥有织机 800 张,工匠 2300 人,并雇佣技术较好的“高手”从事染织,规模有了扩大。同时,民间的丝织业更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城东比户皆织,不啻万家产品畅销全国。随着棉织业的发展,染布业成为苏州的新兴行业,造纸业也很发达。苏州的商业更是繁荣,乾隆年间,苏州城中居民有十万多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列肆招牌,烂若云锦,行人摩肩接踵。其繁荣程度超过了京城,让人赞叹不已。苏州的水陆交通发达,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币,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乾隆二十四年(1759),徐扬绘的《姑苏繁华图》就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苏州工商业繁荣的盛况。

在工商业日益繁荣、商品经济日趋发达的基础上,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丝织业中破土而出。除了一些官营的织造局以外,还有众多的民间机户。他们一方面被编入匠籍,隶属于织造局,为封建王朝服一定的劳役,另一方面又和市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而不断发生两极分化。同时,也出现了一批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和作坊主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计日受值。除了丝织业雇佣工人人数不断增加外,造纸业也出现了大量的雇佣工人。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工商业人口的激增,城市居民开始向郊区扩展。

(六) 杭州

明清时期杭州商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商业网点分布稠密,商店沿街几十里,商品充斥于各级市场;商人往来不绝,数量之多位于全国大都市前列。万历年间杭州与两京、广州并列为全国大都会。来自浙江的商品就有湖州的丝,嘉兴的绢,绍兴的茶、酒,宁波的海味水产,严州的漆,衢州的桔,温州的漆器,金华的

酒，处州的瓷等。至清代杭州市场上更是商品汇聚，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体系。

杭州商业活动以丝绸贸易为中心，杭州的丝绸除了本城所产外，嘉、湖二地丝绸也经杭州转销到全国各地，杭州就成为太湖南端的丝绸商品市场。万历年间丝绸主要品种有绫、罗、纁丝、纱、绢、绸、绉（绉纱）七种。清代新增了缎、锦、剪绒、线绸、纺绸、绵绸、醪酒绢、画绢、画绫、茧绸、帽缨、丝线。清初丝行多集中于老丝街一带，后才移至艮山门内直街。丝线多集中于城东郊，“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杭城内开设了许多丝绸商店，出售绵帛的著名商店有刘家、李家、陆家，绒绵铺有水巷口的徐家、三桥街柴家等。茧、丝的销售则多分布于临平镇等地。棉布的生产销售也为杭州的商业活动之一。棉布出产于邻近长安、硖石、笕桥等市镇，商品主要有：葛布、縐布（用麻、苧织成青白相间的布）、苧布、麻布、黄草布、兼丝布等。城内外也有许多布庄经营批发或零售业务。以产地名者有桥司布、大关布、塘庄布。笕桥则是米囊米袋布的专业市场。杭州城内外寺庙林立，各地香客不绝于途。锡箔既是迷信品，又是装饰品。销路极广，于是在城内大量生产。杭州属县余杭、富阳盛产制造锡箔辅助的原料竹纸。打制锡箔需要质地坚硬的石墩（砧），杭州南高峰出的青石“极光腻”，是理想的原料。清代杭州商品有“五杭”，即杭扇、杭线、杭粉、杭烟、杭剪。扇店推芳风馆为首，其余则为张子元、顾升泰、朱敏时等。线店推张允升为首，其余则胡开泰、孙大森、鼎隆德。一等粉店推裘鼎聚为首，其余则为关玉山，金建候等，烟店推达昌为首，其余则为陈四海、迎丰、天润、天陆、玉润等。剪刀店则惟张小生（泉）一家而已。

第三节 运河货运与天下物流

明代对会通河大加疏浚，为避开徐州至淮阴的黄河之险，又在



河东不断开挖新的河道,并多次整治淮扬低洼之地的河道。运河货运以其成本低廉、劳动力密度小和方便快捷为世人青睐。

以大运河为干线的销售网络将巨额商品送达全国各级各类市场,打破了地域商业的闭塞状态。明清时期来往于运河上的有漕船、快船、马船以及各种民船。即以当时漕船 1.2 万只,每船每年转运 4 次,每船携带官府认可的私货 60 石计算,每年总运量达 300 万石,相当于漕运总量的四分之三。由官府管辖的快船、马船等私带客货更多,常达 90% 左右,至于民船运量更是难以估计。运河市场与全国市场的广深发展,对封建经济有明显的影响。运河北段以临清、天津、通州为中转市场,与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市场联系起来。同时北部边疆地区的产品如人参、木耳、皮张、毡货、木材、松子、东珠、马匹等亦由陆转河大量销往内地及南方。运河南端,以杭州为中转市场,与江西、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区域市场联系起来。广东、福建等地的货物,也多由商贾通过陆路或水路运至杭州,再从杭州装船沿大运河运至北方。

一 运河南北货运

土特产南北对流。在北方,小麦、高粱和大豆的种植面积广大。小麦在北方旱地作物中品质和口感最好,市场需求和价格都高于杂粮,是商人南运的主要经销对象。江南运河流域是明清两朝的漕粮征收区,大批漕粮北运成为运河运输的主要任务。北船将北方桃、枣、柿子、梨、椿芽、药材以及皮张、皮毛等运往江南,并将江南的大米及竹制品、酒、油、酱菜等捎运售往临清、德州、天津等地。

北棉南运和南布北销。明清时期,北方“半植木棉”,棉花的产量和质量在全国占有突出的地位,而江南的苏、松一带棉织业发达。元时黄道婆从海南岛引进“造捏、弹、纺、织之具”,“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苏、松一带遂逐渐成为“衣被天下”的棉织业中心。北方和江南在植棉和纺棉上的地域垂直分工,使济宁北棉南运遂成

商运大宗，苏州则成为南棉北销的输出地。

生产地和销售地的货物往返。明代蚕桑缫丝以湖州最盛，织丝以苏州最精。苏、湖二州在织丝和缫丝上有一定的地域分工。湖州周围的南浔、双林、菱湖、乌青等镇成为湖丝的集散地，而苏州周围的震泽、盛泽、光福和嘉兴的濮院等镇则成为以丝织业闻名的市镇。这种原料和加工的地域分工靠运河水运来沟通。清初烟草加工在济宁、德州迅速发展。仅济宁六家大的烟草加工工场，“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其工人约四千人”，大批产品是经运河送往天津，在那里坐地批发。如果没有运河的便利沟通，就很难将四百华里之外的天津地区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从而很难扩大自己的生产。

二 东中西部的物流

漕粮引发的粮食物流。明清时期，朝廷漕粮主要征自江浙，江浙米贵必然引发湖广江西商人运粮来填补，从而形成粮食物流。导致长江三角洲地区兴起以苏州为中心、以运河为交通线路的众多米市，如苏州枫桥市、海盐长安镇、吴江平望镇、德清新市镇、吴江同里镇等等，年粮食交易量达数百万石。江西、湖广商人从长江贩米至苏州一带，如果“数年来湖广米不至”，则“价值腾贵”。湖广、江西米由于东运而价贵，则有四川粮食出三峡加以填补。供求关系影响价格，价格悬殊促使商品粮流通。

运河都市的物流辐射。以明清时期济宁和苏州为例。济宁通过运河吸收江南和中原的竹料和木材、浙江的红白糖和绍兴酒、苏州的丝绸、湖州的文房四宝、江西的瓷器和湖北的桐油，然后输送到邻近的山东和河北地区，又将北方的土特产，如核桃、枣、柿子、梨、椿芽、药材以及皮张、皮毛等运往江南。苏州将周围所产的布、绸远销蓟、辽、晋、陕、齐鲁，又把西北贩运来的土特产运销苏南、皖南与江西。没有京杭运河特别是江南运河的水运功能，就很难想

象东西部物流得以实现。

运河制造业外销与非运河原材料供应。如明清造船业以淮安府清江浦为大宗,这是政府行为的结果,也是生产扎堆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所致。淮安府造船场规模大,仅轮班造船工匠就达 6000 人,岁造 500 多只,耗资 50000 两。而所需材料或经黄河,或经运河从各地运来。扬州以镶器、玉器、竹器、香粉和雕版印刷等手工业见长。“竹不产于扬州,扬州制品最精”,凡此种种,莫不依赖运河(外加江河)沟通四方的作用。

江南棉布与西北土特产贸易。明代出于对北部边疆的安全考虑,相继设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除辽东、蓟州外,其余七镇均位于今天西北高寒地区。“九边”军粮供应由北方就近解决,棉布供应则由商人们从内地贩运而来。棉布除用来为边军制作冬衣御寒外,还常常折为军饷和战功奖赏品发给士兵,故而其需求量非常大。除北方市场外,每年从江南地区贩运“九边”棉布,仅嘉靖二十年陕西输边棉布缺额即达三十余万匹。清代东南棉布仍行销西北,山陕客商仍然来江南地区收购棉布。明代西北地区输入江南地区的主要有各类毛皮、兽皮、药材等产品。在泾阳加工的皮货有猓狽、狼、豹、狐、羊之属,多运往湖广、江浙、汴、蜀等处销售。

第四节 盐业生产和运销

隋唐以前中国盐业生产东西并重。先秦西部的秦国在盐政方面,实行民营征税制。国家将山泽之利,尽行开放,产制运销,听民自由,朝廷则课以重税,巴蜀三峡一带成为产盐重地。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①。西汉刘濞在吴地煮盐铸

^① 《汉书》957 页,中华书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钱,邓通在西蜀也煮盐铸钱,都富甲一方。西晋在各主要产盐地,河东安邑和江南钱塘都设立司盐都尉。南北朝时期南朝对盐业实行放任政策,而北朝诸国大多数时间都把持盐利,垄断食盐生产与销售,河东、西北池盐是控制重点。

宋金元时期沿海盐业发展势头强劲,中西部盐业生产开始衰弱。宋代西、北二边成主前线,盐业生产中心向东南转移。由于山东沿海的盐业生产有着较好的基础,因而宋王朝加大了这一区域的盐业开发力度,不断在山东海滨开辟新的盐场,提高食盐产量。据史料记载,山东沿海北起滨州,南至日照,都建有盐场。同时扬州、淮安一带的两淮盐场和浙江海盐生产也得到长足发展。南宋隔淮河与金对峙,“南渡立国,专仰盐纱”,盐业生产的中心进一步向东南转移。元朝贯通京杭大运河,其盐业生产与销售重心移到东部,集中地表现在运河流域盐业的发展上。两淮盐产量,元文宗天历年间占全国产盐量的37%,其次是两浙盐场占全国产量的18%。两淮加上两浙,则超过全国的一半。

明清两代中国盐业和盐运重心完全移到运河流域。明代全国共设有长芦、山东、两淮、两浙、福建、河东六个都转运盐使司,前四个都在运河流域。

(一) 长芦。明清时期,长芦是全国仅次于两淮的大产盐区,每年数十万两的盐课是封建王朝重要的财政收入,每年数十万以至后来近百万引的盐产,更直接维系直豫两省民食的正常消费。长芦,即沧州。沧州旧治在长芦东南,明洪武初徙治长芦,以“长芦为盐产汇集之所”,设都转运司驻其地,故直隶之盐以长芦名。长芦盐区,滨海环居,起直隶临榆县(今秦皇岛市山海关),尽山东海丰县(今无棣县),绵延数百里。

洪武二年(1369),置北平河间盐运司,长芦盐区名称自此始。长芦盐场有南场北场之分。明初,盐场循元之旧而稍有增益;共有24场,是长芦盐区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时期。进入清代以后,长

芦盐场北盛南衰之势加剧,天津取代沧州成为长芦盐业的重心。生产重心向北部、尤其是向天津的丰财、芦台二场集中。终清之世,北场特别是丰财、芦台二场发展成为长芦盐业的产销中心。清初长芦行盐额引 719550 引,嘉庆年间增至 966046 引,清末减为 662497 引,每引直省配盐 587.5 斤,豫省配盐 592.7 斤。

(二) 山东。明清时期,山东的盐业生产在管理体制和制盐技术方面都相对稳定,特别是清代制盐技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山东的盐业经济在沿海经济中有着重要地位。

明朝政府在山东海盐产地设有 19 个盐场,维持着元代盐场建置的基本格局。这 19 个盐场是:信阳、涛雒、石河、行村、登宁、西由、海沧、王家岗、官台、固堤、高家港、新镇、宁海、丰国、永阜、利国、丰民、富国、永利。在山东各盐场中,从事盐业生产的劳动力比较充足,形成了引人注目的产业群体。山东各盐场在官方督导下从事盐业生产,产量基本保持稳定。清代保留了明代的盐业制度,只允许专业灶户开滩制盐,其他民户不得染指盐灶,故素有“民不侵灶”之说。官方严格控制盐业生产,但在灶户和滩户的管理上,却比前朝较宽松。尤其是滩户可以自主选择滩地和制盐方法,并可以在划定范围内扩大生产规模,占有某些生产资料。随着清王朝对灶户管理的松弛以及商品经济的冲击,乾隆以后山东制盐灶户开始发展私有产业。到嘉庆末年,个别盐场私开的盐滩盐池数量已超过官方规划の数倍以上。

(三) 两淮。明清时期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区,保持着全国产量第一的地位。明代,两淮“盐利甲东南之富”,“国用所需,边饷所赖,半出于兹”。到清代,两淮盐利之大,使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清代前期,两淮运司产盐之场二十有三。其中隶属通州分司者九场,即车利场、掘港场、石港场、金沙场、吕四场、余西场、余东场、角斜场、栟茶场。隶属泰州分司者十一场,为富安场、安丰场、深垛场、东台场、河垛场、丁溪场、草堰场、刘庄场、伍祐场、新兴场、庙湾

场。隶属海州分司者，则有板浦场、正中场、临兴场。所产盐“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引地最广，故赋课亦甲于全国”。顺治三年，每岁征课银八十八万一千五百二两八钱。

（四）两浙。浙江东部沿海一带，海水含盐量高，明清两代是我国海盐的著名产区之一。清代前期共三十二盐场。辖于宁绍分司者二十场：在杭州有仁和场、许庄场；在绍兴有钱清场、三江场、东江场、曹娥场、金山场、石堰场；在宁波有鸣鹤场、清泉场、龙头场、穿长场、大嵩场、玉泉场；在台州有长亭场、黄岩场、杜浚场；在温州有长林场、双穗场、永嘉场。辖于嘉松分司者十二场：在杭州有西路场、黄湾场；在嘉兴有鲍郎场、海沙场、芦沥场；在松江有横浦场、浦东场、袁浦场、青村场、下砂场、下砂二三场；在太仓有崇明场等。浙盐行销浙江（浙东、浙西）、江苏、安徽、江西四省的一百二十五府州县。



第四章

中国文化中心东移

先秦以来,中国东部自北向南,先后形成燕赵文化圈、齐鲁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大运河恰好像一条丝带将这些文化珍珠串连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运河文化带。这条文化带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文化融会的轨迹,容纳了各个文化圈的特色,呈现出中华文明的精髓。运河文化不仅具有带状的形态,而且从整个运河流域及其延伸区域来考察,几乎覆盖了中国的东半部。于是,当人们着眼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研究时,不可忽视这两大文化体系在东部地区的会合。运河文化所代表的东部地区恰恰与中国的西部地区形成强烈的反差。

第一节 运河流域传统文化

一 吴楚传统文化

南运河流域是吴楚文化的故乡。楚人从商末到战国,经营南方800年,历经26君,开发了淮河、长江和珠江流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楚文化(包括融入的吴越文化),为文化重心的南移打下了基础。道家文化就源于楚人老子,光照日月的《楚辞》,是在楚国土壤上产生的,屈原也是在南楚这块土地上把先秦的爱国主义推向高峰的。

西汉是楚人打下的天下,汉文化最初就是楚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术”在流动发展中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

思想。魏晋南北朝北方战乱不已，南方相对稳定，汉族南迁，六朝定都建康和经营南方，江南经济文化得以继续发展，同时以道家为主的玄学兴起，乃至南朝的儒学也被玄学化。南方文学传统成为全国主流，它崇尚自然、不拘礼法，玄言诗、山水诗、宫体诗、骈文、志怪小说在南方兴起，佛教、道教盛行，经学仍未丧失自己的主导地位，佛学、经学在隋朝时皆以南学为主走向统一。隋唐创立和发展科举制，官学、私学盛行，儒、佛、道三者并行发展。

五代十国有九国在南方建都，建都金陵的南唐，设太学、开书院、重文教，南京成为南北文人汇聚的中心。宋元时期，江南人勤学好文形成风气，文教事业昌盛。宋代 203 所书院，长江流域占 74% 强，其中江西 80 所、浙江 34 所。官学中江西 76 所，浙江 74 所。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成为朱熹讲学的中心：长江中游的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亦盛极一时，并开始形成湖湘学派。南方私人著书讲学的盛行更对文化重心的南移做出了巨大贡献。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援法入儒”，把儒释道三家融合为一，使心性义理之学占据了北宋学术文化的主导地位；南宋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在儒释道的融合中，发挥二程之“理”，认定理在气之先，理为气之本，为气之主，朱熹把理学推向了顶峰，完成了对儒学的第二次改造，使儒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在哲学和文教昌盛及活字印刷术发明下，宋词、元曲和唐诗一起，构成了中国韵文史上的三座高峰。北宋著名词人，绝大多数出自南方。南宋科举进士两浙多达 6899 人，远远超过其他地区。江南为人才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两浙居先。宋代的诗词大都带有“南方文学”的色彩，南方人占据宋代诗词主导地位。

朱元璋主要靠东南人才开创明朝，建都南京。继唐诗、宋词、元曲以后，明代长江下游的文人学士又把小说推向了高峰。哲学上，浙江余姚人王守仁冲破了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创立“心”学，认为“心外无理”，主张“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永乐大典》的完成,实赖于江南士人。基督教传入中国,徐光启从利玛窦那儿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江南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闪烁着中国开始走向近代的火花。康乾盛世,主要体现在运河流域的繁荣。清代政坛用得最多的是江南士人,《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问世和乾嘉学派的形成,靠的是东南人才。

二 齐鲁文化

运河的中部是齐鲁文化区。周公和太公,建立起鲁文化和齐文化两大体系,并在良性互动中发展,促成齐鲁文化旺盛的生命和内在的张力。周公之子封于鲁,其后人将周礼传承下来;至孔子创立儒学,以“仁”为核心,将礼乐文化提升为礼义之学,孟子继之,遂使鲁文化形成崇仁、重礼、尚德、贵和的传统。姜太公封于齐,将周礼部分内容与当地东夷文化和民俗结合起来,注重发展经济、健全法制、增强实力。齐桓公和管仲形成霸业,后又有晏婴治齐,政绩卓绝。以《管子》为代表的齐文化,礼法并重、农商同举、义利兼顾。鲁文化与齐文化的汇合与互补,使得山东的古代文化既重视人文价值理想,又重视现实国计民生;既注意道德礼乐的建设,又注意行政法规的完善;既保持厚重的传统,又能宽容开放。

山东是孔子、孟子和儒学的故乡,儒学影响巨大,自不待言。山东的道家和道教文化也很深厚和发达。庄子出生地尚有争议,但他活动于山东、河北、河南交界一带,却是可以断言的。唐代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封《庄子》为《南华真经》,而南华山就在菏泽东明境内。故庄子既传承楚文化,又深知儒学。此外,胶东面临大海,自古便有神仙传说和修仙方士,遂成为道教重要源头;金元之际又有全真道从这里兴起,这是有深刻历史文化背景的。发源于齐鲁的儒家重人文化成,道家重自然纯朴。儒家以教育和修养提升人性,改良社会;道家以复归和无为,克服异化,超越世俗。儒家重群体关系,道家重个人自由。儒道互补使中国文化内部有一种

良性的制约与平衡,这一点在齐鲁文化中尤为明显。

先秦时期学术上百家争鸣,集中体现于齐国稷下学宫,各种学派都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言、平等讨论,故天下学者云集于此。古代山东是学者的天堂,除了儒、道、法之外,还出现过墨家、兵家(孙武与孙臆)、阴阳家(邹衍)等学派。管仲乃颍上人,而为齐相;荀子乃赵人,而为稷下祭酒:都说明古山东文化昌繁,尊重人才,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西汉时期,齐鲁经学保存最为完整,《易》有田何,《诗》有申培公、辕固生,《书》有伏生、孔安国,《礼》有高堂生,《春秋》有胡毋生、申公,《论语》则有《齐论》与《鲁论》,传者多人。东汉经学大家郑玄,魏晋玄学代表王弼,及大学者何承天、刘勰等皆山东学者。隋唐以后,齐鲁文化故土哺育出许多文化名人,如文学家辛弃疾、李清照、蒲松龄,军事家戚继光,大学者王懿荣、傅斯年、牟宗三,宗教活动家丘处机及其余全真六子。

山东既有内陆地区,又有较长的海岸线,兼有陆海之利,自古便与朝鲜、日本有海上交通。泰山作为五岳之首和惟一具有封禅资格的“国山”,代表着中华农耕文明的传统,体现着崇高自尊和厚德载物的伟大精神,是中国的象征。山东人民既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历史,同时也学会吸收西方文明的优长,山东沿海地区的文化较早具有中西融合的特色。

三 燕赵文化

远古时期,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就在燕山脚下留下了历史文化遗迹。原始社会晚期,黄帝部落由渭水流域迁徙到当今河北省西北部,《史记》就有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的记载。春秋时期成书的《诗经》中的《邶风》、《卫风》、《鄘风》,其部分诗篇即产生于河北南部。战国时期,燕、赵不仅成为独立的诸侯王国,而且以重义任侠、慷慨悲歌的风骨屹立于七雄之林。汉代乐府民歌中的不少诗篇,如《战城南》、《上邪》、《有所思》、《陌上桑》、《饮马长



城窟行》、《孤儿行》等,即属于反映河北一代民风土气的燕赵民歌。

先秦、两汉时期诞生在燕赵大地的文人士士,有荀卿、慎到、公孙龙、董仲舒、李延年、崔骃、崔瑗等,他们的哲学思想或散文诗赋,均曾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大放异彩。魏晋南北朝时则有地理学家酈道元、数学家祖冲之、郭守敬,文人张华、刘琨、卢湛等,他们的科学创新和文学创作,广为世人所知。

唐代政治相对稳定,燕赵文化进一步发展。从文坛上看,唐初有“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武则天时李峤、苏味道,盛唐时有高适、李颀、李华、李嘉、刘长卿、卢纶、司空曙,中唐有贾岛、卢仝、刘禹锡、崔护、张祜,晚唐有高蟾、卢汝珍等,没有他们,有唐一代的文学就会大为逊色。北宋重文治,肇始于祖籍河北涿州的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河北籍学者李昉编辑《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的文苑盛事,成为佳话。另外还有一度在河北任官的欧阳修、苏洵、苏轼、黄庭坚、贺铸等外省人士,也曾为燕赵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元明时期,燕赵大地戏剧词曲艺术异峰突起。元曲三大活动中心有两个在河北境内,一为元大都,一为真定。在50名著名的元曲作家中,河北就占31名。其中,伟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剧作《窦娥冤》、《蝴蝶梦》、《望江亭》等历演不衰,影响深远。其他如白朴、王实甫也是举世公认的戏剧创作大师。还有刘因、蔡松年、赵秉文、王若虚、李治、元好问、完颜亮等,或理学、或诗文、或词曲,在燕赵文化传承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清代文化学术的主流是以训诂考据为特色的朴学,但性理、词章之学并未中断。在燕赵学者中,定兴鹿善继、容城孙奇逢是清初性理学的代表;博野颜元生于穷乡,长于乱世,艰苦卓绝,力倡“习行”之学,是清初实学的杰出代表,他痛斥理学,鄙弃词章、考据,北方学风民气为之一振。乾嘉之际朴学鼎盛,《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纪晓岚为此时朴学兼词章之学的名流。同光年间,清廷主张洋务新政,南皮张之洞则是晚清洋务派的后起之秀。他系统阐述的“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

不可否认，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对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风土民俗、文化性格、心理气质等有重要影响，在生产力低下，交通、教育、信息传播不发达的古代，尤其如此。从自然地理环境看，作为燕赵大地的河北，东临渤海，西倚太行，南接大河，北枕燕山，地理环境自古如斯。东海之阔，黄河之动，太行燕山之雄奇厚重，自古生存于如斯环境，祖祖辈辈从事农耕生活间或从事手工艺和小本生意的传统意义上的河北人，养成质朴厚道的民风，木讷爽快的民气、重义任侠的民性和勤劳耐劳的民智。这就是燕赵风骨或河北人的文化性格。此种文化性格，通过生理性的和社会历史性的遗传，至今不同程度地流淌在现代河北人的血液中，积淀为他们的心理气质并表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

从人文历史环境看，燕赵文化自古形成于华北平原的中部，东南与尚功重智、知礼乐仁、民性仁厚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毗邻，西边与尚法、尚兵、重商、民性刚毅的秦晋文化肩连，西北与高寒地带金戈铁马、弯弓射雕的游牧文化相望，东北与地广人稀、游牧与农耕并举、民性慍悍的关东文化接壤。燕赵文化处于周边不同区域文化的边界带，经过战争、商旅、民族交往、移民等途径，接受周边文化的影响，形成自身兼容并包、多样杂糅的区域文化特征。其一，燕赵文化兼容开放性强。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燕赵文化兼容游牧文化的典范；平原君不拘一格招贤养士，同样表现了这种兼容性格。先秦时期慎到的早期法家思想，公孙龙的名家思想，荀子的儒家思想，都可以在赵国产生。其二，荀子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了道家的自然主义，名家的名学分析，前期法家的重参验、正名实的理智主义因素，克服了孟子先验论道德理想主义的局限性，才卓然成就一家哲学，是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第一次批判综合。董仲舒以儒学为根底，吸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等思想建立起来的今文经学体系，同样体现了燕赵思想文化的兼容性格。

其三,由于兼容性强,所以燕赵学者门户之见淡漠,历史上有众多的燕赵籍学者,却很少形成影响久远的学派。

自13世纪初蒙古人举鼎中原,继之立国北京,历经明、清七百年间,燕赵一直是京师所在的畿辅重地,地名直隶,这种靠近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近水楼台”效应,给燕赵文化打上深刻的烙印,形成燕赵文化如下的区位优势:一是历史名胜文化蕴含深厚。今属京、津的名胜已不须说,古已有之的邯郸赵王城、古丛台,保定燕下都,满城中山靖王汉墓等著名历史遗迹也不必说,仅就清代河北境内就有清东陵、西陵,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园林,全国现存惟一的保存最完整的直隶总督署,建制较早而清代鼎盛的保定莲池书院等历史名胜。这些名胜古迹,作为凝固的历史,有形的文物,承载着明清畿辅文化丰厚的内涵,诉说着明清时代封建王朝的兴衰,民族命运的起伏,历史人物的功过。二是戏剧艺术及早期市民意识发达。封建时代的京师,自然是皇家贵族、达官贵人、富贾缙绅、文人学子的理想去处,所以,一般说来,政治文化中心所在的京畿之地,在生活消费、社会见闻、文化水准以及社会矛盾对国人政治意识、文化心理的冲击上要高于“天高皇帝远”的周边地区。这是元、明、清时期戏剧艺术及早期市民意识在燕赵文化中崛起的根本原因。元代,戏剧文学有如繁花似锦,“勾栏瓦肆”遍布城乡。明清以降,随着南戏弋阳腔、昆山腔北上,晋陕梆子东进,河北出现了第二次戏剧艺术高峰。清末民初以来,祖籍在河北或活跃于河北境内的戏曲表演艺术家不可胜数。

第二节 运河流域市民新观念

一 全新的消费观念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衣着服饰具有“明尊卑、别贵贱”的特定功

能,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它最能表现人的身份、财富和地位。明清两代继承前代庶民冠服之制,规定庶民不得服用蟒缎、金花缎等上等衣料,一般官民禁用黄色、米色等色彩。这些制度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各治以罪。但是,商品经济的繁荣,猛烈冲击着服饰上的清规戒律和等级尊卑。吴地市民们僭越封建等级的礼制,追求华美多姿的衣着,丝绸服装已由官僚士绅的专用品变为民间百姓的一般服饰,由只供少数人占有的奢侈品成为多数人都能享有的普通消费品。衣着服饰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农业社会古朴尚俭的传统风俗,开始逐步向城市社会追求奢华的方向转变,而吴地作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前沿,在此时期比其他各地转变的步伐更快更坚实。

中国人才一直把勤俭节约奉为传统的美德。然而,进入明代之后,这种传统美德在江南市民中几乎荡然无存,呈现出来的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人们不再恭行节俭,而是要求现世享受;不再满足于糊口度日而是追求精神享受。不仅豪商巨贾鲜衣骏马、甲第琼筵,就连大户婢女、官府皂隶也要在饮食、住房、生活用品以及与人

的交往上,争奇计胜,夸富逞强。

明清时期对人的饮宴也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但是吴地市民不顾那些条条框框,对宴饮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刻意求精,互相攀比,赛食品之丰盛,比器皿之精美,于山珍海味之中又极为讲究烹调之法。一席之间,水陆珍品毕呈,一宴之费,常耗数月之食。家宴之外,酒楼茶馆业也有大的发展。常熟县在康熙以前,只有几家饭馆,还怕饭菜卖不出去,雍正年间,酒楼猛增,生意兴隆。酒楼不仅出卖菜肴,还包办酒席,官员、商人、市民随时前来就餐或请客,非常方便。在经常光顾酒楼的人中,大抵以商人为多。商人洽谈贸易,交际广泛,酒楼饭馆往往成为他们的业务场所。茶馆则不同,农人市民都喜欢在这里闲谈娱乐,饮茶品茗,兼用小吃,逐渐成为风气。常州府无锡县,早在康熙年间就不仅遍设茶馆,连村镇也都有了,人称“遍地清茶室”,可见茶馆之多。

在房屋制式方面,明中叶以后的吴地民居无论是建筑规格,还是式样、装饰,都已突破了传统的封建等级界限。那些官绅富户自不必讲,平民百姓都可根据自己的能力建造住宅,村镇居民也一改往昔的简陋面目,开始建起高墙瓦屋。在吴地的都市和城镇中,为经商之需而建起的公馆也大多华丽壮观。“规模宏敞,材物精良”,“金碧晃耀,轮奂晶莹”,“堂庑园地,巍峨壮丽”等,就是史籍中经常用来描绘这些会馆建筑的形容词。

在闭锁、保守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娱乐生活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的严厉约束。而在吴地商品经济的繁荣和都市城镇的发展,刺激着市民文化的发育和成长,此地市民表现出日益追求闲暇娱乐的趋向。纵情游乐已经成为吴地士人和富裕市民的一大消遣方式。而普通市民和手工业者则往往在休息、娱乐和喜庆的场合咏唱山歌,编排戏文,藉以自娱。在这一时期,固定的营业性戏园开始出现。其内容以情爱为主,反映了市井细民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因有悖于忠、孝、节、义的封建教化,因此屡屡受到封建官府的禁限。同时,赌博之风也日益猖獗,可以说是冒险和竞争意识的畸形表现。

二 重商向利风气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了物质利益的诱惑,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序列以及“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工商亦为本业”的说法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地域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商业在国计民生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明显、愈来愈重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抑商的传统政策和社会观念提出了挑战。早在成化年间,丘濬就提出要给商人一定的社会地位,给予充分的经营自由,而反对抑商政策。嘉靖年间的清官海瑞认为士

农工商等阶层不过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同为社会所需。万历初期官至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不仅将农、商平等看待,更指出二者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王阳明否定四民之间的高下尊卑贵贱等级观念,而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平等观念。黄宗羲正式提出了“工商皆本”思想。

思想的解放带来了新鲜气象。首先,越来越多的人趋于商贾。生活于明代后期的松江人何良俊称:“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田,无有他志。……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趋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①同时代杭州人张瀚也说:“余尝总揽市利,大都江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纴,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②。不仅普通百姓经营工商,一向为人清高、视工商为贱业的缙绅士大夫阶层,亦为利所引,转而从事工商业,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行为。

其次,士商关系变化与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士为四民之首,是封建国家培养的统治人才,历来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享有各种特权。他们信奉“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说教,视工商为贱业,看不起商人,羞与商人为伍。但是,明代中期以后,士、商关系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在士大夫看来,商业不再是贱业,士商渗透、绅商融合的现象广泛出现,亦官亦商的现象也不是个别的事情。如明末著名思想家唐甄在苏州从事牙行经营,针对有些人的责难,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以商贾为生,有人认为有辱身份,但他们没有看到经商对生存有益。他把自己的经商行为,与辅佐周武王立大功业的姜尚相比,认为经商并非可

①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111~11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张瀚:《松窗梦语》8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耻行为。这样的观念在江南地区甚为流行,士大夫经商的事例比比皆是,所谓“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即使官居首辅的松江人徐阶,也摆脱不了商业利润的诱惑,“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①;明中叶文学家乌程(今湖州)人董份,官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良田遍布苏州湖州,开有当铺一百多处,分别聘请内行商人管理,每年得利几百万两。文士无不重财,成为江南地区的普遍写照。

二是商人地位提高,士商关系渐趋融洽。经商治贾,为商人带来了巨额财富。经济地位的提高促使社会地位的改观,商人的富裕与士人的清贫形成了强烈而又鲜明的对照,“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的社会现实促使士大夫投身于商业的洪流,从而出现士商渗透、官商融合的情况。另一方面,明清专制王朝对商人的控制有所松动,商人及其子弟可以通过读书应举的办法走向仕途,明代许多达官、文人都出身于商贾之家,或立业后兼营善业。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朝廷实行捐纳之制,掌握财富的商人只要向政府交出一笔钱,即可获得一定的官品或学位,于是出现了“天下之士多出于商”的局面。朝廷的政策也促进了士商相互渗透和官商走向融合。

第三节 运河流域出版业的兴盛

一 南宋书院和刻书藏书

书院始于南唐,而大盛于南宋时的南方地区。伴随着私人讲学之风的出现,南宋时书院数量大增,许多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在

^① 于慎行:《谷山笔尘》3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山林书院读书讲学,收授弟子,并形成各种学派。除吴地的茅山、明道、学道、和靖、鹤山、龟山、丹阳、濂溪等书院外,越地另有 34 所,成为当时的一大人文景观。书院的出现,与理学的兴盛大有关系。理学酝酿于北宋,书院也始兴于北宋;理学到南宋时大盛,书院也大盛于南宋。在吴越地区,吕祖谦的丽泽书院是浙东学派的代表。浙东学派在与朱程理学的抗衡中自身又分化发展,形成了金华学派、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每一学派都将书院作为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阵地。

与书院文化紧密联系的是刻书业和藏书业的兴盛。南宋迁都和靖康之乱,使宋代的藏书损失惨重,宋绍兴九年开始筹划重新刻书。杭州以其纸张好,雕版印刷水平高而成为全国刻印、出版、发行、校讎的中心,并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等三大刊书系统。据统计,南宋刻书地有 170 多处。刻书业的普及、书肆的繁荣,促进了吴越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也为学术文化的交流,文献的保存和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时兴藏书也成了当时吴越地区的一道文化风景线。浙江公私藏书为天下之冠,据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统计,有名可考的就有 33 人,如山阴的陆宰、陆游父子,新昌的石公弼,会稽的诸葛行仁,扬州的陈亚,丹阳的刁约,吴兴的沈思,吴县的朱长文等,安吉的陈振孙和吴兴的周密二人藏书均达 4 万余卷,松江的庄肃藏书达 8 万卷,尤其是叶梦得藏书逾 10 万卷。

二 明清出版业和小说书籍畅销

明清时期,江南运河流域已成为全国经济发达地区。“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谚语形象表明了江南农业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江南手工业的繁荣,更为人所周知,如苏州是当时著名的丝织业中心,南京是棉织业的重要基地。至于其商业的发达,同样为世人瞩目。

社会的变迁需要文学做出反映。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大容量写实性无疑是展现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的最佳体裁,而它的叙事性通俗性,也更合乎新兴阶层的阅读欣赏口味。于是小说这一文体,便有了长足发展。以通俗小说为例,一批小说家诞生在江浙,如施耐庵、吴承恩、陆西星、冯梦龙、袁于令、褚人获、杜纲、夏敬渠、屠绅、陈森、俞达、韩邦庆、刘鹗、李伯元、曾朴;还有一些小说大家如凌濛初、李渔、曹雪芹、吴敬梓、李百川等,其生活和创作都与运河流域有不解之缘。

私家书坊刻书考虑更多的是市场需要与经济效益,这决定了出版者要将目光盯住市场,考虑什么样的读物才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新兴的通俗小说无疑有广大的市场,这从它在当时的传播与出版后的热销可以看出。正因为通俗小说的出版有可观的利润,各书坊也争着物色作者,收买小说作品,《拍案惊奇》的编创,即因冯梦龙《古今小说》等“三言”的畅销,书商看好,而邀约凌濛初写作的。至于他的《二刻拍案惊奇》,同样是“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抄撮成篇,得四十种”,并以较短的时间成书出版的。

三 当代学者命名的熊大木现象^①

《三国演义》问世后,畅销一时,给私人书坊带来较大收益。于是他们把经营方向转向通俗小说上,一时没有书稿就找人现写现刻现印。书坊物色小说作者,大量刊刻小说,对推动小说创作的繁荣,无疑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最先试图解决稿荒问题的是福建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他出于职业敏感,意识到若将叙录岳飞业绩的《精忠录》改写为通俗小说定能畅销于世,于是便去拜访其姻亲、忠正堂书坊主熊大木。熊大木作了一番“才不及班、马之

^① 见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方式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的谦虚后，终于动笔写成《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为书坊主维护新财源做出了颇有诱惑力的示范，此后效尤者日众，书坊主们几乎主宰了嘉靖、万历时的通俗小说创作，而他们对创作的干预直到清末也未曾间断。通俗小说发展史上一种带有相当普遍性的创作模式因此而形成，对此不妨称之为“熊大木现象”。

书坊主为解决稿源而进行通俗小说创作，有其特点：一是由于将市场开拓置于首要地位，其创作目的是满足“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的需求，因为这类读者数量众多，能追求售多利速的前景；二是书坊主缺乏必要的艺术修养，其编撰便是模仿，既然广大读者对《三国志演义》喜爱，熊大木就模仿《三国志演义》。在叙述故事过程中硬性镶嵌了岳飞二十一本奏章、三篇题记、一道檄文、一封书信与两首词，未及嵌入者则全部附于作品之后。

熊大木之后，许多人步其后尘。万历二十二年，与耕堂刊刻了安遇时的《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三年后万卷楼又翻刻了这部粗糙简陋的作品，表明广大读者十分欢迎讲史演义之外新的创作流派，余象斗敏锐地抓住阅读市场的动向，迅速编撰刊行了《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这部作品集分人命、奸情、盗贼、争占等16类，相当一部分内容辑自《疑狱集》之类案例书。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刊出《西游记》，读者们几乎立即就为它新颖的题材、生动的故事与诙谐幽默的风格所倾倒。余象斗又于万历二十年刊出《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不久又刊出《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大王传》，显然是借《西游记》名声以助畅销，依据民间传说编写的真武大帝、华光天王等故事，对读者也确实颇有吸引力。

书坊主为占领市场，雇佣下层文人编撰，这也是“熊大木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吴元泰《东游记》，杂取民间传说演述八仙故事，拼凑痕迹极为明显。作者为弥补内容单薄，竟又将《杨家府演义》第三十二至三十八回全都抄入，而书中齐天圣手持铁棒、英勇

无比的描写，无疑是想借《西游记》声势行世。同时代的邓志谟编写了《铁树记》、《咒枣记》和《飞剑记》。这类下层文人，自称“糊口书林”，可以看出他们的谋利目的。

自万历后期起，随着李贽、袁宏道等人在理论上对通俗小说加以肯定，文人参与创作渐多，天启、崇祯时更出现冯梦龙、凌濛初、袁于令等著名作家，以往书坊主之作则被斥为“牵强附会，支离鄙理”（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或“铺叙之疏漏、人物之颠倒、制度之失考、词句之恶劣，有不可胜言者矣”（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不再为书稿发愁的书坊主逐渐退出创作领域，夷白堂主人杨尔曾接连推出《东西晋演义》与《韩湘子全传》，可视为“熊大木现象”尾声。崇祯间余季岳虽接连编撰《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与《有商志传》，但为销路却伪托钟惺与冯梦龙之名行世，只能通过署名“后人余季岳”的赞语、书尾“识语”与诗来暗示自己的著作权。这时，持续约半个世纪的书坊主主宰创作的格局已趋式微。

第五章

明清运河流域主导性文学创作

早在唐宋时期,运河流域文学创作往往独领风骚。到了明清,随着政治、经济中心东移,文学创作重心也转移到了运河流域,运河流域文学创作不仅领风气之先,而且居天下文学主流、大宗。

第一节 明清运河流域的诗文创作

一 明代诗词创作的核心在运河流域

明初诗人政治上多为新王朝拥护者,或主动追随朱元璋反元,或受朱元璋征聘参与新政权建设。宋濂祖籍浙江金华,后迁居浦江。受业于浙东大儒吴莱、柳贯、黄潜,至正二十年投靠朱元璋,明开国后为《元史》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明初朝廷“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是青田(今属浙江)人,元末进士,后为朱元璋谋士,官至御史中丞。宋濂、刘基元末的文学创作,反映江南社会生活;明初的文学作品,表现了新王朝的意识形态。被新王朝征用的吴中名士,有高启、王彝、徐賁、张羽、杨基等十余人。其中高启是长洲人,文学成就尤大。

明前期文坛,台阁体影响甚大。台阁主要指内阁与翰林院,又称为“馆阁”。台阁体则指以当时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台阁体诗文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

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杨溥《东里诗集序》），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三杨”虽非运河流域人，但他们的文学活动在得天独厚的都城，对天下的影响是很大的。

明中期的文学复古运动有摆脱程朱理学、官方政治对文学的约制，追求文学的独立性和自然、真实情感表现的成分。而“吴中四才子”的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和徐祯卿，与北方崛起“前七子”相呼应，标明文学自觉性的到来。“四才子”代表人物唐寅，弘治年间中乡试第一名。却因会试中受科场舞弊案牵连被逮下狱，归吴中后以卖画为生，过着“放浪名教外”的生活。早期代表作《金粉福地赋》，描摹了奢靡享乐的场景，错金镂彩的台观，通宵达旦的宴游，歌女舞姬的锦灿服饰和销魂体态，反映出当时东南城市中追求物质生活的社会氛围。后期以卖画为生，其诗有意识地强化了自己“狂诞”的形象。

“后七子”基本上是运河流域作家。代表人物李攀龙，山东历城人；王世贞，江苏太仓人；谢榛，山东临清人。晚明文学的先驱徐渭，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末，华亭（今上海松江）出现了一批爱国诗人。陈子龙、夏允彝等结几社，与复社相呼应，为江南抗清中坚。夏完淳子承父志，其诗作多反映易代之际的抗清斗争，于悲凉中发出激昂之气。晚明诗苑出现了不少富有个性和才华的女作家，在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尤为集中，如秦淮诗社朱无瑕，吴门的徐媛。朱无瑕是妓女，徐媛是名门淑女，她们的诗都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欣赏，并刊刻成书，广为流传。

明末小品文体制较为短小精练，体裁上不拘一格，风格上轻俊灵巧而有情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张岱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等多部文集，其作品取材广泛，笔力高致，是晚明小品文的集大成者。张岱同乡王思任绘画之余，也工小品文写作，有生活化、个人化的特点，其小品文往往从平常与细琐处透露出作家体察生活涵义、领悟人生趣味的精旨妙意，情趣盎然。

二 清代诗词代表作家都在运河流域

(一) 清初:三个著名诗人都是南运河流域人。钱谦益,常熟(今属江苏)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但很快他就告病归,与反清势力保持联系。其诗作于明者收入《初学集》,入清以后的入《有学集》,另有《投笔集》系晚年之作,多抒发反对清朝、恢复故国的心愿。吴伟业,太仓(今属江苏)人。明崇祯四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明亡后曾与侯方域相约终隐,但迫于清廷的压力,还是应召北上,当了国子监祭酒,一年多后即辞职南归。有《梅村家藏稿》。顾炎武,江苏昆山人。他年少时与同乡归庄参加“复社”,清兵南下,曾在昆山、嘉定一带抗清,以后也为此奔走多年,并始终不仕于清朝。有《亭林诗文集》。

词坛三大家影响深远。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和独树一帜的著名满族词人纳兰性德。三大家影响所及,直至清末。陈维崧,江苏宜兴人。其父陈贞慧,为明末著名复社文人。陈维崧少有才名,入清后出游四方,晚年举博学鸿词科,官翰林院检讨。他学识渊博,性情豪迈,才情卓越,学习苏、辛,使豪放词大放异彩,平生所作一千八百余首,居古今词人之冠。朱彝尊,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词试,出仕清廷。博通经史,工诗词古文,尤长于词,有《江湖载酒集》等词集四种,是浙西词派开创者,和陈维崧并称“朱陈”,执掌词坛牛耳,开创清词新格局。纳兰性德,满洲正黄旗人,但主要生活在北京。厌倦随驾扈从的仕宦生涯,产生“临履之忧”的恐惧和志向难酬的苦闷,纳兰词主情,崇尚入微有致;真挚自然,婉丽清新,善用白描,不事雕琢,运笔如行云流水,纯任感情在笔端倾泻。他还吸收李清照、



秦观的婉约特色,铸造出个人的独特风格。况周颐甚至把他推到“国初第一词人”的位置。

康熙、雍正年间运河流域诗人皆有作为。王士禛,山东新城(今桓台)人。明亡时他年仅10岁,没有太多的历史和感情包袱,而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又善于把个人的前途和新王朝联系在一起,因而能升迁至刑部尚书的高位。查慎行,浙江海宁人。康熙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有《敬业堂集》。查诗较多反映了社会民生问题,但其用意在于引起统治者的注意,表现士大夫“忧国忧民”的责任感,故叙述多而激情少。

(二) 清中叶:诗歌大家大都在运河流域。沈德潜,江苏长洲(今苏州)人。67岁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乾隆帝所信重。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沈德潜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以汉儒的诗教说为本,以唐诗的“格调”为用,企图造成一种既能顺合清王朝严格的思想统治而又能点缀康、乾“盛世气象”的诗风。在乾隆朝有较大影响。厉鹗,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幼年丧父,家境清贫,性情孤直而好读书,29岁时中举,此后几次应试都不第,于是把心思从仕进转向了著述,有《樊榭山房集》,又编有《宋诗纪事》,扩大了宋诗派的影响。厉鹗的诗作,病在好用僻典、故事,用意也过于深刻,但一些近体短篇,仍能表现出他孤寂的性格,有一种出俗的幽深清寒之意。袁枚,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入翰林院,因不娴满文,出为地方官,在江南一带做六年知县。后辞官,居于江宁小仓山下的随园。后半生过着诗酒优游的名士生涯。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及笔记小说《子不语》。他和李贽一样,肯定情欲的合理性,认为圣人之治,就是要让“好货好色”的人欲得到满足。和李贽一样尊重人欲,对矫饰虚伪的假道

学加以激烈的抨击,反映了当时城市工商业者的要求和思想。袁枚的诗歌理论标榜“性灵说”,创作以新颖灵巧见长。性灵说在当时诗坛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赵翼、郑燮、黄景仁等人都与袁枚交往并多少受到他的影响。

赵翼,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中期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晚岁辞官,专心著述,文学方面有《瓯北诗钞》和《瓯北诗话》。赵翼论诗与袁枚相近之处,是以创新为最高标准,绝不甘落人后,更不用说模拟。他的另一部分诗好发议论,思想机智而敏锐。如《后园居诗》之三从自己的谀墓之作联想到史籍的可疑,《闲居读书》之六以看戏者所处位置不同而所见各异比喻读书的道理,咏史而感时的《读史二十一首》更有启发人思考的见解。郑燮,江苏兴化人。乾隆初进士,曾为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后因为灾民请赈而被罢官,回扬州卖书画为生,有《郑板桥全集》。他的诗一部分集中反映民生疾苦,此外多山水纪游及题画之作,大抵语言自然浅切,不喜模拟,是一种优点,但缺少特异的感受和别出格创造。黄景仁,江苏武进人。4岁丧父,早年为谋生奔走四方。曾任武英殿书签官,后纳捐为县丞,候选时为债家所逼,欲往西安依陕西巡抚毕沅,病死于途中,年仅35。有《两当轩集》。黄景仁一生潦倒而多病,穷愁困顿是其诗歌的主要内容,他的诗也常常表现出对于人格尊严的珍视和由此产生的孤傲之情。

重要词人词派大都在运河流域。浙派词从清前期延伸到中期,厉鹗继朱彝尊成为其支柱。厉鹗论词,认为清婉深秀胜于慷慨豪放。他的词作以纪游、写景及咏物为多,音律和文辞都很工炼,选取的意象大抵华美而幽冷。多孤寂的情调,这种情绪在寻求宣泄时,会形成自我的扩张,使词呈现壮奇之趣。常州派开创者张惠言,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嘉庆四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有《茗柯词》,另编有《词选》,代表他的词学观点。其《词选序》中所述主张,最根本一点是提出词和诗一样要讲求比兴、要有寄托,“要其至者,

莫不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畅，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①。张惠言的词作，文字简净，少用华艳的辞藻和典故，抒情写物，细致生动，词旨在若隐若显之间。张惠言所编《词选》后面，附有郑善长所编《附录》一卷，收张惠言、张琦兄弟及黄景仁、左辅、恽敬、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金应珙、金式玉和郑善长的词，他们中除后三人为安徽歙县人外，其余都是常州（武进、阳湖）人，因此他们被称为“常州词派”。其后进一步推衍常州派理论的周济，江苏荆溪（今宜兴）人。

（三）晚清：龚自珍开风气之先。龚自珍，字璦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清末思想家、文学家。他支持林则徐禁烟，建议加强战备。他反对清末土地兼并，反对君主独裁。其为文纵横，自成一派，诗风瑰丽奇肆，辑有《龚自珍全集》。龚自珍的诗文是他社会批判的产物，紧密围绕社会政治这个轴心，彻底打破了嘉庆以来文坛的平庸风气，体现出时代精神，成为近代文学的开山之作。

第二节 明清运河流域的戏剧创作

与诗词创作领域一样，明清戏剧也呈现出运河流域带动其他地区共同繁荣的局面。

一 传奇在江南运河流域获得新生

南戏长期流传于南方各地，逐渐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声腔，而声腔的变化，又与戏曲的抒情内容相互关联，这就是声情相通的道理。明中叶几种主要声腔的流布情况：“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

^① 《中国古代诗文经典选本词选·续词选》1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①在《南词叙录》写作的嘉靖前期，昆山腔流行的范围还非常狭小，而且只用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清唱小曲。大约到了嘉靖中后期，以魏良辅为首的艺术家用海盐腔、弋阳腔的曲调，同时吸收北曲结构严谨的长处；在音乐伴奏方面，把弦索、箫管、鼓板三类乐器合在一起，集南北之所长。这种经过改良的昆山腔，清柔而婉折，富于跌宕变化，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其声调“恒以深邈助其凄唳”，适宜于表达带有伤感色彩的内心情绪。其后梁辰鱼首先将它推向戏曲舞台，创作了传奇《浣纱记》，对这种新腔的传布起了很大作用。此后传奇的演唱，昆腔便占了主导地位，并产生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优秀作品。

梁辰鱼，昆山（今属江苏）人。他失意于功名，寄情于声乐，平生任侠好游。他的散曲集《江东白苎》也是依昆山腔写作的，有较大的影响。《浣纱记》取材于《吴越春秋》，把勾践复仇灭吴的历史大事件与范蠡、西施的爱情传说结合起来写，剧中的中心人物实际是西施。因西施与范蠡初以一束浣纱定情，故以此为名。

产生于隆庆年间的《鸣凤记》是一部关切当代政治事件的剧作，或谓是王世贞作，或谓是其门人作，无有定论。作者把以严嵩父子及赵文华为首的“奸党”和以杨继盛、董传策等人为一方的“忠臣”向两个方向作极端化的描绘，从而维护了嘉靖皇帝的“圣明”品性。把复杂的政治矛盾解释成政治人物道德品质的对立，这是一种惯常的作法。剧中的杨继盛等人是“忠义”的化身、“纲常”的代表，缺乏普通人的思想感情，显得很死板。

① 《〈南词叙录〉注释》3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



二 明代中期运河流域戏剧创作

明中期运河流域戏剧作家冯惟敏、徐渭和李开先的创作,最少封建说教成分,较多新思想的光辉。

冯惟敏,山东临朐人。以举人授涑水知县,升至保定通判。杂剧《僧尼共犯》写僧明进与尼惠朗苟合,被邻人捉至官司,钤辖司吴守常将二人打了一顿板子,断令还俗成亲,并说:“成就二人,是情有可矜。情法两尽,便是俺为官的大阴鹭也!”冯氏为人好戏谑,他让明进和惠朗挨一顿打再欢欢喜喜结为夫妻,算是于情于法都有了交代,也是他的个性的表现。这和晚明戏剧强烈而严肃地为情欲争权利虽态度有别,但毕竟还是肯定了情欲的不可抑制。

徐渭,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其杂剧《四声猿》是彻底摆脱封建说教的迂腐,闪耀着新的思想光彩的杰作。《四声猿》包含四种剧:《狂鼓史》一折,《翠乡梦》二折,《雌木兰》三折,《女状元》五折。长短无定制,所用曲调,有时为北曲大套,有时为南北兼用,还采用《鹧鸪》等民间小调,在形式上就表现出不受陈规束缚的革新精神。这已经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杂剧。

李开先,山东章丘人。因上书批评朝政,罢官居家近三十年。在此期间,他与友人结词社从事戏曲的创作与研究,以消磨岁月、发散郁闷。所作传奇今存《宝剑记》、《断发记》。《宝剑记》叙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但它的情节、主旨与《水浒传》所写有很大不同。在《宝剑记》中,林冲是因二度上本弹劾高俅、童贯专权用事、败坏朝政而一再遭到迫害,至于高衙内看上林冲之妻张氏,则是林冲发配以后的事情。将林冲写成一个忠臣义士,将张氏写成一个孝妇贞妻。既寄托了作者自身因遭受挫折而生的愤慨,也反映了他对政治黑暗的亲身体验,与纯粹从教化忠孝立场出发的作品毕竟不是一回事。像“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一类的表白,具有一定的反抗意味。

三 明后期戏剧繁盛于东南

明代后期是戏曲的繁盛时期，东南一带，尤为风行。吕天成《曲品》云：“博观传奇，近时为盛。大江左右，骚雅沸腾；吴、浙之间，风流掩映。”当时士大夫宴集以观赏戏曲为娱乐，成为普遍风气，由此可见一斑。一些殷富人家还蓄有家庭戏班。这种风气无疑会刺激剧本的创作。万历年间，有为数众多的文人参与戏曲创作，并且有不少人投入了毕生的主要精力，戏曲在文人中受重视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刺激了对戏曲本身的研究，形成了两个戏剧流派。

江苏吴江人沈璟创立了吴江派。沈璟中年告病还乡，专力于戏曲创作及研究。著有传奇十七种，合称《属玉堂传奇》。其中《红蕖记》、《埋剑记》、《双鱼记》以情节离奇、关目曲折取胜，表现了重视舞台效果的倾向，对后来的戏剧创作有一定影响。另有《义侠记》写武松故事，传唱较广；《博笑记》以十个独立的短剧组成，形式上有创新，内容多讥刺世事混乱，也有一定特点。但沈氏思想颇为陈腐，作品内容多封建说教的成分，也不擅于刻画人物的真实心理和个性，所以成就不高。作为曲学名家，他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在前人著作的基础上对南曲七百十九个曲牌进行考订，指明正误，成为后人制曲和唱曲的权威教科书。曲论要点有二：一是格律至上，二是推崇“本色”语言。他要求作曲合律本来不错，但持法过于苛严，且认为为了合律可以牺牲抒情表意，这就成了束缚。至于他所说的“本色”，则着重于语言的朴拙浅俗，这对于明传奇过于偏重文藻骈骊的倾向有纠正的意义。在沈璟的影响下，形成了“吴江派”。与汤显祖所代表的“临川派”东西呼应，成为明代戏曲史上双璧。

吴江派作家，据沈自晋《望湖亭》传奇第一出的《临江仙》词所列，除沈璟、吕天成、王骥德外，尚有叶宪祖、冯梦龙、范文若、袁晋、

卜世臣及沈自晋本人,可见其声势不小。其中叶宪祖的戏剧多写男女爱情,思想倾向上有晚明文学的特点。如杂剧《寒衣记》写刘翠翠违抗父母之命与金定结为夫妻,后被掳,本想自尽全节,但为了日后与丈夫重见,忍辱委身于李将军,最后终于团圆。这表明只要有真实的爱情,贞节是可以忽视的。袁晋的《西楼记》传奇写书生于鹄与妓女穆素徽的爱情故事,对于鹄的痴情用力刻画,突出了“情”的不可磨灭。此剧音调工整,结构严密,情节富于曲折变化,一向流行很广。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王骥德,早年曾师事徐渭,后深受沈璟赏识,同时他对汤显祖也很尊崇。所以,虽然前人把他归于吴江派,他的见解并不只是附和沈璟。对汤、沈之争,王氏持折中之论。受吴江派和临川派双重影响的戏剧家吴炳,宜兴(今属江苏)人。著有传奇《西园记》、《绿牡丹》、《疗妒羹》、《情邮记》、《画中人》,合称《粲花斋五种曲》。五剧均以歌颂男女真情为主题。吴炳的剧作不仅主题鲜明,也以结构严谨见长,善于运用误会、巧合手法,情节曲折而线索清楚,代表了晚明戏剧在重视舞台演出效果和娱乐功能方面的新发展。同时,也善于用优美流畅的文辞深入刻画人物的心理,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四 清初运河流域戏剧创作

苏州在明代就曾经是戏剧创作与演出的一个中心城市,清初仍有许多作家在这里活动,形成一个重要的创作群。其中李玉最为著名,另有朱骀、朱佐朝、叶时章、张大复、丘园等,除丘园是常熟人而生活在苏州外,其余都是苏州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彼此交往密切,常合作写剧,所以有的研究者称之为“苏州派”。李玉是明末清初创作最多、影响较大的戏曲家,所作传奇三十多种,今存十八种,又曾编订《北词广正谱》,是研究北曲曲律的重要著作。李玉于明亡以前所作戏剧,以“一笠庵四种曲”即《一捧雪》、《人兽关》、《永团

圆》、《占花魁》最为有名。入清后创作有《清忠谱》、《万里圆》、《千钟禄》。朱佐朝所作传奇今存十二种,代表作为《渔家乐》,写东汉梁冀擅权,清河王刘蒜被逼逃亡,追兵误杀一邬姓渔翁,渔翁之女邬飞霞救出刘蒜,又为报父仇,冒名混入梁府,刺死梁冀;后刘蒜称帝,立邬飞霞为皇后。张大复所作传奇今存《如是观》、《快活三》等十种。丘园所作传奇今存《党人碑》等三种,另有《虎囊弹》。

浙江兰溪(今金华市)人李渔,顺治八年移家杭州,过着“卖赋以糊其口,吮毫挥洒怡如”(黄鹤山农《玉搔头序》)的生活。他的戏曲、小说大部分是寓居杭州十年间作成的,刊行后颇为畅销,以此受到了一些达官名流的垂青、资助。顺治十七年又移家南京,经营芥子园书坊,时常带着自家的戏班周游各地,到达官贵人府第打抽丰,成为一个很有名气的托钵山人。李渔自负才情,沾染了晚明士人放诞自适的遗风,不讳言享乐和饮食男女,有《笠翁传奇十种》剧目为《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怜香伴》、《风筝误》、《慎鸾交》、《凰求凤》、《巧团圆》、《玉搔头》、《意中缘》。

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洪昇,出身于已趋中落的世宦之家。他本人做了二十来年的太学生,其间十余年旅食京华,未获一官半职。此后往来于吴越山水之间,过着放浪潦倒的生活,在浙江吴兴夜醉落水而死。洪昇能诗,今尚存《稗畦集、续集》、《啸月楼集》。主要创作成就是在戏曲方面。有传奇九种,仅存《长生殿》;又存有杂剧《四婵娟》一种。《四婵娟》体式略近于徐渭的《四声猿》,由四个单折的短剧合成,分别写谢道韞、卫夫人、李清照、管夫人这四个历史上才女的故事。而据洪昇友徐材说,他“自谓一生精力在《长生殿》”(《天籁集·跋》)。《长生殿》是一部以写“情”为主、兼寓政治教训与历史伤感的作品。《骂贼》一出,写乐工雷海青责骂安禄山和投降的官员,主要表现正统的“忠义”思想。

山东曲阜人孔尚任,康熙南巡返经曲阜时(1684),孔尚任被荐在御前讲经,由国子监生破格被任为国子监博士,后迁至户部员外



郎。参与疏浚黄河入海口的工程,在淮扬一带生活了三年,结识了冒襄、黄云、宗元鼎、杜濬等明末遗老及其他一些著名文人,还在扬州、南京诸地凭吊明朝的遗迹,这为他后来创作《桃花扇》收集了素材。《桃花扇》创作,作者自谓始于未出仕时,经十余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始成(见《桃花扇本末》)。作品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绘了南明弘光王朝由建立到覆灭的历史,写出了明王朝最后的崩溃。剧本的宗旨,作者说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同时要通过说明“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桃花扇小引》)。总结历史教训和抒发兴亡之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各有偏重的方面,作者在这两方面达到的深度有所不同。

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

第六章

明清运河流域小说

到了明清两代,小说作品 80%左右出自运河流域作家之手。明清小说的主体运河流域化,比诗歌散文要突出明显得多。

第一节 明清小说与吴越文化

一 明清小说作者与吴越的关系

明代中期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因素最早在吴越地区萌芽,促使了文人灵魂充分感受到时代的变革、多姿多彩的生活等时代气息。吴越地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催生了俗文学的繁荣,单就小说来说,明清两代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的总数大概在 2000 余种,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提到通俗小说的作者是 604 人,吴越文化区域的作者即高达两百多人,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明清小说的作者多来自吴越地区,或与吴越文化区有过某种联系,且这些小说的题材内容也多涉及到吴越地区的人物和事件,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吴越文化。有如下三种情况:

其一,吴越地区作者描写吴越生活的作品。《三言》的编著者冯梦龙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二拍》的作者凌濛初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醒世言》的作者陆人龙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西湖二集》的作者周清源是武林(今浙江杭州)人,《欢喜冤家》的作者“西湖渔隐主人”,据其署名可知为杭州人,《鼓掌绝尘》的作者署名

“古吴金木散人”，可见作者是苏州人。这些作品中大部分的故事取材于吴越地区的人物和事件，具有浓厚的地域风格。长篇小说也有相同现象，《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为兴化白驹场（今江苏大丰）人，宋江平方腊，战场由润州（今江苏镇江）、苏州直至浙江的西部，涉及吴越文化的不同方面。

其二，吴越地区作者描写其他地域人事的作品。这类作品虽未直接描述吴越文化，但我们在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吴越文化的浸染。以神魔鬼怪小说例，成书于万历年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成书于隆庆、万历间的《封神演义》作者许仲琳，号钟山逸叟，系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人。成书于清中叶的《绿野仙踪》的作者李百川，从其自序及他人的序中，知其为南运河一带人，常年周旋于扬州、盐城等地。与《绿野仙踪》同一时期的此类作品《济公传》，题“西湖渔樵主人编”；《瑶华传》的作者丁秉仁为苏州人；《何典》的编著者张南庄为上海人。这些作品虽写的是神灵鬼怪传说，似乎与吴越地区无关，但因作者系吴越地区的人，势必会受到吴越文化的熏陶，我们在阅读此类小说的过程中仍隐约可见吴越文化对作者及其创作的影响。

其三，其他地区作者描写吴越文化的作品。这一类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曾经在吴越地区生活过的其他地区作者，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虽祖籍辽宁，但其祖上长期居住在江南，他自己也曾在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祖父曹寅特别钟爱吴越文化，曹府里充满着吴越文化的气氛。因此《红楼梦》书中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各方面仍保持着吴越地区的味道。《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安徽全椒人，但在南京、扬州生活过很长时间，小说人物原型多为南京、扬州士林。《姑妄言》作者曹去晶，祖籍辽东三韩，但他长期生活于南京，对南京及扬州、苏州等地的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非常熟悉。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又以南京为中心。因此，这部介于《金瓶梅》和《红楼梦》之间的独具特色的世情小说，与吴越地区

同样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姑妄言》成了南京明清之际的风俗史,浓缩了许多吴越文化。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作者虽非吴越人,也未长期生活在吴越,但或多或少接触过吴越的人事,写出了反映吴越地区的作品。如《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虽是东原人,但与吴越也颇有些瓜葛。传说这位“有志图王者”的小说家曾与元末义军领袖张士诚(江苏兴化人)有过接触,有传说罗贯中是施耐庵门人,而明刻本《水浒传》作者大多署施、罗二人。明代中篇传奇《双卿笔记》,作者籍贯不明,有可能他经过吴越,听说了两位佳丽张正卿、张顺卿共事平江才子华国文的传说,于是写了这篇传奇。

二 明清小说反映的吴越文化

吴越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历来较高,尤其表现在工商业方面,“重商谋利”成为吴越文化中的重要特征。及至明代中叶以后,手工业和商业在吴越地区尤其发达。

首先,明清小说真实地描写了这一时期繁荣的江苏都市

南京在明代以前,便已是古都,有着相当的经济基础;到朱元璋在此建都,作为明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京变得更加繁华。对南京的繁富,明清小说作品中多有描写。如《醉醒石》第一回写到:“南京古称金陵,又号秣陵,龙盘虎踞,帝王一大都会。自东晋渡江以来,宋、齐、梁、陈,皆建都于此。其后又有南唐李煜、李璟建都,故其壮丽繁华,为东南之冠。……及至明朝太祖皇帝,更恢拓区宇,建立宫殿,百府千衙,三衢九陌,奇技淫巧之物,衣冠礼乐之流,艳妓变童,九流术士,无不云屯鳞集。真是说不尽的繁华,享不穷的快乐。虽迁都北京,未免宫殿倾颓,然而山川如故,景物犹昨,自与别省郡邑不同。”又如《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写到:“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

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妆炫服，招接四方游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这两段文字，从南京的历史到现状，从自然山水到人文景观，乃至社会风尚、风土人情等等，都作了具体入微的描绘，对认识明清时期的南京，是十分宝贵的资料。

除了南京，关于苏州、扬州等，在明清小说中，也不乏描写笔墨。《豆棚闲话》第三则写苏州道：“那平江是个货物码头，市井热闹，人烟凑集，开典铺的甚多。”表现了市井的繁华。第十则描写到：“阊门外山塘桥，到虎丘止得七里，除了一半大小生意人家，过了半塘桥，那一带沿河临水住的，俱是靠着虎丘山上养活，不知多多少少扯空研光的人。即使开着几扇板门，卖些杂货或是吃食，远远望去挨次铺排，到也热闹齐整。”描写了从山塘桥到虎丘一带的人文景观。《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写到：“却说苏州六门：葑、盘、胥、阊、娄、齐。那六门中只有阊门最盛，乃舟车辐辏之所。真个是：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东西。五更市贩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齐。”极写苏州阊门之繁盛。关于扬州的描写，在《醒世恒言》第六卷有一段文字：“那扬州隋时谓之江都，是江淮要冲，南北襟喉之地，往来橈櫓如麻。岸上居民稠密，做买做卖的，挨挤不开，

真好个繁华去处。”扬州的地理、商业、繁华富庶，在这不多的文字中，真实地展现了出来。

其次，明清小说以形象之笔，生动地展现了手工业的发展与市镇经济的繁华

江南运河流域手工业的发达，在明清文献中多有记载，而从事手工业纺织者的普遍，文献中有明文阐述；在明清小说中，小说家也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这方面内容的可贵材料。如《拍案惊奇》卷二十的人话写到：“且说南直长洲有一村农，姓孙，年五十岁，娶下一个后生继妻。前妻留下一个儿子，一房媳妇，且是孝顺。……那老儿和儿子，每日只是锄田耙地，出去养家过活；婆媳两个，在家绩麻拈芭，自做生理。”男耕女织，以耕为主，以织为副，这反映了明代中叶的社会分工形式，是较早时期的自然经济形态。再如《警世通言》第三十一卷写扬州名妓赵春儿，从良嫁与富家子曹可成。丈夫浪子败家，春儿恨其不争气，赌气将箱笼钥匙全给了丈夫，说：“这些东西左右是你的，如今都交与你，省得欠挂。我今后自和翠叶纺织度日，我也不要你养活，你也莫缠我。”春儿自此日为始，就吃了长斋，朝暮纺织自食。这里写纺织度日，而不是靠耕作养家活口，显然已不同于上则内容。在此，纺织起码已经与耕作不分主副，纺织也可以自立。

随着时代的发展，手工业渐渐从对农业的依附中走向独立，最后形成一乡一镇同操一业的局面。《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是一篇经常被经济史家称引，用来说明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及江南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文字。作品进入正话，便有一段文字，描写了吴江县盛泽镇作为蚕丝重镇的富庶繁华。写到：“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子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伧足之隙，乃出产



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苏南商业手工业市镇的具体情况。当代学者刘石吉综合排比各种方志考证，盛泽古为青草滩一荒村，弘治年间尚为村落，居民仅五六十家；嘉靖间始渐成市集，居民增至百家，以绫绸为业。到了清初，因为“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咸萃”，所以逐渐成为吴江县第一大镇，乾隆五年且移驻吴江县丞于此，以资弹压。盛泽镇的发展，在苏浙一带市镇的崛起中，显然是有代表性意义的。

《施润泽滩阙遇友》更为可贵之处在于，它通过施家的发家史，揭示了苏南桑蚕织丝业的艰难历程，对认识明清丝织业的发展，极富意义。初始，施家仅开了一张绸机。在回家的路上拾到数两银子归还了失主，积善所至，百事顺利，“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家中颇颇饶裕。里中遂庆个号儿，叫施润泽”。施家以蚕织为业，“蚕丝利息，比别年更多几倍。欲要又添张机儿，怎奈家中窄隘，摆不下机床”，运来福凑，买房掘到藏银约有千金，“夫妻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的十分完美”，“施复之富，冠于一镇”。揭去文字中唯心神秘的烟雾，应该看到施复由家庭小作坊扩大到颇具规模的作坊经营，主要靠的还是他营运有方，以及为人忠厚而带来的人和，这是他发家的法宝。从施复的发迹史，正可以照见苏浙丝织业发展的一般情形。

再次，明清小说具体描绘了当时江南商业贸易的繁荣景观，成功地刻画了一批商人形象

明清世情小说继承了宋、元话本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家们对世俗社会十分关注，描绘了世俗社会芸芸众生的生活及命运，反映了他们的思想与情绪，塑造了一批市井人物形象，为小说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方面,作品反映了江南商品市场的活跃与繁荣,既描写了集市贸易的红火,也展现了林林总总的店家生意的兴隆。《喻世明言》第一卷写到:苏州“枫桥是柴米牙行聚处”,商品交易非常活跃,蒋兴哥从广东贩货归来,都要在此发卖。《拍案惊奇》卷一描写了集市上出售洞庭红的情景,文若虚“信步走去,只见满街上筐篮内盛着卖的”,都是当地的“洞庭红”。《十二楼·萃雅楼》则写了苏州花市的盛大:“因到虎丘山下卖花市中,看见五彩陆离,众香芬馥,低徊留之不能去。”繁华得眼花缭乱。

江南运河都市店家,有开典当解铺的。如《警世通言》第十五卷写苏州矫大户,积年开当铺,“为富不仁,轻兑出,重兑入,水丝出,足纹入,兼将解下的珠宝,但拣好的都换了自用。又凡质物值钱者,才足了年数,就假托变卖过了,不准赎去。如此刻剥贫户,以至肥饶”。同书第二十二卷中的宋金暴富后,在南京买了所大宅,也“门前开张典铺”。同书卷二十六写无锡华学士府开有典铺,生意尽好。《醒世恒言》第七卷写太湖西洞庭高赞,“少年惯走湖广,贩卖粮食。后来家道殷实了,开起两个解库,托着四个伙计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石点头》第六卷写湖广广济人吴公佐,流落江苏盐城,受尽艰难,后“白手得钱,积累巨万,从此开起典库。那典库生理,取息二分,还且有限,惟称贷军装,买放月粮,利上加利,取资无算。不五年间,遂成盐城大户,声达广济故乡”。有开杂货店的,如《拍案惊奇》卷八的吴江陈大郎,《连城璧》中所写的吕旭之父。《警世通言》卷五所写徽州陈商在扬州开粮食铺子,《警世通言》卷二十二中苏州陈三郎开棺材店,《醒世恒言》卷七中吴江县尤少梅开果子店,《醒世恒言》卷二十中苏州王家开玉器铺,《型世言》卷二十三中苏州盛诚开缎子店,《云仙笑·厚德报》中苏州张国瑞开布店等,这些生意也都尽好。

江南活跃的商品市场招来了全国各地的客商,商人也都在这里赚取了可观利润。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五写河南开封府杞

县钱已、赵申，两人合伙到苏、松做买卖，“得了重利”。《醒世恒言》卷三十五写浙江严州府淳安县义仆阿寄做生意帮主人发家，常跑的地方就有苏州、杭州。《无声戏》第十一回写福建泉州商人单龙溪，“只是在本处收荔枝圆眼，到苏杭发卖”，就生财致富。这都从一定角度反映了明清时期江苏商品市场的繁荣。

江南人的对外贸易，也是小说中表现的重要内容。《拍案惊奇》卷一写苏州客商张乘运等，“专一做海外生意”。“原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作品中另一主人公文若虚同他们一道前往海外，才有了机遇。这是到海外做生意的故事，还有江南人到外地做生意的故事，《喻世明言》卷二十八写上元县黄公，“以贩线香为业，惯走江北一带地方”。黄公死后，其女继承父业，乔扮男装，与同里人李秀卿一道，合伙生理，“轮流一人往南京贩货，一人在庐州发货讨账”，“几年勤恳营运，手中颇颇活动，比前不同”。《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写苏州商人到辽阳卖布，《无声戏》第八回写苏州王继轩贩米售之山东等，都是江南商人在外行商的例子。

第二节 明清小说与燕赵文化

燕赵在明清两朝属直隶行省，是都城近畿、首善之地。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燕赵地区小说成就虽次于吴越，不如诗歌那样能辐辏天下，但颉颥齐鲁，高于非运河流域省份，地位也不容小视。

一 明清两朝燕赵小说的作家作品

正如整个明代小说至中期始渐入佳境那样，明代燕赵小说也发轫于马中锡的文言小说《中山狼传》。马中锡，字天禄，号东田，故城（今属河北）人。其单篇别行的传奇小说《中山狼传》，存作者

《东田文集》卷三，脍炙人口，广泛流传。小说叙赵简子射伤一狼，东郭先生解救了狼，狼脱离危险后却要吃东郭先生。无奈之中，东郭先生求救于老丈，老丈将狼骗入口袋打死，并教育东郭先生不能对忘恩负义的恶狼讲信义。后来这个小说在明代影响广泛，被多人多次改编为戏剧。马中锡学生康海的杂剧《中山狼》共四折，借中山狼影射李梦阳的负恩。“你看世上那些负恩的，却不个个都是中山狼么？”流露出愤世嫉俗情绪。陈与郊、汪廷讷的《中山狼》杂剧，无名氏的《中山狼白猿》传奇，在当时的剧坛皆有影响，形成中山狼题材创作热。与此同时，明中叶问世的燕赵人所写的文言小说集，《臆见录》，入《千顷堂书目》子部小说类，无卷数。作者乔英（瑛），字伯藏，号南庄，河北束鹿人，嘉靖癸未进士。《涉世谈藪》，十卷，已佚。作者刘袞，直隶新安（今属河北）人。

稍晚，燕赵地区有一批文言笑话集问世。《古今寓言》作者陈世宝，字介锡，钜鹿（今属河北）人，万历中官监察御史，曾巡按江西。据《四库全书提要》，此作编诸家托讽取喻之作为十二类，有嬉笑怒骂风格。《笑赞》作者赵南星，字梦白，号侂鹤，别号清都散客，高邑（今河北元化）人，万历二年进士，东林党主要人物，为官清正敢言，因而先后两次被罢官或流放，《明史》有传。作品思想内容，大都讽刺世间丑恶现象。如《端公》写神汉教了一个徒弟，师傅外出而人来请，徒弟刚会打鼓唱歌，只好前去应付。跳神许久不见神来附体，没奈何信口扯了个神灵，乱说几句，得了钱米回来。见师傅如实相告，师傅听了大惊：“徒弟你怎么知道？我原来就是如此。”这是常人体笑话，讽刺世间迷信坑人现象。

明代燕赵白话小说有饶安（今河北盐山）人完熙生所著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一部短篇白话小说集。作者把民间流传的包公故事搜集起来，掺杂一些史书杂记内容，编成一部包罗百件讼案的话本总集，为中国第一部短篇公案小说集，开后来包公小说先河。



清代燕赵小说成就超过明代。首先是文言小说数量众多,清初宛平(今属北京)人王崇简的笔记小说集《谈助》,二卷,杂记朝野人物言行,以明代为主,兼及前代,而以朝内轶闻居多。直隶广平(今属河北)人宋起凤的文言小说集《稗说》,创作于康熙初年,四卷,记事一百五十件。本书卷四所记“内库所贮藏金银,每锭重三四百两,(李自成)鞏归西安,自京门达潼关千余里,日夜不绝道路。叹谓:崇祯天子蓄如许物,奈何数称饷绌耶!”可窥明末统治者聚敛财富而不用用于国的真相。又记明宫中蓄藏米粮的地方叫做“天堆”,“每年六官动用,不过减地上之一尖,明年复增益如初”。“寇变,除散给贼党与民间乘乱窃取外,亦委于火,今并其遗址莫问矣。”反映了明末农民军开仓救民的事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与宋起凤同时的大兴(今属北京)人黄叔琳,著有文言笑话集《砚北丛录》,《四库提要》称作者写于巡抚罢官后,杂采唐宋元明及当时说部,益以耳目见闻,多文人嘲戏之词,忧患中消遣之作。雍正年间天津人王又朴的笔记小说集《诗礼堂杂纂》问世,该书所记或文论经史,或现代轶闻,其中不乏具有小说性质之作。

清后期成书于道光末年,由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张昀创作的志怪小说集《琐事闲录》,杂记各种怪异之事,部分故事反映了当时民风习俗。成书于咸丰四年,由宝坻(今属天津)人高继衍所撰文言小说集《蝶阶外史》,记明清两代奇闻怪事,包括神仙鬼怪、卜筮梦象、江湖杂耍等,内容极为丰富。写法上能注意虚实相生。如“窦尔墩”记其剪除恶盗;“高二爷”、“槛中人”、“少林寺僧”诸篇均为后来武侠小说滥觞;另如“河帅”写清官周行县境,深入访察的作风;“郝雪海”记巡按督军的威严和任人唯贤的作风,都有积极意义。成书于咸丰后期,由天津人徐士銮撰写的文言小说集《宋艳》,仿《世说新语》体例,从《宋史》中取材,所记多宋代婢妾娼妓,故名“宋艳”。对今人了解宋代上层社会生活习

俗有史料和审美价值。清末章武(今属河北)人储仁逊世居天津,以设馆为生,创作了《器器琐言》。书中杂记晚清社会传闻及奇闻怪事,寓伤时之意。稍后天津人李庆辰创作的文言小说集《醉茶志怪》,不少鬼神故事反映了社会的黑暗。而深泽(今属河北)人斯陶居士的文言小说摘编《斯陶说林》,堪称古代文言小说荟萃。

其次是白话小说有长短篇佳作问世。清前期有直隶大兴(今北京大兴)人李汝珍创作的章回小说《镜花缘》,写华人海外冒险经历,表现了异域风情;后期有上谷(今河北易县)人蓉江氏所著的《西湖小史》,为燕赵人写江南社会生活的范例。写受奸臣迫害避难于西湖的广东惠州人黄建勋等人的子女成人后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几经磨难,终于挫败奸臣、建功立业,终成眷属的故事。清末北京人连梦青的章回小说《邻女语》写光绪庚子年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西狩。江苏丹徒人金不磨,慨然携仆北上。目睹乱军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面对洋人的进攻,清军将领惶恐失色,但屠杀人民却毫不留情;山东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客店中却歌妓献唱灯红酒绿。居庸关守将刘光才闻变而走,后知德军并未进攻,又献捷行在;山西巡抚毓贤杀各国教民,朝廷迫于联军淫威,将毓贤正法,并赔偿五十万两白银;义和团张德成至天津,总督跪迎。张德成装神弄鬼,自称有法术,但洋人临城下,即挟财逃跑,为村民所杀,写尽弱国乱政百态。清末保定人何迥著章回小说《狮子血》,写山东人查二郎率李大郎等五人一起出海,先到北冰洋,又绕行地球,至墨西哥,与人角力,大获全胜,至西班牙,救出狂牛角下的斗牛士。复又至爪哇,有大地震,查二郎斗败巨龙,平息地震,被当地华人称为华人冒险家。在非洲,他们救出被人买卖的奴隶,又征服落后民族地区,建立共和国。

二 明清燕赵小说代表作品述评

(一) 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①，清纪昀撰。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官至侍读学士，曾谪戍乌鲁木齐三年，释还后主编《四库全书》，累迁至礼部尚书。《阅微草堂笔记》包括主修《四库全书》以来先后写成的《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集文言小说，最后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一题《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书中多记怪异故事，颇多忠孝节义、劝善惩恶、因果报应之谈，记神鬼物怪之事往往寓有宣扬纲常名教倾向，其中也不乏针砭社会、展示人情物理的作品，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阅微草堂笔记》鬼神故事和常人故事并存，以记述作者家乡乃至燕赵大地的社会百态为主，同时旁及其他地区人事。以《滦阳消夏录》卷一为例，故事涉及的州县有献县、沧州、河间、天津、德州、涿州、景州、交河、南皮，也有泰安、扬州、汀州，乃至乌鲁木齐。所记内容能表现积极主题者主要有：

1. 揭示官场和世道的不古，表现清官循吏复杂的内心世界。《滦阳消夏录一》记有：“献县令明晟，应山人。尝欲申雪一冤狱，而虑上官不允，疑惑未决。儒学门斗有王半仙者，与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验，遣往问之。狐正色曰：‘明公为民父母，但当论其冤不冤，不当问其允不允，独不记制府李公之言乎？’门斗返报，明为悚然。”明县令欲平反一冤狱，担心上司不答应，可知此冤狱必为上司造成。又清官欲雪冤狱，尚需因神汉以决狐疑，可知当时为清官的不易。作品后面论及做人可以安命、为官不能不抗争的道理：“一

^① 本章节选《阅微草堂笔记》，均见北京出版社2001年6月版《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15)、(16)。

身之穷达,当安命。不安命则奔竞排轧,无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桧,即不倾陷善类,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国计民生之利害,则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设官,所以补救气数也。身握事权,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设此官乎?”这段话,是封建社会清正官员的传统美德集中表现。

《槐西杂志四》写道:“明公恕斋,尝为献县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时,有疑狱,易服自察访之。”这是一个清官形象。但他某次私访时受到老僧批评:“公为郡不减龚、黄。然微不嫌于众心者,曰好访。此不特神奸巨蠹,能预为蛊惑计也;即乡里小民,孰无亲党?孰无恩怨乎哉?访甲之党,则甲直而乙曲;访乙之党,则甲曲而乙直。访其有仇者,则有仇者必曲;访其有恩者,则有恩者必直。……”此话虽有偏颇,但强调为官得实情难,“凡狱情虚心研察,情伪乃明。信人信己皆非也。信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己之弊,亦有不可胜言者”。强调对访察结果去伪存真的重要。

2. 记述非同寻常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槐西杂志四》写道:“沧州一带海滨煮盐之地,谓之灶泡。袤延数百里,并斥卤不可耕种。荒草粘天,略如塞外,故狼多窟穴于其中。捕之者掘地为阱,深数尺,广三四尺,以板覆其上,中凿圆孔如孟大,略如枷状。人蹲阱中,携犬子或豚子,击使嗥叫。狼闻声而至,必以足探孔中攫之。人即握其足立起,肩以归。狼隔一板,爪牙无所施其利也。”表现了盐民的勇敢和智慧。《槐西杂志三》:“太湖有渔户嫁女者,舟至波心,风浪陡作,舵师失措,已欹仄欲沉。众皆相抱哭,突新妇破帘出,一手把舵,一手牵篷索,……直抵婿家,吉时犹未过也。”作品又写焦氏女,“已受聘矣。有谋为媵者,中以蜚语,婿家欲离婚。父讼于官,而谋者陷阱已深,非惟证佐凿凿,且有自承为所欢者。女见事急,竟倩邻媪导至婿家,升堂拜姑曰:‘女非妇比,贞不贞有明证也。儿与其献丑于官媒,仍为所诬,不如献丑于母前。’遂阖户弛服,请姑验。讼立解。”作品中的两个女性,虽然在

封建社会并不多见,但其刚烈果敢、机智勇决,堪称中国劳动妇女的杰出代表。

3. 抨击歧视妇女的陋习,为女子的悲惨命运鸣不平。《槐西杂志三》:“奴子宋遇,凡三娶,第一妻,自合番即不同榻,后竟仳离。第二妻子必孪生,恶其提携之烦,乳哺之不足,乃求药使断产;误信一王媪言,舂砺石为末服之,石结聚肠胃死。”反映了封建社会女子命运的悲惨。“又奴子王成,性乖僻,方与妻嬉笑,忽叱使伏受鞭。鞭已,仍与嬉笑。或方鞭时,忽引起与嬉笑;既而曰可补鞭矣,仍叱使伏受鞭。大抵一日夜中,喜怒反复者数次。妻畏之如虎,喜时不敢不强欢,怒时不敢不顺受也。”对妻子一会拷打,一会调笑,喜怒无常而妻子不敢丝毫违拗。封建社会男女之不平等可见一斑。《如是我闻一》写一位反抗强奸英勇牺牲的女子,死后也不被理解的故事:“妾黄保宁妻汤氏也。在此为强暴所逼,以死捍拒,卒被数刃而死。官虽捕贼骈诛,然以妾已被污,竟不旌表。冥官哀其贞烈,俾居此地,为横死诸魂长,今四十余年矣。夫异乡丐妇,踽踽独行,猝遇三健男子,执缚于树,肆行淫毒;除骂贼求死,别无他术。其啮齿受玷,由力不敌,非节之不固也。司讞者苛责无已,不亦冤乎?”声讨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观念对女子的压制。

4. 记录物产奇闻,表明独到见解。《槐西杂志》写道:“余乡产枣,北以车运供京师,南随漕舶以贩鬻于诸省,土人多以为恒业。枣未熟时,最畏雾。雾浥之则瘠而皱,存皮与核矣。每雾初起,或于上风积柴草焚之,烟浓而雾散;或排鸟铳迎击,其散更速。”记述了河北献县红枣运销情况和种枣防雾办法,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如是我闻》一则故事载:“余家距海仅百里,……海中每数岁或数十岁,遥见水云湏洞中,红光烛天,谓之烧海。辄有断椽折栋,随潮而上。人取以为薪。越数日,必互言某匠某匠,为神召去营龙宫。然无亲睹其人,话鲛室贝阙之状者,第传闻而已。余谓是殆重洋巨舶,弗戒于火,水光映射,空无障翳,故千百里外皆可见;梁柱之类,

舶上皆有，亦不必定属殿材也。”作者对海上漂来木材的解释，立足于他外海贸易知识，颇有说服力。

（二）文康的《儿女英雄传》

《儿女英雄传》^①，初名《金玉缘》，又名《日下新书》、《正法眼藏五十三参》等，署名燕北闲人。作者文康，姓费莫，字铁仙，满族镶红旗人。出身豪门，祖父勒保是清廷的大学士，乾隆、嘉庆间曾任陕甘总督和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文康本人则“以资为理藩院郎中，出为郡守，洊擢观察，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于家”。（马从善序）文康的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块处一室，仅存笔墨。感慨于世运变迁，产生人情反覆的叹息，遂著此书以自遣。“其书虽托于稗官家言，而国家典故，先世旧闻，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亲历乎盛衰升降之际，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同上）文康的以往之过，主要指教子不严、教子无方，没有培养出能光大门庭的忠臣才子来；其未遂之志，亦无非挽满清王朝和八旗子弟日薄西山的颓势。《儿女英雄传》表现了文康对即将没落和衰败的清代封建统治的眷恋，儿子不肖，就在小说中大写特写英雄父好汉儿，寄托自己的理想。

书中出现的人物，大都是封建伦理、封建道德的典型。作品名曰“儿女英雄”，小说的男主人公安骥，连中举人、进士，官运亨通，做了二品大员，“政声载道，位极人臣”。在他身上，寄托着作者挽救清朝封建统治的希望。女主人公十三妹，前期飞檐走壁、力敌万夫，济危扶困、打抱不平；后来与安公子结婚，又一改侠客面目，成为温柔贤淑的少奶奶，与张金凤不嫉不妒共事一夫，并且热衷功名，力劝丈夫“奋志成名，力求上进”，以作忠臣，成为封建社会的理想女性。男女主人公都是忠臣孝子、烈女贤妇的典范。

① 本章所节录《儿女英雄传》，均出自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但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作者意图的范围。首先,小说如实地描写了运河治理的不易和官场仕途的险恶。第二回《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忤大宪冤陷县监牢》写安学海去淮安河道总督府报到,“一般也随众打点些京里的土仪,给河台送去;及至送到院上,巡捕传了进去,交给门上。那门上家人看了看礼单,见上面写着,不过是些京靴,缙绅,杏仁,冬菜等件,便向巡捕官发话道:‘这个官儿来得古怪呀!你在这院上当巡捕,也不是一年咧,大凡到工的官儿们送礼,谁不是绉绣,呢羽,绸缎,皮张,还有玉玩,金器,朝珠,洋表的?怎么这位爷送起这个来了?他还是河员送礼,还是看坟的打抽丰来了?这不是搅吗?没法儿也得给他回上去。’说着,回了进去,又从中说了些懈怠话。那河台心里,更觉得是安老爷瞧他不起,又加上了三分不受用,当时吩咐出来,说:‘大人向不收礼,这样的费心费事,教安老爷留着送人罢!’”后来河台大人看了他的履历,才知由进士出身。又见他举止安详,言词慷慨,又动了忌贤妒能心思,就给安学海安排了个“工段最简的冷静地方”。安学海在“邳州管河州判”任上还没有一点政绩,河台大人却下令让他高就“高堰外河通判”这一人人垂涎三尺的肥美之缺:

列公有所不知,这从中有个原故。那高堰外河地方,正是高家堰的下游受水的地方。这前任的通判官儿,又是个精明鬼儿,他见上次高家堰开了口子之后,虽然赶紧的合了龙,这下游一带的工程,都是偷工减料作的,断靠不住。他好容易挨过了三月桃汛,吃是吃饱了,掳是掳够了,算没他的事了,想着趁这个当儿躲一躲,另找个把稳道儿走走;因此谋了一个留省销算的差使,倒让出缺来,给别人署事。那河台本是河工上的一个虫儿,他有甚么不懂的?只是收了人家的厚礼,不能不应,看了看这个立刻出乱子的地方,若另委别人,谁也都给过个三千二千,一千八百的,怎好意思呢?没法儿可就想起安老爷来了。偏看了看收礼的帐,轻重不等,大家都格外有些尽

心，独安老爷只有寿屏上一个空名字，他已是十分着恼；又见这安老爷的才情见识，远出自己之上，可就用着他当日说的那个“拿他一拿”的主意了。想着如此，把他一调，既压一压外边的口舌。他果然经历伏汛，保得无事，倒好保他一保，不怕他不格外尽心；倘然他办不来，索性把他参了，他也没的可说。因此上才有这番调署。

果然，不明就里而高兴上任的安学海，在汛期真遇到了灭顶之灾。他把剩余河工刚做完，就到了雨季，结果“偏偏从工完这日下雨起，一连倾盆价的，下了半个月的大雨。又加着四川、湖北一带江水暴涨，那水势建瓴而下，沿河陡长七八九尺丈余，水势不等。……从别人的上段工上，开了个小口子，那水直串到本工的上泊岸里，刷成了浪窝子，把个不曾奉宪查收的新工，排山也价坍了下来”。于是河台大人别的不答，只拿安学海开刀，把他下狱，只待问斩。

其次，小说形象地展示了当时社会到处都潜伏的杀人越货歹徒，同时也讴歌了扶危济困的正义力量。第四回写安学海下狱后，他儿子安骥为了上缴“带罪赔修”水毁工程的银两，“把家中的地亩折变，带上银子”，从京城赶往淮安的路上，两个脚夫就商量着谋财害命，二人还未曾得手，发骥夜宿能仁古刹时却险遭恶僧毒手。恶僧先做翻了白脸狼和傻狗，又要害安骥性命，幸亏侠女十三妹在暗处及时发镖打死恶僧，安骥才避免人死财空。

原来，十三妹只因偶然听到白脸狼和傻狗要谋害安骥，出于同情心暗中相随，碰巧救了安骥。实际上，这“能仁古刹”是个贼窝，恶僧除了劫财害命，还在寺里关了许多妇女供其奸淫，十三妹索性杀了所有恶僧，救了落难妇女。

再次，小说描写了运河流域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第一回所写首善京城：“清朝的制度，不比前代，龙飞东海，建都燕京，万水朝宗，一统天下。就这座京城地面，聚会着天下



无数的人才。真个是冠盖飞扬，车马辐辏。与国同休的，先数近支远派的宗室觉罗，再就是随龙进关的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内务府三旗，连上那十七省的文武大小汉官，何止千门户！说不尽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里流露了作者对康乾盛世的留恋。第四回写在平城：“果然好一座大镇市！只见两旁烧锅当铺，客店栈房，不计其数。直走到那镇市中间，路北便是那座悦来老店。那店一连也有十几间门面，正中店门大开，左是柜房，右是厨灶，门前搭着一路罩棚，棚下摆着走桌条凳，棚口边安着饮水马槽。那条凳上坐着许多作买作卖单身客人，在那里打尖吃饭。旁边又歇着到站驴子，二把手车子，以及肩挑的担子，背负的背子，乱乱烘烘，十分热闹。”表现了这个县城商业的繁华。第十七回写褚家庄园的和谐安谧：“安老爷心中有事，天还没亮，一觉醒来，枕上早听得远寺钟敲，沿村鸡唱，林鸦檐雀，格磔弄晴；便听得邓九公在那里催着那些庄客长工们起来，打水熬粥，放牛羊，喂牲口，打扫庄院；接着就听得扫叶声，叱犊声，桔槔声，此唱彼和，大有那古桃源的风景。”这自然农耕经济生活的平和有序美。第二十二回写德州码头风光：“却说这德州地方，是个南北通衢，人烟辐辏的地方。这日靠船甚早，那一轮红日，尚未衔山，一片斜阳，照得水面上乱流明灭，那船上桅杆影儿，一根根横在岸上，趁着几株疏柳参差，正是渔家晚饭，分明一幅画图；恰好三只船，头尾相连，都顺靠在岸边。那运河沿河的风气，但是官船靠住，便有些村庄妇女赶到岸边，提个篮子装些零星东西来卖，如麻绳、棉线、零布带子，以及鸡蛋、烧酒、豆腐干、小鱼子之类都有，也为图些微利。”这是运河重镇民俗图画。

最后，小说反映了清代运河客运和货运情况。第二十一回何玉凤母亲在青云山庄去世，要运灵柩回故乡与父亲合葬，安家也随行返京，“梁材从临清雇船回来，雇得是头二三号大号平船，并行李船，伙食船，都在离此十余里，一个沿河渡口靠住。”第二十二回写远行和送行的人“便从青云堡出岔道口，顺着大路奔运河而来。通

共十来里路,走了不上半个时辰,早望见渡口码头边,靠着有三只大太平船,和几只伙食船;晋升、梁材、叶通一班人都在船头伺候。又有邓九公因安老爷带得人少,派了三个老庄客,还带着几个笨汉子,叫他们沿途帮着照料,一直送到京。这班人见车辆到了码头,便忙着搭跳板,搬行李。安老爷把大家都安顿在安太太船上。玉凤姑娘虽然跟他父亲到过一次甘肃,走的却是旱路,不曾坐过长船;如今一上船,便觉得另是一般风味,耳目一新”。这次远行是客货并行,一副棺材,许多行李,十来口人,另有伙食船数只,“只听得当当一片锣响,华拉拉扯起船篷,那些船家,叫着号儿,点了一篙,那船便离了岸,一只只荡漾中流,顺流而下”。可见清代运河运输之一斑。

(三) 石玉昆的《三侠五义》^①

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清道光咸丰间以唱单弦轰动一时,尤其以《包公案》为出色。他本人有文字粗放的《龙图公案》,另有他人将其说书内容笔录成书的《龙图耳录》。石作唱词甚多,而《耳录》全为白话,无唱词。石玉昆所著多为说唱包公故事,被后人称为“石派书”。清光绪五年,北京聚珍堂排印了活字本,为原刊本,是曰“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署“石玉昆著”,并不排除刊印前经人润色的可能。这是一部侠义与公案合流模式的典型作品。三侠指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兄弟。五义指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他们本都是江湖侠士,后来多数得到清官包公的赏识与荐拔而获得官身。小说的前半部写包公断案、诸侠义归属包公的过程及其协助包公除暴安良的故事;后半部主要写剪除谋叛的襄阳王及其党羽的故事。这是一部“为市井细民写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的作品,体现了市井细民对于贤明政治的渴望

^① 本章所节录《三侠五义》,均出自中华书局2001年9月版。



与幻想。石玉昆将源远流长的包公故事加以编缀增饰,首尾贯通,演为大部。小说中的包公,明察善断,嫉恶如仇,铁面无私,不畏强暴,他参太师,铡庞公,作了“几件惊天动地之事”(第十五回),是受黑暗政治残害的民众倾心的清官形象。

小说以北宋都城汴京为中心,以江淮流域为重点,却也写及燕赵大地。第十回《买猪首书生遭横祸 扮化子勇士获贼人》,通过包公亲临邺县(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成功破获书生韩瑞龙买猪头而得人头而引发的连环杀人案的故事情节,展现了广阔的市井生活图景:一方面豺狼当路、鬼蜮横行,另一方面包公严正执法惩恶扬善、众豪杰仗义行侠主持正义。坏人犯罪行为线有两条:一是白家堡财主白熊,当初穷时借表弟李克明纹银五百两,富后有意不还,见了债主的游仙枕竟然杀人越货,事后让管家白安销尸灭迹。白安与主子的小妾有私情,接受吩咐后只埋了尸体而把人头用水银灌了装进木匣偷放在情妇房里,准备私情被发觉时以人头要挟白熊。不想再次与主子小妾偷情时水银匣子被无赖叶阡偷走。二是恶棍郑屠五更起床杀猪,未及点灯便听到有人敲门求救,开门放进求救者,等追赶者远离燃灯细看才知是一年少美貌女子,顿起奸淫之心,遇到反抗便持刀杀了女子,将尸体卖在后院,将人头当猪头卖出嫁祸于人。小说的线索人物是无赖叶阡,他只因为白熊张罗生日而没有得到好处而恼羞成怒,夜入白宅偷盗报复,不想偷走的是一只装有死人头的木箱,他不报案却把人头扔到仇人邱凤院里,出五十两银子让长工刘三去埋人头,刘三在路上又受到刘四的敲诈,于是又将刘四打死,连人头一块埋下。

破案的关键是赵虎伪装私访:“楞爷赵虎便对三位哥哥言道:‘你我投至开封府,并无寸进之功。如今遇了为难的事,理应替老爷分忧,待小弟暗访一番。’三人听了,不觉大笑,说:‘四弟,此乃机密细事,岂是你粗鲁之人干得的?千万莫要留个话柄!’说罢,复又大笑。四爷脸上有些下不来,搭搭讪讪的回到自己屋内,没好谤气

的。倒是跟四爷的从人有机变，向前悄悄对四爷耳边说：‘小人倒有个主意。’四爷说：‘你有什么主意？’从人道：‘他们三位不是笑话你老吗，你老倒要赌赌气，偏去私访，看是如何。然而必须巧妆打扮，叫人认不出来。那时若是访着了，固然是你老的功劳；就是访不着，悄悄儿回来，也无人知觉，也不至于丢人。你老想好不好？’楞爷闻听大喜，说：‘好小了！好主意！你就替我办理。’赵虎私访，巧遇叶阡又去郑屠家偷盗，赵虎当场抓了他‘现行’，还在现场发现了郑屠埋的女尸。于是包公顺藤摸瓜，终于使两宗无头案水落石出。

三 其他明清小说反映的燕赵文化

燕赵地处华北平原北端，自古以来北临关外少数民族部落，北方高寒地带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与中原炎黄后裔农耕文化互相影响，有着独特文化。非燕赵人所撰的明清小说也多写及燕赵古代人事，反映当时燕赵文化。明代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第二十一回《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描述了齐桓公帮助燕国抵御山戎入侵的故事：山戎乃北戎之一种，东临燕，东南界齐鲁，闻齐桓公图中原霸业，遂统戎兵万骑，侵扰燕国，欲绝燕国通齐之路。燕庄公抵敌不住，遣人走间道告急于齐。桓公率齐师北逐山戎，为燕国“西北增地五百里”，使燕国成为东北大国。第九十三回《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记录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变革图强的故事：“武灵王自念赵国北边于燕，东边于胡，西边于林胡，楼烦与赵为邻，而秦止一河之隔，居四战之地，恐日就微弱，乃身自胡服，革带皮靴，使民皆效胡俗，窄袖左衽，以便骑射。国中无贵贱，莫不胡服者。废车乘马，日逐射猎，兵以益强。武灵王亲自帅师略地，至于常山，西极云中，北尽雁门，拓地数百里，遂有吞秦之志。欲取路云中，自九原而南，竟袭咸阳。”武灵王通过改革，学习他人长处，强大赵国，为赵国一代雄主。



燕赵之地在秦汉之交是决定兴亡的主战场。明人甄伟《西汉演义》第十四、十五回描述了“巨鹿之战”的惨烈，宋义率楚军救赵，留河南四十日不进，项羽斩杀宋义，渡河即首战得胜，“所得军器辎重，不知其数，收军进营。待后军陆续俱到，遂领军北渡河，按剑高坐，候后军渡毕，乃尽将船只沉入河南，釜甑打碎，庐舍烧毁，止持三日行粮，晓谕三军，务要竭力死战，无复退志。三军踊跃大呼曰：‘愿从将军决一死战！’鼓噪连夜攻章邯”。在决战中，“项羽一马当先，章邯出马对敌。羽见邯出，咬牙切齿大骂曰：‘逆贼杀吾季父，此仇不共戴天！’遂跃马挺枪，直取章邯，邯举枪相迎，二马交战，杀五十合，邯败走。未及五里远，早有王离人马接应，章邯退后，王离出马与羽交战，不二十回合，羽卖了个破绽，让王离一枪刺来，羽却躲过，就势将王离活捉过马来，众军将王离绑缚归阵。邯见王离被擒，拨转马便走，羽大叫：‘逆贼那里去？’催动人马追赶，羽骑的是乌骓马，日行千里，众军跟之不上，俱落在后，羽一骑马飞奔章邯。章邯见羽无兵，复回马交战，项羽一根枪，恨不得即时刺死章邯，章邯只是架隔遮拦，如何当敌？正在危急之时，早有秦将涉间兵到，接住厮杀。羽更不答语，直取涉间，战不十合，项羽按住火尖枪，顺手取出鞭来，望间一鞭打去，涉间急躲时，早中左肩，翻鞍落马。秦阵上章邯见涉间落马，即领牙将宋文等死战来救，只见项羽大军又到，英布、桓楚各领兵冲杀过来，章邯折军大半，大败而走。”项羽九战皆胜，最后逼降章邯残部，取得了对秦作战的决定性胜利。

燕赵之地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发源地。《三国演义》第一回写道：“时钜鹿郡有兄弟三人，一名张角，一名张宝，一名张梁。那张角本是个不第秀才，因入山采药，遇一老人，碧眼童颜，手执藜杖，唤角至一洞中，以天书三卷授之，曰：‘此名《太平要术》，汝得之当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异心，必获恶报。’角拜问姓名，老人曰：‘吾乃南华老仙也。’言讫，化阵清风而去。角得此书，晓夜攻

习，能呼风唤雨，号为‘太平道人’。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张角散施符水，为人治病，自称‘大贤良师’。角有徒弟五百余人，云游四方，皆能书符念咒。次后徒众日多，角乃立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称为将军。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又云：‘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令人各以白土书‘甲子’二字于家中大门上。青、幽、徐、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角遣其党马元义，暗赍金帛，结交中涓封谗，以为内应。角与二弟商议曰：‘至难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顺，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可惜！’”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的统治，推动历史进入三国纷争的时代。

燕赵在隋唐是东北开边、守边的前进基地，清初褚人获的《隋唐演义》第三十六回写隋炀帝北修长城，东征高丽，“着宇文述督造战船器械，为征高丽总帅。山东行台总管来护儿，为征高丽副使。其余所用将佐，悉听宇文述、来护儿随处调遣，该地方官不得阻挠。奏凯之日，各行升赏”。“西边从榆林起，东边直到紫河方止，但有颓败倾圯，都要重新修筑补葺。”穷苦百姓千里徭役，动辄经年，故园荒芜，民不聊生，炀帝倒行逆施，隋朝二世而亡。第八十回写唐玄宗好大喜功，对边将极为垂青，甚至犯了死罪的武夫也赦免重用，“遂降旨以安禄山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赐爵东平郡王，克期走马赴任”。后来安禄山以三镇军马反唐，黄河流域生灵涂炭，唐王朝随之走向衰亡。

燕赵自古多良将。《东周列国志》中的赵将廉颇、赵奢、李牧，燕将乐毅，皆智勇双全。廉颇年近七旬，客居于魏，赵王派使者往请，廉颇有意回国报效，“故意在他面前施逞精神，一饭斗米俱尽，啖肉十余斤，狼餐虎咽，吃了一饱，因披赵王所赐之甲，一跃上马，驰骤如飞，复于马上舞长戟数回，乃跳下马，谓唐玖曰：‘某何如少年时？烦多多拜上赵王，尚欲以余年报效。’”后世传为佳话；赵奢“为将，所得赏赐，尽以与军吏；受命之日，即宿于军中，不问及家



事，与士卒同甘苦每事必博谕于众，不敢自专”。赵奢救韩，以五万军却秦；“师二十万”。李牧为赵守代郡、雁门，“救韩，大败秦兵”、“合兵伐燕，取上谷三十城”；乐毅为燕王画“必与天下共图之”的灭齐之策，亲率本国精锐，护“秦将白起、赵将廉颇、韩将暴鸢、魏将晋鄙”四国之师伐齐，“出兵六个月，所攻下齐地共七十余城”。三国名将谋士，多出燕赵。张飞“世居涿郡”自称燕人，赵云是“常山真定人”。李典是“山阳钜鹿人”，张郃是河间人。明人杨尔曾《东西晋演义》所写晋代名将刘琨、祖逖都是燕赵人，刘琨祖籍中山魏昌（今河北正定一带）人，祖逖是范阳道（今北京一带）人，小说写道：“逖性豁荡，不修仪检。年十四五，犹未知书，诸兄每忧之。后乃博览书记，该涉古今，往来京师，见者谓逖有赞世之才。先与友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因起舞焉。逖、琨二人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后二人并有业绩。祖逖受命渡江拓边，“次日，引众登舟渡江，至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此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人皆慷慨。次日，行至淮阴，铸器械甲冑。又募得二千余人，进屯豫州。安民阅武，大兴攻讨，北地士民，皆来归之，于是北地遂平，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矣”。刘琨受命镇守并州，“琨募兵上党，得五百人，转斗而前。至晋阳，府寺焚毁，邑野萧条。琨抚循劳徕，流民稍集，并州稍安”。皆堪称良将。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隋唐演义》写的颜杲卿，“当禄山叛乱之时，他为常山太守，禄山兵至藁城，常山危急。杲卿自度常山兵力不足，一时难以拒守；乃以长史袁履谦计议，姑先往以迎之，以缓其锋。禄山喜其来迎，赐以紫袍金带，使仍旧守常山。杲卿遂与履谦密谋起义，恰好真卿遣甥卢逖至常山，与杲卿相约，欲连兵断禄山的归路”。表面归顺，伺机图之，“那时安禄山方僭号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杲卿乃假传禄山的恩命，召伪井陉守将李钦凑率

众前来,受那登极的犒赏。俟其来至,与之痛饮至醉,缚而斩之,宣谕解散其众。贼将高邈、何千年,适奉禄山之命,往北方征兵,路过常山,亦为杲卿所杀。时部将在禄山手下名张献诚,正统兵围困饶阳。杲卿先声言,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令兵马使李光弼与武锋使仆固怀恩,统众兵卒出井陘来了。献诚闻之大惧,杲卿乃遣人往说之,使解饶阳之围,献诚遂引兵遁去。杲卿令袁履谦入饶阳,慰劳将士传檄诸郡,于是河北响应”。可惜时机不成熟,英雄死于非命,“杲卿起义才数日,贼将史思明引兵突至城下,杲卿使人往太原告急。王承业既攘其功,正利于杲卿之死,拥兵不救。杲卿悉力拒战,粮尽兵疲,城遂陷,为贼所执,解送禄山军前。安禄山大喝一声道:‘你何背我而反!’杲卿瞋目大骂,禄山怒甚,令人割其舌,并袁履谦一同遇害。二人至死,骂不绝口”。诚为千古英烈。

《隋唐演义》中的南霁云“魏州人氏。其为人慷慨有志节,精于骑射,勇略过人”,雷万春“涿州人氏”,二人在安史之乱中随张巡死守睢阳。绝境之中突围求救于人,然后杀回睢阳,城破被俘,“万春、霁云俱骂不绝口而死”。(第九十四回)表现出中华民族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第三节 明清小说与齐鲁文化

齐鲁地在运河中段,北承燕赵,南启江淮,经济上崛起德州、临清、济宁等运河沿岸重要商埠,文化上接近文学繁荣的吴越,成为小说创作的高产区之一。明清小说与齐鲁文化有不解之缘。

一 明清两代齐鲁小说一般作者作品

据《千顷堂书目》,明代山东最早的出现的文言小说集是黄卿的《闲钞》,黄卿字时庸,号海亭,益都(今属山东)人。稍后有冯子咸的《耕余笔谈》、马应龙的《艺林钩微录》和毕际辰的《蝉雪隳言》。

冯子咸字受甫，号望山，临朐（今属山东）人；马应龙字伯光，安丘（今属山东）人，万历壬辰进士，礼部主事；毕际辰字星伯，山东掖县人，万历丙辰进士。

现存明代最早由山东人所撰文言小说集是王象晋的《剪桐载笔》，象晋字子进，新城（今山东桓台）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历任江西按察司知事、河南按察司使、江右布政司使。小说所记多奇闻异事，或表彰嘉言善行，或鞭挞不良之辈。稍后有杨士聪的《玉堂荟记》，作者字朝彻，号鳧岫，山东济宁人，崇祯进士，官翰林检讨，入清官至谕德。作者自谓其书“凡十余年来，世局、朝政、物态、人情，约略粗载于此，而戏笑不经之事，亦往往而在”。

进入清代，山东小说渐至佳境。清初文言小说集有四：1.《客途偶记》。作者郑与侨，字蕙人，号荷泽，山东济宁人。崇祯丙子举人，入清奉亲不出。据《四库提要》，知其书述明末所见闻二十五篇，多忠义节烈之事，多叙明末战乱残破之状。“杂记”中的“济宁守御记”、“济宁倡议记”二篇，反映了山东人的抗清斗争。2.志人小说集《皇华纪闻》，新城（今山东桓台）人王士禛撰。记述明代以来轶闻杂事，或表彰传统道德，但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如卷四《梁指妹》写女主人公自缢以殉其夫，意在表彰梁指妹的节烈观，却使人感到礼教的残酷无情。或写能人能事，表现超人智慧。如卷一《侯中丞》叙侯中丞为盗所劫后能默写其群像，按图皆捕得凶犯。或讽刺社会可笑人事。如卷一《惠朱匾额》写吴中某监司以“似我”匾置惠山二泉，自誉清如惠泉，却被诸生移至厕上，表现监司的无耻和诸生的嫉恶如仇。3.《渠丘耳梦录》，作者张贞，安丘（今属山东潍坊）人。书中记古今杂事，不乏小说内容。4.笔记小说集《海鸥小谱》，作者赵执信，益都（今属山东）人，康熙年间客居天津时所作。记狎游之事，多率意而出，又凄婉艳丽。

清中叶有文言小说集《鸡谈》，上中两卷论古今杂事，下卷记怪异事多趣味，《于丐犬》记于丐与犬相依为命，数年积攒的五十金为

恶少抢去，人也被恶少打死，其犬竟赴官府吠冤，引导役人追捕凶犯。故事以犬之重义与人之重利形成对比，颇有讥讽世风之意。《鬼断》写南安县令嗜睡，上堂便鼾声大作，后妖鬼附体，代其判案。揭露昏官怠政，形象生动。作者黄如鉴字菱溪，即墨（今属山东）人。《小豆棚》，作者曾衍东，嘉祥（今属山东）人，五十岁以举人任知县，为官清正，晚年以卖志字画为生。作品所记以清代遗闻为主，略及明末；背景以山东济宁一带为主，少量取前人小说。以激愤之情，抨击封建政治。如《庄仙人》写大学士刘紫村以扶乩治理政事，凡事必请仙后行。《杨汝虔》记大龟吞没捐银官，假冒太守上任，搜刮民财，卑躬迎上，生活奢靡，借以鞭挞世上贪官污吏的卑劣和虚假面孔。《张二棱》记叙山东某州捕快张二棱敲诈勒索，在灾荒年安享丰裕，自鸣得意。勾勒出封建官僚群丑图。书中还赞颂下层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优良品质，肯定她们对自由婚姻的追求。

在白话小说方面，《金瓶梅》作者为山东兰陵人虽无实证，但《续金瓶梅》的作者为清代山东人是不争的事实。丁耀亢，字西生，号野鹤，别署紫阳道人、木鸡山人，诸城（今山东诸城）人。此书先后有《玉楼月》、《隔帘花影》、《金屋梦》等书名。清初还有阳信（今山东阳信）人李修行的章回小说《梦中缘》，四卷十五回。小说写明正德年间山东青州府益都教谕吴钰，一日游园，得一梦，有一老者，赐其一帖，上书：“仙子生南国，梅花女是亲。三明共两岸，俱属五行人。”醒后，即命其子吴瑞生外出游学，以验梦兆。其子南游至杭，与金翠娟、烛堆琼、水蓝英、堆素烟等女子相识。几经曲折，后吴瑞生考中二甲进士，授江南南昌知府。先后赢得金翠娟等五女的欢心，五行俱全，应了其父之梦。清中叶有平阴（今山东平阴）人石翁的章回小说《精神降鬼传》，写昊天上帝因阳界人中鬼杂凑而秽气冲天，乃封精神为消魔使者，命其降伏人中鬼。精神奉旨，率心猿大师、肾行太保、耳招神、口头大王等，前往降鬼。精神在阳间先后降伏痨病鬼、勾死鬼、赌博鬼、短命鬼、鸦片鬼、尖酸鬼、胡捣

鬼、下作鬼、无二鬼、势利鬼以及横行天下棱鬼、丑恶不堪癩歹鬼，表现了改造诸鬼精神的救世态度。

二 明清齐鲁小说代表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

(一)《聊斋志异》

蒲松龄《聊斋志异》^①并非全是“志怪”作品，大约有七分之一的篇目是常人体作品。作品数量虽然有限，但其反映社会生活较之“鬼狐神妖”题材要直接得多，尤其对齐鲁社会生活反映较多。

1. 纪实类作品，准确地记述了作者身边的人物和事件。如卷二的《地震》记述了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发生在山东的大地震，“余适客稷下，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体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后闻某处井倾侧，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此真非常之奇变也”。先写地震爆发前的雷声，接着写地震来临时室内动静，然后写走出房间，所见房舍仆而复起，所闻墙倒屋塌之声，所感眩晕立脚不住。再特写河水倾泼，鸡鸣犬吠。接着写震后余生的仓皇失态，最后写事后传闻，表现了地震力之大。卷四的《水灾》记述了作者家乡一场先旱后涝的自然灾害：“康熙二十一年，山东旱，自春徂夏，赤地千里。六月十三日小雨，始种粟。十八日大雨后，乃种豆。一日，石门庄有老叟，暮见二羊斗山上，告村人曰：‘大水至矣！’遂携家播迁。村人共笑之。无何，雨暴注，平地水深数尺，居庐尽没。一农人弃其两儿，与妻扶老母

① 本章所节录《聊斋志异》，均出自凤凰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版。

奔避高阜。下视村中，汇为泽国，并不复念及两儿。水落归家，一村尽成墟墓，入己门，则一屋独存，见两儿尚并坐床头，嬉笑无恙。咸叹谓夫妇孝感所致。此六月二十二日事也。”这则作品很像几则日记，准确地记载了旱涝的起讫时间，并且有点有面地展示了大水之中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同卷的《瓜异》记述的是黄瓜上长出西瓜的奇特现象，“康熙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圃中，黄瓜上复生蔓，结西瓜一枚，大如碗”。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一是瓜蔓嫁接，二是西瓜籽在黄瓜中发芽。

2. 史实为主稍有润色的作品，讴歌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等优秀品质。如卷九的《农妇》写淄川县西部磁窑坞一农家劳动妇女，“勇健如男子，辄为乡中排难解纷。与夫异县而居。夫家高苑，距淄百余里。偶一来，信宿便去。妇自赴颜山，贩陶器为业。有赢余，则施丐者。一夕与邻妇语，忽起曰：‘腹少微痛，想孽障欲离身也。’遂去。天明往探之，则见其肩荷酿酒巨瓮二，方将入门。随至其室，则有婴儿绷卧。骇问之，盖娩后已负重百里矣。故与北庵尼善，订为姊妹。后闻尼有秽行，忿然操杖，将往撻楚，众苦劝乃止。一日，遇尼于途，遽批之。问：‘何罪？’亦不答。拳石交施，至不能号，乃释而去。”作品表现女主人公两方面品质：一是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娘家到淄川一百里，往返只用一两天；身为女子，亲往外地做生意；生子后负重走百里，不误家务。二是是非分明，敢爱敢恨。经商所得，周济乞丐；听说好友行为不检点，立刻与她反目成仇。女主人形象，集中体现了山东人民勤劳勇敢的优良品质。卷三的《于江》写淄川刚烈后生智杀恶狼、誓报父仇的故事：

乡民于江，父宿田间，为狼所食。江时年十六，得父遗履，悲恨欲死。夜俟母寝，潜持铁槌去，眠父所，冀报父仇。少间，一狼来，逡巡嗅之，江不动。无何，摇尾扫其额，又渐俯首舐其股，江迄不动。既而欢跃直前，将齧其领。江急以锤击狼脑，立毙。起置草中。少间，又一狼来，如前状，又毙之。以至中

夜，杳无至者。

忽小睡，梦父曰：“杀二物，足泄我恨。然首杀我者，其鼻白，此都非是。”江醒，坚卧以伺之。既明，无所复得。欲曳狼归，恐惊母，遂投诸智井而归。至夜复往，亦无至者。如此三四夜。忽一狼来，啗其足，曳之以行。行数步，棘刺肉，石伤肤，江若死者，狼乃置之地上，意将斃腹，江骤起锤之，仆，又连锤之，毙。细视之，真白鼻也。大喜，负之以归，始告母。母泣从去，探智井，得二狼焉。

作者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农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义烈发于血诚，非直勇也，智亦异焉。”于江以身诱狼，示狼以死，而后突起以锤击狼，终报父仇，表现了与仇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卷六《林氏》的济南戚安期是一个改过自新的形象，原来“喜狎妓。妻婉戒之，不听”。后来妻子林氏被“北兵”俘去，途中欲相犯，“急抽刀自刎死”，弃尸荒野。“戚痛悼往。视之，有微息。负而归，目渐动，稍颀呻，轻扶其项，以竹管滴沥灌饮，能咽。戚抚之曰：‘卿万一能活，相负者必遭凶折！’半年，林平复如故；惟首为颈痕所牵，常苦左顾。戚不以为丑，爱恋逾于平昔，曲巷之游，从此绝迹。”以至于连林氏想让他与婢女结合生子也坚决不同意：

居数年，林不育，因劝纳婢。戚曰：“业誓不二，鬼神鉴之。即嗣续不承，亦吾命耳。若不应绝，卿岂老而不能生耶？”林乃托疾，使戚独宿，遣婢海棠卧其床下。既久，阴以宵情问婢。婢曰：“并无。”林不信。至夜，戒婢勿住，自诣婢所卧。少间，闻床上睡息已动。潜起，登床扣之。戚问谁，林耳语曰：“我海棠也。”戚拒却曰：“我有盟誓，不敢更也。若似曩年，尚须汝奔就耶？”林乃下床去。戚仍孤眠。林又使婢托已往就之。戚念妻生平从不肯作不速之客，疑而摸其项，无痕，知为婢，又叱之。婢惭而退。及明，以情告林，使速嫁婢。林笑曰：“君亦不

必过执。倘得一丈夫子，岂不幸甚。”戚曰：“倘背盟誓，鬼责将及，尚望延宗嗣乎？”

林氏曾被清兵俘获，但她拔刀自刎、义不受辱，脖子留下刀疤。婢女海棠假装她去和戚安期亲热时，戚安期一摸脖子无疤就知道不是妻子，而加以拒绝，并在次日向林氏提出要嫁海棠出家门。节录的文字，把林氏、海棠和戚安期三人各自不同动机支配下的行为描述得生动如画。

3. 虚构居多但细节真实的作品讴歌了当时社会的真善美，鞭挞了假恶丑。卷三《小二》写山东滕县青年男女赵小二、丁紫陌自主选择生活道路的故事。二人入学读书相识有情，丁紫陌让母亲“求婚赵氏。赵期以女字大家，故弗许”。但他不轻易放弃对意中人的追求，得知“赵惑于白莲教，徐鸿儒既反，一家俱陷为贼”，便也“投徐麾下。女见之喜，优礼逾于常格”。他看出义军难成大事，“我非妄意攀龙，所以故，实为卿耳。左道无济，止取灭亡。卿慧人，不念此乎？能从我亡，则寸心诚不负矣”。说服赵小二与自己从徐营中逃出，在莱芜山间成了亲。后因当地人“以为鸿儒余党。官啖其富，肉视之，收丁”。二人大难不死，只得远徙西川，重新开始靠手艺吃饭的生涯：

女为人灵巧，善居积，经纪过于男子。尝开琉璃厂，每进工人而指点之，一切棋灯，其奇式幻采，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居数年，财益称雄。而女督课婢仆严，食指数百无冗口。暇辄与丁烹茗着棋，或观书史为乐。钱谷出入，以及婢仆业，凡五日一课。女自持筹，丁为之点籍唱名数焉。勤者赏赍有差，惰者鞭挞罚膝立。是日，给假不夜作，夫妻设肴酒，呼婢辈度俚曲为笑。女明察如神，人无敢欺，而赏辄浮于其劳，故事易办。村中二百余家，凡贫者俱量给资本，乡以此无游惰。值大旱，女令村人设坛于野，乘舆野出，禹步作法，甘霖倾注，

五里内悉获沾足，人益神之。女出未尝障面，村人皆见之，或少年群居，私议其美，及覩面逢之，俱肃肃无敢仰视者。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授以钱，使采茶薊，几二十年，积满楼屋。人窃非笑之。会山左大饥，人相食，女乃出菜，杂粟贍饥者，近村赖以全活，无逃亡焉。

《小二》所写，除女主人公剪纸为兵之术超现实外，基本上是才子佳人自主选择人生道路、成功实现个人价值的赞歌。这在封建社会大多数人靠父母官位、财势生存发展的背景下，弥足珍贵。

卷十的《胭脂》写东昌牛医卞氏女胭脂，本约鄂生幽会，不意赖毛大拾了信物冒充前来，为卞氏发现，杀了卞氏逃走。事后鄂生成为疑犯被拘，已被县令屈打成招、问成死罪。后解入济南府复审，知府吴南岱觉得事有可疑，于是重新审理，查出另外四五个嫌疑犯，巧计使真凶暴露无遗：

盖甲、乙皆巷中游荡之子，有心于妇而未发者也。公悉籍其名，并拘之。既齐，公赴城隍庙，使尽伏案前。讯曰：“曩梦神告，杀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对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虚者，廉得无赦！”同声言无杀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将并夹之；括发裸身，齐鸣冤苦。公命释之，谓曰：“既不自招，当使鬼神指之。”使人以毡褥悉障殿窗，令无少隙；袒诸囚背，驱入暗中，始投盆水，一一命自盥讫；系诸壁下，戒令“面壁勿动，杀人者，当有神书其背”。少间，唤出验视，指毛曰：“此真杀人贼也！”盖公先使人以灰涂壁，又以烟煤濯其手；杀人者恐神来书，故匿背于壁而有灰色；临出，以手护背，而有烟色也。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尽吐其实。

毛大本想淫辱胭脂，被发现后为逃命不得不杀死胭脂老父，满以为遗下绣鞋，县官会怀疑胭脂意中人鄂生，因而面对清官给他最后机会还信誓旦旦说自己无杀人之事。而在与其他嫌犯进入暗

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

室,又想继续耍小聪明反被聪明误而暴露了自己,读之真大快人心。

(二)《醒世姻缘传》

《醒世姻缘传》^①署名“西周生”。对作者的真实姓名,研究者做过不同的推断,但都缺少真凭实据。但小说是用山东中部方言写成,故事背景主要是山东济南府绣江县(章丘的别称)明水镇,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写及明末这一带的实有人事,如济南“守道副使李粹然”(第二十一回)、“癸未”(崇祯十六年)除夕“大雷霹雳,震雹狂风”(第二十七回),《济南府志》里都有记载。这说明小说作者是明末清初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一位文人,小说写成于清初顺治年间。作品从武城县官僚地主晁思孝的官运写起,以晁、狄两家的生活史为叙事线索,虽带有深厚的因果报应色彩,但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却十分广阔。书中写到的人物,上至朝廷官府,下及市井小民,形形色色;书中描写的社会景象,有官场中的贪贿,科举中的舞弊,奸商的掺假牟利,地痞的胡作非为,以及宗族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争夺,都很有真实感,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尤其是所反映的明代山东社会生活认识价值更大。

1. 描述了以绣江县为中心的齐鲁百姓的生存状况

(1) 政通人和、风调雨顺时节的自耕自足的理想生活。第二十四回《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写绣江县明水镇先前的社会环境,上面是“极清廉、极慈爱、极循良的善人,来做这绣江县的知县”,“轻徭薄赋,功令舒宽,田土中大大的收成,朝廷上轻轻的租税”。而又遇着风调雨顺的年景,“却道数十年,真是五日一风,十日一雨,风不鸣条,雨不破块;夜湿昼晴,信是太平有象。一片仙山上边满满的都是材木。大家小户都有占下的山坡。这湖中的鱼蟹菱芡,任人取之不竭,用之无禁。把湖中的水引决将去,灌

^① 本章所节录《醒世姻缘传》,均出自中华书局2002年1月版。



稻池、灌旱地、浇菜园、供厨井，竟自成了个极乐的世界”。因而有了林茂粮丰、安居乐业的好时光，春天是：

有山水的去处，又兼之风雨调和，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山光映水，水色连山，一片都是细细缢缢的色象。日月俱有光华，星辰绝无愆价，立了春，出了九，便一日暖如一日，草芽树叶渐渐发青，从无乍寒乍热的变幻。大家小户，男子收拾耕田，妇人浴蚕做茧。渐次的春社花朝，清明寒食，亡论各家俱有株把紫荆、海棠、蔷薇、丁香、牡丹、芍药，节次开来，只这湖边周匝的桃柳，山上千奇百怪的山花，开的就如锦城金谷一般。再要行甚么山阴道上，只这也就够人应接不暇了。

再现了齐鲁大地在勤劳勇敢人民手中的勃勃生机，表达了作者对生态平衡的故乡的热爱。冬天是：

到了十月半以后，这便是农家受用为仙的时节，大囤家收运的粮食，大瓮家做下的酒，大栏养的猪，大群的羊。成几十几百养的鹅鸭，又不用自己喂他，清早放将出去，都到湖中去了；到晚些，着一个人走到湖边一声唤，那些鹅鸭都是养熟的，听惯的声音，拖拖的都跟了回家。数点一番，一个也不少。那惯养鹅鸭的所在，看得有那个该生子的，关在家里一会，待他生过了子，方又赶了出去。家家都有腊肉、腌鸡、咸鱼、腌鸭蛋、螃蟹、虾米。那栗子、核桃、枣儿、柿饼、桃干、软枣之类，这都是各人山峪里生的。茄子、南瓜、葫芦、冬瓜、豆角、椿牙、蕨菜、黄花，大囤子晒了干，放着过冬。拣那不成才料的树木，伐来烧成木炭，大堆的放在个空屋里面。清早睡到日头露红的时候，起来梳洗了，吃得早酒的，吃杯暖酒在肚。那溪中甜水做的绿豆小米粘粥，黄暖暖的拿到面前，一阵喷鼻的香，雪白的连浆小豆腐，饱饱的吃了。穿了厚厚的绵袄，走到外边，遇了亲朋邻舍，两两三三，向了日色，讲甚么“孙行者大闹天宫”，

“李逵大闹师师府”，又甚么“唐王游地狱”。闲言乱语，讲到转午的时候，走散回家。吃了中饭，将次日色下山，有儿孙读书的，等着放了学。收了牛羊入栏，关了前后门，吃几杯酒，早早的上了炕。

(2) 暴政害民、灾荒年景下老百姓的悲惨生活。第二十七回《祸患无突如之理 鬼神有先泄之机》写绣江县丙辰年一场秋灾，展示了“骨肉相戕”的人间惨剧：

那丙辰夏里，薄薄也还收了一季麦子，此后便就一点雨也不下，直旱到六月二十以后方才下了雨，哄得人都种上了晚田。那年七月十六日立秋，若依了节气，这晚田也是可以指望得的。谁知到了八月初十日边，连下了几日秋雨，刮起西北风来，冻得人索索的颤，陨了厚厚的一阵严霜，将那地里的晚苗冻得稀烂，小米小麦渐渐涨到二两一石。

论起理来，这等连年收成，刚刚的一季没有收得，也便到不得那已甚的所在。却是这些人恃了节年的收成，不晓得有甚么荒年，多的粮食，大铺大腾，贱贱卖了，买嘴吃，买衣穿。卒然遇了荒年，大人家有粮食的，看了这个凶荒景象，藏住了不肯将出果；小人家又没有粮食得吃，说甚么不刮树皮、搂树叶、扫草子、掘草根？吃尽了这四样东西，遂将苦房的烂草拿来磨成了面，水调了吃在肚内，不惟充不得饥，结涩了肠胃，有十个死十个，再没有腾挪。又有得将山上出的那白土烙了饼吃下去的，也是涩住了，解不下手来，若有十个，这却只死五双。除了这两样东西吃不得了，只得将那死人的肉割了来吃，渐至于吃活人，渐至于骨肉相戕起来。

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力低下，认识自然知识欠缺、征服自然手段缺乏，一些地方农田水利建设几乎是零，因而农民几乎是靠天吃饭。一遇灾害，大灾大难，小灾小难。《醒世姻缘传》所写灾民所吃

腐草、白土，以至于吃死人、活人，在今天不可理解，但在封建社会很普遍。第三十一回《县大夫沿门持钵 守钱虏闭户封财》还写了绣江县辛亥年秋天一场先涝后旱的连年大灾：“七月初十日的时候，正是满坡谷黍，到处秋田，忽然被那一场雨水淹没得寸草不遗。若是寻常的旱涝，那大家巨姓平日岂无积下的余粮？这骤然滚进水来，连屋也冲得去了，还有甚么剩下的粮食？人且淹得死了，还讲甚么房屋？水消了下去，地里上了淤泥，耩得麦子，这年成却不还是好的？谁知从这一场水后，一点雨也不下，直旱到壬子，整整一年。癸丑、甲寅、丙辰、丁巳，连年荒去。小米先卖一两二钱一石，极得那穷百姓叫苦连天；后来长到二两不已，到了三两一石；三两不已，到了四两；不多几日，就长五两；后更长至六两七两。黄黑豆，秫秫，都在六两之上。麦子，绿豆，都在七八两之间。起先还有处去买，渐至有了银没有卖的。糠都卖到二钱一斗。树皮草根都刮掘得一些不剩。”灾害之重可见一斑。

作者还写了大灾中的善恶美丑。抨击那些大发灾难财的贪官污吏，如第三十二回《女菩萨贱赙赈饥 众乡宦愧心慕义》中的“漕粮”官，重灾之年“还不肯上本乞恩改了折色，把人家孩童儿女都拿了监追。这还说是正供钱粮由不得自己，但这等荒年，那词讼里边，这却可以减省得的。一张状递将上去，不管有理没理，准将出来，差人拘唤要钱；听审的时候，各样人役要钱；审状的时候，或指了修理衙宇，竟是三四十两罚银；或是罚米折钱、罚谷折钱、罚纸折钱、罚木头折钱、罚砖瓦折钱、罚土坯折钱。注限了三日要，你就要到第四日去纳，也是不依。卖得房地产土出去，虽说值十个的卖不上一个的钱，也还救了性命；再若房屋地土卖不出去，这只得把性命上纳罢了。把一个当家的人逼死了，愁那寡妇孤儿不接连了死去？死得干净，又把他的家事估了绝产，限定了价钱，派与那四邻上价。每因一件小事，不知要干连多少人家”。灾年搜刮钱财，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小说也褒扬那些开仓济民的富户，如同回书

中的晁夫人，“晁夫人见这样饥荒，心中十分不忍，把那节年积住的粮食，夜晚睡不着觉的时候，料算了一算，差不多有两万的光景。从老早的唤了雍山庄上的季春江，坟上管庄的晁住，分付他两庄上的居民，一家也不许他移徙；查了他一家几口，记了口数，与他谷吃，五日一支。凡庄上一家有事，众家护卫，不许坐视。这等时候，那个庄上不打家劫舍？那个庄上不鼠窃狗偷？那个庄上不饿莩枕藉？惟晁家这两个庄上，也不下六七百人家，没有一家流移外去的，没有一人饿死的。本处人有得吃了，不用做贼。外庄人要来他庄上做贼的，合庄的老婆汉子就如豺狗阵的一般。虽然没有甚么坚甲利兵，只一顿叉把扫帚撵得那贼老官兔子就是他儿！那邻庄人见他这庄上人心坚固，所用者少，所保者大，那大姓人家也只得跟了他学，所以也存住了许多庄户”。善恶对比，显示了作者的正义情怀。

2. 描述了封建社会齐鲁大地的善恶人生

《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三回《绣江县无儆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写了三个理想人生，体现齐鲁大地作为“礼义之邦”的传统文明。一是杨乡宦，做官做到了尚书，全额俸禄告老在家。把明水庄祖居修盖了一下住在里边。尽数辞了县里送来的仆夫门皂，“或到那里游玩，或到田间去，路远的所在，坐了个两人的肩舆，叫庄客抬了；近的所在，自己拖了根竹杖，跟了个奚童，慢慢踏了前去。遇着古老街坊，社中田叟，或在庙前树下，或就门口石上，坐住了，成半日的白话。若拿出甚么村酒家常饭来，便放在石上，大家就吃，那里有一点乡宦的气儿。那些庄上的乡亲也不把他当个尚书相待，仍是伯叔兄弟的称呼。人家有甚喜庆丧亡的事儿，他没有自己不到的。冬里一领粗褐子道袍，夏里一领粗葛布道袍，春秋一领浆洗过的白布道袍，这是他三件华服了”。正陪客，邻家一个老头子手里提了一根布袋，来借谷种，他“连忙放下了箸，自己出去，迎到阶前，……叫人量了与他，临去，必定自己送他到门外，叫人与他驮了



谷，送到家中”。而且偌大年纪，还想着方便乡梓，“庄前一道古堤，堤下一溪活水。他把那边又帮阔了丈许，上面盖了五间茅屋，沿堤都种桃柳，不上二十年，那桃柳都合抱了。暮春桃花开得灿烂如锦，溪上一座平阔的板桥，渡到堤上，从树里挑出一个蓝布酒帘，屋内安下桌凳，置了酒炉，叫了一个家人在那里卖酒，两三个钱一大壶，分外还有菜碟。虽是太平丰盛年成，凡百米面都贱，他这卖酒原是恐怕有来游玩的人没钟酒吃，便杀了风景。若但凡来的都要管待，一来也不胜其烦，二来人便不好常来取扰；所以将卖酒为名，其实酒价还不够一半的本钱。但只有一件不好：只许在铺中任凭多少只管吃去，只不教把酒装了别处去，有来赊吃的也不计论，凭你吃去，也不计帐，也不去讨”。热诚待人，深得乡梓拥护。

二是舒秀才，教书时“恨不得把那吃奶的气力都使将出来”，所教两个孩子又“过目成诵，讲与他的书，印板般刻在心里；读过的书，牢牢的，挖也挖不吊的”。教了三年，舒秀才感觉自己的本事已尽，他不肯只顾挣钱误人子弟，便对东家说：“这两个学生将来是两个大器，正该请一个极好的明师剔拨他方好。”另荐了一个名士杨先生，教了两年，那大学生刚得十四岁就进了学；又隔得两年，大的考了一等第十，挨补了廪，后来官至布政使；二的也是十四岁进了学，后来做官做到户部郎中。

三是农夫祝其嵩。祝家不过“小户农夫”，“止得十来亩田，门前开个住客的店儿”，但他不爱意外之财，“一日进城去纳钱粮，只见一家酒铺门口一个粮道的书办”，自己丢了银子，怀疑酒店主人捡了不还，正在大打出手。祝其嵩一边拦挡一边告诉行凶书办：“我刚才倒在四牌坊底下拾了一个白罗汗巾，颠着重重的，不知里面是些甚么？同了众人取开来看看，若是合得着你刚才说的，便就是你的了。”将所拾七八两银子还了书办，免去酒店主人的无妄之灾。

《醒世姻缘传》也写了一些道德败坏的人物，反映了封建社会

后期的好人生存环境的恶劣。第二十七回写秀才麻从吾到张仙庙寄食，无赖得能“逼得两个道士都逃走了”，然后又打丁利国的主意，“打听得明水东南上十五里路沈黄庄有一个丁利国，自来卖豆腐为生，只有一妻，从不曾见有儿女，后来积至有数百两家私，自己置了一所小小巧巧的房子，买了一个驴儿推那豆腐的磨”。于是在丁老必经的路上故意上吊，引诱丁老说出“待我先回去与你收拾一所书房，招几个学生，一年包你十二两束修。再要不够你搅用，我再贴补你的”的话，就带着老婆儿子住进了丁老的家里，后来还认丁老做义父，一住十年全家都靠丁老养活，“住到十一年上，麻从吾出了贡。丁利国教他把那所得作兴银子一分不动，买了十来亩地。其上京的盘费，京中坐监的日用，俱是丁利国拿出银子来照管，又与他的儿麻中桂娶了媳妇。麻从吾坐完监，考中了通判。丁利国管顾得有了功劳，拚了性命，把那数十年积趱的东西差不多都填还了他。点了两卯，选了淮安府管粮通判，同了妻子四口亲人，招了两个家人合几个养娘仆妇。其一切打银带、做衣裳、买礼物、做盘缠，都是丁利国这碗死水里舀，却也当真舀得干上来了”。麻从吾上了任，却翻脸不认丁利国，“料得丁利国将到，预先分付了把门的人，如家中有个姓丁的夫妇来到，不许传禀”。老人含辛茹苦十多年养活麻从吾全家，却被麻从吾做官后拒不相认病死于返回故乡的路上。

3. 反映了明代山东的自然景观的人文意蕴

第二十四回《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写当时山东六府以泰山、东海为代表的“天下的奇观”，并涉及齐鲁大地的文化积淀。

济南府的“华不注、函山、鹊山、鲍山、黄山、夹谷、长白、孝堂、紫榆、徂徕、梁父、大石、平原、大明、跑突、文卫、濯缨，这都说是名胜，写在那志书上面”；兖州府的“尼山，虽不是大观，但圣母颜氏祷此而生孔子，到如今颜氏所生之谷，草木之叶皆上起；所降之谷，草



木之叶皆下垂。这孔圣人发迹的所在,那较得甚么优劣?雷泽相传有神主之,龙身人头,鼓其腹作雷声。《史记》‘舜渔于雷泽’,就是此处。这圣地经历的所在也不消论甚好歹。至于甚么防山、龟山、峰山、君山、昌平、南武、澹台、太白、栖霞、谷城、马陵、南武,这都是兖州属内名山。会、济、汶、汜、洙、泗,这都是兖州属内的古河。范蠡湖、蜀山湖、桃花涧、沧浪渊、南池、阿井、泽华池,这都是兖州属内的胜水。还有梁山泊,这藏贼的所在,上不得数的。”

东昌府“也有甚么徊山、陶山、历山、箕山,这都卑不足数。狠命争说当初舜耕的所在就是这个历山,许由隐的所在就是这个箕山。舜是山西平阳府蒲州人,却因甚的跑到东昌去耕地?许由放着本处这样首阳、中条的大山不隐,也跟了那大舜跑到东昌去隐?倒只有那鸣石山有些好景。那山岩有百余丈的高,扣之,声就是钟磬一般响。昔有人隐居岩下,尝见一人白单衣徘徊岩上,及晓方去,时常遇见。一日,扯住他的袖子,问他来历。他说:‘姓王,字中伦,周宣王时入少室山修道,往来经过,爱此石清响,常来留听。’用力求他养生的法术,遂留下雀卵大的一个石子,忽然不见。把石子含在口内,终日不饥。如此等的山也可以与那会仙山称得兄弟,可又没甚出产。其水有漳河、鸣犊河、卫河、瓠子河、漯川、鹤渚,这都是东昌的水。还有那濮水岸上,有庄周的钓台。古时有一个乐官,叫作师延,与纣做那淫哇委靡之乐。武王伐纣,恐怕武王杀他,自己投入濮水而死。后卫灵公夜宿濮水之上,听见鼓琴之声,召乐官师涓细听,要习他的曲调。师涓听了一会,说道:‘此亡国之音,习他何用!’不知此等的水也都载入志书”。

青州府“有云门山、牛山,是齐景公流涕的所在。孤山、沂山、灵山、大岬山、琅琊山、九仙山、浮莱山、大弁山、三柱山、淄澠水、白河、康浪水、葛陂水,这都是寻常的名迹。只有范公泉在府城西。范仲淹做太守时有善政,忽涌醴泉,遂以范公为名。今医家汲泉丸药,号‘青州白丸子’。此药在本地不灵,出了省,治那痰症甚效”。

登州府有“丹崖山、田横山、羽山、莱山、之罘山、昆仑山、文登山、召石山。除了海，有一个祖洲，在海中间，相传生‘不死草’，叶似菰苗，丛生，一株可活人。秦始皇时曾遣道士徐福发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洲采药，后竟不知下落。这又是虚无不经的谎话”。莱州府有“黄山、之莱山、天柱山、孤山、陆山、大珠山、不其山。汉时有一个童恢，做这不其县的知县，有虎食人。童恢祷告了山神，要捉那食人的老虎。不两日，果然猎户捉了两只虎到。童恢分付了那两只虎道：‘吃人的垂首伏罪，不食人的仰首自明。’一虎垂头不动。童恢叫把那个仰首的放到山去，那个垂首的杀了抵命。后又改为‘驯虎山’。其水也，除了海，有那掖河、胶河、潍水、芙蓉池”。

4. 描述了明代山东人对运河交通的依赖

明代官员及其亲属在京城、家乡和做官地往返多走运河。《醒世姻缘传》开头写晁思孝携全家由山东武城到江南华亭县上任，可能走的是运河水路。后来其子晁源因不惯衙门的拘束，“在华亭衙内住了半年光景，卷之万金，往苏州买了些不在行玩器，做了些犯名分的衣裳，置了许多不合款的盆景，另雇了一只民座船，雇了一班鼓手，同了计氏回家”。由华亭乘船到苏州，另雇船返回老家，走的是运河水路无疑。第六回写晁思孝华亭县任满，谋得通州知府的升迁，“写了两只官座船，择四月初一日离任，不到家，一直往通州上任”。走的也是运河水路。当然船走运河有危险，弄不好狂风恶浪船毁人亡。第三十回写僧官宝光“得了赦诏，领了妻妾，卷了金珠，戴了巾帻，骡驮车载，张家湾上了船，回他常州府原籍去做富翁。一路行去，说那神仙也没有他的快活。谁知天理不容，船过了宿迁，入了黄河，卒然大风括将出来，船家把捉不住，顷刻间把那船帮做了船底，除了宝光本人遇着一个水手揪得上来，其余妻妾资财，休想有半分存剩”，就是一例。

经商于运河南北。第五十回写狄希陈父子到济南“商确递呈子援例”，即花钱买出身，接受熟人的宴请，“将出高邮鸭蛋、金华火



腿、湖广糟鱼、宁波淡菜、天津螃蟹、福建龙虱、杭州醉虾、陕西琐琐葡萄、青州蜜饯棠球、天目山笋鲞、登州淡虾米、大同酥花、杭州咸木樨、云南马金囊、北京琥珀糖，摆了一个十五格精致攒盒；又摆了四碟剥果：一碟荔枝、一碟风干栗黄、一碟炒熟白果、一碟羊尾笋嵌桃仁；又摆了四碟小菜：一碟醋浸姜芽、一碟十香豆豉、一碟莴笋、一碟椿芽。——预备完妥。知狄希陈不甚吃酒，开了一瓶窖过的酒浆。实指望要狄希陈早到，秦敬宇迟回，便可再为相会”。这段文字中提及的天南海北各种菜肴，没有商人通过济水、运河的贩运是不可想象的。说明运河货运的快捷便当。第三十三回写秀秀才无生计可做，“拿上几百两本钱，搭上一个在行的好人伙计，自己身子亲到苏杭买了书，附在船上，一路看了书来，到了地头，又好赚得先看。沿路又不怕横征税钱。到了淮上，又不怕那钞关主事拿去拦腰截断了平分。却不是一股极好的生意？但里边又有许多不好处在内：第一件，你先没有这几百银子的本钱。第二件，同窗会友，亲戚相知，成几部的要賒去，这言賒即骗，禁不起骗去不还。第三件，官府虽不叫你纳税，他却问你要书。你有的应付得去，倒也不论甚么本钱罢了。只怕你没有的书，不怕你不问乡宦家使那重价回他；又不怕你不往远处马头上去买。买得回来，还不知中意不中意。这一件是秀才可以做得生意？做不得了。至于甚么缎铺、布铺、绸铺、当铺，不要说没这许多本钱，即使有了本钱，赚来的利息还不够与官府赔垫，这个生意又是秀才们做不得的”。反映了明代山东经商的不易。

（三）《续金瓶梅》

清初遗民、诸城（今属山东）人丁耀亢从《金瓶梅》引发故事情节，创作出《续金瓶梅》^①。以两宋之交金兵南侵为背景，借吴月娘与孝哥的悲欢离合及金、瓶、梅等人转世后的故事，大写北宋亡国、

^① 本章所节录《续金瓶梅》，均出自齐鲁书社1988年8月版。

金人南犯的军国大事，“意在刺新朝而泄黍离之恨”（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先后写了西门庆、潘金莲、陈经济等人转世后的淫恶孽报，以及蒋竹山、苗青叛国通敌的罪恶，中间还插叙了宋徽宗被掳、张邦昌称王伏法、韩世忠梁红玉大败金兵、秦桧通敌卖国等历史故事。描绘出了一幅兵荒马乱、百姓流离的乱世景象，行文中还出现了清代特有的“蓝旗营”、“旗下”之类的语词，插叙宋金间军国大事，褒忠诛奸，第五十三回写金兵屠扬州，发出了“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的悲叹。显然，亲身经受过明清易代战乱之苦难的作者，是借续书影射现实，抒发心中对清朝以武力征服、取代明朝的愤懑。

作者作为明遗民，亲身经历了明末清初满清取代朱明统治中国过程中的种种残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假托北宋末年金兵入主中原的社会背景写出。由于作者是山东诸城人，小说以山东为中心，反映了西到汴梁、南至扬州广大地区的战乱生活。主要是：

1. 战乱给山东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

以吴月娘等人为例，“宋钦宗靖康十三年间，遇着金兵大入中原，把汴京围了，掳掠金银子女无算，讲了和盟北去，不消一年，倾国又来。那时山东、河北地方俱是番兵，把周守备杀了，济南府破了。清河县地方去临清不远，富庶繁华，番兵、土贼一齐而起，那吴月娘抱着四岁孝哥，家人走散，到了永福寺，原是西门庆舍了五十两布施，僧官认的月娘，暂且藏躲”。（第一回）好不容易躲过番兵，出了寺院回到清河县城，“月娘进得城来，四下观看，见那城郭非故，瓦砾堆满，道傍死尸半掩半露。到了自家门首，狮子街开当店的门面全不认的了：大门烧了，直至厅前；厦檐塌了，剩下些破椅折床，俱是烧去半截。又走到仪门里，上房门外虽没烧坏，门窗尽行拆去，厨房前马粪有半尺余深”。“上房床后楼梯下找那埋的衣服首饰，已被人尽情掘去”（第二回），侥幸“太湖石下，埋着一个磁坛”

所藏一千余金尚在，但又被来安勾结张小桥父子纵火打劫，连同细软物件一块抢走，庄院草房也被烧坏；只得到观音庵小住，发现观音庵中有淫乱，便回城与吴大妗子相依为命，不想又被贪官吴典史污蔑与玳安有奸，抓进县衙受尽折磨。“吴大妗子、老冯怕连累着，一溜烟都躲了。只撇的小玉和五岁孝哥在那一座破宅子里，四顾无亲，斗米文钱从那里来！又想着月娘、玳安在牢里这一日了，又没人送碗饭进去看看，只得手拖着孝哥，提着些米汤，战兢兢的县门前来。那孝哥唬得乱哭，小玉雨泪悲啼，不敢进去。”（第十一回）直到吴典史被上司纠劾，月娘才出狱。

刚出狱，又遇到金兵二次洗劫，“那月娘、小玉紧紧扯着奔走，玳安背着孝哥，正在荒忙，只见金兵一冲，把这百姓们马踏刀砍，杀的杀，掳的掳，一似鸟惊鱼乱，那里还顾得谁来！这月娘和小玉挡扶着乱跑，回头看孝哥、玳安，不知隔在那里去。一回面叫着，那些哭声振地，喊杀连天，那里去找寻？”（第十三回）后来孝哥为应伯爵所卖，吴月娘孤身一人找到汴梁，后又漂泊淮扬一带，最后削发为尼。

2. 控诉了异族入侵者和汉族统治者的罪恶

小说还通过吴月娘的见闻，控诉了异族入侵者和汉族统治者的罪恶，第一回写道：“那寺外往来兵马，何止一日三五千过！幸喜各去攻城，不入寺中搜觅，也就躲了十余日。眼见得金兵枪过兗东一带地方，撤回汴梁大寨，围困京城去了。真是杀的这百姓尸山血海，倒街卧巷，不计其数。大凡行兵的法：杀的人多了，俘掳不尽，将这死人堆垛在一处，如山一般，谓之‘京观’，夸他用兵有威震敌国之胆。这金兵不知杀了几十万人，筑成京观十余座而去。”第十三回写道：“鞑离不分兵攻河北大名、山东青齐一带，不消说焚杀之苦，百姓逃亡。单表这清河县地方是经过一番的。这些人家一闻得金兵过河，东奔西躲，星散云飞，那有军兵守城敢去截杀的。那知县已先怀印而逃，不消金人兵到，土贼放火乱抢起来。”知县弃

城而逃，土贼（当地流氓恶棍）趁火打劫，百姓生灵涂炭。第十七回写道：“却说这金人斡离不攻了河北，逢县破县，到了清河县，百姓逃走一半，或杀或掳，把这壮汉不杀的都拴了来伺候攻城，推在前头，挡城上的炮弹。这掳的人不计其数。到了夜里，俱是铁镣扭锁，或十人一连，五人一连。”可谓战乱中山东人民苦难的见证。

三 其他明清小说所反映的山东文化

齐鲁是孔孟故乡，礼义之邦，战国时期齐国的稷门还是天下学术中心。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七十八回中的孔子是个“有圣德，好学不倦，周游列国，弟子满天下，国君无不敬慕其名，而为权贵当事所忌，竟无能用之者”的形象，但他也曾短暂执鲁国之政，“自少正卯诛后，孔子之意始得发舒，定公与三家皆虚心以听之。孔子乃立纲陈纪，教以礼义，养其廉耻，故民不扰而事治。三月之后，风俗大变。市中鬻羔豚者，不饰虚价；男女行路，分别左右，不乱；遇路有失物，耻非己有，无肯拾取者。四方之客，一入鲁境，皆有常供，不至缺乏，宾至如归”。治理鲁国臻于化境。第八十七回记述孟子道，“邹人孟轲字子舆，乃子思门下高弟。子思姓孔名伋，孔子嫡孙。孟轲得圣贤之传于子思，有济世安民之志，闻魏惠王好士，自邹至魏，惠王郊迎，礼为上宾，问以利国之道，孟轲曰：‘臣游于圣门，但知有仁义，不知有利。’惠王迂其言，不用。轲遂适齐”。后齐宣王接受钟离春谏言，“散遣稷下游说之徒，以田婴为相国，以邹人孟轲为上宾，齐国大治”。（第八十九回）不仅儒家学说在齐鲁得到短时间推行，收到实效，而且齐国的稷门，是一个百家并存的学术中心，第八十九回写到齐宣王“听信文学游说之士，于稷门立左右讲堂，聚游客数千人。内如驺衍、田骈、接舆、环渊等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日事议论，不修实政”。对百家思想的酝酿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隋末反隋起义由山东人首倡，《隋唐演义》第十五回写秦琼路



过华州华阴县少华山，遇到占山为王的拦截，“叔宝把双铜纵马，照此人顶梁门打将下来，此人举金背刀招架，双铜打在刀背上，火星乱爆，放开坐下马，杀个一团。刀来铜架，铜去刀迎，约斗有三十余合，不分胜败。原来山中还有两个豪杰。倒有一个与叔宝通家，就是王伯当，因别了李玄邃，打此山经过，也因遇了寨主，战他不过，知是豪杰，留他入寨。那拦住叔宝讨常例的，叫做齐国远，上边陪王伯当饮酒的，叫做李如珪”。这是小说中所写隋末第一伙占山为王的，其中王伯当是山东济阳人。第二十三回写道，隋炀帝欲在洛阳造显仁宫，要天下各州县“加派三千两助工”，兖州大户尤俊达盯上了即将过境的青州三千两解银，纠集了本乡程咬金，在齐州（后代济南府）境劫下皇银。齐州原捕盗官秦琼被刘刺史从“总管来节度”那里要回，负责侦破此案，恰好为母亲做寿，前来祝寿的有绿林好汉王伯当、柴嗣昌、李玄邃、单雄信、尉迟兄弟、张公谨、白显道、史大奈、童佩之、金国俊，也有劫银要犯尤俊达、程咬金，席间当秦琼说起身负破案重任的话题，“咬金道：‘当初那解官错记了名姓，就是程咬金、尤俊达，是我与尤大哥干的事。’众人听见此言，连叔宝的脸都黄了，离坐而立”。（第二十三回）秦琼、单雄信等人选择了隐瞒不报、卖放程尤的决抉。

明朝天启年间，山东暴发了白莲教起义。清陆应旸的《樵史演义》第四回对这场起义多有描述。小说交代起义的背景道：“山东连年亢旱，民不聊生，几载饥荒，竟是人吃人了。”“话说兖州府是周朝东鲁地方，虽然辖着四州十三县，却都是穷困所在。凭他大人家，也只是财来财去，没有什么积蓄的。小人家有了今日的，还没有明日的哩。有个阳谷县，与郛城县连界，一派皆是乱山。就是宋朝梁山泊宋江一班大盗常常出没的去处。那两县的人，极喜欢打家劫寨，做不公不法的事。乡风又信师巫邪术，被发跳神，烧香聚众。”在这种背景下，山东钜野人徐鸿儒假借李贽为旗号，在兖州一带传教，渐成气候。丁寡妇是郛城县白莲教头目，“教门里朋友，

来拜望她了。男男女女，不一而足。也有曹州、济宁州的，也有邹县、滕县、东阿县的，只是钜野县、峄县的人更多”。白莲教在山东发展情况，用丁寡妇的话说，就是：“这教门里人也众，钱粮也多。凡入了这教，再不分你我了，东西大家吃，衣服大家穿，银钱大家用，就是汉子老婆，也大家可以轮流换转，不像常人这样认真。故此叫做白莲教，又叫做无碍教。说受一位圣贤的古人，唤做李卓吾，他在湖广麻城县一带地方开这教门起的。近来咱这钜野县里一位徐爷，原是秀才，名唤鸿儒，重新广演教法，收集徒众。他自入了这教，就不去考秀才了。教门不论男子女人，只要会骑马、会射箭、不吃牛肉、猪肉，就收用了。那徐爷自己原有一二十万家私，如令各处钱凑集，只怕有整百万了。”经过不到一年的宣传积聚，山东白莲教已有相当实力，“徐鸿儒巡游回钜野县来，把各州县头领投入白莲教的兵将总算起来，已有十二万人马。丁寡妇一队能使妖术，更为精健。竟移檄各头领，俱于五月五日起兵”。首攻钜野县不利，徐鸿儒采纳丁寡妇建议，七月初一再次集中力量发动攻势，“遣刘子孝带了十余将、三万兵，打从邹、滕两县南犯徐州；遣齐本恭带了五六员将、三万兵，攻打兖州；自己同丁寡妇一千将，反从东阿汶上小路，出峄县去破了曲阜，再趋郯城。若是处处得胜了，再当传檄会兵于黄家营，为渡淮之计”。但义军未经训练，战斗力不强，只徐丁一路“破了滕县，又破了峄县，声势大振。在夏镇、峄山又各占了要害，立了巢穴，分兵将重去守了邹县”。最后坚守邹县近半年，被明军镇压下去。

古代山东人吃苦耐劳、诚实节俭。陆人龙《醒世言》第九回《避豪恶儒夫远窜 感梦兆孝子逢亲》刻画的王喜一家三口人便是他们杰出的代表。王喜是“山东青州府安丘县弃金坡”的村农，“做人极守本分，有荒地十余亩，破屋两三椽”。洪武十八年，大旱之年颗粒无收，作为“甲首”的王喜，去求里胥崔科把自己“造入赈济册”，先后当了“青绵布衫”和“裙”各得五十钱送过去，崔科不还钱也不



列入赈济，王喜气愤不过就与崔科对骂撕打一场。事后又担心崔科兴风报复，只得告别妻子，远走他乡。妻子霍氏独撑家门并不示弱，而是找到崔科向他要人，“恰好路上撞着崔科，一把抓住道：‘好杀人贼哩，你诳了咱丈夫钱，不与他请粮，又打死他。’当胸一把，连崔科的长胡子也扭了。崔科动也动不得，那霍氏带哭带嚷，死也不放”。在邻居张老三的帮助下，逼崔科“劳了众人处分，少不得置酒相谢，又没了几两银子不题”。外边王喜原只想到避难，不曾想到避难在外如何过活，“前思后想，想起一个表兄，是个吏员，姓庄名江，现做定辽卫经历，不若且去投他，只是没盘缠，如何去得？不如挨到临清，扯粮缸纤进京再处。果然走到临清，顶了一个江西粮缸的外水缺，一路扯纤到通湾。吃了他饭，又得几钱工银，作了路费。过了京师，也无心观看，趲过了蓟州昌平，出了山海关，说不尽千辛万苦，才到得定辽卫”。不想庄江要他回去，王喜只得沿原路返乡。走到宁远，却遇见“宋国公兵来”，军中一“管哨将官”是小时同窗全忠，有意把王喜留在军中做帮手，“我营中新死了一个督兵旗牌，不若你暂吃他的粮，若大军得胜，我与你做些功，衣锦还乡吧”。王喜只得随军征战，在与“鞑子”交战时先胜后败，侥幸不死从战场死尸上摸了几十两银子逃回，打算到京城做生意，没想到途中又被脚夫暗算，“挨到无人处所，猛地把驴鞭上两鞭，那驴痛得紧，把后脚一掀，把个王喜‘扑’地一声跌在道儿上，那掌鞭的将来按住，搜去暖肚内银两，跳上驴去了。比及王喜爬得起来，只见身边银子已被拿去，两头没处寻人，依然剩得一个空身”。王喜要上吊自尽，多亏过路僧人将他救下带回寺院。家中霍氏独撑家门，“在家与儿子熬清受淡，过了日子。光阴迅速，王喜去时王原才得两周三岁，后边渐渐的梳了角儿读书，渐渐蓄了发，到十五六岁时，正值连年大熟，家中倒也好过了”。儿子王原便出外寻父，“先在本府益都、临淄、博兴、高苑、乐安、寿光、昌乐、临朐、诸城、蒙阴、莒州、沂水、日照各县，先到城市，后到乡村，人烟凑集的处在，无不寻到。又想

道：父亲若是有个机缘，或富或贵，一定回来。如今久无音信，毕竟是沦落了，故此僧道、星卜，下及佣工、乞丐里边，都去寻访。访了几月，不见踪迹，又向本省济南、兖州、东昌、莱州，各府找寻。也不知被人哄了几次，听他说来有些相似，及至千辛万苦寻去，却又不是。他并没个怨悔的心，见这几府寻不见，便转到登州，搭着海船行走”。遇海难不死，一直找到王喜出家的“慧日寺”，终于父子相见，全家团圆。后来县里将王原寻父事迹上报京都，“其年正值永乐初年，诏求独行之士，本省备开王原寻亲始末，将他起送至京。圣上嘉其孝行，擢拜河南彰德府通判。王原谢恩出京，就迎了老两口赴任禄养”。这是多么可贵的生存能力。



第七章

《三国演义》和运河文化

汉民族是农耕民族,而农业的发展有赖于运河等水利工程的支撑。至东汉末年形成三个发达的运河农业区,即西部、北方和东南。西部农业区包括关中巴蜀,有郑国渠、都江堰、成国渠、灵轵渠等秦汉运河水利工程,形成天府之国和八百里秦川的经济基础;北方农业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诸州,东周时开掘的荷水沟通了济水和泗水,两汉对鸿沟水系的人工开发利用,促成了北方农业的发达;东南农业区主要指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淮扬、吴越和荆州地区,这里有邗沟、江南运河和灵渠等运河水利工程,农业有后来居上之势。

《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形象地反映了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崛起和衰亡的全过程。三国兴衰虽以军事胜负为决定因素,但军事胜负取决于人力物力的强弱,人力物力的强弱又取决于各自割据地的优劣,包括作为战略区是否完整、综合条件对方占多大优势,而运河的灌溉面积、水上运兵和后勤保障能力是其中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从三国对运河的利用开发程度,包括利用已有运河和开发新的运河两方面,探讨各自的兴衰成败。

第一节 孙吴坐断江淮运河之利

吴越运河包括江南运河和淮扬运河两段。江南运河连接长江和钱塘两大水系,正如今人姚汉源所说:“江南运河修建大致自春

秋后期的吴越控制时代开始,秦代曾有开凿,两汉记载省略。但据东汉末三国初的记载,运河已经形成。”^①发轫于春秋后期的吴越两国贯通钱塘江和长江工程,经秦汉的完善,至东汉末年颇具规模。淮扬运河沟通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公元前 486 年,吴王夫差北上争霸,为了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开凿了一条南接长江、北入淮水的运河,后来这条运河屡经改道整修,一直是沟通江淮的主要运河”。^②这条运河,春秋名叫邗沟,因为它南起扬州北至淮安入淮,后世称之为淮扬运河。后来则有山阳渎、淮扬运河之称。三国时的孙吴就崛起于东部运河流域。

一 孙坚的发迹

孙坚是汉末吴郡富春人,在汉末动乱岁月里靠聪明才智崛起,“年十七岁时,与父至钱塘,见海贼十余人劫取商人财物于岸上分赃。坚谓父曰:‘此贼可擒也。’遂奋力提刀上岸,扬声大叫,东西指挥,如唤人状。贼以为官兵至,尽弃财物奔走,坚赶上杀一贼。由是郡县知名,荐为校尉。后会稽妖贼许昌造反,自称阳明皇帝,聚众数万。坚与郡司马招募勇士千余人,会合州郡破之,斩许昌并其子许韶。刺史臧旻上表奏其功,除坚为盐渎丞,又除盱眙丞、下邳丞”。^③(见《三国演义》第二回)孙坚先凭勇力以少胜多驱逐海贼,被荐校尉,后招募勇士破会稽反贼,除官淮上。到黄巾起事、北方大乱时,又“聚集乡中少年及诸商旅,并淮泗精兵一千五百余人”,出现在宛城战场。

当时朱隽携刘备正在宛城一带围剿黄巾残余,“隽与玄德、关、

① 姚汉源:《京杭运河史》34 页,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

② 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10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

③ 本章所节录《三国演义》原文,均出自中华书局 2005 年 4 月《中国文学四大名著》版。

张率三军掩杀，射死韩忠，余皆四散奔走。正追赶间，赵弘、孙仲引贼众到，与雋交战。雋见弘势大，引军暂退。弘乘势复夺宛城。雋离十里下寨”。孙坚生力军到来，朱雋喜出望外，马上发起对宛城的反攻，“坚攻打南门，玄德打北门，朱雋打西门，留东门与贼走。孙坚首先登城，斩贼二十余人，贼众奔溃。赵弘飞马突槊，直取孙坚。坚从城上飞身夺弘槊，刺弘下马，却骑弘马，飞身往来杀贼。”孙坚又一次在战场上以非凡的勇武精神显身扬名，朱雋表奏其战功，朝廷升任孙坚“别郡司马”。后来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孙坚已是乌程侯长沙太守，被列为第十六路诸侯。这时的他不仅以勇力闻名，而且麾下四将勇力过人，所以当他自告奋勇做讨逆先锋时，盟主袁绍评价：“文台勇烈，可当此任。”成为讨逆联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孙坚作为十八路诸侯的前部先锋，在董卓焚烧洛阳、迁都关中后，首先进入残破不堪的洛阳，得到传国玉玺后背弃盟约离开前线，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取道荆州回江南，通过荆襄时与奉袁绍之命拦截他的刘表武装冲突负伤，并在后来的报仇行动中先胜后败，死于岷山。孙坚私藏传国玉玺和受袁术鼓动兴兵讨伐刘表，反映了他政治上的不成熟。

二 孙策攻占江南

孙策统一江南沿着运河自北向南进行。《三国演义》第十五回《太史慈酣斗小霸王 孙伯符大战严白虎》展示了他攻占江南运河流域的全过程。


1. 寿春决策。孙坚死后，孙策用黄祖换回父亲灵柩，一时难以有所作为，投靠盘据在淮南的袁术，虽为袁术攻克泾县、陆康，但“术席间相待之礼甚傲”，因思父亲英雄业绩和自己的沦落困顿，不觉放声大哭。朱治出谋献策道：“君何不告袁公路，借兵往江东，假名救吴璟，实图大业，而乃久困于人之下乎？”于是孙策决计以父亲

留下的传国玉玺为质，向袁术借兵经营江南。以传国玉玺为抵押借兵，抓住时机夺取地盘，是孙策超过孙坚的地方。孙策把“图大业”的目标确定为江南运河流域的直接动因，是其舅父吴璟在曲阿受刘繇的欺压，他要起兵过江报仇。真实原因是江南运河流域没有强大对手。从孙策过江不久在光武庙的祷词“若孙策能于江东立业，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和打败刘繇后继续向南进兵一事看，孙策对朱治“名救吴璟，实图大业”的谋划心领神会，一开始就有独霸江南的雄心。

2. 历阳得土。孙策借得三千兵马，从寿春行军至历阳遇到周瑜，周瑜“愿施犬马之力，共图大事”，并向孙策推荐张昭、张纮。孙策遂拜张昭为长史，兼抚军中郎将；张纮为参谋正议校尉，与之谋划过江攻击盘据在曲阿、秣陵的刘繇。江淮才士周瑜和二张的加盟，使孙策攻占江南获得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开启了边进取江南边收拢江淮人才的良性循环。

3. 力取曲阿。刘繇原为扬州刺史，被袁术从寿春赶到江南，在曲阿立足，与寄居在当地的孙策家人、亲友发生利益冲突，成为孙策攻占江南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刘繇显然不如孙策占人和，刘军刚和孙策对阵，就有人在寨中放火，导致“军中大乱”，被孙策“乘势掩杀”，占了牛渚。“原来那寨后放火的，只是两员健将，一人乃九江寿春人，姓蒋名钦字公奕；一人乃九江下蔡人，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遭世乱，聚人在洋子江中，劫掠为生，久闻孙策为江东豪杰，能招贤纳士，故特引其党三百余人，前来相投。”周瑜另领一支人马偷袭曲阿，也“有庐江松滋人陈武，字子烈，接应周瑜入去。”孙策得了牛渚的军粮兵器和降兵，声势大震。

4. 攻占秣陵。孙策命陈武为先锋，向秣陵攻击前进。陈武在与秣陵守将薛礼的对阵中“引十数骑突入阵去，斩首级五十余颗”，吓得薛礼“闭门不敢出”。刘繇会合笮融去偷袭牛渚，孙策亲自提兵去救，“一霎时挟死一将，喝死一将”，再次大败刘繇。刘繇与笮



融投刘表去后，孙策还兵复攻秣陵，“亲到城壕边，招谕薛礼投降。城上暗放一冷箭，正中孙策左腿，翻身落马。众将急救起，还营拔箭，以金疮药傅之。策令军中诈称主将中箭身死。军中举哀。拔寨齐起。薛礼听知孙策已死，连夜起城内之军，与骁将张英、陈横杀出城来追之。忽然伏兵四起，孙策当先出马，高声大叫曰：‘孙郎在此！’众军皆惊，尽弃枪刀，拜于地下。策令休杀一人。张英拨马回走，被陈武一枪刺死。陈横被蒋钦一箭射死。薛礼死于乱军中”。孙策攻城得手，实力和声势大增。

5. 智收太史慈。太史慈时为刘繇部将，与孙策有过恶战，在孙策分兵五路夜劫刘繇军营时“独力难当，引十数骑连夜投泾县去了”，在泾县又招得二千人马。周瑜下令“三面攻县，只留东门放走，离城二十五里，三路各伏一军。太史慈到那里，人困马乏，必然被擒”。陈武短衣持刀，首先爬上城头放火，太史慈引军撤出泾县，在城外被伏兵擒获，只得归顺孙策。

6. 平定吴郡。严白虎盘据吴郡，“遣部将守住乌程、嘉兴”，然后派严舆在枫桥布阵迎击孙策。孙策令韩当出马战严舆，“比及韩当到桥上时，蒋钦、陈武早驾小舟从河岸边杀过桥里，乱箭射倒岸上军。二人飞身上岸砍杀，严舆退走。韩当引军直杀到阊门下，贼退入城里去了”。严白虎自料非孙策对手，提出欲与孙策平分江东，被孙策断然拒绝，“白虎料敌不过，弃城而走。策进兵追袭，黄盖攻取嘉兴，太史慈攻取乌程，数州皆平”。

7. 巧取会稽。严白虎从吴郡逃奔浙江，一路劫掠。当地人凌操父子领乡人杀败白虎，然后来投孙策。孙策引兵渡过钱塘江，准备攻打会稽。太守王朗采纳严白虎建议，深沟高垒，坚壁勿出，意欲在孙策粮尽退兵时乘虚掩杀。孙策采纳叔父孙静谋略，偷袭王朗屯钱粮的所在查渚，“下令于各门燃火，虚张旗号，设为疑兵，连夜撤围南去”。白虎与周昕领五千兵出城追赶，“将近初更，离城二十余里，忽密林里一声鼓响，火把齐明。白虎大惊，便勒马回走，一

将当先拦住，火光中视之，乃孙策也。周昕舞刀来迎，被策一枪刺死。余众皆降。白虎杀条血路，望余杭而走。王朗听知前军已败，不敢入城，引部下奔遍海隅去了。孙策复回大军，乘势取了城池，安定人民”。几天后余姚人董袭将严白虎首级来孙策军前投献。至此，孙策完全攻占江南运河流域。

孙策取江南运河有三个特点，一是以义兵诛残暴的正义性日益明显。起初以兴兵报仇为辞，攻克秣陵后以仁义之师自律，“及策军到，并不许一人掳掠，鸡犬不惊，人民皆悦，煮牛酒到寨劳军。策以金帛答之，欢声遍野。其刘繇旧军，愿从军者听从，不愿为军者给赏归农。江南之民，无不仰颂”。从而博得江南人民拥戴，以义兵诛残暴，使战事势如破竹。二是得人与得地相始终。取江南的每一阶段都有当地英杰投靠相助，在历阳得周瑜、张昭、张纮，在曲阿、秣陵得蒋钦、周泰、陈武、太史慈，在会稽得凌操父子并董袭、虞翻，可以说每到一地，民心、才士和土地尽归孙郎，从侧面反映了孙策是江南民望所在，他收取江南是人心所向。三是武力与智谋相辅相成。过江之初，非力战不能打出军威，孙策回救牛渚时与刘繇对阵，大喝一声，吓死樊能；生擒对手，挟死于糜。“自此人皆呼孙策为‘小霸王’。当日刘繇兵大败，人马大半降策。策斩首级万余。”其后军威大震，敌人坚守不战时，多用奇计胜敌，如攻会稽时袭其后以调动守军出城，而豫设伏兵截击，并就势袭取会稽称，堪称出奇制胜之范例。

孙策夺取江南运河流域后，渐次向西扩张至荆州地面，向北扩张到淮河流域。《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写道：“却说孙策自霸江东，兵精粮足。建安四年，袭取庐江，败刘勋；使虞翻驰檄豫章，豫章太守华歆投降。自此声势大振，乃遣张纮往许昌上表献捷。”其势力发展之快，令曹操心中不安。孙策求为大司马，被曹操拒绝，孙策遂有“袭许都”问鼎天下之心。

三 孙权坐守江淮

孙策先后遭遇刺客、妖人，身受重创又不能制怒而死，死前察弟孙权才器，为他确定了保界自守的国策：“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使各尽力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卿宜念父兄创业之艰难，善自图之！”孙权继位后对外开拓的眼光只盯着荆州，在赤壁之战前兴兵江夏剿灭黄祖报了父仇，在赤壁之战后夺得荆州，尽得长江天险之利。

孙权继位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杀黄祖、报父仇。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 战长江孙氏报仇》写及孙权兴兵报仇的始末。兴兵报仇之前孙权广得人才，“自孙策死后，据住江东，承父兄基业，广纳贤士，开宾馆于吴会，命顾雍、张紘延接四方宾客。连年以来，你我相荐。时有会稽阚泽字德润，彭城严峻字曼才，沛县薛综字敬文，汝阳程秉字德枢，吴郡朱桓字休穆、陆绩字公纪，吴人张温字惠恕，会稽凌统字公绪，乌程吴檣字孔休，此数人皆至江东，孙权敬礼甚厚。又得良将数人，乃汝南吕蒙字子明，吴郡陆逊字伯言，琅琊徐盛字文向，东郡潘璋字文珪，庐江丁奉字承渊。文武诸人，共相辅佐，由此江东称得人之盛”。其中阚泽腹有良谋，吕蒙、陆逊后为东吴良将，徐盛、丁奉在东吴后期军事斗争中多有建树。境内大治，建立水军，“东吴各处山贼尽皆平复。大江之中有战船七千余只。孙权拜周瑜为大都督，总统江东水陆军马”。孙权正在对是否兴兵报仇犹豫不决时，黄祖部将甘宁求降，坚定了他的决心信心。甘宁原为江上水贼，弃恶从善投刘表。后见刘表不能成事，欲投东吴过夏口时被黄祖挽留。曾在荆吴冲突中于黄祖救命之恩，却不得黄祖重用，故因吴将吕蒙投孙权，向孙权提出进取荆州的建议。孙权“遂命周瑜为大都督，总水陆军兵；吕蒙为前部先锋；董袭与甘宁为副将；权自领大军十万，征讨黄祖”。东吴上下一心，将士用命，对盘据江夏的黄祖占有绝对优势，很快攻克夏口，射死黄祖。

孙权回兵东吴，“自此广造战船，分兵守把江岸；又命孙静引一支军守吴会；孙权自领大军，屯柴桑；周瑜日于鄱阳湖教练水军，以备攻战。”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孙权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在决计联刘抗曹，取得赤壁之战全胜并在战后通过外交和军事双重手段夺取荆州。孙权虽无对外开拓魄力，但东吴生存受到威胁时，他内心是不愿屈膝投降的。所以尽管赤壁之战前身边谋士大多主降，但他最终还是采纳周瑜、鲁肃的意见，决计联刘抗曹，并最终取得战争的全胜。战前东吴西临软弱无力的刘表集团，意识不到强敌顺江而下对东吴构成的巨大威胁，刘表集团投降曹操后，“且主公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既得荆州，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势不可敌”（第四十三回中张昭语）的现实威胁，才与曹操“与将军会猎于江夏”的战书一起压上孙权的心头。受此刺激，赤壁战后的孙权及其谋士，都有占有荆州、尽有长江天险的迫切愿望。从地理上看，荆州与东吴皆为“南人乘舟”地域，东吴水军强大，攻击容易奏效，且得手后容易统治，正如第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中孙权与吕蒙一段对话：

权曰：“孤欲北取徐州，如何？”蒙曰：“今操远在河北，未暇东顾，徐州守兵无多，往自可克；然其地势利于陆战，不利水战，纵然得之，亦难保守。不如先取荆州，全据长江，别作良图。”

“全据长江”成了东吴在赤壁战后惟一的进取目标，并且最终有效地实现了这一目标。这样，东吴就比较完整地据有江南运河流域水网纵横地区，并且在长江以北占有江淮间约三分之一纵深的土地，西界直抵三峡江口。孙权靠着江南运河流域战略区的人力物力，对西蜀火烧连营七百里，打败刘备报仇军兵 75 万；数挫曹魏入侵之师，使魏蜀在孙权生前不敢小视东吴。



但是孙吴集团除孙策、周瑜外,大都没有进取天下的雄心和才干。甘宁初投孙权时,曾向孙权提议攻占荆襄,进而进取巴蜀:“今汉祚日危,曹操终必篡窃。南荆之地,操所必争也。刘表无远虑,其子又愚劣,不能承业传基,明公宜早图之;若迟,则操先图之矣。今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迈,务于货利;侵求吏民,人心皆怨;战具不修,军无法律。明公若往攻之,其势必破。既破祖军,鼓行而西,据楚关而图巴、蜀,霸业可定也。”对此,尽管孙权当时赞叹“此金玉之论也”,但攻取夏口、射杀黄祖后,孙权向部下提出欲分兵守江夏时,谋士张昭说:“孤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东。刘表知我破黄祖,必来报仇;我以逸待劳,必败刘表;表败而后乘势攻之,荆襄可得也。”其他人居然都不反对,孙权也就把甘宁的建议忘到九霄云外,采纳了张昭的意见,放弃已经到手的江夏,班师回守江东。周瑜死后,执掌军权的陆逊也无四方之志,第九十六回《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断发赚曹休》写陆逊总率江南八十一州并荆湖之众七十余万,与朱桓、全琮合谋抵御曹魏三路进犯,当时魏将曹休受吴将周鲂假降迷惑,欲深入吴地迎降,朱桓献策说:“曹休以亲见任,非智勇之将也。今听周鲂诱言,深入重地,元帅以兵击之,曹休必败。败后必走两条路:左乃夹石,右乃挂车。此二条路,皆山僻小径,最为险峻。某愿与全子璜各引一军,伏于山险,先以柴木大石塞断其路,曹休可擒矣。若擒了曹休,便长驱直进,唾手而得寿春,以窥许、洛,此万世一时也。”这个作战方略不仅胜算在手,而且高瞻远瞩、极富进取心,但陆逊认为“此非善策”,他的所谓“妙用”,虽然击溃了曹休的冒进,却没有全歼曹军,更没有乘胜追击,只是知会西蜀催其西线出兵而已。

第二节 刘蜀未尽西部运河之利

刘蜀集团在三国中最后建立根据地,其后发优势是事先做好

的战略规划,按照这个规划一步步向前推进。其战略规划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这一点为吴魏两国所不及,曹操是边做边想,孙氏是就故土取近利,而刘蜀是先由谋主提出进取方案,但未能最终实现进取方案。

刘备参加了平黄巾和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全过程,与曹操、孙坚有着同样的资历,而且所遇机遇也并不比曹操孙策差多少。比如陶谦让徐州于他,使刘备轻而易举地跻身一方诸侯之列,这一点让袁术嫉妒得要命,“汝乃织席编履之夫,今辄占据大郡,与诸侯同列;吾正欲伐汝,汝却反欲图我,深为可恨”。(第十四回)但刘备军事才能平平,张飞、关羽也仅长于战场攻杀,所以刘蜀集团在诸葛亮加入之前,不是利益得而复失,就是行为无据、前后矛盾、劳而无功。如刘备从陶谦手中接过徐州,不得不接受曹操攻打袁术的命令,袁术也起兵相迎,“两军会于盱眙”。刘备虽兵少,但关羽勇力过人,“纪灵却遣副将荀正出马。关公曰:‘只教纪灵来,与他决个雌雄!’荀正曰:‘汝乃无名下将,非纪将军对手!’关公大怒,直取荀正;交马一合,砍荀正于马下。玄德驱兵杀将过去,纪灵大败,退守淮阴河口,不敢交战,只教军士来偷营劫寨,皆被徐州兵杀败”。但坐镇徐州的张飞却因酒失事,被曹豹、吕布应外合袭了徐州,刘备因而前功尽弃,不仅退无归路,而且在前取广陵时又遇袁军伏击,最后只得应吕布之请还军小沛,反主为客屈居别人卧榻之下。刘备先后投吕布、投曹操、投袁绍、投刘表,不仅在天下惶惶如丧家之犬,而且作战的功劳正负相抵,一事无成。比如刘备与曹操水火不容,但他却为曹操灭吕布立下过汗马功劳;袁绍是刘备的盟友,关羽却斩杀袁绍大将两员,为曹操解白马之围不遗余力。直到诸葛亮出山,刘备寄居荆州一新野安身。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只认命苦,而司马徽替他总结了前半生成败得失:

玄德曰:“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镜曰:“不然。盖因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玄德曰:“备虽不才,文有孙乾、糜竺、简

雍之輩，武有关、张、赵云之流，竭忠辅相，颇赖得力。”水镜曰：“关、张、赵云皆万人敌，惜无善用之人。若孙乾、糜竺輩，乃白面书生，非经纶济世之才也。”

刘备返回新野，未得去请大贤，却有徐庶来投。刘备靠徐庶之智，首先把前来进犯的曹仁部将吕旷、吕翔杀得一败涂地，然后又粉碎了曹仁的复仇反扑。这使刘备尝到了重用贤才的甜头。后来徐庶为曹操诡计所赚，事刘备不得善终，临离新野时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刘备锐意三顾茅庐，得到诸葛亮的倾心画策：

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

诸葛亮首先分析了天下大势，指出东吴孙权、北方曹魏都根基稳固，一时难以动摇。但又要区别对待，曹操是最终敌手，孙权是暂时盟友。但进取天下又要果敢勇为，只能避强击弱，先取荆州为家，后取西川建立基业，最后等待时机成熟，两路出兵北伐中原，重扶汉室。这就是诸葛亮为刘备规划的兴国蓝图。这个蓝图，应该说是既目标远大，又切实可行的，并且事后也被刘备集团基本实

现了。

首先,刘备集团在曹操大兵压境、刘琮投降、荆州基本沦陷曹魏的情况下,以区区二万兵马成功地与孙吴结盟抗曹,并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曹操败走后,先孙吴夺取荆襄,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荆州地广人众,战略地位重要,用诸葛亮的话说,“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这一地区水网纵横,交通便利,当年秦国灭楚后,始皇帝发军五十万,开凿灵渠,沟通了湘江与漓江;军需供应有了保障,秦军最终变南越、西瓯为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至刘备入主荆州时,这一地区经两汉四百年经营,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又在汉末动乱中没有受到大的破坏,成为刘备进取西川的理想基地。

其次,刘备集团趁曹操破马超后志得意满又南下攻吴、东吴周瑜死后缺少帅才之机,又从刘璋手中夺取了西川。庞统在兴兵前说刘备道:“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此天赐也。何必疑哉?”此话可作诸葛亮隆中对的补充。西蜀长江峡口本来易守难攻,但刘备集团打着帮刘璋抵御汉中张鲁的旗号顺利入川,然后利用刘璋的懦弱无谋,虽然损失了军师庞统,但在诸葛亮、张飞、赵云后继增援后,相当轻易地取代了刘璋在西川的统治。西川在先秦即因为有都江堰水利工程而被称为天府之国,东汉末年的动乱又没有波及此地,所以刘备得西川后实力大增。

再次,刘备集团成功地通过利益交换把曹操攻占汉中后对西川的威胁转移到孙权方面,使自己得以稳定对川统治并攻占汉中。曹操攻占汉中后,司马懿、刘晔先后两次提议乘胜攻击蜀,“西川百姓,听知曹操已取东川,料必来取西川,一日之间,数遍惊恐”。刘备请诸葛亮商议,诸葛亮提出了一个利益转让方案,“曹操分军屯合肥,惧孙权也。今我若分江夏、长沙、桂阳三郡还吴,遣舌辩之士,陈说利害,令吴起兵袭合肥,牵动其势,操必勒兵南向矣”。孙

权得三郡后大喜，果然在东线向曹操发动进攻，尚在汉中犹豫的曹操最终放弃攻蜀，提重兵杀向江淮，去合肥前线与孙吴厮杀。孙曹两败俱伤，刘蜀集团趁机从曹魏手中夺取了汉中。汉中处于关中与西川之间，西汉武帝时曾有人提议开褒斜漕道，“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漕船。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①可见汉中地位的重要和物产之丰富。

但是，刘蜀集团最终并没能够实现重扶汉室、一统天下的愿望，反而在三国中第一个灭亡。那么，“隆中对”在制定之初就存在什么先天不足，在执行过程中又有什么重大失误呢？这两个问题都是《三国演义》研究中无法回避并且先前研究者说之不明的事。

首先，“隆中对”的历史根据主要是汉高祖刘邦创立西汉的成功经验，但诸葛亮理解西汉成功经验失之偏颇，忽视了巴蜀汉中必须结合关中，才能形成对东部中国的有利进取态势。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他东向与项羽争夺天下进退自如，是因为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战而定关中所致；假如刘邦不得关中，那么他就被压制在西南一隅难有作为。而“隆中对”恰好没有把尽早夺取关中明确列入重要进取步骤，仅列入“待天下有变”最后冲刺阶段的出击目标。诸葛亮作为刘蜀谋主，他一生的最大失误就是夺取汉中便止步不前，放弃了进取关中的良机，在汉中忙什么劝刘备进位汉中王。一般学者都把《三国演义》第七十六回《徐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当作蜀汉由盛转衰的分水岭，那是因为关羽死于这一回，但这是表面现象；蜀汉由盛转衰的真正起点是第七十三回《玄德进位汉中王 云长攻拔襄阳郡》。也就是

^① 《史记》1199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说，七十三回是因，七十六回是果。

七十三回开头写道：“曹操退兵至斜谷，孔明料他必弃汉中而走，故差马超等诸将分兵十数路，不时攻劫。因此操不能久住。又被魏延射了一箭，急急班师。三军锐气堕尽。前队才行，两下火起，乃是马超伏兵追赶。曹兵人人丧胆。操令军士急行，晓夜奔走无停。直至京兆，方始安心。”这是多么好的进兵关中的机会，诸葛亮若于此时乘胜进兵，不仅事半功倍，而且取胜把握极大，因为此时刘蜀的人才精英和精锐部队都集中在汉中，比起后来六出祁山的阵容来高下有天壤之别。但这时的刘蜀集团上层人物都被小胜陶醉得忘乎所以了，“于是众将皆有推尊玄德为帝之心，未敢径启，却来禀告诸葛军师。孔明曰：‘吾意已有定夺了。’随引法正等人见玄德，曰：‘今曹操专权，百姓无主。主公仁义著于天下，今已抚有两川之地，可以应天顺人，即皇帝位。名正言顺，以讨国贼。事不宜迟，便请择吉。’”诸将小胜即安可以，诸葛亮也推波助澜，说明他不仅隆中决策时就事有不明，而且在执行中也不善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历史给刘蜀集团的机遇稍纵即逝，刘备进位汉中王的表章一到许都，身在邳城的曹操勃然大怒，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就提出了挫败刘蜀集团的构想，“江东孙权以妹嫁刘备，而又乘间窃取回去；刘备又据占荆州不还，彼此俱有切齿之恨。今可差一舌辩之士，赍书往说孙权，使兴兵取荆州，刘备必发两川之兵以救荆州。那时大王兴兵去取汉川，令刘备首尾不能相救，势必危矣”。满宠出使东吴，双方顿生共同语言。张昭说，“魏与吴本无仇，前因听诸葛之说词，致两家连年征战不息，生灵遭其涂炭。今满伯宁来，必有讲和之意，可以礼接之。”满宠呈上操书说：“吴、魏自来无仇，皆因刘备之故，致生衅隙。魏王差某到此，约将军攻取荆州，魏王以兵临汉川，首尾夹击。破刘之后，共分疆土，誓不相侵。”这说明三国鼎立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某一方过快强盛起来，也就是说刘备称王汉中是自招祸端。

权与众谋士商议。顾雍曰：“虽是说词，其中有理。今可一面送满宠回，约会曹操，首尾相击；一面使人过江，探云长动静，方可行事。”诸葛瑾曰：“某闻云长自到荆州，刘备娶与妻室，先生一子，次生一女。其女尚幼未许字人。某愿往，与主公世子求婚。若云长肯许，即与云长计议，共破曹操；若云长不肯，然后助曹取荆州。”

顾雍和诸葛瑾的话代表了孙吴对待孙刘联盟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右派完全和曹魏不谋而合，左派试图挽回孙刘破裂的局面，但又不得不以折中调和的口吻说话。孙权还不算太绝情，同意诸葛瑾过江试一下。雪上加霜的是，荆州守将关羽至此都不明白诸葛亮交待他的“东和孙权，北拒曹操”话的玄机，居然对诸葛瑾的美意大骂出口：“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这就彻底促成了孙曹联盟，同时历史机遇也就从刘备一方彻底转向了曹魏。

身在成都的诸葛亮得到孙曹合谋的消息，他本该调整人事部署，派川中深谋远虑之士如法正、李恢之类，加上沉稳厚重之将如黄忠、严颜之流去荆州加强防御；或者采取外交手段分化吴魏暂时同盟；或者既然想不到进兵关中，把曹魏的注意力吸引到西方，减轻关羽在荆州的压力，那就索性自己提一旅之师亲赴荆州，在东线做出点名堂来。这些他都没有做，却又一次自以为是地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提出“可差使命就送官诰与云长，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敌军胆寒，自然瓦解矣”，一厢情愿地幻想关羽先发制人即可败坏曹孙的合谋。而实际上，尽管关羽北伐初期曾攻克曹魏的襄阳，并水淹曹操援兵“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振华夏，但并没有吓住孙曹智能之士夺取荆州的图谋，反而激发了他们对关羽志在必胜、对荆州志在必得的志气。司马懿再次献计曹操：“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战之故。于国家大计，本无所损。今孙权失好，云长得志，孙权必不喜。大王可遣使去东吴陈说利害，令孙权暗暗起

兵，蹶云长之后，许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孙权，则樊城之危自解矣。”（第七十五回）而陆逊也向吕蒙提出：“云长倚恃英雄，自料无敌，所虑者惟将军耳。将军乘此机会，托疾辞职，以陆口之任让之他人，使他人卑辞赞美关公，以骄其心，彼必尽撤荆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荆州无备，用一旅之师，别出奇计以袭之，则荆州在掌握之中矣。”至此，魏吴联盟真正形成。

关羽本非帅才，战场冲杀是其长项，深谋远虑乃其所短，以前跟随刘备时仅如此而已。后在诸葛亮帐下听用，应该说得到用计制胜的熏陶，用兵水平有很大提高，对付曹仁、吕蒙之流或许有余，对付司马懿、陆逊这样的高智商军事家，可以说是勇气有余、智慧不足。果然，陆逊代替吕蒙后给关羽灌了些迷魂汤：“陆将军呈书备礼：一来与君侯作贺，二来求两家和好。幸乞笑留。”关羽居然当着东吴来使的面说：“仲谋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于是便放松对东吴的警惕，从荆州调重兵到樊城前线助战。

东吴取荆州就非常轻易。吕蒙点兵三万，快船八十余只，选会水者扮作商人，皆穿白衣，在船上摇橹，却将精兵伏于船中。吕蒙自为前队，安排韩当、蒋钦、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等七员大将相继而进。并遣使致书曹操，令进兵以袭云长之后。然后率白衣商人，驾快船往浔阳江去，直抵江北岸，欺荆州守烽火台士卒以“我等皆是客商，因江中阻风，到此一避”。到了二更，“暗号一声，八十余船精兵俱起，将紧要去处墩台之军尽行捉入船中，不曾走了一个。于是长驱大进，径取荆州，无人知觉。将至荆州，吕蒙将沿江墩台所获官军，用好言抚慰，各各重赏，令赚开城门，纵火为号。众军领命，吕蒙便教前导。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门。门吏认得是荆州之兵，开了城门。众军一声喊起，就城门里放起号火。吴兵齐入，袭了荆州”。吕蒙连连招降关羽旧部，兵不血刃，取了荆州全境。

而关羽从樊城败退，想复夺荆州，下场是那么可悲，“蒋钦等三路军马，喊声震地，鼓角喧天，将关公困在垓心。手下将士渐渐消

疏。比及杀到黄昏，关公遥望四山之上，皆是荆州士兵，呼兄唤弟，觅子寻爷，喊声不住。军心尽变，皆应声而去。关公止喝不住，部从止有三百余人。”最后被东吴俘获，成了异乡之鬼。

综上所述，刘蜀兴得益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及为实现“隆中对”所作的努力，衰也由于“隆中对”有先天不足，并且在执行中没有根据情况及时调整，既没意识到夺取汉中后乘胜进兵的机不可失，又在应对孙曹合谋荆州失当，致使关羽独力支撑荆州危局，智力不济而亡。

其次，刘蜀集团的内部机制以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为核心，以诸葛亮为最后决策者，这种机制有利也有弊。以刘关张三结义为核心，使刘蜀集团在前期得以艰苦奋战而不溃散，并逐渐吸收外转成员，形成了“文有孙乾、糜竺、简雍之辈，武有关、张、赵云之流”的颇有凝聚力的团体，但是后来在关羽战死、曹丕篡汉的关键时刻，刘备不听赵云、诸葛亮等蜀中文武大臣的劝谏，一意孤行地兴兵伐吴，居然到了“义”令智昏的地步。实际上，曹丕篡汉就是“隆中对”所说的“天下有变”，当时蜀汉集团的正确选择是：“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凶逆，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第八十一回赵云谏语）但刘备恪守“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的信条，甚至置一向尊重的诸葛亮的“陛下初登宝位，若欲北讨汉贼，以伸大义于天下，方可亲统六师”“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等意见于不顾，贸然兴倾国之兵伐吴，不仅导致孙权对曹丕俯首称臣，并且本人在猇亭被东吴杀得大败而回。于是，促使刘蜀扶汉兴刘大业走入绝境。

诸葛亮出山后，在赤壁之战和取荆州西川汉中过程中的确显示出超人智慧，但他出山前并无足够的社会和战场实践，仅靠书中间接经验结合当时实际指导复杂多变的三国斗争，难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前期，诸葛亮还比较注重发挥将领的主观能动

性,但“七擒孟获”过程中,形成了战役安排皆出一人之口的专断作风和“稳扎稳打,平推直进”的作战模式,军事民主没有了。一出祁山时,司马懿被魏主闲置不用,曹魏在关中又无防范准备,战役发起是否突然、能否一招致敌死命就成了胜败的关键,上策应取“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第九十五回中司马懿语),中策应听取魏延的意见:“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走。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诸葛亮拒绝了魏延的建议,所取是下策“从陇右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这种战法正如魏延所批评的那样,“兵从大路进发,彼必尽起关中之兵,于路迎敌,则旷日持久,何时而得中原?”再加上诸葛亮误用马谡守要害之地,被司马懿断蜀军粮道和归路,诸葛亮不得不仓促退兵。其后曹魏一直视关中为边防重地,诸葛亮夺取关中的目的至死未能实现。

第三节 曹魏尽有北方运河之利

曹操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并无立足何处的考虑。这一点他甚至不如袁绍,第三十三回写曹操灭袁绍,祭袁墓时忆及先前与袁绍的交往:“昔日吾与本初共起兵时,本初问吾曰:‘若事不济,方面何所可据?’吾问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虽无立足何方的考虑,但曹操却是最善于着眼运河之利选择立足之地的政治家,并且是最善于利用运河解决军需供应以赢得战争的军事家。

首先,曹操受诏勤王,赴洛阳拜见汉献帝,取得控制朝廷的实际权势后,做出的第一个决策便是迁都许昌。第十四回写道:

次日入见帝,奏曰:“东都荒废久矣,不可修葺,更兼转运



粮食艰辛。许都地近鲁阳，城郭官室，钱粮民物，足可备用。臣敢请驾幸许都，唯陛下从之。”帝不敢不从；群臣皆惧操势，亦莫敢有异议。遂择日起驾。操引军护行，百官皆从。

这个选择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他之所以放弃洛阳，主要原因是洛阳残破，转运粮食艰辛，而许昌地近鲁阳关，而且南临汝南、南阳两个东汉农田水利建设示范区。《后汉书·邓晨传》载：“得为汝南太守……晨兴鸿郤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①《后汉书·鲍永鲍昱传》载：“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②《后汉书·杜诗传》载：“七年，迁南阳太守，……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时人方于召信臣，故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③《后汉书·何敞传》载：“迁汝南太守。……又修理颍阳旧渠，百姓赖其利，垦田增三万余顷。吏人共刻石，颂敞功德。”^④许都东接鸿沟水系，经前代循吏开发，水利灌溉条件较好。

为了尽得黄淮、江淮平原之利，曹操首先对盘据在徐州、扬州和南阳的吕布、袁术、张绣用兵，扫除了许都东西两面的割据势力，使以许昌为中心的黄淮平原成为进取天下的基地。安作璋先生说：“早在建安元年(196)，曹操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就在河南许昌进行屯田，并设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等官吏，专门管理。许多大面积的屯田就设在自然水道和人工运河的附近，并修筑了不少水利工程，与河渠相接，使屯田取得良好的灌溉效果，同时也便于屯

① 《后汉书》388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② 同上，687页。

③ 同上，735页。

④ 同上，1004页。

田所获粮食漕运京城及供应军需。”^①《三国演义》第十四回也写到曹操任命“毛玠、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催督钱粮”，许昌屯田细节虽未写及，但曹魏他时他处屯田多见，如第三十四回写曹操平定北方后，“复聚众谋士商议，欲南征刘表。荀彧曰：‘大军方北征而回，未可复动。且待半年，养精蓄锐，刘表、孙权，可一鼓而下也。’操从之，遂分兵屯田，以候调用。”第八十六回写曹丕欲兴兵伐吴，侍中辛毗出班奏曰：“中原之地，土阔民稀，而欲用兵，未见其利。今日之计，莫若养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后用之，则吴、蜀方可破也。”第一百十一回写魏臣诸葛诞“大聚两淮屯田户口十余万，并扬州新降兵四万余人，积草屯粮，准备进兵”。这些例子都说明，曹魏的屯田是极有传统的。

曹操稳定黄淮后，便集中力量对付河北的袁绍。在从袁氏手中夺取河北四州的过程中，曹操把开掘运河、利用运河作为战争胜负的先机来抓，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中说：“曹操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败袁术，杀吕布，而后便开挖通往官渡的运河——睢阳渠，准备与袁绍决战……又开挖白沟，作攻取邺城的准备。”^②曹操开睢阳渠的事，在《三国演义》中没有写及，但开挖白沟在第三十二回中有两处虚写，一是袁谭请曹操攻击盘据在冀州的袁尚，曹操说：“方今粮草不接，搬运劳苦，我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然后进兵。”二是“袁尚与审配商议：‘今曹兵运粮入白沟，必来攻冀州，如之奈何？’配曰：‘可发檄使武安长尹楷屯毛城，通上党运粮道，令沮授之子沮鹄守邯郸，遥为声援。主公可进兵平原，急攻袁谭。先绝袁谭，然后破曹。’”由此可知，曹操开掘利用运河在战争中对敌我态势的影响之大。

官渡之战决胜的关键不在正面战场，而在后勤保障。袁绍本

① 《中国运河文化史》12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

② 同上，93页。



在正面战场和后勤保障上占优势，正如第三十回沮授的分析：“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自败矣。”不仅粮草，而且官渡之战袁曹一交兵，袁军也是大胜，“四员将捉对儿厮杀。曹操令夏侯惇、曹洪，各引三千军，齐冲彼阵。审配见曹军来冲阵，便令放起号炮两下，万弩并发，中军内弓箭手一齐拥出阵前乱射。曹军如何抵敌，望南急走。袁绍驱兵掩杀，曹军大败，尽退至官渡。”但在两军进入相持阶段后，袁绍不能采纳正确意见屡失战机，而曹操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多次出奇兵扰乱敌人后勤保障，最终将袁绍击溃，取得了官渡之战胜利。具体情况是：曹操获悉袁绍的“大将韩猛运粮至军前接济”的消息后，接受荀攸的建议，“差徐晃将带史涣并所部兵先出，后使张辽、许褚引兵救应”劫了韩猛所运粮草。然后分军于寨前结营，为犄角之势。其后，曹操又接受新降的袁绍谋士许攸“袁绍军粮辎重尽积乌巢，今拨淳于琼守把。琼嗜酒无备。公可选精兵，诈称袁将蒋奇领兵到彼护粮，乘间烧其粮草辎重，则绍军不三日将自乱矣”的建议，亲自率军烧了袁绍屯集在乌巢的粮草。最后，曹操依荀攸之计，彻底击溃了袁绍：

荀攸献计曰：“今可扬言调拨人马，一路取酸枣、攻邴郡；一路取黎阳，断袁兵归路。袁绍闻之，必然惊惶，分兵拒我。我乘其兵动时击之，绍可破也。”操用其计，使大小三军四远扬言。绍军闻此信，来寨中报说：“曹操分兵两路：一路取邴郡，一路取黎阳去也。”绍大惊，急遣袁谭分兵五万救邴郡，辛明分兵五万救黎阳，连夜起行。曹操探知袁绍兵动，便分大队军马，八路齐出，直冲绍营。袁军俱无斗志，四散奔走，遂大溃。袁绍披甲不迭，单衣幅巾上马，幼子袁谭后随。张辽、许褚、徐晃、于禁四员将引军追赶袁绍。绍急渡河，尽弃图书、车仗、金帛，止引随行八百余骑而去。操军追之不及，尽获遗下之物。

所杀八万余人，血流盈沟，溺水死者不计其数。

官渡败后，袁绍因病死去，幼子袁尚继位，弟兄之间发生内哄。曹操乃渡过黄河，截淇水入白沟运粮，解决了军需粮草供应的后顾之忧，很快攻占邺城。袁熙、袁尚逃奔乌桓，袁氏地盘尽为曹操所有。为彻底消灭袁氏残余，解除北方边患，曹操又开掘两条运河，一是平虏渠，二是泉州渠。关于二渠，《三国演义》不见其详，但《三国志·武帝纪》载：“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沱入孤水，名平虏渠；又从洵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①《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只写了曹操平定乌桓的过程，行军所过“但见黄沙漠漠，狂风四起；道路崎岖，人马难行”，但曹操出奇制胜，决战还算顺手，“田畴引张辽前至白狼山正遇袁熙、袁尚，会合昌顿等数万骑前来。张辽飞报曹操。操自勒马登高望之，见昌顿兵无队伍，参差不整。操谓张辽曰：‘敌兵不整，便可击之。’乃以麾授辽。辽引许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奋力急攻，昌顿大乱。辽拍马斩昌顿于马下，余众皆降。”虽然备尝艰辛，但一战而胜还算容易。

曹操尽得袁绍旧地，不久又南取荆州，但在赤壁之战中败北，荆州得而复失，刘备崛起荆州，统一中国的进程受阻。晚年曹操的作为在西北：灭张鲁破马超。因汉中得而复失于刘备，实际上只做成了一件大事，即破马超得西凉，巩固了魏国在关中的地位。这样，曹操一生的业绩，就是统一北方，形成了以运河和自然河流支撑的北方战略区，并在西北据有关中和陇西，随时随地能够对西蜀发起致命的攻击；在东南据有古邗沟之利，并可“从蔡、颍而入淮，取寿春，至广陵，渡江口，径取南徐”（第八十六回中司马懿语），对东吴发起战略进攻。

① 《三国志》20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后来司马氏执掌魏国大权，在东南平定了毋丘俭和诸葛诞的反叛，巩固了进攻东吴的前进基地；在西部顶住了蜀汉的进攻，并且在蜀汉军政不和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发起灭蜀之役，一举攻克汉中和西川。进兵路线只有一个，那就是由关中南下，钟会的主攻进军路线是：“兵分三路：汝领中路出斜谷，左军出骆谷，右军出子午谷。”邓艾的助攻部署是“雍州刺史诸葛绪引兵一万五千，先断姜维归路；次遣天水太守王颍引兵一万五千，从左攻沓中；陇西太守牵弘引一万五千人，从右攻沓中；又遣金城太守杨欣引一万五千人，于甘松邀姜维之后。艾自引兵三万，往来接应”，充分发挥了关中和陇西对蜀汉的钳击地利，加上蜀汉君昏臣佞，姜维独木难支大厦之倾，因而一举灭蜀。灭蜀后，曹魏尽得西部运河之利，并把西川变成进取东吴的重要基地。

司马炎代魏开晋后，经过周密筹划，终于发起灭吴之战，“命镇南大将军杜预为大都督，引兵十万出江陵；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伷出滁中，安东大将军王浑出横江，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各引兵五万，皆听预调用。又遣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浮江东下，水陆兵二十余万，战船数万艘。又令冠军将军杨济出屯襄阳，节制诸路人马。”这个灭吴部署，东方司马伷、王浑两路，攻击方向是江南运河江口；西路王濬、唐彬，出长江峡口进兵，并最终由这东西两路会师建业，接受孙皓投降。这说明淮扬运河和关中两个前进基地对进取全国的作用。

第八章

《水浒传》与运河文化

《水浒传》与北宋运河的关系表现在，作者施耐庵是运河流域人，主要生活在运河流域。作品渗透了吴越人文气息；作品中所写“闹东京”、“平方腊”、征辽等故事情节与江南运河关系密切。

第一节 《水浒传》所写的梁山泊

一 《水浒传》所写的梁山泊

《水浒传》中首次提及梁山泊，是在第十一回通过柴进之口虚写，“是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如今有三个好汉在那里扎寨。为头的唤做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个唤做摸着天杜迁，第三个唤做云里金刚宋万。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罗，打家劫舍，多有做下弥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他都收留在彼。”^①林冲在山神庙手刃陆谦、富安、差拨，犯下弥天大罪，此时正在柴进东庄避难；只为官府搜寻得紧，柴进才向他提出去梁山泊的建议。第十二回写朱贵引林冲进山，通过林冲的所见展示梁山泊地形地貌，较为细腻。“林冲看时，见那八百里梁山水泊，果然是个陷人去处。”并安排一

^① 本章所节录作品原文，出自中华书局 2005 年 4 月版《中国文学四大名著·水浒传》。



段韵文铺排梁山泊的险恶：

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乱芦攒万万队刀枪，怪树列千千层剑戟。濠边鹿角，俱将骸骨攒成；寨内碗瓢，尽使骷髅做就。剥下人皮蒙战鼓，截来头发做缰绳。阻挡官军，有无限断头港陌；遮拦盗贼，是许多绝径林峦。鹅卵石叠叠如山，苦竹枪森森似雨。战船来往，一周回埋伏有芦花；深港停藏，四壁下窝盘多草木。断金亭上愁云起，聚义厅前杀气生。

虽然写及梁山泊自然和人文两方面景观，但为韵文形式所限，仍有隔雾看花之嫌。水泊梁山之险又通过林冲的视觉再用散文详细描写：“林冲看岸上时，两边都是合抱的大树，半山里一座断金亭子。再转将上来，见座大关。关前摆着枪刀剑戟，弓弩，戈矛，四边都是擂木炮石。”“二人进得关来，两边夹道遍摆着队伍旗号。又过了两座关隘，方才到寨门口。林冲看见四面高山，三关雄壮，中间里镜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靠着山口才是正门，两边都是耳房。朱贵引着林冲，来到聚义厅上。”四面环绕恶水，水中耸峙险山，险山环抱着一片平地，山口与寨口相合。果然是强人安身的理想所在。

据今人黄倬成考证^①：梁山由四个山峰、七个支脉组成，西枕黄河，东临古运河，北望东来湖，南瞻微山湖。本名良山，汉代为皇家猎场。汉文帝次子梁孝王在此游猎暴病而亡，葬于山麓，后改称梁山。五代时黄河溃决，洪水环山夹流，形成了水势浩淼的水泊，周围六七百里，号称“八百里水泊梁山”。水泊内深港水汊，芦苇水荡，纵横交错。梁山泊在宋代属东平府郛城县（后改寿张县），不仅地势险要，而且水陆交通便利。据今人安作璋考证：北宋梁山泊临自汴京到京东地区的一条主要水上通道——广济河，“广济河自开

^① 《施耐庵与〈水浒〉》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封东北流经定陶、济州合蔡镇(今山东巨野西北),入梁山泊达于郛州(今山东东平东须城),沿北清河(即古泗水)通贯齐鲁地区,使之成为宋代自京城达于京东地区的一条主要水上通道,并沿此运路复经京畿地区与江南等联接起来”。^① 反向看,从梁山泊沿永济河西南行可由京师转至江淮任何地方,西北行可于将陵(今山东德州)进入御河水道,取利幽蓟。当然,在王伦占据水泊时期,这些交通之利对他来说没有意义。

二 梁山事业的发展变化

王伦无四方之志。第十一回写他的心理活动道:“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发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后患;只是柴进面上却不好看,忘了日前的恩,如今也顾他不得。”王伦因屡试不第落草梁山,正因为胸无大志才觉得留林冲无用。王伦手下头领,也无特别才干,因而山寨并无正大作为,同回书朱贵对林冲说:“小人姓朱名贵,原是沂州沂水县人氏。山寨里教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靶子,肥肉煎油点灯。”王伦等所为不过是谋财害命的勾当。梁山事业发生性质变化,是晁盖上山后的事。

当时从河北到汴梁,陆路却有近道。河北大名府主官梁中书往汴梁给蔡京送寿礼,取的便是济州境内的近道。“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

^① 《中国运河文化史》66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

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第十六回中杨志所说无水路，乃作者施耐庵对此宋地理研究不深所致；旱路所经多处有强人出没。晁盖后来劫取生辰纲，就是在济州境内的黄泥冈下的手。

劫生辰纲的主谋晁盖是东溪村保正，吴用则在东溪村南五六里的一个小村教书为生，第十四回写刘唐从晁盖村里，“挺着朴刀，赶了五六里路，却早望见雷横引着土兵，慢慢地行将去不远”，二人在路上相斗，吴用从村里出来劝开。吴用“祖贯本乡人氏”，他向晁盖推荐的“阮氏三雄”则在梁山泊捕鱼为生，“弟兄三个，在济州梁山泊边石碣村住，日常只打鱼为生。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加上公孙胜和白胜，七个人取齐后去取生辰纲。

黄泥冈离济州城不过几十里路。后来白胜事发，连带出晁盖，晁盖接到宋江报信，与吴用合计先“奔石碣村三阮家里去”，因为从石碣村“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里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儿看他。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晁盖、吴用选择梁山泊为藏身之地，地近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梁山泊地势险要，而且当时北方官府一般没有水军水捕。正如第十九回济州何观察手下众公差所说：“若说这个石碣村湖荡，紧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荡荡芦苇水港。若不得大队官军，舟船人马，谁敢去那里捕捉贼人。”何观察及步其后尘的黄团练前去追捕晁盖、剿灭梁山，都是带的步兵，何观察的“五百官兵人马”，来到碣石村“但见河埠有船，尽数夺了，便使会水的官兵且下船里进发。岸上人马，船骑相迎，水陆并进”。在旱鸭子中挑会水的驾船，不会水的在岸上配合，结果是乘船官兵全部葬身水泊。济州府尹派团练使黄安，“并本府捕盗官一员，带领一千余人，拘刷本处船只，就石碣村湖荡调拨，分开船只，作两路来取泊子”。这支队伍到了湖边，也是临时“拘刷”船只，上了船便展开进剿，当然败得更惨。后来，高俅所派呼延灼、蔡京所派关胜所率剿梁山军都是马步军，在进攻水泊之前就被宋江

收降过去。再后来，童贯引“东京管下八路军州，各起军一万”，进剿梁山泊大败而回，高俅才向徽宗进言：“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非仗舟船，不能前进。臣乞圣旨，于梁山泊近处，采伐木植，命督工匠造船，或用官钱收买民船，以为战伐之用。”由此可见，北方无现成水军可用是真情。

所以晁盖、宋江等人，包括后来放弃原有陆地山寨入伙梁山泊的鲁智深、朱武等人，正是看到了梁山泊进可四面出击、退可保守一洼的无比优越性，这才纷纷上梁山聚义。到了徽宗晚年，这里成了当时势力最大的贼寇，与“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并列令徽宗头疼“四大寇”。

晁盖当上梁山泊首领，特别是宋江上山后，梁山义军活动区域日渐扩大。第四十回晁盖决策，亲率众人到江州劫法场救宋江，那就不是为财兴兵，而是带有与北宋王朝作对头的政治色彩。“众多好汉得了将令，各各拴束行头，连夜下山，望江州来，不在话下。”梁山泊在黄河末梢，江州在长江中游，两地相距千余里，此行带有冒险性。但晁盖为救宋江在所不顾，此时梁山聚义的农民起义性质最明显。宋江领兵，作战区域越来越大，一打祝家庄，在郓城县北部，“此间离梁山泊不远，地方较近”。（祝家庄店小二语）二打高唐州，已在郓城之外；三打青州，与梁山泊间州隔县；四打华州，由黄河下游出击黄河上游以远，五打大名府，远出齐鲁地界，深入到河北腹地；六打曾头市，地在“凌州西南”，把梁山军威远播四面八方。

三 梁山军北上伐辽

宋江受朝廷招安，梁山军成了北宋统治者的御用武力，北上抗辽还是正义的，反映了北方运河文化。梁山军在陈桥驿接受了北上抗辽的诏令，“再说宋江传令诸军，便与军师吴用计议，将军马分作二起进程。令五虎八彪将，引军先行，十骠骑将在后。宋江、卢

俊义、吴用、公孙胜，统领中军。水军头领三阮、李俊、张横、张顺，带领童威、童猛、孟康、王定六并水手头目人等，撑驾战船，自蔡河内出黄河，投北进发。”（第八十三回）北上抗辽，是水陆分进。其中水军是取蔡河入黄河，出黄河投北进发。蔡河为唐代李荃所开运河，因为通蔡州，所以当时称蔡河。蔡河上游的闵河，宋太祖改称惠民河，经新郑县达开封。而在黄河投北，则需取道御河。今人安作璋考证说：“御河是宋代通往河北地区的一条主要水上运输通道，其河道为隋唐所开之永济渠，御河之名亦是宋代沿袭前代所称。北宋时期的御河河道与唐代大体相同，即由卫州（今河南淇县东之卫贤镇）起，东北经内黄县、洹水、馆陶、永济，过将陵（今山东德州）而北至清池 30 里入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北合潮河（约今海河）入海，并由此溯易水、拒马、滹沱诸河道，可通至河北沿边州军，是北宋时期为‘蓟燕漕运计’的一条重要运路。”^①不过，乾宁军离宋江伐辽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檀州还有一定距离，所以宋江水军晚于马步兵到达前线三五天，第八十三回写道：

宋江引兵在城下，一连打了三五日，不能取胜。再引军马回密云县屯住。帐中坐下，计议破城之策。只见戴宗报来，取水军头领，乘驾战船，都到潞水。宋江便唤李俊等到中军商议，着戴宗传令下去。李俊等都到密云县中，帐前参见宋江。宋江道：“今次厮杀，不比在梁山泊时，可要先探水势深浅，然后方可进兵。我看这条潞水，水势甚急，倘或一失，难以救应。尔等可宜仔细，不可托大。将船只盖伏的好着，只扮作运粮船相似。你等头领各带暗器，潜伏于船内。止着三五人撑驾摇橹，岸上着两人牵拽，一步步捱到城下，把船泊在两岸，待我这里进兵。城中知道，必开水门来抢粮船。尔等伏兵却起，夺他

① 《中国运河文化史》667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

水门，可成大功。”

宋江给水军的任务是运粮诱敌。后来辽檀州守将洞仙果然中计，“番兵报洞仙侍郎道：‘潞水河内有五七百只粮船泊在两岸。远远处又有军马来也。’洞仙侍郎听了道：‘那蛮子不识俺的水路，错把粮船直行到这里。岸上人马一定是来寻粮船。’便差三员番将楚明玉、曹明济、咬儿惟康前来分付道：‘那宋江等蛮子，今晚又调许多人马来也。却有若干粮船在俺河里。可教咬儿惟康引一千军马出城冲突，却教楚明玉、曹明济开放水门，从紧溜里放船出去，三停之内，截他二停粮船也好，便是汝等干大功也。’”结果咬儿惟康的骑兵被李逵等堵在城里，楚明玉、曹明济从水门出击，被梁山泊水军将士从水门反攻进城，取了檀州。

第二节 方腊割据江南和宋江平方腊

方腊起义史有其事，其起义规模不小于宋江。方腊，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人。方腊家有漆园，造作局官员经常去他家敲诈勒索，方腊忍无可忍。他利用秘密宗教活动，组织农民准备起义，并于宣和二年（1120）在他家漆园召集骨干紧急动员，号召大家揭竿起义，打击贪官污吏，推翻宋王朝。当即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响应。方腊自称为“圣公”，建元永乐，设官封将，建立了政权。起义队伍迅速从千余人发展到近万人，并攻占了青溪县城，接着又趁势攻下了睦州州治建德城与睦州所属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一个多月后占据了杭州。这时，东南州都纷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水浒传》第九十回描写方腊势力道：“却说这江南方腊起义已久，即渐而成，不想弄到许大事业。此人原是歙州山中樵夫，因去溪边净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冠，身穿袞龙袍，以此向人道他有天子福分，因而造反。就清溪县内帮源洞中，起造宝殿、内苑、宫



阙，睦州、歙州亦各有行宫；仍设文武职，台省院官，也内相外将，一应大臣。睦州即今时建德，宋改为严州；歙州即今时婺源，宋改为徽州。这方腊直从这里占到润州，今镇江是也。共该八州二十五县。那八州：歙州、睦州、杭州、苏州、常州、湖州、宣州、润州。那二十五县都是这八州管下，此时嘉兴、松江、崇德、海宁，皆是县治。方腊自为国主，仍设三省六部台院等官，非同小可，不比啸聚山林之辈。”将方腊事业往大处夸张，是为了反衬宋江平方腊的不易。

宋史所载与小说平方腊大相径庭，“徽宗始大惊，亟遣童贯、谭稹为宣抚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以东，且谕贯使作诏罢应奉局。三年正月，腊将方七佛引众六万攻秀州，统军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军至，合击贼，斩首九千，筑京观五，贼还据杭。二月，贯、稹前锋至清河堰，水陆并进，腊复焚官舍、府库、民居，乃宵遁。诸将刘延庆、王禀、王涣、杨惟忠、辛兴宗相继至，尽复所失城。四月，生擒腊及妻邵、子毫二太子、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四年三月，余党悉平。”^①方腊将领方七佛引众六万攻秀州，童贯率征讨大军合围而来，与守城军里应外合击溃方腊军，然后一路追杀，灭了方腊。

而小说写他的势力直达润州，正待过江谋取扬州，宋江率梁山征辽得胜之军挫败其谋，然后过江沿运河渐次推进，经数番苦战，付出重大牺牲才平定了方腊。施耐庵这样写目的大概在于反衬宋江被招安后替天行道的气大势弘，突出其挽狂澜于既倒的盖世奇功。

若按小说所写，方腊尽得江南运河流域，那么“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十万，多出东南”的北宋王朝财赋的多半已经丧失，如果说宋江啸聚梁山是腹心之患，那么方腊割据江南就是咽喉梗阻。徽宗“已命张招讨、刘光世征进，未见次第”。也就是说

^① 《宋史》10576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张、刘尚未有进展。倒是宿太尉对利害看得真切，再次以梁山军为救命稻草向徽宗进言：“想此草寇，既成大患，陛下已遣张总兵、刘都督，再差破辽得胜宋先锋，这两支军马为前部，可去剿除，必干大功。”于是才有宋江平方腊之举。

宋江平方腊，反映了宋代运河文化。从汴梁向江南进兵，行军路线基本是沿汴河下淮扬运河，同时“将军马分作五起，取旱路投扬州来。”马步军所行旱路，当是“隋堤”即汴河和淮扬运河的大堤；“水军头领已把战船从泗水入淮河，望淮安军坝，俱到扬州取齐。”进兵方略是先取润州，在江南获得一个跳板，然后沿江南运河自北而南依次攻城。宋江马步军在淮安小停，“前军已到淮安县屯扎。当有本州官员，置筵设席，等接宋先锋到来，请进城中管待。诉说：‘方腊贼兵浩大，不可轻敌。前面便是扬子大江，九千三百余里，奔流入海，此是江南第一险隘去处。隔江却是润州，如今是方腊手下枢密吕师囊并十二个统制官守把住江岸。若不得润州为家，难以抵敌。’宋江听了，便请军师吴用计较良策：‘即目前面大江拦截，作何可渡？破辽国时，都是旱路，水军头领不曾建的功劳。今次要渡江南，须用水军船只向前。’吴用道：‘扬子江中，有金、焦二山，靠着润州城郭。可叫几个弟兄前去探路，打听隔江消息；用何船只，可以渡江？’”宋江授计四位水军头领过江去润州侦察敌情。

当时，方腊的润州江防前线，有枢密使吕师囊并十二个统制官，统领着五万南兵，宋江大军到达扬州之前，他已经策反了宋管区扬州城外定浦村的陈将士。陈将士“人有数千，马有百十余匹。嫡亲有两个孩儿，好生了得。长子陈益，次子陈泰。”陈将士派人到江南，取得“号色旌旗三百面，并主人陈将士官诰，封做扬州府尹，正授中明大夫名爵。更有号衣一千领，及吕枢密紬付一道。”方貌要陈将士先到润州向方腊献粮，然后引吕师囊过江袭取扬州。陈将士所派之人过江时连同物品被张横截获，宋江、吴用于是将计就计，首先派人假扮方腊使者里应外合斩了陈将士，“里面燕青、解

珍、解宝，早提出陈将士父子首级来。庄门外又早一彪人马官军到来。为首六员将佐。那六员？美髯公朱全、急先锋索超、没羽箭张清、混世魔王樊瑞、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当下六员首将，引一千军马，围住庄院。把陈将士一家老幼，尽皆杀了”。然后着将士穿江南号衣，打江南旗号，冒充陈将士献粮队伍过江袭取润州，“三百只船内，埋伏二万余人”，“大小正偏将佐，共计四十二员渡江”。袭取润州一举成功：

却说那三百只船上人，见半日没些动静。左边一百只船上张横、张顺，带八个偏将，提军器上岸；右边一百只船上十员正将，都拿了枪刀，钻上岸来。守江面南军，拦挡不住。黑旋风李逵和解珍、解宝，便抢入城。守门官军急出拦截，李逵轮起双斧，一砍一剁，早杀翻两个把门军官。城边发起喊来，解珍、解宝各挺钢叉入城，都一时发作，那里关得城门迭？李逵横身在门底下，寻人砍杀；先在城边二十个偏将，各夺了军器，就杀起来。吕枢密急使人传令来，教牢守江面时，城门边已自杀入城了。

宋江在江南获得继续进兵的桥头堡，又粉碎了三大王方貌所派兵马“恢复润州”的反扑，夺得丹徒，然后与卢俊义各领一路人马向南进兵：东路宋江进取苏州、常州，西路卢俊义进取宣州、湖州。苏常二州是江南运河重镇，宋江马步军沿运河从陆路先取常州，常州城守将金节献了西门，“那时百姓都被方腊残害不过，怨气冲天。听得宋军入城，尽出来助战。城上早竖起宋先锋旗号”。宋江得了常州，乘胜追击，直抵苏州城下。

宋江取苏州全靠水军出奇制胜。水军原来另有作战任务，李俊前来告捷，就如何攻取苏州，宋江问计于李俊，李俊自告奋勇说：“此城正南上相近太湖，兄弟欲得备舟一只，投宜兴小港，私入太湖里去，出吴江，探听南边消息，然后可以进兵，四面夹攻，方可得

破。”李俊在深入苏州后方侦察时结识当地绿林好汉，并侦察到“平望镇上，有十数只递运船只，船尾上都插着黄旗，旗上写着：‘承造王府衣甲’，眼见的是杭州解来的。每只船上，只有五七人。”并与费保等定计夜袭平望镇船队，“捉得两个为头的来问时，原来是守把杭州方腊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手下库官，特奉令旨，押送新造完铁甲三千副，解赴苏州三大王方貌处交割”。李俊将此情报知宋江，然后按照军师吴用的安排，“引着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四个，……到第三日，众人商议定了，费保扮做解衣甲正库官，倪云扮做副使，都穿了南官的号衣。将带了一应关防文书。众渔人都装做官船上稍公水手。却藏黑旋风等二百余人将校在船舱里”。这样赚开了苏州南门，李逵、鲍旭、项充、李衮从船舱里钻出来。南军那五百军人都走了。船里众好汉并牌手二百余人，一齐上岸，便放起火来。“宋江已调三路军将取城。宋兵人马杀入城来。南军漫散，各自逃生。”

宋江攻取杭州，深得奇正相成之妙。“杭州城郭阔远，人烟稠密。东北旱路，南面大江，西面是湖。乃是方腊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守把。部下有七万余军马，二十四员战将，四个元帅，共是二十八员。”宋江军马先从北面兵临杭州城下，并在北门、西门、东门发动试探性进攻，挫动方腊军锐气。西路卢俊义进兵宣、湖二州，连连得手，“一面进兵攻取德清县，到杭州会合”。至此，形成东西两路会攻杭州的态势。卢俊义率军经过苦战，夺得杭州南面的独松关，迂回至杭州南门。宋江正面攻城，攻守互有伤亡。夺取杭州的战机出现在城南，解珍侦察到杭州城南门外二十余里，范村江边泊着一连有数十只船。原来是富阳县来杭州的解粮船。宋江、吴用故伎重演，派精锐将士扮作富阳解粮民丁，“众将人等都杂在梢公水手人内，混同搬粮运米入城。三个女将也随入城里去了”。里应外合取了杭州。

平方腊的最后一战，是攻取方腊老巢睦州和歙州。睦州在今浙江淳安县，宋江一路军马水陆并进，“水军头领正偏将佐七员，部



领船只，随军征进睦州”，“取路沿江望富阳县进发”。恶战得过乌龙岭，与童贯合攻睦州得手，在进攻方腊老巢青溪县时受挫。此时卢俊义一路“度过昱岭关之后，催兵直赶到歙州城下”，攻城得手，形成会攻青溪的形势。

杭州进兵前，宋江已派“柴进与燕青去做细作”，现今又安排“水军头领李俊等，就将船内粮米，去诈献投降”。“方腊坦然不疑，加封李俊为水军都总管之职，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皆封水寨副总管，且教只在清溪管领水寨守船。”李俊等趁方腊出城与宋江对阵，在青溪县城杀将起来，“只听得大内城中喊起连天，火光遍满，兵马交加。却是李俊、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在清溪城里放起火来。方腊见了，大驱御林军马，来救城中，入城混战。宋江军马见南兵退去，随后追杀。赶到清溪，见城中火起，知有李俊等在彼行事。急令众将，招起军马，分头杀将入去。此时卢先锋军马也过山了，两下接应，却好凑着。四面宋兵，夹攻清溪大内。宋江等诸将，四面八方，杀将入去。各各自去搜捉南军，打破了清溪城郭”。宋江里应外合计策奏效。

方腊占据江南运河水乡，尽得地利；八州各处兵力不下二十万，良将数十员，之所以在宋江进攻下顷刻灭亡，从军事上讲主要是没有集中兵力，被宋江各个击破。宋江平方腊回军时，“军马渡江，十存二三”，生还诸将“共计二十七员”，将士歿于江南之役者十分七八，可见战事惨烈。而《宋史》卷四百六十八所记童贯平方腊相当简略，二者相比，《水浒传》虚构的宋江平方腊月之役要生动曲折得多。

第三节 作品中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一 北宋水运和运河

杨志在黄河河道上失事。第十二回杨志被王伦请上梁山，他

对山上头领诉说道：“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年纪小时，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因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不想洒家时乖运蹇，押着那花石纲来到黄河里，遭风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纲，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处避难。”宋徽宗以朱勔为使，从太湖一带挑选奇花异石，编成船队运到汴梁；花石纲从江南搜刮起运，正常的运输路线是沿江南运河北上，过长江后走淮扬运河，在盱眙转进汴河，可以不经黄河至汴梁。元代黄河南流，运河在淮安即进入黄河河道，到汴梁才需要逆黄河西上数百里。《水浒传》这回书写杨志押运花石纲在黄河失事，可能是对宋代运河把握不准，因元代事而言之。

宿太尉沿漕运水路到西岳降香。第五十九回写宿太尉从汴梁到西岳华山进香，被宋江截获利用。当时宋江率军到华州解救鲁智深、史进，正为华州城池坚固发愁，“忽有一人上山来报道：‘如今朝廷差个殿司太尉，将领御赐金铃吊挂来西狱降香，从黄河入渭河而来。’吴用听了，便道：‘哥哥休忧，计在这里了。’”宿太尉是京官，往西岳降香必然沿汴河西上至河阴入黄河，然后由黄河入渭河。唐代的漕运就是这样的，宋代汴梁以西漕运虽然日渐衰微，但线路还是通的。吴用得到宿太尉要来的消息，当即安排“宋江、李应、朱仝、呼延灼、花荣、秦明、徐宁，共八个人，悄悄止带五百余人下山，径到渭河渡口，李俊、张顺、杨春已夺下一十余只大船在彼。吴用便教花荣、秦明、徐宁、呼延灼四个埋伏在岸上；宋江、吴用、朱仝、李应下在船里；李俊、张顺、杨春把船都去滩头藏了。众人等候了一夜”。次日成功迫使宿太尉一行让出官船、官服、印信和文书，由梁山将士假扮降香一行，赚华州守将出城，随后袭取了华州。

高太尉府可能背靠运河。北宋汴梁城中有金水河、蔡河、汴



河、广济河四水穿过，这些河都不同程度担负漕运任务。《水浒传》第八十一回写燕青、戴宗二人前往接应潜入高俅府中的乐和、萧让，“且说燕青、戴宗两个，就街上买了两条粗索，藏在身边。先去高太尉府后看了落脚处。原来离府后是条河，河边却有两只空船缆着，离岸不远”。北宋高官居京城，多临水选宅。如杨业在金沙滩舍命救太宗，太宗返回东京开封后，对杨业父子重加赏赐，敕建杨府于天波门内、金水河畔。高俅作为宋徽宗宠臣，府后紧靠“四渠”之一，符合北宋传统。

二 运河自然和人文景观

金山、焦山。江南运河在润州附近入江，淮扬运河在扬州附近入江，运河江口金、焦二山景色壮观。第九十一回写道：“九千三百里扬子大江，远接三江，却是汉阳江、浔阳江、扬子江。从四川直至大海，中间通着多少去处，以此呼为万里长江。地分吴、楚，江心内有两座山：一座唤做金山，一座唤做焦山。金山上有一座寺，绕山起盖，谓之寺裹山；焦山上一座寺，藏在山凹里，不见形势，谓之山裹寺。这两座山，生在江中，正占着楚尾吴头，一边是淮东扬州，一边是浙西润州，今时镇江是也。”张顺奉宋江命到江边侦察，望见江心里的金山寺“江吞鳌背，山耸龙鳞。烂银盘涌出青螺，软翠帷远拖素练。遥观金殿，受八面之天风；远望钟楼，倚千层之石壁。梵塔高侵沧海日，讲堂低映碧波云。无边阁，看万里征帆；飞步亭，纳一天爽气。郭璞墓中龙吐浪，金山寺里鬼移灯”景色，萌发了夜探金山的想法。

浩渺太湖。太湖是江南运河的水柜，运河靠它调剂水量，吐纳丰歉。第九十三回写宋江取苏州，只因苏州城“城池四面是水，无路可攻；舟船港狭，难以进敌”，便派水军头领去苏州南面太湖上看城，“李俊带了童威、童猛，驾起一叶扁舟，两个水手摇橹，五个人径奔宜兴小港里去，盘旋直入太湖中来。看那太湖时，果然水天空

阔，万顷一碧。但见：天连远水，水接遥天。高低水影无尘，上下天光一色。双双野鹭飞来，点破碧琉璃；两两轻鸥惊起，冲开青翡翠。春光淡荡，溶溶波皱鱼鳞；夏雨滂沱，滚滚浪翻银屋。秋蟾皎洁，金蛇游走波澜；冬雪纷飞，玉洞弥漫天地。混沌凿开元气窟，冯夷独占水晶宫。仙子时时飞宝剑，圣僧夜夜伏骊龙。”太湖美景让人叹为观止。

杭州与西湖。杭州地在江南运河末端，浙东运河发端；西湖为运河水柜，对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起调节水量的作用。第九十四回写张顺到西湖上侦察杭州城防，“当晚张顺身边藏了一把蓼叶尖刀，饱吃了一顿酒食，来到西湖岸边，看见那三面青山，一湖绿水，远望城郭，四座禁门，临着湖岸。那四座门？钱塘门、涌金门、清波门、钱湖门。看官听说：那时西湖不比南渡以后，安排得十分的富贵。盖为金、宋二国讲和罢战休兵，天下太平，皇帝建都之地，如何不富盛。西湖上排着数十处游赏去处。那时三面青山，景物非常，画船酒馆，水阁凉亭，其实好看”。这是忙里偷闲于战争间隙写西湖自然美景。

第九十五回写宋江到西陵桥祭奠张顺，又穿插描写道：“有一万顷碧澄澄掩映琉璃，列三千面青娜娜参差翡翠。春风湖上，艳桃秾李如描；夏日池中，绿盖红莲似画。秋云涵茹，看南园嫩菊堆金；冬雪纷飞，观北岭寒梅破玉。九里松青烟细细，六桥水碧响泠泠。晓霞连映三天竺，暮云深锁二高峰。风生在猿呼洞口，雨飞来龙井山头。三贤堂畔，一条鳌背侵天；四圣观前，百丈祥云缭绕。苏公堤，东坡古迹；孤山路，和靖旧居。访友客投灵隐去，簪花人逐净慈来。平昔只闻三岛远，岂知湖上胜蓬莱！”用韵文描写西湖胜景，出神入化；“方腊占据时，东有菜市门，荐桥门；南有候潮门，嘉会门；西有钱湖门，清波门，涌金门，钱塘门；北有北关门，艮山门。城子方圆八十里。果然杭州城郭非常，风景胜绝”。用散文描写杭州的雄壮，形象如画。

三 运河重镇风采

繁华汴京。第七十二回宋江、柴进到东京寻找招安门路，中间穿插一段韵文描写城市繁华：“州名汴水，府号开封。逶迤接吴楚之邦，延亘连齐鲁之地。周公建国，毕公阜改作京师；两晋春秋，梁惠王称为魏国。层叠卧牛之势，按上界戊己中央；崔嵬伏虎之形，像周天二十八宿。王尧九让华夷，太宗一迁基业。元宵景致，鳌山排万盏华灯；夜月楼台，风辇降三山琼岛。金明池上三春柳，小苑城边四季花。十万里鱼龙变化之乡，四百座军州辐辏之地。黎庶尽歌丰稔曲，娇娥齐唱太平词。坐香车佳人仕女，荡金鞭公子王孙。天街上尽列珠玑，小巷内遍盈罗绮，霏霏祥云笼紫阁，融融瑞气罩楼台。”并以宋江等人视觉，展示市井的富丽，“东京果是天下第一国都，繁华富贵，出在道君皇帝之时。……正是：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四个转过御街，见两行都是烟月牌。来到中间，见一家外悬青布幕，里挂斑竹帘，两边尽是碧纱窗，外挂两面牌，牌上各有五个字，写道：‘歌舞神仙女，风流花月魁’”。宋江此次入京，与徽宗姘头李师师拉上了关系，为日后燕青在李师师处向徽宗面陈梁山招安意向作了铺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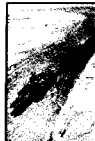
富丽大名府。宋仁宗时以河北大名府为北京，此城近邻隋唐所开永济渠，是个商贾辐凑之地。第六十六回写道：“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头一个大郡，冲要去处。却有诸路买卖，云屯雾集，只听放灯，都来赶趁。在城坊隅巷陌，该管厢官每日点视，只得装扮社火。豪富之家，各自去赛花灯，远者三二百里去买，近者也过百十里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将灯到城货卖。家家门前扎起灯棚。都要赛挂好灯，巧样烟火。户内缚起山棚，摆放五色屏风炮灯，四边都挂名人画片并奇异古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都要点灯。大名府留守司州桥边搭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红黄纸龙两条，每片鳞甲上点灯一盏，口喷净水。去州桥河内周围上下，点灯不计其

数。铜佛寺前札起一座鳌山，上面盘青龙一条，周围也有千百盏花灯。翠云楼前也札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着一条白龙，四面灯火不计其数。原来这座酒楼，名贯河北，号为第一。上有三滴水，雕梁绣柱，极是造得好。楼上楼下，有百十处阁子。终朝鼓乐喧天，每日笙歌聒耳。城中各处宫观寺院佛殿法堂中，各设灯火，庆赏丰年。三瓦两舍，更不必说。”只因梁中书决策在梁山军撤围间歇元宵放灯，被梁山细作混入城内，里应外合取了城池。

四 运河流域风物民情

正月十五元宵放灯。北宋京城，有元宵观灯习俗。第七十二回写及“今上大张灯火，与民同乐，庆赏元宵。自冬至后，便造起灯，至今才完。我如今要和几个兄弟，私去看灯一遭便回。”这是虚写，耳听；“当日黄昏，明月从东而起，天上并无云翳。宋江、柴进扮作闲凉官，戴宗扮作承局，燕青扮为小闲，只留李逵看房。四个人杂在社火队里，取路哄入封丘门来，遍玩六街三市，果然夜暖风和，正好游戏。转过马行街来，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照耀如同白日”。这方是眼见，实写。

七月十五日盂兰盆大斋节。沧州地近隋唐所开永济渠，是北宋河北运河重镇。第五十一回朱仝被“刺配沧州牢城”，深得小衙内欢喜，“时过半月之后，便是七月十五日盂兰盆大斋之日。年例各处点放河灯，修设好事。当日天晚，堂里侍婢奴子叫道：‘朱都头，小衙内今夜要去看河灯。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仝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内穿一领绿纱衫儿，头上角儿拴两条珠子头须，从里面走出来。朱仝托在肩头上，转出府衙内前来，望地藏寺里去看点放河灯。那时恰才是初更时分。但见：钟声杳霭，幡影招摇。炉中焚百和名香，盘内贮诸般素食。僧持金杵，诵真言荐拔幽魂。人列银钱，挂孝服超升滞魄。合堂功德，画阴司八难三涂。绕寺庄严，列地狱四生六道。杨柳枝头分净水，莲花池内放明灯。



当时朱全肩背着小衙内，绕寺看了一遭，却来水陆堂放生池边看放河灯。那小衙内爬在栏干上，看了笑耍。”七月十五日是一个佛教吉日，当晚放河灯的目的是修设好事。沧州在北宋不算大州，但当夜不仅地藏寺内放灯，水陆放生池也放河灯。

第四节 作者生活阅历与小说情节

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兴化旧称阳山，境内河流纵横，湖荡众多，素有“水乡泽国”、“水泊阳山”之称。传说施耐庵是“舟人之子”，靠苦学 19 岁中秀才，30 岁上下中举人，其后曾到北京参加科举，落第后在郓城做训导，其间曾考察水浒和黄泥冈遗址；后到杭州为官两载、行商多年，最后隐居苏州，埋头创作《水浒传》。可以说他一生主要生活在运河流域，其生活阅历与《水浒传》所写运河人事息息相关。

一 兴化打虎传说与《水浒传》的打虎故事

施耐庵家乡便仓、白驹一带地处海滨，却有猛虎出没。施耐庵的表弟卞元亨赤手空拳打死猛虎，在盐城、兴化一带传为佳话。《卞氏宗谱》附载内阁中书宋曹《元（亨）将军传》则生动具体地记载了元亨打虎的情形：“东海尝出猛虎，路绝来往。公怒曰：‘昔周处父射虎杀蛟，以除民害，吾当效之！’人以为狂。公独往，无寸械，适虎当振威，公从容近之，以蹴其额，虎立毙。其豪迈如此。”^①这很可能成为《水浒传》写打虎故事的原型。《水浒传》所写打虎英雄，一是武松，二是李逵。武松打虎或李逵打虎虽俱可能有话本为据，但这并不妨碍施耐庵以表弟打虎故事，充实其故事情节。

^① 黄俦成《施耐庵与〈水浒〉》3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版。

二 张荣得胜湖大捷与晁盖石碣村败何涛

北宋末年,金兵沿淮扬运河南下,梁山余部张荣曾在施耐庵家乡兴化的缩头湖大败金兵。“得胜湖距兴化东城十八里,今东西长约十二里,南北约宽六七里(宋代湖面当比现在宽阔得多)。城、湖之间数万亩地本为沼泽、芦苇荡。”^①《续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九载宋江残部张荣曾在得胜湖(战前称缩头湖)大胜金人:“先是张荣在通州,以地势不利,乃引舟入缩头湖,作水寨以守。金右监军昌在泰州,谋久驻之计,至是以舟师攻荣水寨。荣亦出数十舟载兵迎敌,望金人战舰在前,荣惶遽,欲退不可,徐谓其众曰:‘无虑也!金人止有数舰在前,余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能登岸,我舍舟而陆,击之可尽。’遂弃舟登岸,大呼而杀之。金人不能骋,舟中自乱,溺水陷淖者不可胜计。昌收余众二千奔楚州,荣获昌子婿佛宁,俘馘甚众。荣自京东来,未尝承王命,遂无路告捷,闻光世在镇江,乃遣人愿听节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荣知泰州。”^②施耐庵少年长于兴化,当听到不少此类传说,这些传说成为《水浒传》中晁盖等人大败何涛于石碣村的故事原型。请看《水浒传》第十九回所写:

原来都是一丛小船,两只家帮住,上面满满堆着芦苇柴草,刮刮杂杂烧着,乘着顺风直冲将来。那四五十只官船,屯塞做一块。港汊又狭,又没回避处。那头等大船也有十数只,却被他火船推来,钻在大船队里一烧。水底下原来又有人扶助着船烧将来,烧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来逃命奔走。不想四边尽是芦苇野港,又没旱路。只见岸上芦苇又刮刮杂杂也烧将起来,那捕盗官兵两头没处走。风又紧,火又猛,众官兵只得钻去,都奔烂泥里立地。火光丛中,只见一只小快船,船

① 黄叔成:《施耐庵与〈水浒〉》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② 《续资治通鉴》2881—2882页,中华书局1957年8月第1版。

尾上一个摇着船，船头上坐着一个先生，手里明晃晃拿着一口宝剑，口里喝道：“休教走了一个！”众兵都在烂泥里，只得忍气。说犹未了，只见芦苇东岸两个人，引着四五个打鱼的，都手里明晃晃拿着刀枪走来；这边芦苇西岸，又是两个人，也引着四五个打鱼的，手里也明晃晃拿着飞鱼钩走来。东西两岸四个好汉，并这伙人，一齐动手，排头儿搠将来。无移时，把许多官兵都搠死在烂泥里。

几乎是得胜湖大败金人的翻版，只不过写得更为形象生动罢了。

施耐庵中年有幸在杭州生活数年，一方面接触都市社会，另一方面在杭州广泛收集水浒话本和戏剧，为创作《水浒传》做准备。“施耐庵在杭州做‘官’仅二年而已，更长的时间是经商。他的友人钟嗣成记：‘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①这时期他的生活阅历，反映在《水浒传》中就是杭州城防和集市的出色描写：“刘唐要夺头功，一骑马，一把刀，直抢入城去。城上看见刘唐飞马奔来，一斧砍断绳索，坠下闸板。可怜悍勇刘唐，连马和人，同死于门下。原来杭州城子，乃钱王建都，制立三重门关。外一重闸板，中间两扇铁叶大门，里面又是一层排栅门。刘唐抢到城门下，上面早放下闸板来，两边又有埋伏军兵。刘唐如何不死！”虽是以明初所见想象北宋，但若对杭州不熟，如何写得这般逼真生动、惊心动魄。“正将朱全等，原拨五千马步军兵，从汤镇路上村中，奔到菜市门外，攻取东门。那时东路沿江都是人家，村居道店赛过城中，茫茫荡荡，田园地段。”（第九十五回）城外尚且如此繁华，何况城内。

《水浒传》中有许多集市场面描写，如第六十一回写吴用带李逵去大名府赚卢俊义：“吴用、李逵两个，摇摇摆摆，却好来到城门下。守门的左右约有四五十军士，簇捧着一个把门的官人在那里

① 《施耐庵与〈水浒〉》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坐定。吴用向前施礼。军士问道：‘秀才那里来？’吴用答道：‘小生姓张名用，这个道童姓李，江湖上卖卦营生。今来大郡与人讲命。’身边取出假文引，交军士看了。众人道：‘这个道童的鸟眼，恰像贼一般看人。’李逵听道，正待要发作，吴用慌忙把头来摇。李逵便低了头。吴用向前与把门军士陪话道：‘小生一言难尽！这个道童又聋又哑，只有一分蛮气力。却是家生的孩儿，没奈何带他出来。这厮不省人事，望乞恕罪！’辞了便行。李逵跟在背后，脚高步低，望市心里来。……北京城内小儿，约有五六十个，跟着看了笑。却好转到卢员外解库门首，自歌自笑去了。复又回来，小儿们哄动。”如此场景，大概施耐庵在杭州坐地为商时，多曾见识。

四 苏州遭际与《水浒传》所写方腊王朝

苏州是江南运河中部重镇，又是元末反元割据势力张士诚的吴都。施耐庵在杭州完成收集素材后，便隐居苏州创作《水浒传》；《水浒传》创作未完，元末红巾起义爆发，张士诚建立吴国，以苏州为都，欲聘施耐庵为幕僚。“施耐庵经历了这次农民大起义，目睹张士诚的成败得失，也同张士诚的文武部属发生了各种恩怨关系。”^①此等生活阅历和《水浒传》的关系，表现在方腊王朝顷刻瓦解带有张士诚败亡的影子。

张士诚强盛时，南抵绍兴，北逾徐州，国土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但他于天下未定之际不思进取，沉溺酒色，一切朝政都交兄弟张士信、女婿潘元绍，自己只管享乐。“士诚为人，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既据有吴中，吴承平元，户口殷盛，士诚渐奢侈，怠于政事。士信、元绍尤好聚敛，金玉珍宝及古法书名画，无不充牣。日夜歌舞自娱。将帅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战，辄称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甫至军，所载婢妾乐器踵相接不绝，或大会游谈

^① 黄俶成：《施耐庵与〈水浒〉》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之士，樗蒲蹴鞠，皆不以军务为意。及丧师失地还，士诚概置不问。已，复用为将。上下嬉娱，以至于亡。”^①（《明史·张士诚传》）施耐庵亲身经历这些事，并把对士诚兴亡的感慨寄寓于方腊败亡情节中。

细读《水浒传》，便会发现方腊与张士诚之亡有惊人相似之处：张士诚深居简出，听任朱元璋取泰州、淮安、湖州、杭州，最后被困死于苏州；方腊寸步不离青溪宫殿，面对南下宋军无所作为，最后青溪不保，被俘身亡。《水浒传》写了方腊的任人惟亲，除润州前线主帅枢密使吕师囊是异姓外，其他重镇守将都是方腊子弟，镇守苏州的是三弟方貌，被称作三大王；镇守杭州的是方腊长子南安王方天定；镇守歙州的方垕，是方腊的亲叔叔；殿前金吾上将军、内外诸军都招讨是侄子方杰。方腊深居简出，藏在深宫享乐，放弃战役指挥，尤其是没有及时集中兵力决战，致使数十万军队在各驻防地被各个击破。宋江南下平方腊，取润州、取常州、取苏州、取杭州、取秀州、取宣州、取歙州，方腊只呆在他的清溪帮源洞大内，不曾对战事做出任何有价值反应。直到宋军打到睦州大门口，他仍拒绝邓元觉和娄敏中增兵乌龙岭关隘的建议，导致乌龙岭失守，方腊的末日也就到了。宋军“众军将都入正宫，杀尽嫔妃彩女，亲军侍御，皇亲国戚，都掳掠了方腊内宫金帛”。方腊只知困守“财色”，如何不亡。

《水浒传》还写了方腊称王后，横征暴敛，失了民心。第九十五回写解珍解宝在钱塘江上截获方腊的运粮船，押运者哭诉道：“我等皆是大宋良民，累被方腊不时科敛。但有不从者，全家杀害。”“近奉方天定令旨，行下各县，要刷洗村坊，着科敛白粮五万石。老汉为头，敛得五千石，先解来交纳。今到此间，为大军围城厮杀，不敢前去，屯泊在此。”失去民心，所以不得民助。第九十二回写及宋

① 《明史》2448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江军破常州，“百姓被方腊残害不过，怨气冲天，听得宋军入城，尽出来助战……赵毅躲在百姓人家，被百姓捉来献出。应明乱军中杀死，获得首级。宋江来到州治，便出榜安抚，百姓扶老携幼，诣州拜谢”。就是一例。



第九章

《西游记》与运河文化

《西游记》虽然写西天取经故事，但它的作者吴承恩是运河流域人，个别章回直接描写了运河流域人事，部分章回间接取材运河流域人事，因而与运河文化有比较紧密的关系。

第一节 作者生活阅历与小说成书

一 明中叶运河流域的神魔小说家

关于吴承恩生平，目前已出版的“年谱”有三：一是赵景深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二是刘修业的《吴承恩年谱》，三是苏兴的专著《吴承恩年谱》^①。其中“苏谱”晚出，在“刘谱”基础上多有订正充实。

吴承恩(约1504~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典型运河流域小说家，一生除短时间出外做官外，基本生活在运河流域，运河流域的自然、人文景观和社会生活是小说创作的主要素材来源。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而败落为小商人的家庭。先世江苏涟水人，后迁移淮安山阳。曾祖吴铭曾任浙江余姚县学训导，祖父吴贞曾任浙江仁和县学教谕，官都不显。其父吴锐，因家境穷困，以

^① 赵谱见1936年北新书局《小说闲话》书中；刘谱见1958年作家出版社《古典小说戏曲丛考》书中；苏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专著出版。

经营绸布为生；虽身为商人，却喜欢研读群籍，六经诸子百家，莫不观览；为人正派，读史籍，至屈原、伍子胥、诸葛亮、檀道济、岳飞等人事迹，每每感慨流泪。

家庭影响使吴承恩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少小以文名闻于乡里。许多人造门请教，缙绅也常请他代笔为文。吴承恩幼年好奇闻佚事，喜欢偷偷阅读野言稗史，深受民间文学熏陶；并喜读“善模写物情”的唐人传奇作品，对通俗文学很感兴趣。

早年吴承恩曾希望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但却屡试不中，以后补为岁贡生，在乡宦李春芳的“敦谕”下，入京候选，结果愿望落空。迫于家贫母老，很不情愿地当了长兴县丞。不久，因“耻折腰”拂袖而归，后来又一度担任过品级不高的荆府纪善。晚年归居乡里，放浪诗酒，贫老以终。《西游记》创作时期不可确考，一般认为是晚年所作。

吴承恩一生诗、文、词创作数量不少，但因无子嗣，去世后大部分亡佚。后由丘度遍索遗稿，但亦仅“存十一于千百”，编订成《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包括诗一卷，散文三卷，卷四末附小词三十八首。此外有仿唐人牛僧孺《玄怪录》和段成式《酉阳杂俎》而创作的传奇小说集《禹鼎志》，体制不大，仅写十数事，借神话故事批判现实。有词选集《花草新编》，合唐《花间集》及宋《草堂诗余》二集为名，所选上自唐代开元，下迄元代至正年间词。

吴承恩生活的弘治到万历时期，正是明代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政治十分黑暗的时期，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出现，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思想意识开始活跃起来。吴承恩对当时政治的腐败和世风的堕落十分愤慨。他的《二郎搜山图歌》对残害人民的“五鬼”“四凶”，表现了强烈的愤恨，对追捕妖魔的二郎神表示了热情的赞美，呼唤斩邪除妖的英雄人物出现。这些就形成了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



二 唐僧取经故事的演变

《西游记》主体部分的唐僧取经故事，截至吴承恩时代，其发展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真人真事阶段。《旧唐书》玄奘本传，全文如下：

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

高宗在东宫，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经院，内出大幡，敕《九部乐》及京城诸寺幡盖众伎，送玄奘及所翻经像、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显庆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国子博士范义硕、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译。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后以京城人众竞来礼谒，玄奘乃奏请逐静翻译，敕乃移于宜君山故玉华宫。六年卒，时年五十六，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①

从中可以看出：唐太宗贞观初年，和尚玄奘只身一人赴天竺取经，跋山涉水，历尽艰难险阻，至贞观十九年（645），取回梵文佛经 657 部，并在长安进行翻译。玄奘取经所表现出的坚定的信念、顽强的

^① 《旧唐书》3475 页，中华书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令人敬仰；他所身历的种种奇遇和所见异域风光，具有不同寻常的传奇色彩。于是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弟子慧立又写成《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玄奘西行取经事迹。这是一部带有文学色彩的大型传记。作者为了宣传佛教并颂扬师父的宏伟业绩，不免作种种夸张，并插入一些带神话色彩的故事。

二是取经故事在社会上流传，得到通俗文学作者加工、润色阶段。在《独异志》、《大唐新语》等唐人笔记中，取经故事已带有浓厚的神异色彩。宋代取经故事成为“说话”艺术的重要题材。刊印于南宋时期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篇幅约 16000 多字，情节离奇而比较简单，描写也较粗糙，但已初步具备《西游记》故事的轮廓，猴行者取代唐僧而成为取经故事的主角，猴行者化作白衣秀士，神通广大，能降服精怪，有了孙悟空形象的雏形；书中的深沙神则是《西游记》中沙僧的前身。元末明初出现了更加完整生动的《西游记平话》，《永乐大典》第 13139 卷所引《西游记平话》中《梦斩泾河龙》故事，约 1200 字，内容与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回前半部分基本相同；书中已有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的故事，且由“魏征斩龙”过渡，与取经故事连接，在情节结构上也与吴著《西游记》相近；在人物方面，深沙神已演变成沙和尚，出现了黑猪精猪八戒。由宋至明，取经故事在戏剧舞台上也得到搬演。宋元南戏有《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有《唐三藏》，皆佚。元代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亦仅存少量曲文。元末明初则有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和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剧中某些情节与吴承恩《西游记》相似，但孙悟空的形象并不突出，且未脱掉妖气。

三 吴承恩最后写定《西游记》

现存《西游记》最早的版本是《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明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付梓，扉页上没有作者姓名，只有

“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字样，共二十卷一百回。稍后的版本有万历三十一年《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百回，首先在日本内阁文库发现，随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河南省图书馆也见到原本，都没有作者署名。

到了上世纪前叶，鲁迅、胡适考证《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他们的根据主要是天启淮安府志。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载：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①

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载：

吴承恩 《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②

可以说，这是目前所见有关《西游记》作者记载最明确的文献资料，因而鲁迅、胡适据此做出《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的结论毫不牵强。针对上世纪末有人提出“吴作怀疑说”，江苏学者蔡铁鹰出版了《西游记成书研究》一书，指出对《淮安府志》提出疑问固然很重要，但这样的理由假想成分太重，明显地缺乏后续手段。按正常的逻辑推理，要证实吴承恩的《西游记》确系异书，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找到吴承恩同名异书的《西游记》或有关资料，二是考出百回本的真正作者，而目前在这两个问题上都难得出令人比较信服的结论。天启《淮安府志·淮贤文目》的记载，距吴承恩生活的年代不过四十年，应当可信，辅以卷十六《人物志》中的吴承恩小传，便构成了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的主要证据。

① 《〈西游记〉资料汇编》164页，中州书画社1983年7月版。

② 同上，165页。

大部分学者认为《西游记》为吴承恩晚年所作。吴承恩在前代传说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将无支祁传说跟取经故事结合到一起,并熔铸进现实生活的内容,创作出这部规模宏大的杰出神话小说《西游记》。《西游记》改变了原取经故事浓厚的宗教色彩,赋予新的深刻的社会主题;塑造了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理想化的神话人物形象;创造了生动丰富的故事情节,完成了完整宏伟的艺术结构。《西游记》是吴承恩创造性艺术劳动的结晶。

第二节 取材运河流域的几个章回

一 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1. 唐朝定都运河上游和太宗开榜招贤。“陕西大国长安城,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汉以来,三州花似锦,八水绕城流,真个是名胜之邦。方今却是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改元贞观,此时已登极十三年,岁在己巳,天下太平,八方进贡,四海称臣。忽一日太宗登位,聚集文武众官,朝拜礼毕,有魏征丞相出班奏道:‘方今天下太平,八方宁静,武将纷纷,文官少有,微臣欲依古法,开立选场,招取贤士,擢用人材,伏乞圣鉴。’太宗道:‘贤卿所奏有理。’就出一道招贤榜文,颁布天下,各府州县不拘军民人等,但有读书儒流,立志向上,文义明畅,三场精通者,前赴长安应试,考取贤材授官。”^①《西游记》这回书说的科举,虽然是唐朝初期介于选举与科举之间的一次取士,但它为东部运河流域一个读书人提供显身扬名的机会。

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隋唐行科举取士

^① 本章所节录作品原文,出自中华书局 2005 年 4 月版《中国文学四大名著·西游记》。



之道后,开始于战国“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王者与士人之间的关系,由春秋战国的双向选择、互相尊重,完全变成了皇帝单向选择臣下的主奴关系。士人只能别无选择地遵从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学习统治者思想,并以其做为跻身仕途的敲门砖。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科举考试在“学”与“仕”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此榜行至海州地方,那海州弘农县聚贤庄有一人,姓陈名萼,表字光蕊,一日入城见了此榜,即时回家,对母张氏道:“唐王廷颁下黄榜,诏开南省,考取贤才,孩儿意欲前去应试。倘求得一官半职,封妻荫子,光耀门闾,乃儿之志也。特此稟告母亲前去。”张氏道:“我儿,你去赴举,路上须要小心,得了官早早回来。”光蕊便吩咐家僮,收拾行李,即日拜辞母亲上路。不则一日,已到长安,正值大开选场,光蕊就同众举子进场应考。及廷试三策,唐王御笔亲赐状元,跨马游街三日。

不期游到丞相殷开山门首。有丞相所生一女,名唤温娇,又名满堂娇,未曾匹配于人,高结彩楼,抛打绣球。正值陈光蕊在楼下经过,小姐一见光蕊人材出众,况是新科状元,心内十分欢喜,就在绣楼上将绣球抛下,正打着光蕊的乌纱帽。只听得一派笙箫细乐,十数个婢妾走下楼来,把光蕊马头挽住,迎状元入了相府。即请丞相和夫人出堂,唤宾人赞礼,小姐就与光蕊拜了天地。夫妻交拜毕,又拜了岳父、岳母。丞相吩咐安排酒席,欢饮一宵。二人同携素手,共入兰房。

历史上玄奘是洛州偃师人,而小说中把玄奘之父写作海州弘农县人,这样陈萼由家乡进京就要长行水路。按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李渊开国定都长安,因隋代运河之旧,由渭河入黄河,至板渚沿通济渠、山阳渎、江南运河漕运江淮粮食至长安。陈光蕊由海州入长安,理应由通济渠入黄河,由黄河入渭水至长安。

唐时,富贵人家有抛绣球招亲的习俗,也可以算作是对“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一种挑战,因为彩球抛给谁毕竟是由小姐决定的。那陈萼中了状元,又一表人才,当然博得相府千金的青睐。小说这般凑巧,可能是殷丞相事先知道状元公当天跨马经过此地,故遣小女于路旁抛球招亲。不管怎么说,陈萼中状元后入赘相府,因而太宗命他为江州太守,授官较高。陈萼谢恩出朝,同新婚妻子回乡省亲,然后赴江州上任。

小说中的陈萼赴任前先回故乡省亲,再由家乡赴任,“正是暮春天气,和风吹柳绿,细雨点花红。光蕊便道回家,同妻交拜母亲张氏”。他们夫妻所走必为水路,即乘船从渭水下黄河,由黄河入通济渠至淮泗转旱路至海州。陈萼携老母上任,水路取山阳谿南下,至扬州转入长江西下彭蠡湖口。这条水路虽然十分快捷,但充满风险,因为运河水道有船匪水贼。小说中的陈萼就遭遇了不幸:

途路艰苦,甚不可言,晓行夜宿,不觉已到洪江渡口。只见稍水刘洪、李彪二人,撑船到岸迎接。也是光蕊前生合当有此灾难,正撞着这冤家。光蕊令家僮将行李搬上船去,夫妇齐齐上船,刘洪睁眼看时只见殷小姐面如满月,眼似秋波,樱桃小口,绿柳蛮腰,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刘洪陡起狼心,私自与李彪设计,将船撑至没人烟处,候至夜静三更,先将家僮杀死,次将光蕊打死,把尸首都推进水里去了。小姐见他打死了丈夫,也便将身赴水。刘洪一把抱住道:“你若从我,万事皆休;若不从时,一刀两段!”那小姐无奈何,只得权时应承,顺了刘洪。那贼把船渡到南岸,将船付与李彪自管,他就穿了光蕊衣冠,带了官凭,同小姐往江州上任去了。

节录部分所言“洪江渡口”,即今赣江入长江处,江州就在近处。水贼杀夫霸妻,如此残暴,在太宗贞观之治也不免,实在是封建社会一大悲剧。后来殷小姐产下陈萼的遗腹子,背着刘洪将他



放进长江，顺流漂到运河入江口的金山，被金山寺老僧收留养大，“却说此子在木板上，顺水流去，一直流到金山寺脚下停住。那金山寺长老做法明和尚，修真悟道，已得无生妙诀。当日打坐参禅，忽闻得小儿啼哭之声。一时心动，急走到江边观看，只见一片木板上，睡着一个婴儿，长老道：‘善哉！善哉！不知是何人家所弃？出家人慈悲为本，救人一命，胜造浮图。’即将此子取起，见了怀中血书，方知来历。将此子取个乳名，叫做江流，托人抚养，血书紧紧收藏。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其年长一十八岁，长老就叫他削发修行，取法名为玄奘，摩顶受戒，坚心修道”。这玄奘，就是后来的唐僧。

玄奘得知身世，便至江州见母。殷小姐也找借口至金山寺，指点玄奘进京为父报仇，“我再写一封书与你，径到唐王皇城之内，金殿左边殷开山丞相是你外公，你将我的书递与外公，叫外公奏上唐王，统领人马，擒杀此贼，与父报仇，那时才救得老娘的身子出来”。玄奘依计而行，唐王便差殷开山统兵擒拿刘洪，依法惩治；陈萼也由龙王那里活着放还。玄奘随大兵到了长安，“次日早朝，唐王登殿。殷丞相出班，将前后事情，备细启奏一本，并荐光蕊才可大用。唐王准奏，即命升陈萼为学士之职，随朝理政。玄奘立意安禅，送在洪福寺内修行”。玄奘父母的悲剧，十八年后方得昭雪，然后一家团圆，实在是运河客运一大传奇。陈萼，新旧唐书均无传，《旧唐书》玄奘本传也无其父记载，可见《西游记》这回书所写，是虚构。但他浓缩了唐以来进士上任途中的险恶遭遇，因而更能反映运河文化的一个侧面。

二 第十至十二回

长安，隋时叫大兴城，唐朝因以为都，是当时运河流域最繁盛的城市。李渊建立唐王朝，仍定都大兴城，但废除大兴之名，改称长安。在旧大兴城的基础上，加以整修和扩建，成为全国政治、经

济和文化的中心。如此都市，必是藏龙卧虎之地。《西游记》中的袁守诚被写得上知天下知水无所不知的人物；魏征被写得半人半神，能在梦中受玉皇大帝之托监斩龙王。

第十二回写唐僧在长安译经，并被唐王选中去西天取经。“玄奘领旨而出，遂到化生寺里，聚集大小名僧，共计一千二百名，分派上中下三堂，一切佛事，件件皆齐。选定日期，乃是贞观十三年，岁次己巳，九月甲戌，初三日癸卯也。其日系黄道良辰，开坛做七七四十九日水陆大会，演说诸品妙经。”反映了唐代都城佛教的兴盛。玄奘被太宗御赐为御弟法师，佛号三藏，到西天取经。太宗亲临送行，“三藏方待要饮，只见太宗低头，将御指拾一撮尘土，弹入酒中。三藏不解其意。太宗笑道：‘御弟呵，这一去，几时可回？’三藏道：‘只在三年。’太宗道：‘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饮此酒，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三藏方悟捻土之意，复谢恩饮尽，辞谢出关而去”。此描写极富人情味。

第三节 《西游记》反映的运河文化

一 孙悟空形象来源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下)》中说，吴承恩《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是大禹治水时收伏的神猴无支祁。按禹伏无支祁的故事，见唐人李公佐的传奇《古岳渎经》，其主要内容是：

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搜命夔龙，桐柏千君长稽首请命。禹因囚鸿濛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

授之乌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鸱脾桓、木魅、水灵、山妖、石怪、奔号聚绕，以数千载，庚辰以战逐去。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后，皆图此形者，免淮涛风雨之难。^①

大意是：禹治水，到桐柏山三次，刮风打雷，山叫树吼，五伯占据了河川，天老兴兵作乱，不能进行治水。禹生气了，召集了众神仙，处死了夔龙，降伏了桐柏山千君长。禹又关押了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而且活捉了淮河、涡河的水神，名叫无支祁。他善于言谈，对长江、淮河何处水深，何处水浅，全都知道得很清楚，对何处地势高，何处地势低，也了解得很详细。他长得像猿猴，塌鼻子、高额头，一身黑毛，白脑袋瓜，金光闪闪的眼睛，雪白雪白的牙齿。脖子一伸能十丈多长，力气大得超过几只大象，扑捉东西、窜高跳远都十分敏捷，一眨眼、一呼吸之间就无影无踪了。禹派童律去斗他，童律制服不了他；派乌木由去斗他，也没能制服他；最后派了庚辰去，才捉住了他。可是猫头鹰精、木头精、水怪、山妖、石头精成千上万，围着无支祁乱喊乱叫，庚辰把他们打跑了。然后，用大锁链子把无支祁的脖子锁上，穿透了鼻子，带上个金铃铛，把他送到淮南，押在龟山脚下，好让淮河不泛滥，顺利入海。庚辰以后，人们都画他的图像供奉着，免得淮河发大水。

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写了一个齐天大圣：梅岭北坡有一洞，洞中有三怪，一个是通天大圣，一个是弥天大圣，一个是齐天大圣。小妹便是泗洲圣母。其中齐天大圣神通广大，变化多端，能兴妖作法，摄取可意佳人，这里的“齐天大圣”虽是反面人物，但其法力已接近孙悟空。元杂剧《锁齐天大圣》中齐天大圣的念白已有孙悟空气度：

^①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⑥3935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3月版。

广大神通变化，腾云驾雾飞霞。三天神鬼尽皆夸，显辉千般噁咤。不怕天兵神将，被吾活捉活拿。金精闪烁怒增加，三界神祇惧怕。吾神乃齐天大圣是也，我与天地同生，日月并长，神通广大，变化多般。闲游洞府，赏异卉奇花；闲绕清溪，玩青松桧柏。衣飘惨雾，袖拂狂风。轻舒猿臂起春雷，举步频那轰霹雳。天下神鬼尽归降，盖世邪魔闻吾怕。吾神三人，姐妹五个：大哥哥通天大圣，吾神乃齐天大圣，姐姐是龟山水母，妹子铁色猕猴，兄弟是要耍三郎。姐姐龟山水母，因水淹了泗州，损害生灵极多，被释迦如来擒拿住，锁在碧油坛中，不能翻身。我听知的太上老君，炼九转金丹，食之者延年益寿。吾神想来，我摇身一变，化做一个看药炉的仙童，扳倒药炉，先偷去金丹数颗，后去天厨御酒局中，再盗了仙酒数十余瓶，回到花果山水帘洞中，大排宴会，庆赏金丹御酒，岂不乐哉！不怕天符玉帝差，吾身愤怒奋胸怀。仙酒灵丹延寿永，洞中排宴乐开怀。^①

这里的齐天大圣一方面仍然保持着淮扬运河的地方色彩，如龟山水母水淹泗州，被锁在碧油坛中，另一方面也衍化了上天盗仙丹御酒的情节，比话本又向《西游记》靠近了一步。

吴承恩，对家乡有关无支祁的传说兴趣盎然，在宋元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对孙悟空的形象进行创造性的加工，使之成为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最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二 花果山水帘洞的由来

《西游记》第一回写花果山和孙悟空的出生道：“单表东胜神洲海外有一国，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

^① 《西游记资料汇编》82~83页，中州书画社1983年7月版。

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那山顶上有一块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八卦。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胎，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接着又写水帘洞：“你看他瞑目蹲身，将身一纵，径跳入瀑布泉中，忽睁睛抬头观看，那里边却无水无波，明明朗朗的一架座铁板桥，桥下之水，冲贯于石窍之间，倒挂流出去，遮闭了桥门。又上桥头再看，却似人家住处一般，好个所在。看罢多时，跳过桥左右观看，只见正当中有一石碣。碣上镌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任何读者都会为这天造地设、自然天成的山、洞、猴叹为观止。那么，它们的原型在哪里，吴承恩这样写有无依据呢？

花果山水帘洞的原型在海州（今连云港市灌云县），原名云台山。苏兴《〈西游记〉的地方色彩》根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十一山川考之清人姚陶《登云台山记》（石刻），认定姚陶所记就是《西游记》所写唐僧身世和花果山水帘洞的原型。其中的青峰顶，就是花果山。传说吴承恩曾特地到离淮安两百多里的云台山，看到满山长满了各种花草果木；上山又见有许多山洞，其中有的山洞洞口有水帘遮挡，他就天天跑到这里来，构思孙悟空在花果山的作为。

三 金箍棒与二郎神

金箍棒为孙悟空生色不少，第三回写道：“后面闪过龙婆、龙女道：‘大王，观看此圣，决非小可。我们这海藏中那一块天河定底的神珍铁，这几日霞光艳艳，瑞气腾腾，敢莫是该出现，遇此圣也？’龙王道：‘那是大禹治水之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是一块神铁，能中何用？’龙婆道：‘莫管他用不用，且送与他，凭他怎么改造，送出宫门便了。’老龙王依言，向悟空说了。悟空道：‘拿来我看。’龙

王摇手道：‘扛不动，抬不动！须上仙亲自去看。’悟空道：‘你引我去。’龙王果引至海藏中间，忽见金光万道，龙王指道：‘那放光的便是。’悟空撩衣上前，摸了一把，乃是一根铁柱子，约有斗来粗，二丈有余长。他尽力两手挝过道：‘忒粗忒长些，再短细些方可用。’说毕，那宝贝就短了几尺，细了一围。悟空又颠一颠道：‘再细些更好。’那宝贝真个又细了几分。悟空十分欢喜，拿出海藏看时，原来两头是两个金箍，中间乃一段乌铁，紧挨箍镌着一行字：唤做‘如意金箍棒，生一万三千五百斤’。”这是《西游记》最富有神话色彩的段子。孙悟空使用的金箍棒是大禹治水时定江海深浅的定子，这奇思妙想也得益于淮扬运河流域民风民俗的启发。《广阳杂记》卷二载，扬州禹王庙中，有巨石一块埋土中，名曰浮山，相传神禹以此石镇海。吴承恩受此影响，再加上创造性想象，而赋予金箍棒无比神妙的魅力。

《西游记》中的二郎神精明强干，有勇有谋，水涨船高地衬托了孙悟空的大智大勇。第六回写道：“他两个斗经三百余合，不分胜负。真君抖擞神威，摇身一变，变得身高万丈，两只手举着三尖两刃神锋，好便似华山顶上之峰，青脸獠牙，朱红头发，恶狠狠，望大圣着头就砍。这大圣也使神通，变得与二郎身躯一样，嘴脸一般，举一条如意金箍棒，却就似昆仑顶上擎天之柱，抵住二郎神。唬得那马流元帅战兢兢摇不得旌旗，崩芭二将虚怯怯使不得刀剑。”吴承恩能把二郎神写得如此骁勇善战，得益于淮扬一带浓厚的民间传说基础。曹晋杰等《关于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民间传说》一文中写道：一天吴承恩从淮安坐船，沿灌河入海，而后北上，游览连云港口的花果山。正当他们乘坐的船快要出海时突然遇到狂风恶浪，只好在海口的二圣港（今响水县陈港）停泊靠岸。第二天天气暖和，吴承恩便登岸散步解闷，看到一座二郎神庙，庙前竖一根高大旗杆，庙内供奉着二郎神杨戩的塑像，三只眼，手执三尖两刃刀，脚踏吠天犬，十分威武。离此不远，还有一座土地庙，庙后也竖着一

根旗杆，吴承恩感到很奇怪。和尚秋月告诉他，相传五百年前孙悟空和二郎神在这里打过仗，孙悟空七十二变，还是斗不过二郎神，被打得大败，无处逃跑，只好变了个土地庙，但那根猴子尾巴没处放，便变成旗杆竖在庙后。吴承恩对和尚秋月讲的这个故事很感兴趣，后来在《西游记》书中专门写上了“二郎神大战灌江口”一回书。

四 《西游记》人间国度，折射明代昏君佞臣

祭赛国。第六十二回写道：“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我这金光寺，自来宝塔上祥云笼罩，瑞霭高升，夜放霞光，昼喷彩气，远近无不同瞻。故此以为天府神京，四方朝贡。不期三年之前，孟秋朔日，夜半子时，下了一场血雨，把我这寺里黄金宝塔污了。这两年外国不来朝贡，我王欲要征伐，众臣疑道我寺里僧人偷了塔上宝贝，所以无祥云瑞霭，以此奏上。昏君更不察理。那些赃官，将我僧众拿了去，千般拷打，万样追求。当时我这里有三辈和尚，前两辈已被拷打不过死了，如今又捉我辈问罪枷锁。老爷在上，我等怎敢欺心盗取塔中之宝？”祭赛国仅靠珍宝被四夷尊为上邦，实际上君昏臣佞。国宝被盗后四夷不朝，昏君就要兴兵讨伐，佞臣却要迁怒无辜。有趣的是，祭赛国和明朝有一样的官职，同回书写道：“那国王急降金牌：‘着锦衣卫快到金光寺取妖贼来，寡人亲审。’三藏又奏道：‘万岁，虽有锦衣卫，还得小徒去方可。’国王道：‘高徒在那里？’三藏用手指道：‘那玉阶旁立者便是。’国王见了大惊道：‘圣僧如此丰姿，高徒怎么这等相貌？’……再着当驾官看车盖，教锦衣卫好生伏侍圣僧，去取妖贼来。那当驾官即备大轿黄伞，锦衣卫点起校尉，将行者八抬八辮，大四声喝路，径至金光寺来。”锦衣卫是明代特有的镇压工具，这回书分明是影射明朝黑暗政治。

《西游记》写了几个崇道灭佛的国度，其一是车迟国。第四十

四回写僧人做苦力，而道士作威作福。只因二十年前民遭亢旱，正在倒悬之忧中，忽然降下大师虎力大仙、二师鹿力大仙、三师羊力大仙三个仙长来，“呼风唤雨，只在翻掌之间；点石成金，却如转身之易”，国王便与大仙结了亲，对僧人却“拆了他山门，追了他度牒，御赐与我们家做活，就当小厮一般。我家里烧火的也是他；扫地的也是他。因为后边还有住房未完，着这和尚来拽砖瓦木植，起盖房宇”。这是侧面描写，通过道士的口讲述车迟国“仙长”凌驾于君臣之上。第四十五回又直接描写道：“国王展开方看，又见黄门官来奏：‘三位国师来也。’慌得国王收了关文，急下龙座，着近侍的设了绣墩，躬身迎接。三藏等回头观看，见那大仙，摇摇摆摆，后带着一双丫髻童儿，往里直进，两班官控背躬身，不敢仰视。他上了金銮殿，对国王径不行礼。”车迟国王亲自下殿躬迎三位国师，两班官员也不敢仰视，比对国王还惧怕；而三位国师上殿却如入无人之境，对国王不睬不理。

其二是比丘国。第七十八回写道：“此国原是比丘国，近有民谣改作小子城。三年前有一老人，打扮做道人模样，携一小女子，年方一十六岁。其女形容娇俊，貌若仙姬，进献与当今陛下，宠幸在宫，号为美后，不分昼夜贪欢。如今弄得精神疲困，身体尪羸，饮食少进，命在须臾。太医院检尽良方，不能疗治。那进女子的道人，受我主诰封，称为国丈。国丈有海上仙方，甚能延寿。前者去十洲、三岛，采将药来，俱已完备。但只是药引子利害，单用着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煎汤服药。服后有千年不老之功。这些鹅笼里的小儿，俱是选就的，养在里面。人家父母，惧怕王法，俱不敢啼哭。遂传播谣言，叫做小子城。此非无道而何？”这是比丘国驿丞对唐僧所说的话，后来唐僧面见国王倒换公文时，国王疾病缠身，一听国丈到来便要挣扎起身相迎，可知对道士的迷信到何种程度。

实际上，书中所写折射了明世宗嘉靖皇帝在北京皇宫里的作



为。清人谷应泰所著《明史纪事本末》，记述嘉靖皇帝崇信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的肮脏作为。嘉靖先前佛道并信。当时他信佛，但仅对欢喜佛感兴趣，藏“神鬼淫褻”金像和金玉匣装佛骨共 13000 余斤。一个皇帝整天一门心思放在欢喜佛和佛骨的收藏上，哪有心思思考国计民生；在位十四年后，嘉靖转而专一迷信道教，大内佛寺的僧人被赶出宫，标志着佛教的失宠和道教的专宠；十五年春又“加致一真人邵元节道号，赐玉带冠服。……岁给禄一百石，遣缁骑四十人充扫除役，赠田三十顷，蠲其租徭。……十二月，以皇嗣生，录致一真人邵元节祷祀功，加授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赐白金、文绮、宝冠、法服、貂裘。授其徒邵启为等禄秩有差”。后来邵元节死，嘉靖皇帝“敕有司营葬，恤典如伯爵例。以方士陶典真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嘉靖十九年，又“进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领道教事。寻加少保、礼部尚书，又加少傅，食一品俸”。^①给道士邵元节、陶仲文如此高的礼遇和待遇，表面上看是帮助皇帝静修有功，但实际上是嘉奖他献壮阳药有功。

今人苏兴在《〈西游记〉对明世宗的隐寓批判和嘲讽》一文中，根据《万历野获编》卷二—《佞幸·秘方见幸》所记考证：“世宗接待陶仲文虽然比玉帝对太上老君，车迟国王、比丘国王对妖道要有些身份，但由于陶仲文献房中秘方和传授房中术之功，‘必于门庭握手方别’带点现代洋味的迎送方式，其谄媚道士的神情灼然可见。至此，明世宗已与玉帝、车迟国王、比丘国王难分彼此、融为一体了。明世宗信道的本质，包括《明史纪事本末》在内的有关明代历史著述，多言之暗昧，只说他求神仙，希延年益寿，斋醮祷祀等等。读者往往误以为明世宗不理朝政，是为了专意清修而洁心寡欲。孰知恰恰相反，不但不洁心寡欲，反而是借方士献的房中秘方多恣女色，无节制地纵欲。所谓延年益寿仅是壮阳的代名词。”苏文还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中华书局 1977 年 2 月版。

引《万历野获编》中资料,揭露了道士所配淫药的内幕,一是取童女初经炼药,二是取童男阳具炼药。而《西游记》第七十八回写比丘国王受道士诱惑,要用一千多个小儿的心肝做药引,影射的便是嘉靖皇帝和假道士陶仲文之流的肮脏关系。



第十章

《金瓶梅》与运河文化

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明代中叶运河流域城市以市民阶层崛起、商品生产和商业运销繁荣、初期资本积累加快及其导致的物欲横流为特征的运河文化。

第一节 《金瓶梅》是运河文化产物

一 《金瓶梅》从《水浒传》脱胎

《金瓶梅》第一回写西门庆与结义兄弟应伯爵、谢希大到临街一酒楼上看打虎英雄，“不一时，只听得锣鸣鼓响，众人都一齐瞧看。只见一对对缨枪的猎户，摆将过来，后面便是那打死的老虎，好像锦布袋一般，四个人还抬不动。末后一匹大白马上，坐着一个壮士，就是那打虎的这个人。西门庆看了，咬着指头道：‘你说这等一个人，若没有千百觔水牛般气力，怎能勾动他一动儿是的？’三个儿饮酒评品，按下不题”^①。这样，《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至二十七回故事情节，除了个别地方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动外，基本上被兰陵笑笑生原封不动地搬到《金瓶梅》中，做了《金瓶梅》的第一至六回，即“西门庆热结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俏潘娘帘下勾情

^① 本章所节录作品原文出自中华书局 1998 年 3 月版《金瓶梅》会评会校本。

老王婆茶坊说技”、“定挨光王婆受贿 设圈套浪子私挑”、“赴巫山潘氏幽欢 闹茶坊郓哥义愤”、“捉奸情郓哥定计 饮鸩药武大遭殃”、“何九受贿瞒天 王婆帮闲遇雨”。只不过《金瓶梅》改武松斗杀西门庆为误杀李外传,发配孟州;直到第八十七回,武松才从孟州刑满回来,当时西门庆已死,他以一百两银子从王婆手里将潘金莲买了回来,然后将她杀掉,卷财逃走。

在水浒故事中,西门庆是一个陪衬角色,他在书中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出场,至二十六回《郓哥大闹授官厅 武松斗杀西门庆》中横死于武松刀下,前后所占篇幅不过三回,留给读者的是个性格单一的淫棍形象,在书中所占位置几可略去。但在《金瓶梅》一书中,西门庆不仅成为全书的主要人物,而围绕西门之家展开的世俗生活也成为全书的结构中心。西门庆的形象衍变成了一个对金钱、女色、权势极其贪婪的商业暴发户,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和现实代表性。而武松由《水浒传》中的杀仇祭兄、仗义自首、光明磊落、义薄云天的英雄,变为《金瓶梅》中卑微琐小的凡夫俗子。

除此之外,《金瓶梅》的第七至八十六回还不时与《水浒传》照应,如第十回中介绍李瓶儿本是北京梁中书的妾,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书同夫人在翠云楼上,被李逵杀了全家老小。李氏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与养娘妈妈走上东京投亲,“那时花太监由御前班直升广南镇守,因侄男花子虚没妻室,就使媒婆说亲,娶为正室”。《水浒传》中实施杀梁中书一家的是杜千和宋万,《金瓶梅》中说是李逵,可能兰陵笑笑生觉得这种杀人放火的勾当让李逵来干更合适些。

兰陵笑笑生从《水浒传》衍生情节写小说,其考虑有二:一是借《水浒传》的名气提高《金瓶梅》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二是把自己抨击明代政治黑暗的意图掩藏起来,躲避抨击对象的迫害报复。

二 托言北宋、实写明朝的总体构思

1. 《金瓶梅》中蔡京父子的所作所为，影射明代奸臣严嵩。《金瓶梅》第三十回写道：“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北宋有四个奸党，而《明史》说嘉靖朝有四凶，“昔舜诛四凶，万世称圣。今瓚与郭勋、严嵩、胡守中，圣世之四凶。陛下旬月间已诛其二，天下翕然称圣，何不并此二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以盛苞苴者为才，献淫乐者为敬，遂使边军益瘠，边备更弛。行边若此，将焉用之！故不清政本，天下必不治也。不易本兵，武功必不竞也。”^①（《明史·谢瑜传》）宋末四个奸臣与明代四凶如出一辙，作者以蔡京隐喻严嵩，借宋代写明朝昏暗政治人所共知。

2. 陶仲文，明嘉靖皇帝宠信的道士；《金瓶梅》中林灵素的作为，影射陶仲文。《金瓶梅》第七十回写到宋徽宗褒奖林灵素，“国师林灵素，佐国宣化，远致神运，北伐谋略，实与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禄一千石，赐坐龙衣一袭，肩舆人内，赐号玉真教主，加渊澄玄妙广德真人、金门羽客、达灵玄妙先生”。而明嘉靖皇帝的国师陶仲文因为献药有功，加少傅兼少保、少师，登三孤何其相似。

3. 陆炳，嘉靖年间的锦衣卫都督。《金瓶梅》中的朱勔，影射嘉靖皇帝的酷吏陆炳。《金瓶梅》第七十回写朱勔新加太保，官员前往朱家馈送贺礼的场面，渲染了他的赫赫威势，“官居一品，位列三台。赫赫公堂，潭潭相府。虎符玉节，门庭甲仗生寒；象板银筝，碗礲排场热闹。终朝谒见，无非公子王孙；逐岁追游，尽是侯门戚

^① 《明史》3696页，中华书局2001年1月第1版。

里。那里解调和燮理，一味能趋谄逢迎；端的谈笑起干戈，真个吹嘘惊海岳。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辞使九重天子点头。督择花石，江南淮北尽灾殃；进献黄杨，国库民财皆匱竭”。与明代锦衣卫都督陆炳与严嵩结亲相重，大吏争相纳贿，朝官纷纷自称门下何其相似。

沈德符的看法，经今人的研究充实，获得了充分的论据，成为当今学者的共识。《金瓶梅》总体构思借宋写明，为近年国内重要文学史的共识。“全书的背景安置在北宋末年，但它所描绘的世俗人情，都是立足于现实的。”^①“书中记事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到南宋建炎元年（1127），共十六年，但实际上却是明中叶以后社会现实生活的写照。”^②确为英雄略同之见。

三 《金瓶梅》作者是谁虽无定论，但为运河流域人无疑

《金瓶梅》欣欣子序称“兰陵笑笑生作”。古称“兰陵”之地有二：一为今山东峄县，一为今江苏武进县，无论哪个兰陵都是在运河流域。

明代学者对“笑笑生”进行猜测，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作者是“绍兴老儒”，谢肇淛《金瓶梅·跋》说作者是“金吾戚里”的门客，但都没有确定到具体人。后来人对此推考，先后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贾三近、冯梦龙、王稚登等说法。

王世贞（1526～1590），明太仓（今属江苏）人，19岁中嘉靖进士，一生在南北二京为官，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兵备副使，不附权贵，曾拒严嵩党羽陆炳请托；好友杨继盛被害后，为之发丧，结怨于严嵩。其父为严嵩陷害致死，解官救父，未成。李开先

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17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

② 罗宗强、陈洪：《中国文学史（二）》29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02~1568),山东章丘人。嘉靖八年中进士,在户部任事。后任吏部考功司主事、稽勋司员外、文选司郎中、太常寺少卿,曾提督四夷馆。因抨击当时执政的严嵩,揭露当时政治的腐败,嘉靖二十一年被削职,回到章丘故居。在家修建亭园,结词社,征歌度曲,搜集戏曲及民间文学。屠隆,鄞县(今属浙江)人。万历五年进士,曾任额上知县,转为青浦令,后迁礼部主事、郎中。为官清正,关心民瘼。万历十二年,因“淫纵”被小人诬陷,遭削籍罢官。为人豪放好客,纵情诗酒,所结交者多海内名士。晚年,遨游吴越间,寻山访道,说空谈玄,以卖文为生,潦倒而卒。风流过分,性生活糜烂,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记录。冯梦龙(1574~1646),明代通俗文学家、戏曲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士大夫家庭。万历四十年(1612)前后,编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通俗小说。贾三近(1534~?),山东峄县人。嘉靖三十七年夺乡试省魁,隆庆二年高中进士,以博学宏词选为翰林院府庶吉士,又二年,得授吏科给事中。万历二年,擢升为太常少卿,得到皇帝重用,再迁为大理左右少卿。王稚登(1535~1612),字伯谷,明代江苏江阴人,自幼聪颖,10岁就以能做诗、善书法闻名乡里,稍长入太学深造,嘉靖末年在京师相国府当幕客,后来深感当时朝廷腐败、官场恶浊,便决意摒弃仕途,致力文学创作。侨寓吴中,拜文征明为师,入“吴门派”。

这几位文人,都有运河流域生活经历,有创作《金瓶梅》文学功力。《金瓶梅》作者是谁虽无定论,但为运河流域文人是不争的事实。

四 《金瓶梅》多处叙事着眼点在明代淮安清河县

20世纪末,山东学者李锦山^①数次发文指出《金瓶梅》所写清

^① 李锦山:“《金瓶梅》地理环境淮上考”,见《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2期;“《金瓶梅》地理环境淮上考补证”,见《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3期。

河县以明代淮安府清河县为原型。根据是,山东境内和江苏北部历史上都有东平府、临清关和清河县,但山东境内的清河县与《金瓶梅》故事情节不符,而明代淮安府清河县地理状况与小说情节基本吻合。

《金瓶梅》第四十七回写扬州员外苗天秀在徐州洪被仆人苗青联络水贼翁八、陈三打劫:

是夜天气阴黑,苗天秀与安童在中舱里睡,苗青在橹后。将近三鼓时分,那苗青故意连叫有贼。苗天秀梦中惊醒,便探头出舱外观看,被陈三手持利刀,一下刺中脖下,推在洪波荡里。那安童正要走时,被翁八一闷棍打落水中。三人一面在船舱内打开箱笼,取出一应财帛金银,并其缎货衣服,点数均分。二艄便说:“我若留此货物,必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载此货物到于市店上发卖,没人相疑。”因此二艄尽把皮箱中一千两金银,并苗员外衣服之类分讫,依前撑船回去了。这苗青另搭了船只,载至临清码头上,钞关上过了,装到清河县城外官店内卸下。见了扬州故旧商家,只说:“家主在后船,便来也。”这个苗青在店发卖货物不题。

安童侥幸不死,被一渔翁救起,随渔翁在“河口”卖鱼时发现了行凶的陈三、翁八,便把二人告到提刑院。

徐州洪在江苏铜山县东南二里,元末黄河在徐州洪夺泗入淮安府清河县境的清口入海。京杭大运河出山东后借黄河一段河道与淮扬运河沟通,所以小说中写渔翁在徐州洪附近救了安童,然后顺流而下,到“河口”卖鱼;而翁八、陈三二人杀人后将“一千两金银,并苗员外衣服”送回扬州,再返回“河口”肆意挥霍,这非常符合明代淮阴一带地理。假如清河县在山东境内,则距扬州遥远,翁八、陈三不可能短时间内往返一趟,在河口被安童发现。

李锦山还列举了《金瓶梅》地理环境在淮上的十三个例证。其

实能说明小说叙事着眼点在淮上的不止那十三个。如第四十九回写蔡御史新点两淮巡盐,从京城到扬州上任路经清河县,西门庆要迎他至家中,“来保打听得知他与巡按宋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都行至东昌府地方,使人来家通报。这里西门庆就会夏提刑起身。来保从东昌府船上,就先见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后西门庆与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关键问题是,“出郊五十里”就“到新河口”,只要弄清明代“新河口”在什么地方,就可以断定西门庆所在的清河县在何处了。古人所说河,就是黄河;河口,应指黄河淮河和运河的交汇点——清口。今人姚汉源写道:“清口以泗水(南清河)入淮之口得名,古有泗口,似较偏西。泗水在明代清河县(县在淮水北岸,东稍偏南,距淮安 50 余里)城西 30 里的三汉口分为两支,北支为大清河,东经县城北,更东 10 里至大清河入淮。南支东经城南为小清河,至城东 5 里小清河口入淮。大清河俗称老黄河,嘉靖以前为黄河所经,嘉靖初淤塞,黄河主流改行小清河。”据此,《金瓶梅》所谓“新河口”,就是“黄河主流改行小清河”^①的“小清河口”,它是里运河、黄河和淮河的交会点。西门庆生活的清河县,离此仅 50 里,大致相当于当时的淮安府所在。

第二节 《金瓶梅》中的运河流域商务

一 活跃在运河流域的商人和商品流通

西门庆所在的清河县,实际上有州甚至府的规模,处在南北运河交界地方,江南和北方的客商你来我往。有的从江南贩运丝绸到清河,第二十回写道:“原来李桂姐也不曾往五姨家做生日去。

^① 《京杭运河史》270 页,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近日见西门庆不来，又接了杭州贩绸绢的丁相公儿子丁二官人一号丁双桥，贩了千两银子绸绢在客店里，瞒着他父亲来院中嫖。”这位杭州客商贩绸绢到清河来卖，一次贩运货物价值千两白银。有的从扬州贩盐到清河，第二十五回写道：“西门庆前边陪着乔大户说话，只为扬州盐商王四峰，被按抚使送监在狱中，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对蔡太师讨人情释放。”这位扬州盐商大概是在清河坐地发货，打官司行贿就许银两千银。有的运丝线到清河来批发，第三十三回写西门庆回答吴月娘道：“应二哥认的一个湖州客人何官儿，门外店里堆着五百两丝线，急等着要起身家去，来对我说要折些发脱。我只许他四百五十两银子。昨日使他同来保拿了两锭大银子作样银，已是成了来了，约下今日兑银子去。”这位湖州商人从江南贩运价值五百两银子的丝线到清河，因家有急事，只得发脱给西门庆零售。

西门庆也派伙计到外地做商。第二十五回写道，“西门庆来家，来旺儿走到跟前参见，说道：‘杭州织造蔡太师生辰的尺头并家中衣服，俱已完备，打成包裹，装了四箱，搭在官船上来家，只少雇夫过税。’西门庆满心欢喜，与了他赶脚银两，明日早装载进城。又赏银五两房中盘缠，又教他管买办东西。”来旺到杭州去给蔡京定做生辰贺礼，打成包裹，装了四箱，搭官船返回，省了运费和纳税。第八十一回写道：

韩道国与来保，自从拿着西门庆四千两银子，江南置买货物，到于扬州，抓寻苗青家内宿歇。苗青见了西门庆手札，想他活命之恩，尽力趋奉。又讨了一个女子，名唤楚云，养在家里，要送与西门庆，以报其恩。韩道国与来保两个且不置货，成日寻花问柳，饮酒宿娼。只到初冬天气，景物萧瑟，不胜旅思，方才将银往各处买置布匹，装在扬州苗青家安下，待货物买完起身。



韩道国、来保到扬州为西门庆买布匹，身上带了四千两银子做本钱。这反映了明代中后期运河流域商业和商人活动规模之大。

二 运河流域商人的商业资本积累

运河流域其他商人的资本积累《金瓶梅》语焉不详，但西门庆的商业资本积累历历可数。

一是子承父业，《金瓶梅》第一回写道：“他父亲西门达，原走川广贩药材，就在这清河县前开着一个大大的生药铺。现住着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房子。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虽算不得十分富贵，却也是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人家。”这是西门庆商业活动的最初资本，有人根据小说故事情节统计，六年后至西门庆死时光生药铺就获利六千两。

二是通过婚姻“财色”两得。第八回写他收孟玉楼为妾，“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钗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有三二百筒。不料他男子汉去贩布，死在外边。他守寡了一年多，身边又没子女，止有一个小叔儿，才十岁。”上千两的现银，价值千两以上实物，身边又无拖累，西门庆欣然同意，从孟玉楼身上得了大宗财富。李瓶儿是西门庆娶的第六房妾，西门庆同样从她身上获得不少财富。第十四回花子虚入狱，李瓶儿托西门庆帮她打官司，“妇人便往房中開箱子，搬出六十錠大元宝，共计三千两，教西门庆收去寻人情，上下使用。西门庆道：‘只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许多！’妇人道：‘多的大官人收了去。奴床后还有四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都是值钱珍宝之物，亦发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里，奴用时来取。趁这时奴不思个防身之计，信着他，往后过不出好日子来。眼见得三拳敌不得四手，到明日，没的把这些东西儿吃人暗算了去，坑闪得奴三不归？’”后来花子虚人虽出狱，但房产判没，花子虚得知李瓶儿和

西门庆私情而被气死，李瓶儿带着院子连同浮财一起嫁给了西门庆。而西门庆把所得意外财用在生意的开拓上，第二十回写道：

西门庆自娶李瓶儿过门，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米麦陈仓，骡马成群，奴仆成行。把李瓶儿带来小厮天福儿，改名琴童，又买了两个小厮，一名来安儿，一名棋童儿。把金莲房中春梅，上房玉箫，李瓶儿房中迎春，玉楼房中兰香，一般儿四个丫头，衣服首饰妆束起来，在前厅西厢房，教李娇儿兄弟乐工李铭来家教演，习学弹唱。春梅琵琶，玉箫学箏，迎春学弦子，兰香学胡琴。每日三茶六饭，管待李铭，一月与他五两银子。又打开门面两间，兑出二千两银子来，委傅伙计、贲第传开解当铺。女婿陈敬济只掌钥匙，出入寻讨。贲第传只写帐目，称发货物。傅伙计便督理生药、解当两个铺子，看银色，做买卖。潘金莲这边楼上，堆放生药。李瓶儿那边楼上，厢成架子，搁解当库衣服首饰，古董书画玩好之物。一日也当许多银子出门。

这样，西门庆就通过纳妾扩充了家庭和生意的实力。不仅新增了男仆、开始训练家庭女乐，而且新开了解当铺，拓宽了生药仓库。

三是为官贪赃枉法所得。第四十七回写苗青伙同水贼害了苗员外，事发后想以钱买命，“到十九日，苗青打点一千两银子，装在四个酒坛内，又宰一口猪。约掌灯以后，抬送到西门庆门首”。西门庆分五百两给了夏提刑，卖放了苗青；余下的五百两，装入自己腰包。

四是与大户联姻，合伙做生意。第四十一回写西门庆与清河乔大户结娃娃亲，四十八回接受从京城回来的来保的建议，“咱旧时和乔亲家爹高阳关上纳的那三万粮仓钞，派三万盐引，户部坐派。如今蔡状元又点了两淮巡盐，不日离京，倒有好些利息”。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让韩道国与乔大户外甥崔本，拿仓钞早往高阳关户部韩爷那里赶着挂号。说通蔡御史比别家提前一个月提盐上

市，赚了一大笔钱。西门庆的商业资本积累，反映了当时商人资本积累的基本情况。

三 运河流域商人的商业运行机制

西门庆这样一个身兼官吏的运河流域巨商大贾，一个人是忙不了多少具体商务的。在经营活动中，他只管筹措资本和决定经营方向，具体商务都由他雇佣的“二掌柜”和伙计操作。第三十三回写西门庆与吴月娘商量开线铺的事，话语中透露了他商业运行的内幕：

西门庆便告说：“……我想来，狮子街房子空闲，打开门面两间，到好收拾开个绒线铺子，搭个伙计，况来保已是郛王府认纳官钱，教他与伙计在那里，又看了房儿，又做了买卖。”月娘道：“少不得又寻伙计。”西门庆道：“应二哥说他有一相识，姓韩，原是绒线行，如今没本钱，闲在家里，说写算皆精，行止端正，再三保举。改日领他来见我，写立合同。”说毕，西门庆在房中兑了四百五十两银子，教来保拿出来。

陈敬济已陪应伯爵在卷棚内吃完饭，等的心里火发。见银子出来，心中欢喜，与西门庆唱了喏，说道：“昨日打搅哥，到家晚了，今日再扒不起来。”西门庆道：“这银子我兑了四百五十两，教来保取搭连眼同装了。今日好日子，便雇车辆搬了货来，锁在那边房子里就是了。”伯爵道：“哥主张的有理。只怕蛮子停留长智，推进货来就完了帐。”于是同来保骑头口，打着银子，径到门外店中成交易去。谁知伯爵背地里与何官儿砸杀了，只四百二十两银子，打了三十两背工。对着来保，当面只拿出九两用银来，二人均分了。雇了车脚，即日推货进城，堆在狮子街空房内，锁了门，来回西门庆话。

西门庆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商业信息，比如湖州商人何官儿有

丝线要发脱就是结义兄弟应伯爵告诉他的；然后由他本人对商业信息做出反应，比如这一次西门庆决定用 450 两银子要下丝线开线铺；他掌控金钱使用权，兑出银子交经纪人应伯爵（由贴身家人来保监办）去收货；经纪人应伯爵有 30 两的“背工”利钱，是通过与货主再杀价实现的，不然他无利不起五更；接着由西门庆筹措店面和人事，选定“狮子街临街房”做铺面，来保为伙计，选了应伯爵推荐的韩道国做线铺撑柜，因为他原先就开线铺懂行有经验，且善长算计。还应指出，西门庆进的丝线原是无色的，而素色丝线卖不出好价钱或生意迟，所以他让韩道国、来保领本钱染丝，即组织人染出彩色丝线，增加商品的附加值。结果线铺开张当天，就卖数十两银子。那么，“二掌柜”与雇主是什么关系呢？同回书通过韩道国的嘴道出了其中奥妙：

韩道国坐在凳上，把脸儿扬着，手中摇着扇儿，说道：“学生不才，仗赖列位余光，与我恩主西门大官人做伙计，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白汝晃道：“闻老兄在他门下只做线铺生意。”韩道国笑道：“二兄不知，线铺生意只是名目而已。他府上大小买卖，出入资本，那些儿不是学生算帐！言听计从，祸福共知，通没我一时儿也成不得。大官人每日衙门中来家摆饭，常请去陪侍，没我便吃不下饭去。俺两个在他小书房里，闲中吃果子说话儿，常坐半夜，他方进后边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轿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饮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无忌惮。不可对兄说，就是背地他房中话儿，也常和学生计较。学生先一个行止端庄，立心不苟，与财主兴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财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傅自新也怕我几分。不是我自己夸奖，大官人正喜我这一件儿。”

韩道国负责线铺经营，经营所得与雇主西门庆“三七分钱”，即

韩道国得十分之三，西门庆得十分之七。由于“二掌柜”无须资金投入，净得纯利的三成是很诱人的，所以难免使尽浑身解数以求更多赢利，在为自己争取更多分红的同时，也就为雇主带来更多利润。而西门庆由于让利于人，博得“二掌柜”死心踏地，为自己“兴利除害，拯溺救焚”，不失为高明之法。

西门庆实行的是商人雇主制，靠合同对被雇者进行管理，第三十三回写道：“西门庆教应伯爵，择吉日领韩伙计来见。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纪，言谈滚滚，满面春风。西门庆即日与他写立合同。同来保领本钱雇人染丝，在狮子街开张铺面，发卖各色绒丝。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不在话下。”这种东家出本、伙计经商的机制，是明代商业界，特别是运河流域商界的一大发明。

第三节 《金瓶梅》中的明代黑暗世道

一 恶霸横行，为所欲为

西门庆是运河城市的黑恶势力的代表，是传统美德的掘墓人。《金瓶梅》第一回写道：“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中，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饶有几贯家资，年纪二十六七。这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只为这西门达员外夫妇去世的早，单生这个儿子却又百般爱惜，听其所为，所以这人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一自父母亡后，专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学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结识的朋友，也都是些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西门庆从小没有受过正统教育，他心中没有是非曲直观念，也没有道德法纪观念。出身的富有和父母的骄纵使他好逸恶劳，沾染一身坏毛病，吃喝嫖赌，四毒俱全。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三言二拍”中随处可见。不过，他没有像“三言二拍”中同类人物那样挥霍一空，败

家亡身；与那些败家子不同的是，他有着一股对经商的执着与冒险精神，对奸商之道有着无师自通的理解和善长，对财富有着一种疯狂的追逐和占有能力；加上他的恶棍流氓和政治赌徒品性，使他在封建王朝末世的黑暗世道里，不仅没有败家，反而五六年内崛起商界、冲入政界、富甲一方。

“朋友之妻不可欺”，但西门庆没有礼义廉耻，对结义兄弟也不惜夺妻谋财。花子虚在西门庆结义兄弟中排名老四，西门庆与之结义时信誓旦旦，“伏念庆等，生虽异日，死冀同时。期盟言之永固，安乐与共，颠沛相扶。思缔结以常新，必富贵常念贫穷，乃始终有所依倚。情共日往以月来，谊若天高而地厚。伏愿自盟以后，相好无尤，更祈人人增有永之年，户户庆无疆之福”。但一转眼就引诱花子虚妻子李瓶儿，第十三回写道：“自此西门庆就安心设计，图谋这妇人。屡屡安下应伯爵、谢希大这伙人，把子虚挂住在院里，饮酒过夜。他便脱身来家，一径在门首站立。这妇人亦常领着两个丫鬟在门首。西门庆看见了，便扬声咳嗽，一回走过东来又往西去，或在对门站立，把眼不住望门里盼。妇人影身在门里，见他来便闪进里面，见他过去了，又探头去瞧。两个眼意心期，已在不言之表。”以至勾搭成奸。后来花子虚入狱，李瓶儿便将家中浮财交给西门庆，花子虚出狱后得知详情被气死，“当日妇人轿子归家，也设了一个灵位，供养在房中。虽是守灵，一心只想着西门庆。从子虚在日，就把两个丫头教西门庆耍了，子虚死后，越发通家往还”。（第十四回）这样，西门庆就夺了花子虚的妻，谋了花子虚的财。

“四海之内皆兄弟”，但西门庆却不把奴仆当人看，随意草菅人命。来旺与妻子蕙莲是西门庆的仆人，西门庆趁来旺出差在外诱奸了蕙莲，来旺回来后知道了奸情，扬言“休要撞到我手里。我教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被来兴无意中听到，告诉了潘金莲。西门庆闻讯不反省自己，反要陷害来旺。一天夜里来旺醒来不见了妻子，又听窗外有人叫他去捉奸，“忙跳起身来，开了房门，径扑

到花园中来。刚到厢房中角门首，不防黑影里抛出一条凳子来，把来旺儿绊了一交，只见响亮一声，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闪过四五个小厮，大叫：‘有贼！’一齐向前，把来旺儿一把捉住了”。（第二十六回）这样，来旺就成了刺杀主子的贼，被官府“递解徐州”，宋蕙莲也自缢身死。西门庆大白天鸡奸书童，书童出屋时被平安儿、画童儿两个小厮看见。受到奚落的书童向西门庆打小报告，西门庆就寻事对平安、画童大动酷刑，“西门庆分咐：‘叫两个会动刑的上来，与我着实拶这奴才！’当下两个伏侍一个，套上拶指，只顾擎起来。拶的平安疼痛难忍，叫道：‘小的委实回爹不在，他强着进来。’那排军拶上，把绳子绾住，跪下禀道：‘拶上了。’西门庆道：‘再与我敲五十敲。’旁边数着，敲到五十上住了手。西门庆分咐：‘打二十棍！’须臾打了二十，打的皮开肉绽，满腿血淋。西门庆喝令：‘与我放了。’两个排军向前解了拶子，解的直声呼唤。西门庆骂道：‘我把你这贼奴才！你说你在大门首，想说要人家钱儿，在外边坏我的事，休吹到我耳朵内，把你这奴才腿卸下来！’那平安磕了头起来，提着裤子往外去了。西门庆看见画童儿在旁边，说道：‘把这小奴才拿下去，也拶他一拶子。’一面拶的小厮杀猪儿似怪叫。”（第三十五回）西门庆肆意迫害奴仆，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西门庆为了财富不择手段。第十九回写李瓶儿因西门家关门避祸，便招蒋竹山入赘。西门庆化解了灭顶之灾后，得知这个消息，就花钱请地痞流氓找事殴打蒋竹山，意在迫使李瓶儿放弃蒋竹山，重新投入自己怀抱：

一名草里蛇鲁华，一名过街鼠张胜，常受西门庆资助，乃鸡窃狗盗之徒。西门庆见他两个在那里要钱，就勒住马上前说话。二人连忙走到跟前，打个半跪道：“大官人，这咱晚往那里去来？”西门庆道：“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门外庄上请我们吃了酒来。我有一桩事央烦你们，依我不依？”二人道：“大官人，没的说，小人平昔受恩甚多，如有使令，虽赴汤蹈火，

万死何辞!”西门庆道:“既是恁说,明日来我家,我有话分付你。”二人道:“那里等的到明日,你老人家说与小人罢,端的有甚么事?”西门庆附耳低言,便把蒋竹山要了李瓶儿之事,说了一遍:“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这口气儿便了。”因在马上搂起衣底,顺袋中还有四五两碎银子,都倒与二人。便道:“你两个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干得停当,还谢你二人。”

这两个实际上西门庆平时豢养的打手,结果蒋竹山无缘无故地挨了顿打,又被诬告欠了借银,西门庆把持的提刑院“拖番竹山在地,痛责三十大板,打的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一面差两个公人,拿着白牌,押蒋竹山到家,处三十两银子,交还鲁华。不然带回衙门收监”。挨打的反而拿钱赔打人的。于是西门庆目的达到,李瓶儿赶蒋竹山出家门,最终嫁给了西门庆。

二 奸臣当道,朝政日非

当道的奸臣,是西门庆一类恶棍的后台。正如《金瓶梅》第十七回宇文虚中弹劾蔡京时所说:“今招兵戈之患者,莫如崇政殿大学士蔡京者:本以儉邪奸险之资,济以寡廉鲜耻之行,谗谄面谀;上不能辅君当道,赞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爱元元;徒以利禄自资,希宠固位,树党怀奸,蒙蔽欺君,中伤善类,忠士为之解体,四海为之寒心;联翩朱紫,萃聚一门。”蔡京,实际上是贪官污吏的总后台,是朝政黑暗的罪恶根源。

《金瓶梅》对蔡京的直接描写反映出的蔡京败坏朝政有三:

一是结党营私,败坏吏治。第三十回写蔡京因纳西门庆祝寿大礼而滥授官职,“太师又向来保说道:‘累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来保道:‘小人的主人一介乡民,有何官役?’太师道:‘既无官役,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割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顶补千户贺金的员缺,好不好?’来保慌的叩头谢道:‘蒙老爷莫大

之恩，小的家主举家粉首碎身，莫能报答。’于是唤堂候官抬书案过来，即时签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割付，把西门庆名字填注上面，列衔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西门庆本是目无法纪的恶棍，让这样的人为官执法，只能让好人遭殃，坏人扬眉。

二是贿赂公行，败坏法治。第四十八回写西门庆收受杀人犯贿赂一千两，放苗青逍遥法外，被曾孝序上章弹劾。蔡府管家接了西门庆重礼，便对来保说：“等我对老爷说，交老爷阁中只批与他‘该部知道’，我这里差人再拿帖儿吩咐兵部余尚书，把他的本只不覆上来。交你老爹只顾放心，管情一些事儿没有。”当朝太师公然殉私枉法、庇护犯官，治下还能有什么公道可言。第五十五回写西门庆再上祝寿大礼，被蔡京认了干儿子，“翟管家走近蔡太师耳边，暗暗说了几句话下来，西门庆理会的是那话了，又朝上拜四拜，蔡太师便不答礼。这四拜是认干爷，因此受了”。西门庆倚仗蔡京的虎威，在地方为所欲为。

三是残害忠良，一手遮天。第四十九回写蔡京条陈七事，受到曾孝序的反对，蔡京就挟私报复，“巡按曾公见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点了，心中忿怒。因蔡太师所陈七事，内多舛讹，皆损下益上之事，即赴京见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极言：‘天下之财贵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师，恐非太平之治。民间结巢依众之法不可行，当十大钱不可用，盐钞法不可屡更。臣闻民力殫矣，谁与守邦？’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说他‘大肆倡言，阻挠国事’。将曾公付吏部考察，黜为陕西庆州知州。陕西巡按御史宋盘，就是学士蔡攸之妇兄也。太师阴令盘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锻炼成狱，将孝序除名，窜于岭表，以报其仇”。一手遮天，独断朝纲，必然朝政日非，人心思乱。

这实际上是明代嘉靖年间严嵩控制下的北京朝政的写照。如果说嘉靖时期的明王朝正在日趋腐败的话，那么严嵩就是腐败的病灶，嘉靖皇帝则是讳疾忌医、养痍遗患的病人。

三 民不聊生，水深火热

运河的治废，往往是朝代兴衰的晴雨表。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之时，往往运河通畅、两岸升平；朝政昏暗，吏治腐败，王朝行将灭亡之时，运河往往半通半废。明末贫富悬殊加大，国家财富都流入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流氓恶霸的腰包，他们在运河流域尽情享乐，老百姓却终年劳作而不得温饱。第六十八回写工部郎中安某到清河拜见西门庆，二人谈起治河公务，安郎中道：“蒙四泉过誉。一介寒儒，辱蔡老先生抬举，谬典水利，修理河道，当此民穷财尽之时，前者皇船载运花石，毁闸折坝，所过倒悬，公私困弊之极。又兼贼盗梗阻，虽有神输鬼役之才，亦无如之何矣。”这段话透露了很多信息：朝廷到江南搜刮奇花异石，通过运河运往京城，一路破坏了不少闸坝；花石纲骚扰沿岸民生，使公私困弊、百姓倒悬；在民穷财尽的情况下，修理河道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借北宋末年对明朝末年的“末世”写照。

运河不治，两岸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下降，农业歉收，农民就生活艰难。第八十一回写韩道国、来保从扬州买布回到临清船厘，见到很多客商直接到码头买布，原来“不想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蚕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接，在临清一带马头迎着客货而买”。从山东到河南，赤地千里，棉花绝收，所以山东、河南的布商都来货船上买布。

四 朝廷对运河流域的搜刮和骚扰

明代大运河贯通南北，京城物资供应依赖运河运抵；官员出京入京多从运河往返，地方迎来送往负担甚重。第六十五回写西门庆正在家里宴请前来吊孝的“本县知县李拱极、县丞钱斯成、主簿任良贵、典史夏恭基，又有阳谷县知县狄斯朽，共五员官员”，忽报管砖厂工部黄老爹来吊孝。慌得西门庆连忙穿孝衣灵前伺候，温



秀才又早迎接至大门外，让至卷棚上面坐下，西门庆与温秀才下边相陪。黄主事告诉西门庆：

朝廷如今营建艮岳，敕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纲，运船陆续打河道中来。头一运将至淮上。又钦差殿前六黄太尉来迎取卿云万态奇峰，长二丈，阔数尺，都用黄毡盖覆，张打黄旗，费数号船只，由山东河道而来。况河中没水，起八郡民夫牵挽，官吏倒悬，民不聊生。

这里，仍然是宋明合说，花石纲是北宋徽宗时的事，但由山东河道运抵京城，就是明代的事，因为宋代从江南运花石抵汴梁可由盱眙转汴河直达，元代山东运河才开通，明代从江南运东西抵北京，才需要过山东运河。节录的这段话，出自高官之口，像“官吏倒悬，民不聊生”的话才更可信，八郡民夫更替拉纤，才能通过山东运河，而运的竟是一块两丈高的奇石，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工部黄老爹是个太监，代表皇帝在清河管理专为京城生产建筑材料的砖厂，砖也要通过运河运抵京城，可以想象运河流域船夫水工劳动量是何等之大。

工部黄老爹借吊孝之机，专门来向西门庆摊派接待过往大员的任务，“黄太尉不久自京而至”，“敬烦尊府做一东，要请六黄大尉一饭”。西门庆送走黄老爹，回到卷棚与五位县官相见，“众官悉言：‘正是州县不胜忧苦，这件事，钦差若来，凡一应祇迎，廩饩、公宴、器用、人夫，无不出于州县，州县必取之于民，公私困极，莫此为甚。我辈还望四泉于上司处美言提拔，足见厚爱。’言讫，都不久坐，告辞起身而去”。地方官员遇到这样的事，一般都向百姓层层摊派，尚且认为“公私困极，莫此为甚”，这一次幸亏有西门庆扛了下来。但是西门庆决不会白掏腰包，他往往要从招待或行贿官员中获得好处，就像他在第六十回书中做的那样：

那时来保南京货船又到了，使了后生王显上来取车税银

两。西门庆这里写书，差荣海拿一百两银子，又具羊酒金缎礼物谢主事，就说：“此货过税，还望青目一二。”家中收拾铺面完备，又择九月初四日开张，就是那日卸货，连行李共装二十大车。

这里所谓“青目”，就是减免税款。又像他从蔡御史那里获得的那样，蔡御史带着西门庆金钱美色贿赂的陶醉回到扬州任上，凭自己的巡盐职权，一张批文就使西门庆比别的商人早掣取准盐三万引，西门庆将这三万引准盐高价卖出，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那片获利最大的缎子铺，就是靠兴贩盐引所得而开办的。

第四节 《金瓶梅》中的文化娱乐生活

一 戏剧演出

运河都市高官众多，交际场合多有戏剧演出。第十七回写道：“帅府周守备生日。西门庆封五星分资，两方手帕，打选衣帽齐整，骑匹大白马，四个小厮跟随，往他家拜寿。席间，也有夏提刑、张团练、荆千户、贺千户一班武官儿饮酒，鼓乐迎接，搬演戏文。”说明当时官吏做生日，一般有戏剧演出助兴。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为了在家迎接新上任的蔡御史，“与来保、贲四骑快马先奔来家，预备酒席，门首搭照山彩棚，两院乐人奏乐，叫海盐戏并杂耍承应”。豪华宴席之外，另演海盐戏并杂技，这是多么奢侈的排场。

运河都市富豪杂沓，红白喜事都有戏剧演出点缀。第四十回写西门庆为与乔大户结儿女亲家，安排道：“明早叫来兴儿，买四盘肴品，一坛南酒送去就是了。到明日，咱家发柬，十四日也请他娘子，并周守备娘子、荆都监娘子、夏大人娘子、张亲家母。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教贲四叫将花儿匠来，做几架烟火。王皇亲家一起扮戏的小厮，叫他来扮《西厢记》。往院中再把吴银儿、李桂姐接了



来。你们在家看灯吃酒，我和应二哥、谢子纯往狮子街楼上吃酒去。”结亲庆贺的重要内容是看戏，西门庆点名要演出《西厢记》，而且由王皇亲家的小生登台演主要角色。第四十二回照应着写：“却说前厅王皇亲家二十名小厮，两个师父领着，挑了箱子来，先与西门庆磕头。西门庆吩咐西厢房做戏房，管待酒饭。不一时，周守备娘子、荆都监母亲荆太太与张团练娘子，都先到了。俱是大轿，排军喝道，家人媳妇跟随。月娘与众姊妹都穿着袍出来迎接，至后厅叙礼。与众亲相见毕，让坐递茶，等着夏提刑娘子到才摆茶。不料等到日中，还不见来。小厮邀了两三遍，约午后才喝了道来，抬着衣匣，家人媳妇跟随，许多仆从拥护。鼓乐接进后厅，与众堂客见毕礼数，依次序坐下。先在卷棚内摆茶，然后大厅上坐。春梅、玉箫、迎春、兰香，都是齐整妆束，席上捧茶斟酒。那日扮的是《西厢记》。”王皇亲家的戏班子连同那个小厮都来演出，他们带了一应行头，然后向来宾演出《西厢记》，可见当时运河流域富贵人家人际交往中戏剧演出助兴是必不可少的。

第六十三回西门庆为李瓶儿办丧事，“晚夕，亲朋伙计来伴宿，叫了一起海盐子弟搬演戏文。李铭、吴惠、郑奉、郑春都在这里答应。西门庆在大棚内放十五张桌席，……点起十数枝大烛来，堂客便在灵前围着围屏，垂帘放桌席，往外观戏。”“当时众人祭奠毕，西门庆与敬济回毕礼，安席上坐。下边戏子打动锣鼓，搬演的是‘韦皋、玉箫女两世姻缘’《玉环记》。一时，吊场，生扮韦皋，唱了一回下去。贴旦扮玉箫，又唱了一回下去。”丧事场面宏大，来宾众多。看戏前来宾先吊唁，西门庆领着女婿陈敬济回礼；这次是由海盐子弟唱的《玉环记》。《玉环记》是明代中期戏曲作家屠隆妻子杨柔胜的剧本，《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昙花记·跋》称她：“有才色，工音律。屠亦能为新声，颇以自炫，每剧场辄阑时，屠亦入群优中作技。夫人从帘箔中见之，或劳以香茗，因以外传。”《玉环记》剧情夫妻恩爱、两世姻缘，在李瓶儿丧事上演出，用心可见。

第六十五回披露,李瓶儿三七那天,“先是歌郎并锣鼓地吊来灵前参灵,吊《五鬼闹判》、《张天师着鬼迷》、《钟馗戏小鬼》、《老子过函关》、《六贼闹弥陀》、《雪里梅》、《庄周梦蝴蝶》、《天王降地水火风》、《洞宾飞剑斩黄龙》,各样百戏吊罢,堂客都在帘内观看。参罢灵去了,内外亲戚都来辞灵烧纸,大哭一场”。可见戏剧演出数目之多,延期之长。

第八十回西门庆死后,守灵者“也有二十余人,叫了一起偶戏,在大卷棚内,摆设酒席伴宿。提演的是‘孙荣、孙华杀狗劝夫’戏文。堂客都在灵旁厅内,围着帟屏,放下帘来,摆放桌席,朝外观看”。偶戏,木偶或皮影一类有演员配音的戏。剧目“孙荣、孙华杀狗劝夫”,应为元末明初人徐臬的《杀狗记》,该剧写富家子弟孙华交结市井无赖,并受他们的挑拨而将胞弟孙荣赶出家门。孙华妻杨月真为了劝夫悔改,杀了一条狗扮为人尸放在门外,使酒醉归来的孙华误以为祸事临门。他的那帮市井朋友不但不肯应邀帮忙,反向官府告发,还是孙荣为他“埋尸”避祸。最后真相明了,兄弟重归于好。此剧用“偶戏”形式演出,止见于《金瓶梅》。

二 剧曲演唱

即只唱戏剧的部分唱段,演出场面要小得多,用于富人家小规模交际场合。第十九回夏提刑过生日:“八月初旬,与夏提刑做生日,在新买庄上摆酒。叫了四个唱的,一起乐工,杂耍步戏。”步戏就是带着乐器边走边演奏边唱,杂耍略等于杂技表演。第三十六回西门庆接待蔡状元,“因在李知县衙内吃酒,看见有一起苏州戏子唱的好,旋叫了四个来答应。”西门庆找四个苏州戏子,是因为蔡状元是南方人;四个戏子唱堂会,表演了《香囊记》的一折,《玉环记》的《画眉序》曲子。第二十七回西门庆在家避暑,与妻妾饮酒取乐,“酒过三巡,西门庆叫春梅取月琴来,教与玉楼,取琵琶,教金莲弹”,点名要孟玉楼、潘金莲唱一套“赤帝当权耀太虚”给他听。金

莲非要李瓶儿也拿了桩乐器儿三人一块演唱，西门庆只得“令春梅旋取了一副红牙象板来，教李瓶儿拿着”在旁代板。孟玉楼、潘金莲“方才轻舒玉指，款跨鲛绡，合着声唱《雁过沙》”。后来孟玉楼、李瓶儿要走，西门庆又取过月琴来，教玉楼弹着，西门庆拍手，众人齐唱“梁州序”、“节节高”二曲送行，“众人唱着不觉到角门首。玉楼把月琴递与春梅，和李瓶儿往后去了”。西门庆把潘金莲留下来，二人风流一会，潘金莲“把月琴跨在胳膊上，弹着找《梁州序》后半截”唱完。这些也属剧曲演唱。

三 综合演艺

第五十八回写西门庆过生日，既有戏剧演出，又有剧曲配乐演唱，还有队舞表演。“那日，乔大户没来。先是杂耍百戏，吹打弹唱。队舞才罢，做了个笑乐院本。割切上来，献头一道汤饭。……四个唱的弹着乐器，在旁唱了一套寿词。西门庆令上席分头递酒。下边乐工呈上揭帖，刘、薛二内相拣了‘韩湘子度陈半街’《升仙会》杂剧。”演出有杂技、滑稽院本，刘、薛二人点演《升仙会》杂剧。可见明后期杂剧还相当成行。当天的生日庆贺，还有个别演出，“当下，郑月儿琵琶，齐香儿弹筝，坐在交床上，歌美韵，放娇声，唱了一套《越调·斗鹌鹑》‘夜去明来’。董娇儿递吴大舅酒，洪四儿递应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换盏，倚翠偎红”。这是专门为吴大舅和应伯爵的小场面演出，节目内容是剧曲。

第五节 《金瓶梅》与明代艺人生存状态

《金瓶梅》所写明代艺人，按从艺内容和方式可分为小优、乐工、戏子三类；他们的谋生手段主要是为达官贵人、富豪巨商献艺，获取雇金或赏银。一般地讲，技艺高超的艺人物质生活不一定很困窘，但富贵人家倡优视之，他们失去人权和尊严，其演艺生涯充

满屈辱和痛苦。

一 小优

小优就是年轻戏子，但《金瓶梅》所写小优，都是男性，第十六回“西门庆叫过两个小优儿，认的头一个是吴银儿兄弟，名唤吴惠。那一个不认的，跪下说道：‘小的是郑爱香儿的哥，叫郑奉。’”可见一斑。小优出场达官贵人的聚会，有时气氛融洽。如第三十一回为西门庆唱堂会：“笑院本扮完下去，就是李铭、吴惠两个小优儿上来弹唱。一个操琴，一个琵琶。”因为是庆贺做官，所以小优也显得颇有面子。而有时是很屈辱的，如第十六回郑奉、吴惠二人出场应伯爵生日宴会，宴中众人提及西门庆即将纳李瓶儿为妾，“于是叫伯爵把酒，谢希大执壶，祝实念捧菜，其余都陪跪。把两个小优儿也叫来跪着，弹唱一套十三腔《喜遇吉日》，一连把西门庆灌了三四杯酒。祝实念道：‘哥那日请俺们吃酒，也不要少了郑奉、吴惠两个。’因定下：‘你二人，好歹去。’郑奉掩口道：‘小的们已定伺候。’”西门庆的狐朋狗友跪着，来演唱小曲的郑奉、吴惠也得跪着，跪着边伴奏边演唱，他们怎么不深感耻辱。郑奉掩口答话，恐怕是不掩口就会哽咽失声。其次，小优演出一切听命于雇主，没有人身自由，第三十九回陈敬济深夜向吴月娘、潘金莲报告西门庆行踪说：“今日有大舅和门外花大舅、应三叔、谢三叔，又有李铭、吴惠两个小优儿。不知缠到多咱晚。只吴大舅来了。门外花大舅叫爹留住了，也是过夜的数。”如果迫不得已陪雇主过夜，那么李铭、吴惠很可能被西门庆那样的无耻之徒猥亵。

关于李铭、吴惠的来历，第四十六回写道：“伯爵复到厢房中，和谢希大陪西门庆饮酒，只见李铭掀帘子进来。伯爵看见，便道：‘李日新来了。’李铭扒在地下磕头。西门庆问道：‘吴惠怎的不来？’李铭道：‘吴惠今日东平府官身也没去，在家里害眼。小的叫了王柱来了。’便叫王柱：‘进来，与爹磕头。’那王柱掀帘进入房里，

朝上磕了头，与李铭站立在旁。伯爵道：‘你家桂姐刚才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铭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脸就来了，并不知道。’”官身，就是支应官差；李铭、吴惠与李桂姐是一家。而李桂姐是勾栏女伶，第十一回写西门庆到花子虚家赴宴，席上有两名歌妓演奏器乐，一个吴银儿，一个李桂姐，“‘这位姐儿上姓？端的会唱。’东家未及答应，应伯爵插口道：‘大官人多忘事，就不认的了？这揲箏的是花二哥令翠——勾栏后巷吴银儿。这弹琵琶的，就是我前日说的李三妈的女儿、李桂卿的妹子，小名叫做桂姐。你家中见放着他的亲姑娘。如何推不认的？’”既然吴银儿、李桂姐是勾栏女伶，那么李铭、吴惠是勾栏男性歌伎无疑。第四十六回中应伯爵说吴铭等小优“他这行人故虽是当院出身，小优儿比乐工不同，一概看待也罢了，显的说你我不帮衬了”。当院，即从事色情或音乐服务的行院，也即勾栏。

《金瓶梅》前半部出场的小优，通常是李铭、吴惠、郑奉、王柱四人，第二十回“不觉到二十五日，西门庆家中吃会亲酒……李铭、吴惠两个小优上来弹唱，间着清吹”。这次演出，是弹唱加清吹。弹唱，是一边唱曲一边用乐器伴奏；清吹，则是只演奏器乐而不唱。第四十八回西门庆清明节请客，“小优儿是李铭、吴惠、王柱、郑奉”。这是他们四人同场演出。《金瓶梅》后半部分出场的是另外四位小优。第六十五回“众人吃毕，西门庆叫上四个小优儿，问道：‘你四人叫甚名字？’答道：‘小的叫周采、梁铎、马真、韩毕。’伯爵道：‘你不是韩金钊儿一家？’韩毕跪下说道：‘金钊儿、玉钊儿是小的妹子。’西门庆因想起李瓶儿来：‘今日摆酒，就不见他。’吩咐小优儿：‘你们拿乐器过来，唱个“洛阳花，梁园月”我听。’”韩毕是金钊、玉钊的哥哥。金钊本人也卖唱，第十五回写道，吴月娘等女眷来到狮子街灯市临街楼赏花灯，“叫了两个唱的——董娇儿、韩金钊儿，弹唱饮酒”。兄妹同卖艺，哥为小优，妹为歌妓。

还有无名小优。第五十三回写西门庆到刘太监庄上赴宴，“一班小优儿上来磕了头，左右献过茶，当值的就递上酒来。黄、安二主事起身安席坐下。小优儿拿檀板琵琶，弦索箫管上来，合定腔调，细细唱了一套《宜春令》‘青阳候烟雨淋’”。《金瓶梅》的叙事着眼点总是西门庆，而这次是刘太监做东，小优是别人请的，西门庆看着眼生，作为客人又不好意思问，所以也就没写出小优的名字来。不过，他们所唱的曲目很新鲜，音色也出奇的好，可能不是本地曲目。

二 勾栏女伶

优伶，在古代社会地位低下；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女性，她们向人展示的是美，收获却是欺辱。

经常在西门庆家里献艺的有四个歌妓，第二十回写道，“不觉到二十五日，西门庆家中吃会亲酒，安排插花筵席，一起杂耍步戏。四个唱的，李桂姐、吴银儿、董玉仙、韩金钊儿，从晌午就来了”。她们四人，都是勾栏女伶，有声乐器乐表演特长。封建社会人们谋生很难，女伶地位卑微，备受欺压，还往往亲族相继。第九十六回写道：“月娘那里肯放，教两个妓女在跟前跪着弹唱劝酒。分付：‘你把好曲儿孝顺你周奶奶一个儿。’……春梅因问那两个妓女：‘你叫甚名字？是谁家的？’两个跪下说：‘小的一个是韩金钊儿妹子韩玉钊儿，一个是郑爱香儿侄女郑娇儿。’”女伶演艺生涯最大的痛苦是客人颐指气使，没有精神自由和人格尊严。而且卖艺生涯中，如遇富人看中，还要出卖肉体。第十一回写西门庆在花子虚家看上李桂姐，就送她回家，“次日，使小厮往家去，拿五十两银子，段铺内讨四件衣裳，要梳笼桂姐。那李娇儿听见要梳笼他的侄女儿，如何不喜？连忙拿了一锭大元宝，付与玳安，拿到院中打头面，做衣服，定桌席，吹弹歌舞，花攒锦簇，饮三日喜酒。应伯爵、谢希大又约会了孙寡嘴、祝实念、常峙节，每人出五分分子，都来贺他。铺的盖的都

是西门庆出。每日大酒大肉，在院中玩耍，不在话下”。这样，李桂姐就成了西门庆的性奴。

三 专业戏子

明代有教坊司，专门培训优伶、排演剧目，支应官府演出要求。《金瓶梅》第三十一回写太监刘公公到西门庆府上，“阶下一派箫韶，动起乐来。当日这筵席，说不尽食烹异品，果献时新。须臾酒过五巡，汤陈三献，教坊司俳官簇拥一段笑乐院本上来”。小说还用四句诗描写艺人的演出情况，“百宝妆腰带，珍珠络臂鞦。笑时能近眼，舞罢锦缠头”。除了官戏，民间还有私人戏班，第二十回西门庆在家吃会亲酒，其中有“乐人撮弄杂耍数回，就是笑乐院本”。当时没有官员在场，可能是私家戏班演出。第四十八回西门庆整修坟地，“三月初六日清明，预先发柬请了许多人，搬运了东西酒米下饭菜蔬，叫的乐工、杂耍、扮戏的”。也应是私人戏班演出。

当时大戏盛行，连演数天，恐怕戏班需要很多演员。第六十四回写西门庆为李瓶儿办丧事，有众多高官前来吊孝，有许多演艺节目侍候。先后出场的有海盐戏班，“西门庆道：‘老公公，学生这里还预备着一起戏子，唱与老公公听。’薛内相问：‘是那里戏子？’西门庆道：‘是一班海盐戏子。’”有道情，“子弟鼓板响动，递了关目揭帖。两位内相看了一回，拣了一段《刘智远白兔记》唱了还未几折，心下不耐烦，一面叫上两个唱道情的去，打起渔鼓，并肩朝上，高声唱了一套‘韩文公雪拥蓝关’故事下去。”有唱连轴大戏的戏班，“叫上子弟来吩咐：‘还找着昨日《玉环记》上来。’因向伯爵道：‘内相家不晓的南戏滋味。早知他不听，我今日不留他。’伯爵道：‘哥，到辜负你的意思。内臣斜局的营生，他只喜《蓝关记》、捣喇小子山歌野调，那里晓的大关目悲欢离合！’于是下边打动鼓板，将昨日《玉环记》做不完的折数，一一紧做慢唱，都搬演出来。”这些节目都是私人优伶搬演。第七十四回中蔡九知府点的《双忠记》也是大戏，所

以当时只“演了两折”。大戏班子演员阵容大，但演出报酬却不高，六十四回搬演《玉环记》的艺人，折腾了一个晚上，西门庆只“与了戏子四两银子，打发出门。”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当时的专业戏子有明确角色戏路，旦角也多由男角来演。第三十六回写道：“不一时，四个戏子跪下磕头。蔡状元问道：‘那两个是生旦？叫甚名字？’内中一个答道：‘小的妆生，叫荀子孝。那一个装旦的叫周顺。一个贴旦叫袁琰。那一个装小生的叫胡馐。’安进士问：‘你们是那里子弟？’荀子孝道：‘小的都是苏州人。’安进士道：‘你等先妆扮了来，唱个我们听。’四个戏子下边妆扮去了。西门庆令后边取女衣钗梳与他，教书童也妆扮起来。共三个旦、两个生，在席上先唱《香囊记》。大厅正面设两席，蔡状元、安进士居上，西门庆下边主位相陪。饮酒中间，唱了一折下来，安进士看见书童儿装小旦，便道：‘这个戏子是那里的？’西门庆道：‘此是小价书童。’安进士叫上去，赏他酒吃，说道：‘此子绝妙而无以加矣！’蔡状元又叫别的生旦过来，亦赏酒与他吃。因分咐：‘你唱个《朝元歌》《花边柳边》。’”连西门庆的书童都下场扮演，才凑了三旦两生，勉强表演《香囊记》。

四 地位最低的艺人——乐工

乐工在富贵人家办事待客时，一般在别人之前，如四十六回西门庆家在大门口庆元宵，“先是六个乐工，抬铜锣铜鼓在大门首吹打。吹打了一回，又请吹细乐上来”。目的是招徕围观，以壮家威，后来“西门庆因叫过乐工来吩咐：‘你每吹一套“东风料悄好事近”与我听。’正值后边拿上玫瑰元宵来，众人拿起来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入口而化，甚应佳节。李铭、王柱席前拿乐器，接着弹唱此词，端的声韵悠扬，疾徐合节。这里弹唱饮酒不题”。这是在院子里演奏。乐工出现的场合，有时喜庆，如四十五回西门庆庆贺与乔家定亲，“西门庆把屏风拂抹干净，安在大厅正面，左右看视，金碧彩霞

交辉。因问：‘吹打乐工吃了饭不曾？’琴童道：‘在下边吃饭哩。’西门庆道：‘叫他吃了饭来吹打一回我听。’于是厅内抬出大鼓来，穿廊下边一带安放，铜锣铜鼓吹打起来，端的声震云霄，韵惊鱼鸟”。有时肃穆，如第四十八回西门庆祭祖，但没写演奏具体情况。

西门庆也经常动用教坊官乐。有时候采用协商式，第三十一回刘公公拜访西门庆，“西门庆再三款留不住，只得同吴大舅、二舅等，一齐送至大门。一派鼓乐喧天，两边灯火灿烂，前遮后拥，喝道而去。”第三十二回西门庆“打发乐工等酒饭吃了，分咐：‘你每明日还来答应一日，我请县中四宅老爹吃酒，俱要齐备些。临了一总赏你每罢。’众乐工道：‘小的每无不用心，明日都是官样新衣服来答应。’吃了酒饭，磕头去了。”虽是吩咐，但口气还算婉转。有时候采用拘传方式，如第三十一回，“到了上任日期，在衙门中摆大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乐工承应吹打弹唱”。当然，教坊乐工职责也在此。第七十六回写任医官出西门家院，“走到前厅院内，见许多教坊乐工伺候，因问：‘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门庆道：‘巡按宋公连两司官，请巡抚侯石泉老先生在舍摆酒。’这任医官听了，越发骇然尊敬，在前门揖让上马，打了恭又打恭，比寻常不同，倍加敬重。”官员应酬，就动用官乐，不用掏自己腰包；但替巡抚做东请客，恐怕是要破费些的。所以，《金瓶梅》所写的清河县，是高官豪商享乐的天堂，是包括艺人在内的下层群众的地狱。

第十一章

《红楼梦》与运河文化

《红楼梦》被认为是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生活图景,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而从地域上讲,《红楼梦》主要反映的是清朝康乾盛世的运河文化。

第一节 作者生活经历和作品自传成分

一 曹雪芹主要生活在运河流域

曹雪芹(约 1715~1764),名霁,号雪芹。先世为汉人,明初迁到关外,祖居辽阳。后来成为明军的军官,与清人作战失败投降,被编入满洲旗籍,隶属满洲正白旗,为内务府的“包衣”。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曾做过康熙的奶妈,祖父曹寅做过康熙的侍读。从康熙二年至雍正五年,曾祖曹玺、祖父曹寅、父亲曹颀、叔父曹俯,相继担任“江宁织造”达六七十年之久,长期生活在江南运河流域。“织造”是专为宫廷采办丝织品和各种日用品的官职,官阶虽不高,但是非皇亲不能充任。康熙六次南巡,有五次住江宁织造署内,其中有四次由曹家接待,可见曹家实为声势显赫的贵族世家。雍正五年曹家因事被罢抄家,家道从此败落,由南方迁回北京。后来曹



雪芹移居北京西郊香山一带,长期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困生活,就在这里,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①,写出《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初题“石头记”。后来因为爱子夭折,他忧伤过度,加之贫病交迫,终于在壮年长辞人世。纵观曹雪芹一生,有三点偶得注意:

一是生活范围基本上在运河流域。曹雪芹在小时候生活在金陵,在江宁织造署过着无忧无虑、富贵豪华的生活。其后曹俯丢官抄家以后,曹雪芹随全家北返,后半生在北京过着清贫的生活,穷尽精力著作《红楼梦》,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死去,葬在北京西郊。清代南京在运河中游,北京在运河北端,《红楼梦》所写主要是作者在运河流域的经历见闻,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是前后期生活状况有天壤之别。从曹玺做江宁织造开始,接着曹寅当苏州织造、江宁织造,最后是曹俯做江宁织造,都在南京做官,三代人约世袭这个职务六十年。再加上此前四十年清军入关,从军功起家,曹寅的曾祖母曾经是康熙的奶妈,确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而后期,曹家在皇权斗争中失势,曹雪芹在北京西郊一度“举家食粥”的地步,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压迫的体验。

三是困扰曹雪芹一生的思想矛盾就是,对家族鼎盛期的怀念和对少年时期美好生活的追忆,使他对封建专制政体有一定程度的好感,但后期生活艰难的体验,又使他对造成自己生活状况一蹶不振、每况愈下的封建专制政体怀有切骨仇恨。康熙在世时曹家四次接驾,造成巨额银两亏空,雍正继位后因为曹家在皇子争位中没有站在自己一方而耿耿于怀,借口账目亏空对曹家进行毫不留情的清算,这就使曹雪芹对封建专制政体有恨。

^① 本章所节录作品原文,出自中华书局 2005 年 4 月版《中国文学四大名著·红楼梦》。

二 《红楼梦》虽不是自传体小说,但曹家的兴衰和曹雪芹的经历是作品的主要素材

曹家接驾与贾家省亲。“跟苏州的关系更为密切的,是雪芹的祖父曹寅和舅祖李煦。曹寅于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由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出任苏州织造,在苏州三年,后调南京;接着是曹寅的妻兄李煦继任苏州织造,长达三十年之久(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他们两家均为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人,曹寅的母亲孙氏和李煦的母亲文氏都曾做过康熙幼年的保母,所以他俩同时成了皇帝的亲信。康熙后四次南巡,经南京时住在江宁织造府曹家,经苏州时住在苏州织造府李家,他俩共同担当了‘接驾’的重任。曹寅死后,雪芹的父辈曹颀、曹頔继承江宁织造之职,都是由李煦提携照应的,南京与苏州的亲眷也时有往来。”^①上述情况在《红楼梦》中得到间接反映,卷十六写元妃省亲确定下来,赵嬷嬷与王熙凤说起祖上接驾的事:

赵嬷嬷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这样说起,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大小姐了?”贾琏道:“这何用说?不然,这会子忙的是什么?”凤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赵嬷嬷道:“唉哟!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说起来……”凤姐忙接道:“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

^① 《曹雪芹江南家世考》11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赵嬷嬷道：“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儿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如今还有现在江南的甄家，噯哟哟，好气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凤姐道：“我常听见我们太爷说，也是这样的，岂有不信的？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两段描写假中有真，其中“甄家”应指曹雪芹祖上四次接驾，“贾家”和“王家”应指李煦两次接驾的事。

今人周汝昌认为：曹家的败落并不是从雍正六年就直线发展下去的，曹家在雍正六年被抄，那一年曹雪芹5岁，后来在雍正乾隆之交小有转机，也就是曹雪芹13岁之前，还过了一段“锦衣玉食”的生活。曹家的灭顶之灾是第二次被抄家，当时曹雪芹13岁，但乾隆“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雍正之弟，乾隆之叔）与弘晰、弘升、弘昌、弘皎等结党营私，往来诡秘’，请将庄亲王允禄及弘晰、弘升俱革去王爵、永远圈禁，余人亦都革爵。”^①周先生的推论，这次曹家被牵连，才是致命灾难。

《红楼梦》有浓重的“末世”之感，是曹雪芹自己5岁、13岁两次遭遇抄家厄运心灵创伤在作品中的流露，第一回中说贾雨村“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这是曹雪芹本人晚年生活的写照；第五回中说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这是对同

① 《曹雪芹小传》5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

宗姐妹不幸命运的哀叹，也反映了他们的同病相怜。

第二节 《红楼梦》以运河流域为背景

一 卷一暗示读者，《红楼梦》的生活原型(甄家)在江南运河流域，虚构的故事(贾家)在江南运河流域

“将甄事隐去，用贾雨村言”是曹雪芹构思《红楼梦》最见功夫的手笔。“按那石上书云：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狭窄，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苏州甄家，即是曹雪芹家的缩影。

炎夏的一天，士隐于书房不觉朦胧睡去。梦中遇到一僧一道，且行且谈“绛珠还泪”和“通灵虚幻”之事，梦醒后走出书房，见到真的一僧一道，那僧道二人却指士隐女儿英莲是“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走了来。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由甄士隐过渡到贾雨村，再由贾雨村与冷子兴演说贾府，有生活原型的情节就渐次展开了。

“甄士隐去，贾雨村言”，是曹雪芹逃避文字狱灾难的文学手段。卷二中贾雨村说他在金陵的甄家曾教馆，发现甄家公子“虽是

启蒙，却比一个举业的还劳神”，上课非得女孩陪读才学得进，挨打时就叫姐姐妹妹，而贾家的“衔玉之儿”，也常在嘴上念叨什么“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继续将甄家和贾家交互着写，造成扑朔迷离的效果。将真人真事隐去，另用假的人名敷衍故事，以假乱真，使他人无法捏造罪名迫害作者；以真引假，使虚构的故事更典型地反映社会本质。这是曹雪芹对中国小说表现艺术的巨大贡献。尽管如此，但他并不掩饰《红楼梦》所写是运河流域的人事，甄士隐是苏州人，贾雨村是湖州人，都在江南运河重镇。

二 《红楼梦》所写贾府的乘龙快婿林如海为官扬州

卷二写贾雨村被劾失官后，到扬州寻求发达机会，“闻得今岁盐政点的是林如海。“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为巡盐御史，到任未久。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只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虽系世禄之家，却是书香之族。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没甚亲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五十，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于去岁死了。虽有几房姬妾，奈命中无子，亦无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爱之如掌上明珠，见他生得聪明俊秀，也欲使他识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曹雪芹采取先从外围写起，渐次写及贾府的构思，第一回写“甄家”，第二回写贾家的姻亲林家，然后由贾雨村带黛玉入贾府，描述重点才浮出水面。

林如海是苏州人，在扬州为官。出身侯门，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官至巡盐御史。写林家意图有二，一是以林家烘云托月，贾府女婿尚且如此，何况贾府；二是以林家引出贾家，林家人丁不盛，膝

下只有一女,后来贾夫人病故,如海不得不让弱女进入贾府,进而水到渠成地大写特写贾家。

三 贾府地在石头城金陵,是个钟鸣鼎食之家

《红楼梦》是否写运河流域人事,关键要看贾府所在何处。卷二写贾雨村扬州街头遇冷子兴,“子兴叹道:‘老先生休如此说。如今的这荣宁两府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雨村道:‘当日宁荣两宅,人口也极多,如何便萧索了?’子兴道:‘正是,说来也话长。’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外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边一带花园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苍蔚洒润之气,那里像个衰败之家?’子兴笑道:‘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也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明写荣国府地在金陵。《红楼梦》叙事以贾府为中心,呈网状辐射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然贾府地在运河重镇,那么小说主要反映运河文化无疑。

这段描述还传递了另外一个信息,贾府在走下坡路,这也与曹雪芹的生活经历相符。曹雪芹出生后,贾家是曹府当家作主,当时雍正正在位,先把曹家亲戚李煦抄了家,并准备追查曹家亏空的事,曹府对此一筹莫展,所以小说里说“这宁荣两府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曹雪芹当时虽然年幼,但并不妨碍他日后弄明白家族兴衰原因,而《红楼梦》写于他的晚年,所以本回书中冷子兴对贾府的“演说”,的确反映了雍正初年打击康熙旧臣引起的风波。政

治风暴的根源在北京，而影响所及却在南京。

四 林黛玉随贾雨村从扬州到南京

第三回写贾雨村在张如圭那里听到朝廷有重新起用罢免官员的意思，便按照冷子兴的指点回去向林如海提出请求，正好林如海也有意请贾雨村带小女到外婆贾家去，于是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这样，林黛玉就从扬州到了南京的贾府。“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随了奶娘及荣府几个老妇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只船，带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扬州南京仅一江之隔，乘船当由淮扬运河进入长江，然后由长江进入秦淮河，在金陵下船。他们“一日到了京都，雨村先整了衣冠，带了小童，拿了‘宗侄’的名帖，至荣府门前投了。彼时贾政已看了妹丈之书，即忙请入相会，见雨村相貌魁伟，言谈不俗，且这贾政最喜的是读书人，礼贤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风；况又系妹丈致意，因此优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帮助，题奏之日，谋了一个复职，不上二月，便选了金陵应天府，辞了贾政，择日到任去了”。这里又说金陵是“都中”、“神京”、“应天府”，而清代只称金陵为“江宁府”，如此称呼似乎在明朝才合适，好像小说写的是前朝的事，其实这又是曹雪芹避免蒙受文字狱之灾而设的另一层迷雾。

这卷书以新进贾府的林黛玉视野，展示了金陵城的繁华和宁、荣二府的尊贵。“自上了轿，进了城，从纱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与别处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道：‘这是外祖的长房了。’又往西不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却不进正门，只由西角门而进。轿子抬着走了一箭之远，将转弯时，便歇了轿，后面的婆子已都下来了，另换了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抬着轿子，众

婆子步下跟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又退了出去，众婆子上前打起轿帘，扶黛玉下了轿。”这段描写，重在展示贾府门第高贵。首先，贾府门匾是皇帝亲题；宁、荣二府大门两边都有“大石狮子”；正门是“三间兽头大门”，除非帝王临幸，否则正门不开；一般人只从角门出入，这是王侯门面。其次，贾府的仆人穿戴行头已与常人不同，婆子出外接人要坐轿，守门男仆“华冠丽服”，是何等排场。再次，贾府迎接亲戚，不同地段有不同身份的仆人抬轿，大门外是一般轿夫，大门内是干净小厮，小厮只管抬轿，打开轿帘扶女客下轿的是有身份的婆子。

也写了贾府的富有。“林黛玉扶着婆子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正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风。转过屏风，小小三间厅房，厅后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是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雀鸟。”这是贾母住处，垂花门、游廊、穿堂、插屏、三间厅，然后才是正房大院，先前小厮从大门一箭之深处接了轿子，走了一段路才到了垂花门，垂花门以里又转了这么多廊、堂、厅、院才到贾母大院，恐怕贾母大院才仅仅是荣国府的中心地带，可想而知这荣国府是何等地深广，恐怕有如皇宫大内。而贾府的女眷穿戴又不亚于皇妃，“只见一群媳妇丫鬟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散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王熙凤如此豪华的打扮，身上之物恐怕价值连城。假如当年的曹家真的如此奢华，那就无怪雍正皇帝要抄他的家了。社会贫富不均，穷人无立锥之地，无衣食御寒充腹，而贵族却富拟帝王。不要说曹家还亏空国库数十万两银子，就是不亏空也该抄尽家财。

五 运河重镇官商一体的豪门子弟行凶杀人，在“护官符”庇护下逍遥法外

卷四写贾雨村上任应天府，“一下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乃是两家争买一婢，各不相让，以至殴伤人命。彼时雨村即拘原告之人来审。那原告道：‘被殴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不想系拐子拐来卖的。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银子，我家小主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这拐子又悄悄的卖与薛家，被我们知道了，去找拿卖主，夺取丫头。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仆已皆逃走，无踪迹了，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求太老爷拘拿凶犯，以扶善良，存殁感戴天恩不尽！’”贾雨村本来要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令他们实供藏在何处，以便动海捕文书追捕在逃凶犯。但一个门子示意他不能发签，并在僻静处问他为何没有护官符：“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作‘护官符’。方才所说的这薛家，老爷如何惹得他！他这件官司并无难断之处，从前的官府，都因碍着情分脸面，所以如此。”原来薛家公子唆使手下人打死冯家少爷，便没事人一般，只管进京办事，留下兄弟、奴仆料理官事，这些事前任官员也知道，但为保官不敢得罪薛家，所以拖了一年不曾断下。贾雨村得知薛家与贾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后，最后只得按门子所说糊涂了断了官事。

薛家是典型的皇商富贵之家。“亦系金陵人氏，本是书香继世之家，……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这薛公子学名薛蟠……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旧日的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其余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

措办。……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承局、总管、伙计人等，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便趁时拐骗起来，京都几处生意，渐亦销耗。薛蟠素闻得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正思一游，便趁此机会，一来送妹待选，二来望亲，三来亲自入部销算旧帐，再计新支，其实只为游览上国风光之意。……人命官司，他却视为儿戏，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红楼梦》所写薛蟠，很像八旗子弟，清廷给他们许多特权和优厚待遇，只知道吃喝玩乐、胡作非为；所写的薛家，应该与曹家坐镇江宁、替皇宫生产和转运江南丝绸很相近，大概是拿户部的钱，替朝廷采购物品。所不同的是曹家是坐守江宁、统管江南，宠臣色彩较浓；而薛家是在各省设立分号，走动经营，皇商身份突出。

《红楼梦》反映的主要是雍正、乾隆年间的事，当时统治阶级励精图治精神渐失，腐败势头愈来愈无法控制，那么薛蟠行凶杀人竟能逍遥法外、一应世事全然不知而又能一路风光志得意满，就是清统治者日趋腐败的集中表现。

六 代表满清亲贵的贾府巧取豪夺江南浮财

卷四十八写贾琏挨了贾赦的打。原因是贾赦看上了穷儒石呆子的二十把旧扇子，让贾琏高价去买，偏那石呆子死活不卖：“我饿死冻死，一千两银子一把，我也不卖！”贾赦就把事情告诉贾雨村，贾雨村设了个法子，讹石呆子拖欠官银，拿他到衙门里去，把这扇子抄了来，作官价送与贾赦。贾赦奚落贾琏不如贾雨村有能为，贾琏不服，“为这点子小事弄的人家倾家败产，也不算什么能为”。贾赦恼羞成怒，就对贾琏大打出手。

卷一〇七贾家被抄后，北静王向贾政复述原因说：“主上因御史参奏贾赦交通外官，恃强凌弱。据该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来，贾赦包揽词讼。严鞫贾赦，据供平安州原系姻亲来往，并未干涉官事，该御史亦不能指实。惟有倚势强索石呆子古扇一款是实的，然



系玩物，究非强索良民之物可比。虽石呆子自尽，亦系疯傻所致，与逼勒致死者有间。”可知贾赦为夺扇子还逼死了人命。

可以看出，清朝前期八旗子弟对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对江南汉族知识分子的歧视和压迫是何等的凶残。石呆子家里保存有古扇，必是书香门第出身；现在穷得“连饭也没的吃”但就是不卖扇子给贾家，很可能是一位极有反清意识的人。而贾赦代表的是清廷亲贵，他血管里流的是祖上下江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对汉人无情镇压的血，所以他对石呆子这样的汉族文人没有丝毫的体恤，同时又有借刀杀人的狡猾，他在贾雨村面前流露了想要石呆子古扇的意思，贾雨村就找借口抄了石呆子的家，把抄得的扇子以官价卖给了贾赦。我们透过平儿温情脉脉的叙述，不难看到代表八旗亲贵的贾家借助官府对汉族寒门文人一次血淋淋的戕害。

当时江南运河一带是最富庶的地方，能够到这里做地方大员的都是满清亲贵。这些满清亲贵在为皇帝搜刮财富的同时，也把财富装满了个人腰包。贾府被抄时，仅荣国一府浮财的不完全登记就让人瞠目结舌，“赤金首饰共一百二十三件，珠宝俱全。珍珠十三挂。倭金盘二件。金碗二对。金抢碗二个。金匙四十把。银大碗八十个。银盘二十个。三镀金象牙筋三把。镀金执壶四把。镀金折盂三对。茶托二件。银碟七十六件。银酒杯三十六个。黑狐皮十八张。青狐皮六张。貂皮三十六张。黄狐三十张。猞猁狲皮十二张。麻叶皮三张。洋灰皮六十张。灰狐腿皮四十张。酱色羊皮二十张。猞猁皮二张。黄狐腿二把。小白狐皮二十块。洋呢三十度。毕叽二十三度。姑绒十二度。香鼠筒子十件。豆鼠皮四方。天鹅绒一卷。梅鹿皮一方。云狐筒子二件。貉崽皮一卷。鸭皮七把。灰鼠一百六十张。獾子皮八张。虎皮六张。海豹三张。海龙十六张。灰色羊四十把。黑色羊皮六十三张。元狐帽沿十副。倭刀帽沿十二副。貂帽沿二副。小狐皮十六张。江貉皮二张。獭子皮二张。猫皮三十五张。倭股十二度。绸缎一百三十

卷。纱绫一百八十卷。羽线绉三十二卷。翟翟三十卷。妆蟒缎八卷。葛布三捆，各色布三捆。各色皮衣一百三十二件。棉夹单纱绢衣三百四十件。玉玩三十二件。带头九副。铜锡等物五百余件。钟表十八件。朝珠九挂。各色妆蟒三十四件。上用蟒缎迎手靠背三分。宫妆衣裙八套。脂玉圈带一条。黄缎十二卷。潮银五千二百两。赤金五十两。钱七千吊。”贾府，再加上史府、王府、薛府，他们富可敌国，但他们的财富都是像谋取古扇那样巧取豪夺来的。

七 代表八旗子弟的贾府在运河流域享受的特权

《红楼梦》所写的贾府，实际上是清前期八旗子弟的代表。他们奢侈生活的来源有三：

一是朝廷给他们以人口计的恩赐和俸银，卷五十三写道：“贾珍因问尤氏：‘咱们春祭的恩赏可领了不曾？’尤氏道：‘今儿我打发蓉儿关去了。’贾珍道：‘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关了来，给那边老太太送过去，置了祖宗的供，上领皇上的恩，下则是托祖宗的福。咱们那怕用一万银子供祖宗，到底不如这个有体面，又是沾恩锡福。除咱们这样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袭穷官儿家，若不仗着这银子，拿什么上供过年？真正皇恩浩大，想的周到。’……二人正说着，只见人回：‘哥儿来了’。贾珍使命：‘叫他进来。’只见贾蓉捧了一个小黄布口袋进来。贾珍道：‘怎么去了这一日？’贾蓉陪笑回说：‘今儿不在礼部关领了，又在光禄寺库上。因又到了光禄寺，才领了下来。光禄寺官儿们都说，问父亲好，多日不见，都着实想念。’贾珍笑道：‘他们那里是想我？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东西，就是想我的戏酒了。’一面说，一面瞧那黄布口袋，上有封条，就是‘皇恩永锡’四个大字；那一边又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记。一行小字，道是：‘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恩赐永远春祭赏共二分，净折银若干两，某年月日，龙禁尉候补侍卫贾蓉



当堂领讫。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个朱笔花押。”从中可知，清廷对八旗子弟直接由国库供应其生活所需，书中所写贾蓉所领“春祭赏”，只是多项供应中的一项；八旗子弟中的疏远者，只能世袭穷官，也就更依赖清廷对他们的生活保障。

二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所得不义之财。卷十五、十六写王熙凤包揽诉讼谋财，铁槛寺老尼“先在长安县善才庵内出家的时节，那时有个施主姓张，是大财主。他有个女儿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庙里来进香，不想遇见了长安府太爷的小舅子李衙内。那李衙内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发人来求亲，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长安守备的公子的聘定。张家若退亲，又怕守备不依，因此说已有了人家。谁知李公子执意要娶他女儿，张家正无计策，两处为难。不料守备家一知此信，也不问青红皂白，便来作践辱骂，说：‘一个女儿许几家人家？’偏不许退定礼，就打官司告状起来。那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来寻门路，赌气偏要退定礼。”老尼想让贾府给原长安守备施压，让他同意退亲。王熙凤便大包大揽说：“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结果是害了两条年轻的生命，张家失了爱女，守备家失了儿子，李家也赔了钱财，只王熙凤一人中饱私囊，“果然那守备忍气吞声，受了前聘之物。谁知贪财爱势之父母，却养了一个知义多情的女儿，闻得退了前夫，另许李门，他便一条汗巾悄悄的寻了个自尽。那守备之子闻得金哥自缢，他也是个情种，遂投河而死。可怜张李两家没趣，真是人财两空。这里凤姐却安享了三千两，王夫人连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这尚且是王熙凤一人所为的第一次。

三是对佃农敲骨吸髓的盘剥。贾府不仅倚仗官势巧取豪夺、包揽诉讼收受贿赂，而且广占田产，对佃农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卷五十三写乌进孝向贾珍交租，租单上列了那么多物品，在别人看来是非常丰盛的。而且这些东西是佃农在灾荒年景奉献给贾府

的，乌进孝在雪后泥泞的道路上车运走了一个多月才运来的，贾珍看了单子还一个劲怨天尤人，“我这边倒可已，没什么外项大事，不过是一年的费用。我受用些就费些，我受些委屈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请人，我把脸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里，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这一二年倒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由此可知，像贾府这样的奢靡之家，田租搜刮是其生活来源的大宗。

八 《红楼梦》反映清代前期江南风土人情

贾府到苏州买伶人和小尼。卷十七写道：“此时王夫人那边热闹非常。原来贾蔷已从姑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并聘了教习以及行头等事来了。那时薛姨妈另迁于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将梨香院另行修理了，就令教习在此教演女戏；又另派家中旧有曾学过歌唱的女人们——如今皆是皤然老姬，着他们带领管理。就令贾蔷总理其日用出入银钱等事，以及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账目。”贾府为迎接元春省亲，修了大观园，派贾蔷从苏州买来少年女伶，装点风雅。大观园中设有道观，又让林之孝女人从苏州买来尼姑道姑，“采访聘买得十二个小尼姑、小道姑都到了，连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其中妙玉的身份特殊，她本人既是两个嬷嬷、一个丫头的主子，同时又是贾府买来的奴仆。这种情况反映了满清八旗蓄奴习俗和江南旧有的人口买卖。

贾府所在的金陵城，富贵人家过节有许多讲究。五月初一端阳节前打醮。王熙凤选择的打醮地是清虚观，“打醮”就是女眷端阳节到寺院里看戏，把戏演到寺院去。卷二十九写道：“到了初一这一日，荣国府门前车辆纷纷，人马簇簇，那底下凡执事人等，闻得是贵妃做好事，贾母亲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况是端阳节间，因此凡动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齐全的，不同往日。”主妇女仆全部出动，有的乘轿，有的坐车，清虚观热闹非凡，“贾母与众人上



了楼，在正面楼上归坐。凤姐等上了东楼。众丫头等在西楼轮流伺候。贾珍一时来回道：‘神前拈了戏，头一本《白蛇记》。’贾母问：‘《白蛇记》是什么故事？’贾珍道：‘汉高祖斩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满床笏》。’贾母道：‘这倒是第二本也还罢了。神佛要这样，也只得罢了。’又问：‘第三本？’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贾珍退了下来，走至外边，预备着申表、焚钱粮、开戏，不在话下”。得知贾府在庙里打醮，冯紫英家、赵侍郎家，凡一应远亲近友、通好世家都来给贾母送礼，可以推断这在当时是人人皆知的习俗。五月初王熙凤就一个劲喊热，可见写的是金陵物候。

第三节 《红楼梦》与北运河文化

《红楼梦》毕竟是曹雪芹晚年在北京西郊写出的，故事情节反映北国都城文化是必然的。

一 平安州与康乾盛世京畿治安

贾府与平安州有不解之缘。卷六十六：“大家正说话，只见隆儿又来了，说：‘老爷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爷往平安州去。不过三五日就起身，来回得十五六天工夫。今日不能来了，请老奶奶早和二姨儿定了那事。明日爷来，好作定夺。’说着带了兴儿，也回去了。”其中的“老爷”即贾赦，“二爷”指贾琏，贾赦派贾琏到平安州，来回得半月工夫，而且所为乃机密大事。二是第六十七回：“大家果然都想起来，问着薛蟠道：‘怎么不请琏二爷合柳二爷来？’薛蟠闻言，把眉一皱，叹口气道：‘琏二爷又往平安州去了，头两天就起了身的……’”这是贾琏被第二次派往平安州。根据作品描述，平安州很可能即北京南面的通州或保定。

《红楼梦》前八十卷写江南城市都用的是真名，如金陵、扬州、

苏州等,而此处以假名,说明平安州是靠近北京的城市,它靠近京畿,应该是治安极好的所在,但是薛蟠做生意途经时却遭遇盗贼,“天下竟有这样奇事。我同伙计贩了货物,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一路平安。谁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一伙强盗,已将东西劫去……”。平安州不平安,所以薛蟠语气才如此感到意外。

二 大观园里的北国雪寒

卷四十九写天降大雪,人们都穿了御寒衣装,“黛玉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绉纱面白狐狸皮的鹤氅,系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齐踏雪行来,只见众姊妹都在那里;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独李纨穿一件哆罗呢对襟褂子,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氍丝的鹤氅;邢岫烟仍是家常旧衣,并没避雨之衣。一时史湘云来了,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大家约定次日以诗会友。“宝玉因心里记挂着这事,一夜没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来。掀起帐子一看,虽然门窗尚掩,只是窗上光辉夺目,心内早踴躍起来,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来揭起窗屉,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一夜雪下的将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宝玉此时欢喜非常,忙唤人起来,盥漱已毕,只穿一件茄色哆罗呢狐狸皮袄,罩一件海龙小鹰膀褂子,束了腰,披了玉针蓑,戴了金藤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芦雪亭来。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似装在玻璃盆内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扑鼻,回头一看,却是妙玉那边栊翠庵中有十数枝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很明显,这只能是北国的大雪,是曹雪芹成年写书时根据北京的雪景,虚构大观园少男少女雪后切磋诗艺的浪漫。



才子佳人们相约做诗，贾母也来凑热闹。“一时众姐妹来齐，宝玉只嚷饿了，连连催饭。好容易等摆上饭时，头一样菜是牛乳蒸羊羔。贾母便说：‘这是我们有年纪人的药，没见天日的东西，可惜你们小孩子们吃不得。今儿另外有新鲜鹿肉，你们等着吃罢。’众人答应了。宝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饭，就着野鸡瓜子，忙忙的扒拉完了。贾母道：‘我知道你们今儿又有事情，连饭也不顾吃。’就叫：‘留着鹿肉与他晚上吃罢。’凤姐儿忙说：‘还有呢，吃残了的倒罢了。’湘云便和宝玉计较道：‘有新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自己拿了园里弄着，又吃又玩。’宝玉听了，真和凤姐要一块，命婆子送入园去。”众人所吃，都是北京食物，鹿肉烤吃，牛乳蒸羊，又是北方吃法。在吃鹿肉时，少男少女们亲自操刀，使用了“铁炉、铁叉、铁丝蒙”，有的褪去手上的镯子，三个围着火炉儿，便要先烧三块吃。一派北国风情。

三 北方大族的春节习俗

《红楼梦》卷五十三写贾府过春节的全过程。首先是节前物质准备，宁府贾珍收租，乌进孝呈进的交租单子上列着：“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这些物品，尤其是野味，多是北方所产。有了丰厚的物质储备，贾母才能在过年时慷慨施钱，如十五之夕在院中唱戏，贾母说了一个赏字，“早有三个媳妇已经手下预备下小筐，听见一个‘赏’字，走上去，将桌上散钱堆，每人撮了一筐，走出来，向戏台说：‘老祖宗，姨太太、亲家太太赏文豹买果子吃的。’说毕，向台一撒，只听‘豁唧唧’，满台的钱响”。这是何等地气派！

乌进孝乡人种的贾府地在何处，作品有所暗示。一是乌进孝说“今年雪大，外头都是四五尺深的雪”，他运送物品“走了一个月零两日”；二是贾珍所说“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五千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

潦，你们又打擂台，真真是教别过年了”；三是贾蓉说乌进孝的话“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里知道这道理”。由此可知，贾府的田产在运河流域，因为清代运河都近海；这回书所写以北京为背景，江南没有这么雪深的；贾府由乌进孝负责收租的这片田产围着八九个庄子，八九个庄子的人都是贾府佃农；按每天行走三十里计，一个月乌进孝要走九百里，这是夸大之词。本事很可能指曹家在通州的田产六百亩，而这可能是曹家首次被抄后仅留的固定财产。

其次是见驾和祭祖。“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塞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烛，点的两条金龙一般。次日由贾母有封诰者，皆按品级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轿，带领众人进宫朝贺行礼。领宴毕回来，便到宁府暖阁下轿。诸子弟有未随入朝者，皆在宁府门前排班伺候，然后引入宗祠。”其实曹家即使在江南鼎盛时期，因离京太远过年根本不可能见驾；被抄家后虽然身在北京，但身为罪臣犯属，更难见驾。所以这回书是根据作者或见或闻其他在京亲贵所为，想象到贾府头上的。

先见驾后祭祖，宗祠“里边灯烛辉煌，锦幛绣幕，虽列着些神主，却看不真。只见贾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璠献帛，宝玉捧香，贾菖贾菱展拜垫，守焚池。青衣乐奏，三献爵，兴拜毕，焚帛，奠酒。礼毕，乐止，退出”。接着给祖宗献供，“众人围随着贾母至正堂上，影前锦帐高挂，彩屏张护，香烛辉煌；上面正房中，悬着宁荣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两边还有几轴列祖遗像。贾荇、贾芷等从内仪门挨次列站，直到正堂廊下；槛外方是贾敬、贾赦，槛内是各女眷。众家人小厮皆在仪门之外。每一道菜至，传至仪门，贾荇贾芷等便接了，按次传至阶下贾敬手中。贾蓉系长房长孙，独他随女眷在槛里，每贾敬捧菜至，传于贾蓉，贾蓉便传于他媳妇，又传于凤姐、尤氏诸人，直传至



供桌前，方传于王夫人；王夫人传于贾母，贾母方捧放在桌上”。写得非常隆重、逼真，可以作为礼法的范例。宁府是长房，所以祖宗牌位设在宁府；贾母是现存辈分最高的人，所以由她摆供、拈香。

再次是合家团圆共享天伦之乐。贾母回荣府时，“轿出大门，这一条街上，东一边设立着宁国公的仪仗执事乐器，来往行人皆屏退不从此过”。真是气派得很。“一时来至荣府，也是大门正门一直开到里头。如今便不在暖阁下轿了，过了大厅，转弯向西，至贾母这边正厅上下轿。众人围随同至贾母正室之中，亦是锦裯绣屏，焕然一新。当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百合草。贾母归了坐，老嬷嬷来回：‘老太太太们来行礼。’贾母忙起身要迎，只见两三个老妯娌已进来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让了一回，吃茶去后，贾母只送至内仪门便回来。归了正坐。贾敬贾赦等领诸子弟进来。贾母笑道：‘一年家难为你们，不行礼罢。’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过了礼；左右设下交椅，然后又按长幼挨次归坐受礼。两府男女、小厮、丫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礼毕。然后散了押岁钱并荷包金银锞等物。摆上合欢宴来，男东女西归坐，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毕。贾母起身，进内间更衣，众人方各散出。那晚各处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大观园正门上挑着角灯，两旁高照，各处皆有路灯。上下人等，打扮的花团锦簇，一夜人声杂沓，语笑喧阗，爆竹起火，络绎不绝”。这里所写真是一幅北方风俗画，既有达官贵人的富丽堂皇，也有一般平民的温馨平和。

四 中秋节夜宴赏月

卷七十五写贾母会同全家在凸碧山庄饮宴赏月，先在“嘉荫堂月台上，焚着斗香，秉着烛，陈设着瓜果月饼等物”上香，邢夫人等一千女客随贾母后也“皆拜过”。贾母方发话“在那山脊上的大厅”设宴。于是贾赦贾政等在前导引，两个老婆子秉着两把羊角手罩，

鸳鸯、琥珀、尤氏等贴身搀扶贾母，邢夫人等在后围随，不过百余步，到了凸碧山庄。“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作两间。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边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边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只坐了半桌，下面还有半桌余空。”贾母笑道：“常日倒还不觉人少，今日看来，还是咱们的人也甚少，算不得甚么。想当年过的日子，今夜男女三四十个，何等热闹。……”于是又从围屏那边将迎春、探春、惜春三个请过来。”贾母命折一枝桂花来，让一媳妇在屏后击鼓传花。若花到谁手中，饮酒一杯，罚说笑话一个。这个日子特别讲究团圆、热闹、吉祥，连桌椅都要圆的，赏月时人越多越好，还要有游戏助兴。

五 北方其他习俗

《红楼梦》第一回写甄士隐抱着女儿英莲“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甄士隐住在江南的苏州，却看“过会”，而据清人富察敦的《燕京岁时记》所载：“过会者，乃京师游手，扮作开路、中幡、杠箱、官儿、五虎棍、跨鼓、花钹、高跷、秧歌、什不闲、耍坛子、耍狮子之类。如遇城隍出巡及各庙会等，随地演唱，观者如堵。”这应是北京地方的风俗，被作者用在了江南。

女人坐炕。卷七写周瑞家的到薛姨妈家串门，“轻轻掀帘进去，只见王夫人和薛姨妈长篇大套的说些家务人情等话。周瑞家的不敢惊动，遂进里间来。只见薛宝钗家常打扮，头上只绾着纂儿，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几上同丫鬟莺儿正描花样子呢。见他进来，宝钗便放下笔，转身来，满面堆笑让：‘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问道：‘姑娘好？’一面炕沿边坐了”。炕是北方独有的，北京亦然。顾炎武《日知录》云：“北人以土为床，而空其下以发火，谓之炕。”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亦云：“北人以土为床，而空其下，以置火。名之曰‘炕’。”炕又临窗，是因为坐于炕上便于开启窗户。



芒种花朝节祭花。第二十七回写道：“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卸，花神退位，须要饯行。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颗树，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燕妒莺惭，一时也道不尽。”当日贾府大观园中，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等并巧姐、大姐、香菱与众丫鬟们都在园内赏花玩耍。去找林黛玉的路上，“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将欲过河去了。倒引的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极尽祭花之乐。这里所写，是北京花朝，因为江南花朝节是二月十二，北京地寒，四月底百花凋谢才有可能。

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

第十二章

《儒林外史》与运河文化

清代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可谓清初世态人情，尤其是南运河流域世态人情的活化石。

第一节 作者在南运河流域的生活

吴敬梓一生主要生活在南京、扬州等地，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家乡生活时期：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安徽全椒人，晚年自号文木老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移家赋》，见《吴敬梓诗文集》卷一）的家道昌盛，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随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八股文训练，还涉及到经史、诗赋。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22岁时考中秀才，却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但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他本人也不知珍惜，一面往来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而“传为子弟戒”。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33岁时把家搬到了他所喜爱的有着名山胜水的南京。



二 客居南京时期：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酒之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修葺先贤祠。同时，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36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而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的地步。虽然他性格豪爽，但内心的辛酸还是难免的。《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40岁至50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洞悉世事人情的时期。

三 客死扬州：雍正十一年（1733），吴敬梓移家南京后就与尚在江宁知府任上的卢见曾交往，后来卢见曾调任扬州两淮巡盐使，他也远游江淮间，数度前往真州、淮安等地，又以“留扬最久”，主要出入于卢见曾使署幕。乾隆十九年，吴敬梓客死扬州，丧葬费用，也为卢见曾资助。

吴敬梓属于清初愤世嫉俗的人物。纵观他的一生，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善持家，无生计意识和谋生能力。正如鲁迅所说：“然不善治生，性又豪，不数年挥旧产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乙卯，安徽巡抚赵国麟举以应博学鸿词科，不赴，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而家益贫。”^①（《中国小说史略》）长于文学却短于谋生，穷困潦倒中写成传世名著，许多文豪都是这样。二是他的世界观与传统、时俗格格不入。他厌恶科举，主张士农工商人格平等，正如胡适所说：整个《儒林外史》意在“提倡一种新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了

^① 《名家解读〈儒林外史〉》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①(《吴敬梓传》)生活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却有平等思想,这是非常可贵的。吴敬梓把自己作为一个人物也写进了《儒林外史》,这个人物便是杜少卿。

(一) 同样的出身。吴敬梓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但到了他父亲吴霖起时已经衰败。吴霖起不愿出仕,设帐讲经,游从满座。晚年出任“赣榆教谕”,因不善迎合上官被罢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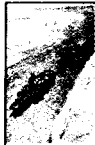
《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写杜少卿的出身,说他父亲是“一位太老爷,做江西赣州府知府”^②,“是个清官”,杜少卿“也是一个秀才”。把吴敬梓父亲的官位夸大了一些,就成了杜少卿的父亲。第三十四回写道,少卿“父亲还有本事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这也和吴霖起的生平基本符合,作者把对父亲的崇敬与惋惜,用在了小说人物的身上。

吴敬梓为人清高,不愿附庸风雅。《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也谢绝官场应酬,第三十一回写道:“王胡子又拿一个帖子进来,禀道:‘北门汪盐商家明日酬生日,请县主老爷,请少爷去做陪客。说定要求少爷到席的。’杜少卿道:‘你回他我家里有客,不得到席。这人也可笑得紧,你要做这热闹事,不会请县里暴发的举人、进士陪?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王胡子应诺去了。”与作者性情一脉相承。

(二) 同样不善谋划生计。父亲留给他许多家产,但吴敬梓喜

① 《名家解读〈儒林外史〉》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② 本章所节录作品原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版《儒林外史》。



欢资助别人，只会花钱不会赚钱，不长时间卖地卖房，“奴逃仆散”、“田庐尽卖”，被乡里引以为戒。

《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也仗义疏财，第三十一回堂兄向别人说起他：“家里还是祖宗丢下的些田地。伯父去世之后，他不上一万银子家私，他是个呆子，自己就像十几万的。纹银九七，他都认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把父亲留下的家私，当作十几万银子似的来用。只出不进，如何不败家。第三十二回描写杜少卿在家乡救助别人，好像是为堂兄的客观介绍作例证。他卖了一宗田得到一千多两银子，“随即叫了娄太爷的孙子到书房里，说道：‘你明日要回去？’他答应道：‘是，老爹叫我回去。’杜少卿道：‘我这里有一百两银子给你，你瞒着不要向你老爹说。你是寡妇母亲，你拿着银子回家去做小生意，养活着你。你老爹若是好了，你二叔回家去，我也送他一百两银子。’娄太爷的孙子欢喜，接着把银子藏在身边，谢了少爷”。然后又资助黄大五十两银子修房，“黄大道：‘要盖须得百两银子；如今只好修补，将就些住，也要四五十两银子。’杜少卿道：‘也罢，我没银子，且拿五十两银子与你去。你用完了再来与我说。’拿出五十两银子递与黄大，黄大接着去了”。别人该帮助，但自家银子有限，杜少卿只知救助他人，难免要败家。

(三) 同样迁居南京。吴敬梓在 33 岁时，变卖了在全椒的祖产，移家南京，开始了客居生涯。“二月，中旬，移家南京寓居板桥之西，秦淮水亭。其地属繁华区。”^①（孟醒仁《吴敬梓年谱》）。吴敬梓《移家赋·序》也说：“粤以癸丑之年，建寅之月……余乃身辞乡关，奔驰道路。……百里驾此艤艇，一日达于白下。”^②迁居南京，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眼界，对于吴敬梓日后创作《儒林外史》是

① 《吴敬梓年谱》41 页，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3 月版。

② 《吴敬梓诗文集》第 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版。

至关重要的。

《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也由家乡移家金陵。第三十三回写道：“话说杜少卿自从送了娄太爷回家之后，自此就没有人劝他，越发放着胆子用银子。前项已完，叫王胡子又去卖了一分田来，二千多银子，随手乱用。又将一百银子把鲍廷玺打发过江去了。王知县事体已清，退还了房子，告辞回去。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银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并与本家，要到南京去住，和娘子商议，娘子依了。人劝着他，总不肯听。足足闹了半年，房子归并妥了。除还债赎当，还落了有千把多银子，和娘子说道：‘我先到南京会过卢家表侄，寻定了房子，再来接你。’”这样，小说中的杜少卿就像吴敬梓那样移家南京，而在老家被人叫做败家子。

而第三十四回高老先生所说：

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他家祖上几十代行医，广积阴德，家里也挣了许多田产。到了他家殿元公，发达了去，虽做了几十年官，却不会寻一个钱来家。到他父亲，还有本事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

这实际是就是吴敬梓的写照。吴敬梓不是当时社会统治思想认可的“正经人”，《儒林外史》中所写的杜少卿也与“衣冠人物”格格不入，二者都讲求君子式的“文行出处”，要挽救士风的颓靡。所以吴敬梓移家南京，花了十年的工夫在南京创作《儒林外史》，塑造出包括杜少卿在内的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反映中国十八世纪前后江南士绅生活及高层士文化，试图矫正封建社会“末世”士风，恢复士林正常、健康的人格。

(四) 同样著《诗说》。吴敬梓主张学习汉儒,反对宋明理学之儒。著“《诗说》若干卷”,可惜已失传,现今只能从前人的诗文和《儒林外史》中看到只言片语。

《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也著有《诗说》。第四十九回写道:“提起《毛诗》两字,越发可笑了。近来这些做举业的,泥定了朱注,越讲越不明白。四五年前,天长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诗说》,引了些汉儒的说话,朋友们就都当作新闻。可见学问两个字,如今是不必讲的了!”与吴敬梓的重汉儒轻宋儒如出一辙。

第二节 《儒林外史》中的运河客运和货流

(一) 客运包船和搭船。运河是江南官员进京出京的水上通道。第二十回写匡超人在杭州“先包了一只淌板船的头舱,包到扬州”,然后“换了淮安船到王家营起旱,进京去了。”整个行程只换了一次船。而牛布衣要从杭州“到江上边芜湖县地方寻访几个朋友”,在扬州换“上南京船,走长江去”,再到芜湖。由此来看,当时运河客运,杭州、扬州、北京、南京是几大码头,有专船分段营运。

第二十二回写牛浦从芜湖“搭了江船,恰好遇顺风,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矶。要搭扬州船,来到一个饭店里,店主人说道:‘今日头船已经开了,没有船,只好住一夜,明日午后上船。’”由此来看,当时的客运分班次,并且有大致时辰规定。但官包船不受班次时辰限制,牛浦不愿捱到次日,“放下行李,走出店门,见江沿上系着一只大船,问店主人道:‘这只船可开的?’店主人笑道:‘这只船你怎上的起?要等个大老官来包了才走哩!’”包船官员“要到扬州盐院太老爷那里去说话”,等他带随从上了船,在店主人示意下,牛浦“掬着行李,走到船尾上,船家一把把他拉了上船,摇手叫他不要则声,把他安在烟篷底下坐。”用船家的话说,这叫“带的一分酒资”,即捎带挣个喝酒钱。

(二) 天气和风向。官员包船虽然不受时辰限制,但受天气影响,再急的公务风雨天也不敢行船。第二十二回写牛浦搭了官包船的当天晚上,“东北风紧,三更时分,潇潇飒飒的下起细雨,那烟篷芦席上漏下水来,牛浦翻身打滚的睡不着。到五更天,只听得舱里叫道:‘船家,为甚么不开船?’船家道:‘这大呆的顶头风,前头就是黄天荡,昨晚一号几十只船都湾在这里,那一个敢开?’”直到次日入夜风住,这趟官包船才启航。一般客运也最怕的风向不对,第二十七回写道:“鲍廷玺收拾要到苏州寻他大哥去,上了苏州船。那日风不顺,船家荡在江北,走了一夜,到了仪征,船住在黄泥滩,风更大,过不得江,鲍廷玺走上岸要买个茶点心吃。”鲍廷玺从南京坐船出发,要到苏州去,中途刮起了北风,结果走了一夜,次日天明还未进入江南运河。

(三) 客运船钱和时日。客人总想乘直达船,第五十一回写凤四老爹同三个差人要送万中书从南京到台州审官司,“出了汉西门来叫船,打点一直到浙江去。叫遍了,总没有一只杭州船,只得叫船先到苏州。到了苏州,凤四老爹打发清了船钱,才换了杭州船,这只船比南京叫的却大着一半。凤四老爹道:‘我们也用不着这大船,只包他两个舱罢。’随即付埠头一两八钱银子,包了他一个中舱,一个前舱。五个人上了苏州船,守候了一日,船家才揽了一个收丝的客人搭在前舱”。他们想包个直达船,但未能如愿,只好包个到苏州的船,到苏州再换到杭州的船。在南京包的船小,船家见够载便启航;在苏州包的船分前中后三舱,他们五个人只包其中两个舱,又不愿意出三个舱的钱,只得等别人包了后舱,白白在苏州呆了一天。

(四) 水运盐粮。《儒林外史》不是专写漕运的小说,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运河的物流情况。如第二十四回写南京的聚宝门吞吐货物之多,“这聚宝门,当年说,每日进来有百牛千猪万担粮;到这时候,何止一千个牛,一万个猪,粮食更无其数”。这些货物主要是

从江南运河或淮扬运河运来,次要的由长江上游运来。第四十八回写邓质夫受扬州盐商之托在南京卖上江食盐,住在朝天宫,有人卖盐就必然有船从扬州运盐进城。

第四十三回写扬州盐商万雪斋有两船盐从扬州发运长江上游,盐船总要找个官船同路做依靠,万雪斋在“开江”前两天就通过王汉策说通了一只贵州官船,那官船答应照顾他们。“这里放炮开船,一直往上江进发。这日将到大姑塘,风色大作。大爷吩咐急急收了口子,弯了船。那江里白头浪茫茫一片,就如煎盐叠雪的一般。只见两只大盐船被风横扫了,抵在岸边。便有两百只小拨船,岸上来了两百个凶神也似的人,齐声叫道:‘盐船搁了浅了,我们快帮他去起拨!’那些人驾了小船,跳在盐船上,不由分说,把他舱里的子儿盐,一包一包的尽兴搬到小船上。那两百只小船,都装满了,一个人一把桨,如飞的棹起来,都穿入那小港中,无影无踪的去了。”盐船上的人向官船求救,官船却说失贼的事,该地方官管。盐船只得到彭泽县告官,彭泽县令不愿惹水贼,就对原告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了事。故事情节很能反映盐运的风险。

第三节 《儒林外史》中的运河都市风情

一 南京

南京有水道直通长江,东至运河江口可北上淮扬运河或南下江南运河,西可逆江而上达荆、襄、四川,因而交通便利,城市繁华。第二十四回写道:“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

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妆炫服，招接四方游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儒林外史》这回书可以视作对南京的总体描写。南京在明末清初经兵火洗劫，经过几十载的休养生息，到吴敬梓客居此城时，繁华得不啻人间天堂。

另外几回书还写了南京城的局部胜景。三十五回写及元武湖：“这湖是极宽阔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大。左边台城望见鸡鸣寺。那湖中菱、藕、莲、芡，每年出几千石。湖内七十二只打鱼船，南京满城每早卖的都是这湖鱼。湖中间五座大洲：四座洲贮了图籍；中间洲上，一所大花园，赐与庄征君住，有几十间房子。园里合抱的老树，梅花、桃、李、芭蕉、桂、菊，四时不断的花。又有一园的竹子，有数万竿。园内轩窗四启，看着湖光山色，真如仙境。门口系了一只船，要往那边，在湖里渡了过去；若把这船收过，那边飞也飞不过来。庄征君就住在花园。”真是一个颐养天年的好地方。第五十五回写到南京妙意庵环境的清幽：“那一日，妙意庵做会。那庵临着乌龙潭，正是初夏的天气，一潭簇新的荷叶，亭亭浮在水上。这庵里曲曲折折，也有许多亭榭，那些游人都进来顽耍。王太走将进来，各处转了一会，走到柳阴树下，一个石台，两边四条石凳，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又是一派江南园林气氛。

二 扬州

扬州在清初是京杭运河中段的重要商埠都市，清廷主管盐政的朝廷官署——两淮盐政盐运使司长驻这里办公，盐业经济日趋繁荣。盐商聚敛了巨大财富，拥有宽敞豪华的住宅和精致华美、书卷气甚浓的庄园，常延接士人、留连竟日。《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写庄征君到北京面君，辞爵后南返，乘船沿运河至扬州，“别了台儿庄，叫了一只马溜子船，船上颇可看书。不日来到扬州，在钞关住了一日，要换江船回南京。次早才上了江船，只见岸上有二十多乘齐整轿子歇在岸上，都是两淮总商来候庄征君，投进帖子来。……随即是盐院来拜，盐道来拜，分司来拜，扬州府来拜，江都县来拜，把庄征君闹的急了，送了各官上去，叫作速开船。当晚总商凑齐六百银子到船上送盘缠，那船已是去的远了，赶不着，银子拿了回去”。当时扬州城衙门重叠，官员众多，是江淮间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第四十回写沈先生送女儿琼枝入嫁扬州总商宋为富，展示了盐商的富有和奢华：

那宋为富正在药房里看着药匠弄人参，听了这一篇话，红着脸道：“我们总商人家，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都像这般淘气起来，这日子还过得！他走了来，不怕他飞到那里去！”踌躇一会，叫过一个丫鬟来，吩咐道：“你去前面向那新娘说：‘老爷今日不在，新娘权且进房去。有甚么话，等老爷来家再说。’”丫鬟来说了，沈琼枝心里想着：“坐在这里也不是事，不如且随他进去。”便跟着丫头走到厅背后左边一个小圭门里进去，三间楠木厅，一个大院落，堆满了太湖石的山子。沿着那山石走到左边一条小巷，串入一个花园内。竹树交加，亭台轩敞，一个极宽的金鱼池，池子旁边，都是株红栏杆，夹着一带走廊。走到廊尽头处，一个小小月洞，四扇金漆门。走将进去，便是三间屋，一间做房，铺设的齐齐整整，独自一个院落。妈子送

了茶来。沈琼枝吃着，心里暗说道：“这样极幽的所在，料想彼人也不会赏鉴，且让我在此消遣几天。”那丫鬟回去回复宋为富道：“新娘人物倒生得标致，只是样子觉得惫赖，不是个好惹的。”

琼枝所进，仅是宋为富大院落中一个小园，富丽得已经让人叹为观止了。扬州盐商的富有，也可从宋为富话中可见一斑。

三 杭州

杭州北接江南运河，南启浙东运河，在清初是个风景秀丽、商贾云集的地方。《儒林外史》第十四回写西湖的美：“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说那灵隐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这出了钱塘门，过圣因寺，上了苏堤，中间是金沙港，转过去就望见雷峰塔；到了净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那些卖酒的青帘高飏，卖茶的红炭满炉，士女游人，络绎不绝，真不数‘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这是移步换形写西湖一带美好风光，传达出对这里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喜爱之情。另一处描写是定点俯视杭州城山河大势：

过这一条街，上面无房子了，是极高的个山冈，一步步上去走到山冈上，左边望着钱塘江，明明白白。那日江上无风，水平如镜，过江的船，船上有轿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边又看得见西湖，雷峰一带、湖心亭都望见，那西湖里打鱼船，一个一个，如小鸭子浮在水面。马二先生心旷神怡，只管走了上去，又看见一个大庙门前摆着茶桌子卖茶，马二先生两脚酸了，且坐吃茶。吃着，两边一望，一边是江，一边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转围着，又遥见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隐忽现。马二先生叹道：“真乃‘载华岳而下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



一段之中，两次变化观察点，好比现代摄像推拉镜头，把登山过程中在不同位置所见展示出来，多层次地传达杭州山水的美。

第四节 《儒林外史》中的运河流域士林

吴敬梓对清初士林的生活状况及心理状态极为熟悉，通过对他们文会诗社、戏曲观赏、出游寄寓、宴集茶会、收藏鉴赏、交游通好等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示了上至京中大老、官吏豪强，下至村学启蒙、卖文为生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写出了各阶层文人的复杂人生。

一 提倡王冕式淡泊名利

《儒林外史》第一回写元末诸暨人王冕不在意科举和官场、过自由自在生活的人生。王冕七岁时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黹，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十岁那年母亲实在供他不起，要他去为人放牛，他痛快地说：“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在放牛生涯中，他读书画画，自学成才，“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朋友，终日闭户读书”。知县把他的“二十四副花卉”送上司，上司想见一见作者，知县便专门到家拜访王冕，王冕却借故不与知县相见，知县心中十分恼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又怕恩师说他暴躁，只得忍口气回去，打算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中抬举，再想法处治他不迟。

那么，王冕为何要怠慢待知县呢？只因“知县倚著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但事后想着得罪了知县，会招致迫害，便借机出外避难，“到大邦去处”，“走出些机遇”，于是到济南府去卖画为生。明初才回到故乡，朱元璋多次征聘他做官，他都一

概谢绝，“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儒林外史》的创作目的，就是要以王冕为样样，规范士林的人生。反对迷失人性于科举，反对科举奴役下的畸形人生；提倡鲜活人性的复归，提倡士林的正常、自由发展。

其次，《儒林外史》写了一些当朝无意功名的人，作为士林淡泊名利的导师。一个是以作者自己为原型的人物杜少卿，作为向士林推出的第二个王冕。杜少卿淡泊功名利禄，第三十三回写他到了安庆李大人那里做客，就曾拒绝对方向朝廷推荐自己的好意，“杜少卿投了手本，那里开门请进去，请到书房里。李大人出来，杜少卿拜见，请过大人的安，李大人请他坐下。李大人道：‘自老师去世之后，我常念诸位世兄。久闻世兄才品过人，所以朝廷仿古征辟大典，我学生要借光，万勿推辞。’杜少卿道：‘小侄菲才寡学，大人误采虚名，恐其有玷荐牍。’李大人道：‘不必太谦，我便向府县取结。’杜少卿道：‘大人垂爱，小侄岂不知？但小侄麋鹿之性，草野惯了，近又多病，还求大人另访。’李大人道：‘世家子弟，怎说得不肯做官？我访的不差，是要荐的！’杜少卿就不敢再说了，李大人留着住了一夜，拿出许多诗文来请教”。第三十四回写李大人真的把征辟的事给杜少卿办了下來，但杜少卿坚辞不就：

话说杜少卿别了迟衡山出来，问小厮道：“那差人他说甚么？”小厮道：“他说少爷的文书已经到了，李大老爷吩咐县里邓老爷请少爷到京里去做官，邓老爷现住承恩寺。差人说，请少爷在家里，邓老爷自己上门来请。”杜少卿道：“既如此说，我不走前门家去了，你快叫一只船，我从河房栏杆上上去。”当下小厮在下浮桥雇了一只凉篷，杜少卿坐了来家。忙取一件旧衣服、一顶旧帽子，穿戴起来，拿手帕包了头，睡在床上，叫小厮：“你向那差人说，我得了暴病，请邓老爷不用来，我病好了，慢慢来谢邓老爷。”小厮打发差人去了。娘子笑道：“朝廷



叫你去做官，你为甚么装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假使连你也带往京里，京里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阵风吹得冻死了，也不好。还是不去的妥当。”

杜少卿对当官不屑一顾，但对于文化公益活动却满腔热情，那就是在南京修建“泰伯祠”。泰伯原本是周王的长子，把王位让给了弟弟，自己跑到当时断发文身的江南做了吴国开国君主。第三十三回杜少卿一听“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就答应捐银三百两，“放开写道：‘天长杜仪捐银三百两。’”此后，杜少卿就弃绝功名，在南京以卖文为业。第三十六回写穷书生武某“随着少卿学诗”，其母丧事，“都亏了天长杜少卿先生相助”。

另一个是庄尚志，第三十四回交待他道：“这人姓庄名尚志，字绍光，是南京累代的读书人家。这庄绍光十一二岁就会做一篇七千字的赋，天下皆闻；此时已将及四十岁，名满一时，他却闭户著书，不肯妄交一人。”皇帝派礼部侍郎徐某，至南京请他入京见驾。第三十五回写他见驾：

庄征君屏息进去，天子便服坐在宝座。庄征君上前朝拜了。天子道：“朕在位三十五年，幸托天地祖宗，海宇升平，边疆无事。只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这教养之事，何者为先？所以特将先生起自田间；望先生悉心为朕筹画，不必有所隐讳。”庄征君正要奏对，不想头顶心里一点疼痛，着实难忍，只得躬身奏道：“臣蒙皇上清问，一时不能条奏；客臣细思，再为启奏。”天子道：“既如此，也罢。先生务须为朕加意，只要事事可行，宜于古而不戾于今罢了。”说罢，起驾回宫。庄征君出了勤政殿，太监又笼了马来，一直送出午门。徐

侍郎接着，同出朝门。徐侍郎别过去了。

庄征君到了下处，除下头巾，见里面有一个蝎子。庄征君笑道：“臧仓小人，原来就是此物！看来我道不行了！”次日起来，焚香盥手，自己揲了一个蓍，筮得“天山遁”。庄征君道：“是了。”便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又写了一道“恳求恩赐还山”的本，从通政司送了进去。

一只蝎子断了他和皇帝合作的因缘，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实际原因是他厌恶官场应酬，“九卿六部的官，无一个不来拜望请教。庄征君会的不耐烦，只得各衙门去回拜。大学士太保公向徐侍郎道：‘南京来的庄年兄，皇上颇有大用之意，老先生何不邀他来学生这里走走？我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侍郎不好唐突，把这话婉婉向庄征君说了。庄征君道：‘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况太保公屡主礼闱，翰苑门生不知多少，何取晚生这一个野人？这就不敢领教了。’侍郎就把这话回了太保”。太保不满意他的不愿逢迎，就在皇帝面前说坏话，于是庄尚志就被赐金放还，“庄尚志允令还山，赐内帑银五百两，将南京元武湖赐与庄尚志著书立说，鼓吹休明”。

再次，吴敬梓反对热衷科举迷失自我、丧失良知和人性的八股虫，尚能体谅一些通过苦读圣贤书博得一官半职的人。因而在《儒林外史》中写了一些与元冕相近的士子，他们对科举是不刻意追求，但也不拒绝，如匡超人、虞育德等。

匡超人在作品中是作为读书人至孝的典型来写的，是孝道的化身。他是温州府乐清县人，弟兄二人，父母尚在，但父亲长年卧病在床。第十五回写匡超人坐船返乡时，在船上受了船客的孝道教育，“而今人情浇薄，读书的人，都不孝父母。这温州姓张的，弟兄三个都是秀才，两个疑惑老子把家私偏了小儿子，在家打吵，吵的父亲急了，出首到官；他两弟兄在府、县都用了钱，倒替他父亲做了假哀怜的呈子，把这事销了案。亏得学里一位老师爷持正不依，详了我们大人衙门，大人准了，差了我到温州提这一千人犯去”。

匡超人听见这话，回到家后，便一心侍候瘫痪在床的父亲，并且做生意、读书、下棋三不误，他“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亲，念文章，辛苦已极；中上得闲，还溜到门首同邻居们下象棋”。晚上尤其辛苦，“到晚，又扶太公坐起来吃了晚饭。坐一会，伏侍太公睡下，盖好了被。他便把省里带来的一个大铁灯盏装满了油，坐在太公傍边，拿出文章来念。太公睡不着，夜里要吐痰、吃茶，一直到四更鼓，他就读到四更鼓。太公叫一声，就在跟前。太公夜里要出恭，从前没人服侍，就要忍到天亮，今番有儿子在傍伺候，夜里要出就出，晚饭也放心多吃几口。匡超人每夜四鼓才睡，只睡一个更头，便要起来杀猪，磨豆腐”。对父亲照顾得无微不至，“匡超人的肉和豆腐都卖的生意又燥，不到日中就卖完了，把钱拿来家伴着父亲。算计那日赚的钱多，便在集上买个鸡、鸭，或是鱼，来家与父亲吃饭”。（第十六回）可以说，天下孝子能做的事，他都做到了。

但匡超人与王冕不同的是，他不放弃科举。他在杭州测字为生时接受了马二先生“学而优则仕”的说教，“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回家后尽管侍候病人、做豆腐、杀猪卖肉劳务繁重，但他居然能不误经业，经县、府、院三考，成了秀才。”

虞育德是吴敬梓塑造的正直读书人形象。他是应天苏州府常熟县人，出身读书人家庭，十四岁父亲去世便子承父业做教书先生，十七岁随本县云晴川先生学诗文，同时开始算命生涯，并留心科举考卷。十八岁到二十里外杨家村教书，每年三十两银子，“当年余下十几两银子馆金，又借了明年的十几两银子的馆金，合起来

就娶了亲。夫妇两个，仍旧借住在祁家。满月之后，就去到馆。又做了两年，积攒了二三十两银子的馆金，在祁家傍边寻了四间屋，搬进去住，只雇了一个小小厮。虞博士到馆去了，这小小厮每早到三里路外镇市上买些柴米油盐小菜之类，回家与娘子度日。娘子生儿育女，身子又多病，馆钱不能买医药，每日只吃三顿白粥，后来身子也渐渐好起来”。（第三十六回）过的是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艰难的谋生中，有一次虞育德好不容易得了十二两银子，但遇到一个为生活所迫投河自杀的农民，就把银子给了那农民。

后来参加南京乡试，虞育德中了举人；常熟康大人到山东做巡抚，他跟去做了几年幕，最后到北京参加会试中了进士，“就补了南京的国子监博士。虞博士欢喜道：‘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乡相近。我此番去，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团圞着，强如做个穷翰林。’”通观虞育德一生，一切都在不经意中为之，在可成可不成的态度中成功。这也是吴敬梓赞赏的人生态度。

再其次，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的五十五回写了一些自食其力的读书人，他们在劳动之余读书写字，其乐融融，寄托了自己的人生观念和理想。“一个是会写字的。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儿无家无业，总在这些寺院里安身。见和尚传板上堂吃斋，他便也捧着一个钵，站在那里，随堂吃饭。和尚也不厌他，他的字写的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但凡人要请他写字时，他三日前，就要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的墨，却又不许别人替磨；就是写个十四字的对联，也要用墨半碗。用的笔，都是那人家用坏了不要的，他才用。到写字的时候，要三四个人替他拂着纸，他才写。一些拂的不好，他就要骂、要打。却是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又不修边幅，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趿着一双破不过的蒲鞋。每日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这是



一个穷得有志气的读书人。

“又一个卖火纸筒子的。这人姓王，名太，他祖代是三牌楼卖菜的，到他父亲手里穷了，把菜园都卖掉了。他自小儿最喜下围棋。后来父亲死了，他无以为生，每日到虎踞关一带卖火纸筒过活。”王太在妙意庵下棋败了“天下的大国手”，败者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这是一个“粪土万户侯”的读书人。

“一个是开茶馆的，这人姓盖，名宽，本来是个开当铺的人。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家里有钱，开着当铺，又有田地，又有洲场，那亲戚本家都是些有钱的。他嫌这些人俗气，每日坐在书房里做诗看书，又喜欢画几笔画。后来画的画好，也就有许多做诗画的来同他往来。虽然诗也做的不如他好，画也画的不如他好，他却爱才如命，遇着这些人来，留着吃酒吃饭，说也有，笑也有。这些人家里有冠、婚、丧、祭的紧急事，没有银子，来向他说，他从不推辞，几百几十拿与人用。”后来逐渐穷下去，“可怜这盖宽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一个僻静巷内，寻了两间房子开茶馆。把那房子里面一间与儿子、女儿住；外一间摆了几张茶桌子，后檐支了一个茶炉子，右边安了一副柜台；后面放了两口水缸，满贮了雨水。他老人家清早起来，自己生了火，扇着了，把水倒在炉子里放着，依旧坐在柜台里看诗画画。柜台上放着一个瓶，插着些时新花朵，瓶旁边放着许多古书。他家各样的东西都变卖尽了，只有这几本心爱的古书是不肯卖的。人来坐着吃茶，他丢了书就来拿茶壶、茶杯。茶馆的利钱有限，一壶茶只赚得一个钱，每日只卖得五六十壶茶，只赚得五六十个钱”。这是一个安贫乐道、与世无争的生意人。

“一个是做裁缝的。这人姓荆，名元，五十多岁，在三山街开着一个裁缝铺。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们和他相与的问他道：‘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

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这是靠手艺吃饭，又不放弃文学创作的手工艺人。

还写了一个种田老汉：“于老者也不读书，也不做生意，养了五个儿子，最长的四十多岁，小儿子也有二十多岁。老者督率着他五个儿子灌园。那园却有二三十亩大，中间空隙之地，种了许多花卉，堆着几块石头。老者就在那旁边盖了几间茅草房，手植的几树梧桐，长到三四十围大。老者看看儿子灌了园，也就到茅斋生起火来，煨好了茶，吃着，看那园中的新绿。”于老汉与裁缝荆元是忘年交，“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边。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那些鸟雀闻之，都栖息枝间窃听。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这是一位桃花源里可耕田的人。

二 《儒林外史》猛烈抨击那些热衷科举丧失人性的士子

首先，小说写了一些通过科举做官后便盘剥治下的读书人。第八回的王惠“须发皓白”中了进士，从工部员外任上补“南昌知府缺”，到南昌后故作姿态，不愿立即接任，直到前任蘧知府的公子说出“历年所积俸余，约有二千余金。如此地仓谷、马匹、杂项之类，有什么缺少不敷处，悉将此项送与老先生任意填补。家君知道老先生数任京官，宦囊清苦，决不有累”的话后，才同意接受官印，在宴会上又不断打听当地有何特产，官司上有什么通融，蘧公子看出他的贪婪，就讽刺他道：



“家君在这里无他好处，只落得个讼简刑清；所以这些幕宾先生在衙门里，也都吟啸自若。曾记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说道：‘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样声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样？”蘧公子道：“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王太守大笑道：“这三样声息却也有趣的紧。”蘧公子道：“将来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换三样声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样？”蘧公子道：“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王太守并不知这话是讥诮他，正容答道：“而今你我却要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认真。”

后来，王惠果然“钉了一把头号的库戥，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人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是头号板子，把两根板子拿到内衙上秤，较了一轻一重，都写了暗号在上面，出来坐堂之时，吩咐叫用大板，皂隶若取那轻的，就知他得了钱了，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隶。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不知道太守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他抱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目的，一边用板子敲诈勒索，一边用戥子、算盘豪敛财富，衙门里真的充满“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

其次，小说写了一些有了功名、没了廉耻的读书人。严贡生是其中最坏的，第五回写有二人向汤知县告状，告的就是严贡生：

一个叫做王小二，是贡生严大位的紧邻。去年三月内严贡生家一口才过下来的小猪，走到他家去，他慌忙送回严家。严家说：猪到人家，再寻回来，最不利市。押着出了八钱银子，把小猪就卖与他。这一口猪在王家已养到一百多斤，不想错走到严家去，严家把猪关了。小二的哥子王大走到严家讨猪，严贡生说，猪本来是他的，“你要讨猪，照时值估价，拿几两银子来，领了猪去。”王大是个穷人，那有银子，就同严家争吵了几句，被严贡生的几个儿子，拿拴门的闩，擀面的杖，打了一个

臭死，腿都打折了，睡在家里。所以小二来喊冤。知县喝过一边，带那一个上来问道：“你叫做甚么名字？”那人是个五六十岁老者，禀道：“小人叫做黄梦统，在乡下住。因去年九月上县来交钱粮，一时短少，央中向严乡绅借二十两银子，每月三分钱，写借约，送在严府。小的却不曾拿他的银子。走上街来，遇着个乡里的亲眷，说他有几两银子借与小的，交个几分数，再下乡去设法，劝小的不要借严家的银子。小的交完钱粮，就同亲戚回家去了。至今已是大半年，想起这事来，问严府取回借约，严乡绅向小的要这几个月的利钱。小的说：‘并不曾借本，何得有利？’严乡绅说小的当时拿回借约，好让他把银子借与别人生利；因不曾取约，他将二十两银子也不能动，误了大半年的利钱，该是小的出。小的自知不是，向中人说，情愿买个蹄酒上门去取约；严乡绅执意不肯，把小的驴和米同梢袋，都叫人短了家去，还不发出纸来。这样含冤负屈的事，求大老爷做主！”

如此横行乡里、讹诈钱财，连汤知县也愤愤地说：“一个做贡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乡里间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实在可恶！”

再次，小说写了一些被弄得神魂颠倒、精神失常的读书人，控诉了科举制度对人才的作贱和对正常人性的扭曲、戕害。范进、周进是《儒林外史》中给人印象是最深刻的，二人都在科举上消耗了青春年华，“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他54岁已经考过20余次还是童生，究其原因用范进自己的话是“文字荒谬”，而周学道特意看他的卷子时，“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得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想道：‘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又取过范进卷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

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而通常考官连一遍可能都不细看，只看有无银子人情就定了名次，这就是科举制度对人才的作贱。

周进则因“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因而“在省城要看贡院，……不想才到‘天’字号，就撞死在地下。众人多慌了，只道一时中了恶。行主人道：‘想是这贡院里久没有人到，阴气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恶。’金有余道：‘贤东！我扶着他，你且到做工的那里借口开水灌他一灌。’行主人应诺，取了水来，三四个客人一齐扶着，灌了下去。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吐出一口稠涎来。众人道：‘好了。’扶着立了起来。周进看看号板，又是一头撞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周进也不听见，只管伏著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他那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科举把周进害得“生意”做不来，“又无官做”，年龄老大，一事无成，见了贡院，怎不如此疯狂？

范进中举后疯颠，是《儒林外史》最成功的描写：“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忙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怕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池塘里，爬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直到胡屠户打了他一巴掌，才清醒过来；周进则一见众人捐钱与他纳监进场，立即变哭为笑：“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这是对科举制度扭曲和戕害正常人性的控诉。

参 考 书 目

1. 朱一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版。
2. 姚汉源:《中国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
3. 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
4. 陈璧显:《中国大运河史》,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5. 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第 1 版。
6. 绍华:《大运河的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1 年 7 月第 1 版。
7. 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8. 《鲁迅全集 第九卷 中国小说史略 汉文学史纲要》,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9.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11 月第 1 版。
10. 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东方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1. 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2. 孙一珍:《明代小说简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1 版。
13. 张俊、沈治均:《清代小说简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1 版。
14. 付丽:《明清小说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15. 高玉海:《明清小说续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16. 袁世硕:《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齐鲁书社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7. 皋天厚:《明清小说的文化审视》,学苑出版社 2005 年版。
18. 李保均:《明清小说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19. 陈其欣:《名家解读〈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20. 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21. 冯立鳌:《三国风云人物正解》,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22. 黄侃成:《施耐庵与〈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版。
23. 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施耐庵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8 月版。
24. 竺青:《名家解读〈水浒传〉》,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25. 余大平:《草莽英雄的悲壮人生〈水浒传〉》,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版。
26. 陆钦:《名家解读〈西游记〉》,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27. 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年版。
28. 盛源、北婴:《名家解读〈金瓶梅〉》,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29. 张国风:《〈金瓶梅〉描绘的世俗人间》,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版。
30. 王平、李志刚、张廷兴:《金瓶梅文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年 4 月版。
31. 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32. 张宝坤:《名家解读〈红楼梦〉》,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33. 周汝昌:《曹雪芹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 年 4 月第 1 版。
34. 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中国书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35. 吴新雷、黄进德:《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9 月第 1 版。
36. 曾保泉:《曹雪芹与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37. 竺青:《名家解读〈儒林外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38. 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6 月版。
39. 孟醒仁:《吴敬梓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3 月第 1 版。
40.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汇编 研究明清小说专著序目(上、下册)》,天一出版社 1982 年版。

后 记

拙作《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能够同广大读者见面,首先应该感谢江苏省高校重点学科——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学科组的无私扶持,尤其是学科总带头人、国内古代文学知名学者、学院副院长张强教授的亲切关怀和指点,其次要特别感谢上海三联书店及其责编彭毅文对本书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

由于任务紧迫和水平所限,本书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热情欢迎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赵维平

2006年12月30日于淮安